告猫眼网友:

东夫所著: “麦苗青菜花黄__川西大饥荒纪实”一书，已在香港出版，获得较大积极反响。该书为余习广主编“大跃进.苦日子研究丛书”系列之四。

今获东夫委托，我在猫眼全文发出，以飨长期支持我的猫眼网友！

下面为原书全文。

余习广主编之“大跃进.苦日子研究丛书”(4)

麦苗青菜花黄__川西大饥荒纪实

东夫著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大跃进·苦日子研究丛书”系列之四

主编：余习广

写 在 前 面 的 话

余习广

四川是遭受大跃进人祸最为惨重的地区，在大饥荒年代里，人口死亡超过一千万以上。本书是第一本记述四川大跃进和大饥荒历史的著作。

作者历时十余年，收集了包括数百万文字的历史档案的大量史料，采访了数以百计亲历过那段历史的各级干部和群众，用事实说话，真实地再现了那段历史。

作为与作者心志相通，方法相通的大跃进研究者，我曾对东夫兄言：在这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的当今时代，你我立志与斯道之中，无疑是一对痴情汉，两个泼胆人！人前人后， 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没有理解，没有支持，没有同道，只有坎坷，只有付出，只有痛苦，只有眼泪，只有信念的支撑！箇中滋味，非当事人，衮衮众生，几人是知音？！

作者以他人所不及，经过长达十余年的努力，终成本书！

该书以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之际视察过郫县红光公社，和地处天府之国核心地带的温江地区为基本历史线索，用真实的事实，反映了在大跃进•苦日子时期，该地区和整个四川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形形色色的人物及其命运。

本书笔触所至，上自中央大政，下至基层所为；上至“伟大领袖”的浩然神思；下至省、地、县、社、队各级干部的所作所为，以及黎民百姓的苦难命运，一一以客观冷峻的文笔娓娓道来。既有全国和全省的全局性展现，也有局部典型的展开。从而不仅展现了上层的政治博弈，也展开了当时社会运动的波澜起伏。

读者深入其中，将真切地触摸和感悟到那个不可理喻、骇人听闻的时代！置身与活生生的人物和可以感受身同的事件之中，你将了解到这一切发生的历史脉络。

本书文字洗练，叙事生动，大开大合，喻理于事，脉络清晰，把握历史和场面游刃有余，自成中国当代历史写作之一体。使人在随笔心动的同时，感受到作者独特的眼界、思考和感染力。

麦 苗 青 菜 花 黄

东夫著

目录

序言 历史不应当缄默

开篇：祭大饥荒四川千万亡灵

第一章 步步高
1、跃进号角
2、龙行一步，百花沾恩
3、新秩序
4、革农民的命
5、第一轮饥荒
6、连滚带爬进入社会主义
7、减产风波
8、不通就辩
9、童话世界
10、迷信扫荡科学
11、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第二章 天堂梦
12、高烧一亿度
13、卫星大赛
14、杯水车薪
15、粮食多了怎么办
16、人民母社
17、万斤田争论
18、仗义执言
19、一级哄一级，农民哄肚皮

第三章 走向深渊
20、子虚乌有的“瞒产私分”
21、给农民“算”出粮食
22、出气筒

23、“饿死都不要管他”
24、主席的方法论
25、良知真情
26、惭愧万家百姓心
27、政治测验
28、让历史去做结论
29、先下手为强

第四章 大饥荒
30、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
31、恶兆
32、沉默的羔羊
33、昏天黑地
34、光环下的罪恶
35、黑白颠倒，好人遭殃
36、饿痨病
37、灾难中的妇女儿童
38、猪贵于人
39、衰竭的“心脏”
40、丢卒保车
41、农民万岁

第五章 迟到的春天
42、经是好的，叫和尚念歪了
43、“失控”下的复苏
44、且战且退
45、各吃各、各吃各……
46、“团结起来犯错误”
47、跃进盘点
48、秋后算帐
49、1962 年
50、年年讲、月月讲

尾声：戏剧人生

附表：
四川农村人口及粮食情况
1950—1963 年四川人口及自然变动

开篇：祭大饥荒四川千万亡灵

20 世纪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神州大地爆发了一场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普遍统计饿死人 3500——4000 万。四川是这场大饥荒中的首屈一指的重灾区，饿死的人超过一千万，几乎是全国的饿死人总数的三分之一。

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举例而言：据 1947 年 2 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关于抗战损失和日本赔偿问题报告》所记，从 1937 年 7 月 7 日至 1945 年 9 月 3 日的八年抗战期间，全国军民在战争死亡的总人数为 572 万多人，其中军人 1，328，501 人，平民 4，397，504 人。这就是说，仅仅四川一省在大跃进年代饿死的人，就远远超过八年抗日战争全国军民的死亡总数！

酿成这场惨祸的直接原因，是一场叫做“大跃进”的工业化运动。

为了在一夜之间成为国富兵强的超级大国，整个国家全体民众被动员起来投入疯狂的工业建设。为了满足陡然增加的城市和工业建设人口的庞大需求，政府不顾一切地争夺包括粮食在内的农村所有资源。那时候的农业生产水平本来就很低，又受到不断升级的集体化规模和蛮横的乱指挥的破坏，而各级政府又肆无忌惮的浮夸产量和加大征收，这一切使农民的生存条件急剧恶化。到 1959 年下半年，整个国家的经济已经被搞到崩溃的边缘，毛泽东却在中共庐山会议上将理性和良知的声音打压下去，不惜一切地继续搞大跃进，各地以“先下手为强”的极端手段拿走农民最后一点粮食，全国性的大饥荒随即在 1959 年到 1960 年的冬春之际爆发，大规模的死亡遍及大江南北。

这是大跃进期间死人最集中、最惨烈的一个冬春，饿死的人占整个大跃进时期死人的一半以上。

四川素称“天府之国”，历来是全国的产粮大省。抗战八年，四川提供了全国三分之一的军粮。之所以死人全国之冠，根本原因在中共中央的路线，同时地方领导人也难脱干系。四川农村自建国伊始，就处于高征购的重压之下，农民的平均口粮标准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标准，饥荒时有发生。例如建国初期川南征粮太多，造成百万饥民，当时的川南区首长李大章 给在重庆的西南局领导邓小平反映困难，还挨了邓的批评。又例如，1953 年实行统购统销的当年，川西有的地方就发生了缺粮导致的“脚肿病”。但四川的征购仍然年年加码，成为外调粮食最多的省，凡是反映粮食减产、征购过高、农民缺粮的人，无不受到打压。

因为外调粮食多，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受到毛泽东的赏识。

1958 年大跃进开始，李井泉和上海的柯庆施、广东的陶铸一起升任政治局委员，成为大跃进的得力干将，在推行一系列极端而荒唐的做法上，表现得比多数地方大

员更左，骇人听闻的大浮夸，强迫命令的高指标，主观主义的高估产，杀鸡取卵的高征购较全国各地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还有独树一帜的新花样。

到 1959 初，四川各地农村已普遍发生缺粮和饿死人的现象，他仍然无视农民的困苦，坚持大批外调粮食，明知会饿死人也在所不惜。在这年庐山会议上，他是批彭德怀最起劲的人之一，在贯彻毛泽东继续跃进的路线和反右倾运动中，表现得尤其积极，就在一些省的领导已经开始收敛、向中央叫苦的时候，他却还信誓旦旦地保证四川有粮食外调。庐山会议后的那个秋收，全四川粮食征购竟然占到实际产量的将近一半（48.9%）！许多地方秋收一结束就断了粮。在将农民的救命粮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各地的同时，全川更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一哄而上，仅仅修水库就上了 600 多万人。当这个黑色的冬天降临的时候，农民唯一吃饭的地方公共食堂大批停火，惨绝人寰的大饥荒爆发了……

如今 50 岁以上的四川农民，无不对当年的大饥荒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其间发生的悲惨故事，足以让人类社会任何与饥荒有关的故事相形见绌。因营养不良导致的水肿、妇女停经子和宫脱出、小儿干瘦等几乎无人幸免。全家死绝、全村人死绝屡见不鲜，无力掩埋的尸体遍布荒野田间。吃人的事多有发生，死人被食、杀人而食、夫妻老少兄弟姐妹之间互食、食人者又被人食……。而种种不可理喻的倒行逆施，更把农民逼入走投无路的绝境。

如清查“瞒产私分”——硬说粮食是被农民私分隐藏了，大肆查抄以至挖地三尺；如“砸锅运动”——以防农民在自家煮东西吃，否则治以重罪；如打人成风——农村基层干部以骇人听闻的残暴武力惩治不服从其荒唐命令、敢于讲真话、或为了活命“偷吃”农作物的人。有的地区死人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如川东的涪陵专区死人逾三成，川西的荥经县死人一半，川中的简阳县四年间减人 37 万……。

农民因饥饿而普遍浮肿、大批死亡的情况，至少在 1960 年春夏之间已经为省领导掌握，并向给中央领导做了报告。

但对外依然编造谎言指鹿为马以继续高征购和维持大跃进局面，任何与缺粮、饥饿相关的字眼都成为禁忌，甚至不能说浮肿是缺少营养所至，否则就会遭到严酷的打击。然而局面迅速崩溃，饥饿、浮肿和死亡开始向城市蔓延，继续外调粮食的可怕后果不言而喻，省上深感恐慌，包括李井泉在内的省领导不得不向中央诉苦。

但此时全国都处于饥饿和死亡的威胁之中，在中央一再催督下，四川被迫继续大批外调粮食，理由是“人死在山沟里，总比死在王府井大街强”。

四川的高征购由来已久，大跃进又左得出奇。当全国各地普遍开始纠左的时候，李井泉又迟迟不愿收手，下放农村所有制单位一拖再拖，解散公共食堂比全国晚了半年。如此的结果，是四川的饥荒持续的时间最长，——1958 年就出现饿死人，1962 年还在饿死人。

李井泉在大跃进中的所作所为，引起四川许多干部反感和愤怒，1962 年初中央七千人大会上，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明朗向中央写匿名信状告李井泉，迫使李井泉给

四川到会干部做检讨。

继后，重庆团市委书记廖伯康、副书记于克书统计出四川饿死人上千万，并当面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做了汇报。事实上，正如杨尚昆在听取廖伯康汇报时所言，四川饿死人的情况中央已经掌握。

当时四川公安、卫生部门也有内部掌握的资料。这个数据之所以长期保密，可以用省长李大章当时的话解释。

1962 年七千人大会后，四川省举办县以上干部轮训，发扬党内民主总结教训，许多干部穷追不舍，要代表省委做检讨的李大章讲清楚四川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李大章的回答说：你们都是从县、地委来的，县里死了多少？地区死了多少？你们不是比我更清楚吗？你们问我，我只知道非正常死亡很大，为什么不向大家讲，是因为中央主张不讲好。这不是中央护短，是因为讲了以后，有好处还是有坏处？这就要考虑讲好还是不讲好，讲有利还是不讲有利。

刘少奇曾忍无可忍地对毛泽东说，“饿死人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书的。” 他相信这一页历史终究会加载史册，是抹不掉的。

然而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在中国大陆写这一页历史的人并不多。执政方面不愿讲这段历史不难理解。然而自诩“社会担当”、“人文关怀”的知识分子集体失语，只能视为丑陋。就整体而言，他们自反右运动被打断脊梁骨以后，腰杆从来就没有挺起来过，这是外力。还有他们千百年修炼出来的内功——蝇营狗苟于一己之利害得失。其实他们在大跃进中的表现并不光彩，肚子方面，除了少数被流放的右派，和工人阶级城市居民一样饭总是有吃的。

于是就出现这样的景观：当权者不声张，学界不开腔，死者无可言，生者能言者不言，绝大多数亲历者——农民不能言，致使这段历史逾见为世人生疏，对年轻一代更成了天方夜谭。一旦有人提起，还总有几幅“知识”颜面跳出来“打假”。

作者以为，“人相食”——饿死人的惨状不能不写，一定要给后人留下真实的记载。而真实地记录当时社会现实，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各社会阶层活动，让后人从中了解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其来历所在、后果所及，从而引发其何以发生、何以防止其再发生的思考、警示，其意义更不可忽视。

出于这个想法，这本书以大跃进中毛泽东视察过的郫县红光公社和地处天府之国核心地带的温江地区为基本历史线索，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以大量活生生的真实故事（除极个别的人物采使用了化名，所有的人名、地名、单位都是真实有据的），反映该地区和整个四川大跃进期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形形色色人物的命运，力图使读者真切地触摸到那个匪夷所思的时代，建立自己的记忆、思考和判断。

作　　者

第一章 步步高

1、跃进号角

1958 年 3 月，正是川西平原如诗如画的季节。暖融融的阳光下，满眼是金灿灿的油菜花绿油油的麦苗，蜜蜂在菜花中穿梭飞舞，轻风拂过，沁香醉人。

那年月，整个川西坝子几乎没有什么工业，空气如水晶般洁净，人们还可以体验杜甫笔下“窗含西岭千秋雪”的景观。天一放晴，湛蓝的天空白云似丝絮般游走，西部透迤苍莽的群山和巍峨峻峭的雪峰历历在目。平原上林木繁茂，密如蛛网的沟渠，错落星散的农舍，随处可见的坟园寺庙无不掩映于苍翠之中。

出四川省府成都市老西门，沿成都至灌县西行十多里地，有一个花团绵簇，戒备森严的神秘去处。就在这个非同寻常的春天，新中国的缔造者们在此举行中央工作会议（史称成都会议），这是建国以来在四川举行的最高级会议，也是对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一次会议。

金牛坝招待所所据地盘，原是一片长满青松、银杏、古楠的大林盘.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高官要员及社会名流在这里建有几栋平房别墅。1953 年成为中共四川省委的疗养院。1955 年,周恩来出席万隆会议归国路经成都曾在此下榻，成为它接待的第一位中央首长。

1956 年，四川省委决定将其建成具有当时一流水准的，接待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高级外宾和召开高级会议的庭院式招待所。

为此，四川省公安厅厅长带领工程技术人员专程赴中南海考查。扩建后的招待所占地 400 亩，并将园内和周围一公里范围内的农户全部迁到东面新建的跃进村。到 1957 年建成西楼、小礼堂、平房和游泳池。

平房是为毛泽东准备的，占地 2200 平方，有包括书房、卧室、客厅在内的两大

套房间，房内门窗地板全部使用古楠木制成。室内游泳池照搬中南海的游泳池规格，长 32 米，宽 25 米，深 2.5-7 米，相当于跳水池的深度。水由锅炉加温，室内有暖气设备。按照毛泽东的习惯，游泳时水温加热至 27 度，室温控制在 29 度。水源使用地下水，金牛坝抽出的地下水水温在 9 度左右，加热至上述标准温度，一次耗煤 24 吨。园内除保留原有的古楠、银杏等外，还遍植海棠、兰草、山茶等花木。

首任所长由曾经在中南海工作过、熟悉毛泽东等中央首长生活习惯的刘正礼担任，并建立起完备的保卫、医疗及食品检验等机构。

3 月初，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各省、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各部委领导陆续抵达成都。国防部长彭德怀因在成都军区检查平叛工作迟到一步。

3 月 4 日，毛泽东携随行人员乘专机飞抵成都，住进金牛坝招待所平房。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由省委副秘书长周颐陪同绕城浏览成都，这是他一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来到川西平原。23 年前的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试图进入四川，被蒋介石组织川军阻挡在川黔边界，不得不绕道云南和川西北高原，爬雪山过草地历尽艰险。这次他要看看被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吟颂的历史名城，富甲天下的天府之国。



成都会议，吹响了大跃进的高调进军号。图为成都会议合影照，注意：毛泽东左边是李井泉，右边是刘少奇。这是李井泉非常珍视的照片。

黑色的苏式吉姆高级轿车自西向南绕城而行。成都的城墙系康熙年间重建，东西 9 里 3，南北 7 里 7，周长 34 里，高三丈，大部保存完整。靠环城马路和城墙边有大片低矮破烂棚户，毛泽东“神情严肃”地对周颐说：你们这里解放这么多年了，还不能给群众盖些瓦房吗？群众住在这种地方怎么能休息？又怎么能讲卫生、除四害？

四害是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

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 1956 年到 1967 年农业发展纲要规定，从 56 年开始，分别在 5 年、7 年或 12 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把它们基本上消灭掉。

声势浩大的全民除四害、六害、七害战争硝烟迷漫，“四无村”、“四无乡”纷纷出现，雄壮的歌声四处飞扬：“麻雀麻雀你往哪里逃，天罗地网已安排好，轰、毒、打、掏办法多呀，要叫你断子绝孙把户口销！咳！”

谢觉哉赋诗：“除非你有劲，飞到美国去”。

美国《芝加哥每日论坛报》的社论则建议，“美国政府也许可以同共产党中国作一笔双方有利的交易，共产党不要把麻雀消灭掉，而把它们捕捉后活活交给我们，以便让它们吃掉由政府亏本收储的剩余农产品。”

人民日报上的一幅漫画描绘，1968 年老鼠的标本已和恐龙一起在博物馆展出，解说员指着恐龙标本对孩子说：“这种动物现在已经没有了”。孩子说：“我知道，这一定是老鼠”。

有碍观瞻的破烂棚户当然不在主席巡视的节目单中，但毛泽东行止往往随心之所欲，兴之所致，信马由缰，不由人指使安排。于是他又发现一道独特景观。他说，四川的茶馆真多，我看见乡场上有，城市也有，你们四川是几天赶一场？

破破烂烂的房子，乡场上、城墙边一个接一个的茶馆里坐满闲散的茶客，这种又穷又懒的模样让一心想使国家迅速富强起来的毛泽东很不满意。

1958 年 1 月，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写道，“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夺取政权后搞土改，土改一完成就搞农业合作化，接着是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接着又是反右为中心的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经济太落后，“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还是感到受束缚”，所以在打完上述一系列胜仗之后，需要马上来一场“技术革命”，在 15 年或者更多的一些时间里赶上和超过英国。这是他 1957 年 11 月参加苏联十月革命 40 周年庆典时提出的，那时候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要在 15 年内赶超美国，毛泽东说我们也可以讲，15 年后，我们也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年底，全国几千万农民投入兴修水利，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在伟大领袖的策动下，整个中国已处于狂热的燥动之中，准备迎接一个经济上翻天覆地的时代到来。

听了主席的问话，副秘书长周颐自然有些惭愧。他回答，这里的场期不一，有的是三六九，有的是二五八，有的是一四七，一个区的范围内，几乎天天有场可赶。

毛泽东问："乡下一碗茶是多少钱？"

"看茶叶好坏，三五分不等。"

毛泽东掰着指头算了算："就算一个社员每月赶七八个场，光茶钱一年就好几块钱。……场期过密了，不可以改革一下吗？"

是啊，调动中国巨大的人力资源，什么人间奇迹创造不出来呢？事实上半年以后市场就取缔了，茶客们的幸福时光也成了回忆。

汽车沿着城墙走了好长一段时间，毛泽东问："这个城墙为什么还不拆除？"

周答："这个问题省人代会上讨论过，有人提议拆，有人说这是文物，不能拆，要保留。"

"为什么不能拆，北京的城墙都拆了嘛。这城墙既不好看，又妨碍交通，进出城很不方便。城墙是落后的东西，拆了方便了群众，土可以做肥料，砖可以修房子。拆掉是先进，不拆是落后。"（见周颐：《回忆毛主席 1958 年在成都》）成都市的城墙在这一年大规模地拆毁， 城墙砖多半用来砌土炼钢炉，墙土用来炼硝和做肥料。



拆成都老城墙时的情景。

汽车经南门华西坝四川医学院，一直绕行至东郊。

东郊是建国初期规划的工业区，一批由苏联及东欧国家援建的企业正在大兴土木。首批援建的，拥有当时国内最先进技术和设备的量具刃具厂引人注目，毛泽东让小车直接开到车间旁，对警卫人员说："不要去告诉党委，他们很忙，只请一位工人带路就行了，看了车间就走。"

他下车直接进车间一边观看一边同工人交谈，书记厂长闻讯赶到，他已走了两个车间。消息象闪电般传遍全厂，数以千计的工人放下工作蜂涌而至，"毛主席万岁"的呼喊震耳欲聋，秩序发展到难以控制，以致毛泽东都担心人被踩伤，警卫人员使出浑身解数才让毛泽东脱离了层层包围，登车离去。

如今日 40 岁以下的人，很难想象那时的人们对毛泽东是何等崇拜。他们衷心高唱“他是人民大救星”，在老百姓心目中，他是神，却又比神更亲切，因为他活着，就住在圣殿般的北京城；他是贤明的帝王，却又比帝王更令人崇敬，因为他是人民的领袖，他为人民谋幸福。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的福祉，中国的未来和希望全都和他的名字联在一起，能够亲眼看见毛主席是亿万中国人最幸福的梦想。突然有一天，他竟然出现你的身边，甚至和你握手、谈话，那是什么感觉！

毛泽东深知他在群众中的威望，他相当的自信心就建立在此之上。建国以后，他有两次和群众见面的高潮，一次是 1958 年，一次是 1966 年，每次都掀起全民性的狂热并达到了他发动社会革命的目的。这种狂热的局面一旦造成，任何力量莫可阻止。

3 月 7 日下午 3 点，他又突然出现在杜甫草堂。毛泽东曾公开表示过他对杜甫“不甚喜爱”，他喜爱狂放不羁的李白，也许他们在气质上有某种共同之处。善解毛泽东之意的郭沫若后来为此专门写了扬李抑杜的《李白与杜甫》一书。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读杜甫的诗，参观完后，派人到杜甫草堂借去各种版本的杜诗 12 部 108 册。

离开杜甫草堂，他到成都市中心的跃华餐厅就餐，这是一家建国前就很出名的高级餐厅。

服务员激动得连桌布都铺不好了，毛泽东吃了回锅肉、鸡丝面、赖汤元等，对麻辣味的川菜大为赞赏。此后，餐厅就把他进过餐的地方布置成纪念馆。

毛泽东还去了武侯祠，但未见诸于当时的公开报道，大概是因为诸葛亮属“帝王将相”之列，不合时宜 。陪同他去的只有很少几个人。

据说他在诸葛丞相祠堂的一幅楹联前伫立良久，那是清末四川盐茶道赵藩所撰：“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回到金牛坝，他又要田家英找人去把楹联抄给他，领命办理的省委办公厅副主任黄流这才知道毛泽东去了武侯祠。

24 年后的 1972 年，刘兴元调任四川省委书记时，盛传毛泽东特意叫他去武侯祠看这幅楹联，一时间这幅楹联广为流传。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期间，数次外出都是下午，唯有 3 月 21 日到灌县(今都江堰市)是上午出行。

春光明媚，望着车窗外遍地的金黄嫩绿，毛泽东显得极为高兴，川西坝子的肥沃富庶，一定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玉垒山上，都江堰工程一览无余，毛泽东举起望远镜向西北眺望，久久伫立不动。那是当年红军走过的雪山草地。

23 年前，他还率领着一支疲惫饥饿的队伍在那里行进，尚不知下一步到何处立足。物换星移，苍海桑田，如今他已是拥有六亿多人口的统一强大、欣欣向荣的新

中国的领袖，而那个一度置他于绝境的蒋委员长，已经“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人们看见他笑了，笑得很自豪。他已经创造了许多震惊世界的历史奇迹，还有什么奇迹不能创造呢？

伏龙观下，汹涌的江水直扑离堆，然后转身咆哮东去。毛泽东问都江堰管理处处长张建中：“这里有多深？”张答：“有 8 公尺深”。“有没有人下去游过？”“没有”。毛泽东笑了“我想下去”。众人顿时哑然。即使是说说而已，谁能把伟大领袖的话当玩笑？万一此话当真，出了事谁能担载得起？这水能把漂木都卷下去啊！

也许毛泽东只是对从没有人下去游过而言，他对任何前人不敢想、不敢做的事都抱有一种挑战心理。接着他让大家把提着的心放下来，指着脚下的离堆问：“这岩会不会被水冲毁”。张缓过气来答：“不会，这是粒岩，很坚硬。”

“一百万年以后会不会？”众人又被打哑。

事后人们反复逐磨领会，“认为这确实是个关系到川西平原安全，关系到子孙万代幸福的问题”，使用钢筋水泥对离堆进行了加固。

曾经引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毛主席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

参观都江堰水利工程模型，张建中介绍飞沙堰的作用是溢洪排沙，毛泽东指着内外江分流处的鱼嘴说，“修个闸门不更好吗？”众人一齐叫好，后来果然修了闸门。张介绍内江年年要岁修，挖泥淘沙。毛泽东说：“那 1 百万年以后，成都平原的泥沙没处堆了。”人人张口结舌，实在难以理解。张后来回忆说，“后来看到毛主席先笑起来，大家才一起跟着笑起来。”

中午，毛泽东在县城一家餐厅吃饭，点了豆花和回锅肉。饭没吃完，整条街道已被闻讯而来的人们挤得水泄不通，陪同人员提心吊胆，毛泽东则频频走到窗前挥手致意。群众情绪如火上浇油，人人引颈掂脚，前拥后挤，热泪盈盈，万岁之声盖过咆哮的江流。

毛泽东的随心所欲，往往使一心想展示先进的地方官员陷于尴尬境地。

从灌县返回金牛坝时，刚出县城，毛泽东见路边的田里有几个社员在干活，叫车停下，跨过路边的小石桥朝田里走去，他见到的第一个人叫冉贵全，人民日报说，此公“以懒散著名，天天赶场吃茶，很少做活路”（见人民日报 1958 年 6 月 2 日 2 版：《八大决议鼓起我们的新干劲》）。他正是毛泽东看不惯的角色。

懒王做梦都没想到会在家乡的田坎上见到毛主席，目瞪口呆一句话说不出。毛泽东跨进麦田，见有杂草，说：“要把草除干净”，冉只知点头，毛泽东又问：“每亩收多少斤？”冉张口结舌，毛泽东伸出四个指头：“四百斤？”。冉终于开口：

“差不多，每亩四百二三。”

那年月，粮食产量是极为敏感的话题，它直接涉及到农民向国家交多少，自己

能吃多少。上面竭力抬高产量，以增加征购，认为农民总是竭力压低产量不愿向国家多交售，毛泽东自己就是这么认为的。他问冉：“粮食多了怎么办？”冉答：“卖给国家”。毛泽东问：“卖给国家，你们赞不赞成？”冉答：“当然赞成”。毛笑着说：“我看你就有些不大赞成吧？”周围的人都笑起来，冉没敢笑，这可是罪过不小的事啊。

毛泽东又跨进一块苕菜田，和几个妇女一起摘苕菜，记者的镁光灯在昏暗的田野里闪个不停，没见过世面的农民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弄得紧张万分，连“毛主席”三个字都没叫出口，直到毛泽东的车队消失在暮色中，有人才如梦初醒地叫起来：“毛主席来了！”。

第二天，莲花一社召开社员大会，一致通过更名为“幸福社”。社里的干部硬是想不通，懒王冉贵全为何有这份福气！

毛泽东在金牛坝招待所住了 23 天，当年专职为毛泽东服务的服务员蒋富全回忆，毛泽东生活俭朴。他象行军打仗一样随身带一个旧马搭子，里面装着毛巾被、棉毯 、枕头、衬衫、布鞋，都是旧的。一住进招待所，警卫员就把它们在房间里摆开。他的拖鞋严重磨损，梳子断齿、睡衣肘上补着两个大疤，不睡为他准备的软床要睡硬板床，而且只垫一层垫子。他对服务员十分和气，服务员掺茶他有时会站起来接。吃饭很简单，每餐只要两菜一汤。在招待所吃第一顿饭就说：“四川是天府之国，吃这么好的大米啊！下次在饭里掺些杂粮。”

毛泽东几乎总是下午出行，这和他与众不同的生活习惯有关。

蒋全富说，毛主席总是晚上办公和读书，凌晨睡觉，下午一点左右起床，参加会议或听汇报，六点钟左右吃饭，饭后散散步，然后参加晚会——跳舞或听川剧，当时的川剧名角陈书舫 、杨淑英、周企和、小艇、小舫都曾登台献艺。晚会后游泳，他喜欢仰泳，长时间一动不动仰漂在水面上，游完泳躺在池边的躺椅上让英文秘书林克教英语。

尽管毛泽东是会议主持人，与会者也都住同一个招待所，但他到会的时间并不多，和其它中央领导保持着一种有形或无形的距离。

由于作息时间的与众不同，上午他一般不到会，下午也不一定到会，会议一般由刘少奇主持。晚上则多半在看书。

一到成都，他就叫秘书田家英到省、市图书馆借了一大堆有关四川的志书、人物传记和诗词等。如《华阳国志》、《四川省志》、《蜀中名胜记》、《战国策》以及《薛涛集》、《宋诗选》、《老残游记》、《西厢记》等。他提出要读金圣叹批本的《西厢记》，由于此书稀缺，省委办公厅主任黄流和几个人八方搜寻，终于在四川大学图书馆找到。他不仅自己读，还要到会的人读，先是选了李清照的诗《声声慢》、枚乘的《七发》、邹容的《革命军》、《苏报案实录》、苏联的《威廉氏的土壤学及其发展近况》

等几十篇文章印发到会者阅读。

他还选了几十首古人吟颂四川的诗词，指示印发到会者，田家英半夜三更找到黄流让四川日报印刷厂加班加点印刷成册。离开成都时，他退还的书装了一吉普车。

招待所的两大套平房，毛泽东住一套，他的随行人员李树怀、李银桥、医生李志绥等住一套。刘少奇住 2 号小楼，周恩来住 3 号小楼，陈云、邓小平及其余人住大楼（西楼）。有两位特级厨师专门给毛泽东做饭，他或者在办公桌上吃饭，或者在平房的小会议室吃饭，从未到餐厅和其他人共同进餐。游泳池里，有一男一女两位服务员专门为他服务。他抽听装的英国三五牌香烟，出门时就叫服务员把烟装到大前门烟盒里带上。

毛泽东在成都期间生过一场病，大概是对学西医的医生李志绥的药方不太信任，特意请来著名中医、成都中医学院院长李斯炽。李赶到金牛坝，见毛泽东懒散地躺在床上昏睡，发着高烧。李开了普通的中药退热药方，毛泽东服后第二天就好了。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关心和尊敬给服务员留下深刻印象。

他见到毛泽东的专职服务员蒋富全和杜永昭(女)，第一句话总是问主席休息得好不好，吃饭好不好，并要服务员每天向他汇报。有事要见毛泽东，总是先向服务员打听主席有没有空，待服务员进去报告后再进屋。

平房的会议室放着舒适的沙发，周向毛汇报工作从不坐沙发，要服务员搬一张靠背椅正襟危坐，那只伤残的手臂悬在空中，服务员于心不忍，就用靠垫给他垫在手臂下。服务员还发现，周总理每天深夜处理完工作后，又拿起床头上夹着许多纸条的《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等专心阅读。

有一夜他凌晨三点多钟才睡，一大早女服务员张谊贤听说毛主席叫周总理饭后去研究工作，赶忙把早餐送去。周总理说："我不饿，我到毛主席那里开了会再吃"，接着就忙着看材料。从毛泽东那里回来，已过了中午 12 点，张谊贤难过得把眼睛都哭肿了。

虽然到会的时间不多，然而会议的整个进程完全在毛泽东的控制支配之下。

从 1957 年下半年以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宏伟计划在他充满想象力和豪情壮志的头脑中逐步形成。1958 年新年伊始，他接连主持召开了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一再批判党内的“反冒进”主张，提出不断革命论和 15 年超过英国等一系列大跃进口号。

事实上，建国后在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速度问题上，毛泽东和党内众多领导人历来就有分歧。

毛泽东几乎是主张越快越好，而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在内的一些人却持稳妥态度。在农村，从互助组、合作社到高级社，后者一再反对冒进。毛泽东的意

见占上风时，合作化的速度便加快，当后者的意见占上风时，就加以控制和收缩。毛泽东对此甚为不满，他始终认为，土地改革后分到土地的个体农民，若不尽快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很快就要出现两极分化，产生新的剥削阶级，无异于旧制度复辟。他坚信，尽快地实现公有化，变小农经济为社会主义大农业，是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的唯一途径。

1955 年下半年，毛泽东对党内的反对意见失去了耐心，对一再反对强制推行合作化的中共中央农工部长邓子恢等人提出严厉批评。

他以极大的热情，用 11 天功夫，看了 120 几篇关于农业合作化先进单位的报告，写了序言，给几十篇报告写了按语，编辑成《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刮起合作化的旋风。

短短一个冬春，全国便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并且开始由初级社转为规模更大的高级社，生产上不顾实际的强迫命令，剥夺农民私有财产的共产风开始出现，当年即造成农业减产。

1958 年年初的南宁会议上，周恩来、李先念批评冒进的话被作为反面材料印发，毛泽东扬言，反冒进离右派只有 50 米远，是政治问题，令全党震惊。

成都会议继续对“反冒进”进行清算。毛泽东让会议重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部分按语。他说，他没有料到 1956 年国际上发生两件事，即批判斯大林和波匈事件，也没有料到 1956 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 57 年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影响。如此一来，就把国际国内“反革命”同“反冒进”罗织成一个遥相呼应的阴谋。

虽然毛泽东说，他绝无要哪个同志不好混之意，实际上“反冒进”的周恩来等人已经“不好混”了。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先后有六次讲话，随着事业的成功和个人权威的膨胀，他出言愈益显示出才气、霸气、仙气。旁征博引神思飞杨谈笑风生妙语连珠是为才气，居高临下睨视一切舍我其谁一言九鼎是为霸气，旁敲侧击语义双关漫无边际莫测高深是为仙气。才气令人倾倒，霸气令人臣服，仙气却让人害怕。你得反复琢磨回味试探，万一理解不透，或者干脆理解反了——这是极有可能的，也许从此种下祸根或大祸临头。

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经济指标搞“两本帐”，把小农业社合并为大社等 37 个中央文件。而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是，毛泽东首次肯定了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从此将国民经济纳入了大跃进。

几千年的专制统治，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积淀下根深蒂固的皇权至上思想，他们总是把福祉寄托于一个好皇帝，这是个人崇拜最深厚的文化土壤。如果最高统治者，尤其是毛泽东这样的开国元首有意要利用它来为某种政治路线服务的活，很容

易办到的。

直至1956年的中共八大，还正确地申明反对个人崇拜。促使毛泽东将个人崇拜“合法化”的直接原因，一个是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搞个人崇拜，一个是党内与他针锋相对的“反冒进”。

在他看来，这些人敢于和他作对，是受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鼓舞，发展下去，将对他的权威构成威胁，使他的正确路线得不到贯彻。他发觉党内和他意见相左的人为数众多，对集体领导缺乏自信。“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是他常说的一句话，而他坚信真理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

“中国的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我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服苏联强大的压力”——他在讲话中说：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又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

他接着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折，盲目崇拜，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1958年3月10日）。

服从真理和个人崇拜两个不同的概念，就这样被归结为一回事：谁掌握了真理就要崇拜谁，换句话说，要崇拜掌握了真理的人。掌握真理的人可以独裁，可以不要集体领导。而且，不言而喻，真理是掌握在毛泽东手里的，这已为几十年革命实践所证明。

毛泽东此话一出，立刻就有人加以发挥。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表示：“对主席就是要求迷信”。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更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毛泽东在1月份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发明了“生产计划两本帐”的计划工作办法。简称“两本帐”。

即在制定生产计划的时候，要定两个指标，一个是内部掌握的必须完成的指标，一个是对外宣传的，争取完成的指标，后者要比前者高出许多。他宣称这是“计划上的一个革命”，它的优越性在于发挥群众的干劲，促进生产高速度发展。不仅中央要搞两本帐，地方也要搞两本帐。这就等于明确规定，为了“调动积极性”，对外宣传的指标可以是虚的，不一定非完成不可的，给接踵而来的恶性浮夸打开了大门。

至此，毛泽东清除了一切障碍，把中国经济建设送上了“大跃进”的轨道。

会议期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也到附近视察。这些视察引起的反响，当然远远不能和毛泽东的相比。而毛泽东的视察影响最为深远的，是视察郫县红光社。

2、龙行一步，百花沾恩



成都会议，是毛泽东加速大跃进的标志。当此之际，他来到红光社，跨过这条小沟，考察田里的麦子和油菜。随即，一首“麦苗儿青来菜花儿黄”唱遍大江南北。图为 1984 年水沟上修建的“幸福桥”。（东夫摄于 2000 年）

红光社位于金牛坝以西几公里的合兴乡境内。1952 年土改后，合兴乡双桂村雇农周桂林和萧绍群两口子，带头组织起全乡第一个互助组，1954 年在县上工作组的帮助下，成立起全县第一个初级农业社，两口子一个当社长，一个当副社长。全社开大会讨论了取个什么响亮的名字，队长张登云说，毛主席来了太阳红，就叫“红光社”，众人鼓掌叫好。1956 年红光社由初级社转高级社，1958 年初又将 6 个高级社合并为一个 940 户、26 个生产队的大社，是从县到省的合作化先进单位。

毛泽东到成都后，给形影不离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打招呼，说要到一个合作社走走。

知道毛泽东脾气的李井泉事先安排了新都的一个社和郫县的红光社，都作好接待准备。出金牛坝招待所大门，如果毛泽东往左走，就到新都的社，如果往右走，就到红光社。得到消息的温江地委，在全区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除四害突击，数百万人奔跑于田间追赶麻雀，以壮观瞻。县委书记们在温江等待了三天不见动静，悻悻而返。

那时候温江专区各县均没有小汽车，郫县县委第一书记刘致台接连几天一直骑自行车在金牛坝招待所门口等候。

3 月 16 下午 4 点左右，毛泽东起床，决定到乡下走走，李井泉陪同，汽车出招待所大门，李问毛泽东往哪边走，毛泽东朝右边一指，让红光社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历史。新都县委女书记王海香因此没见到毛主席，伤伤心心哭了一场。

红光社几天前已经接到通知，说有中央首长要来视查。16 日这天，县委农工部部长潘克之，办公室主任王春莲等，以及社里的干部一大早就在社办公室等候。那是川西坝子一个常见的阴天，等到下午六点暮色降临，还不见首长踪影，周桂林想中央领导劳累了一天，现在该吃饭休息了，就叫妻子萧绍群先回去喂猪。

萧绍群离开不久，村办公室的电话就响起来，通知中央首长已前来红光社，聚集在办公室的干部们前往公路边迎候，没走几步，两辆黑色轿车已经到达，担任向导的刘致台第一个下车，接着是身材高大的毛泽东。众人齐声吹呼。

毛泽东下车环顾四周，道：“这里是一片青枝绿叶啊。”随即说“我们先看一户人家好不好”，说着便信马由缰向就近的一户农舍走去。

按原先的安排，先是请毛主席到村办公室，县、社干部汇报情况，然后带主席到几户“政治上干净”的农家去看看。

毛自行其事去的这家人，男人叫温小凤，曾经做过甲长。乡下流传“乡长万户候，保长嘴流油，甲长啃骨头”，解放后保长以上都是“反革命”，甲长实际上是准反革命待遇。女主人叫林赛华，人称温幺娘，年近 60。因为这家人“政治上不干净”，常来常往的工作干部从不登门。

但是毛泽东迈开大步径直而入。大家只好笑嘻嘻地跟在后头。

这是一户典型的川西农舍，一片树林环绕着几间茅屋，屋前是一片小菜园，前甲长温小凤正在园子里种菜，见一群当官模样的人走来，知趣地躲到一边。毛泽东在院坝里看看问问，留下的一张照片里有一脸煌然的温小凤。然后毛泽东便一低头进了茅屋。女主人林赛华虽未接待过“工作干部”，却是见过世面的人，有时还略施脂粉，家里料理得井井有条，待人接物落落大方。

温幺娘正在害“火疤眼”，模模糊糊见一个高大魁梧的人走进来，后面跟着一大群干部模样的人，毛泽东操着湖南话给她打招呼，她并未认出来，问：“老同志，你是哪省来的？”

毛泽东坐到条凳上，打着四川话对她说：“我们摆一摆龙门阵好不好？”温幺娘把手中的水烟筒递过去请毛泽东抽烟。毛泽东接过水烟筒看了看，问她入社没有，何时入社，接着就提到最关键的粮食问题。

“你们一年分多少粮食？”

“几百斤。”

副社长刘贤松机警地补充：“分 450 斤”。

毛泽东：“他们说的不算，你们分多少？”

和懒王冉贵全一样，温幺娘迟疑不答。

毛泽东：“够吃吗？”

温么娘：“不浪费就够吃”。

毛泽东指着几个社干部问：“社长欺不欺负你们？”

温么娘笑了：“我们几个社长见人都是笑咪咪的，欺负啥子哦”。

毛泽东注意到周围的几个女干部，把 25 岁的县委办公室主任王春莲叫到身边交谈，王说她是来这里搜集“除七害数字”。毛泽东只知道除“四害”，问”七害有哪些。王答：“麻雀、老鼠、苍蝇、蚊子、跳蚤、臭虫、蟑螂。”

“蟑螂是什么东西？”

“农民叫偷油婆。”

“偷油婆是什么样子？”

人们急于想找出一只蟑螂给领袖看，蟑螂是昼伏夜出的角色，温幺娘家虽是茅屋一蓬，却收拾得很干净，忙了一阵没找到。



毛主席訪問四川郫县合兴乡紅光社，和农民温大娘談話，中为省委書記李井泉同志

毛泽东视察红光社，他在李井泉陪同下，在“温幺娘”家中了解民情。

毛泽东离开温幺娘家，她才听说那是毛主席，她因此自怨自艾了好些日子。

毛泽东顺着田间小道漫步走去，农民们谦卑地望着这位至高无上的伟人，许多人家的神龛上就供着他的像，他们要么没有认出他，要么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有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们好奇地向前凑。毛泽东摸着余万才挑在细细的脖子上的脑袋说："还差点营养"。

他问邓昌洪"一天打几架？"，邓洪昌答："一天打三架"。见 15 岁的女孩王祖云手上缠着布条（是挖坟园改田时给石板震伤的），毛泽东就叫随行的医生李志绥给了她消炎药膏。

郫县的田数犀浦最好，清一色的油沙田，红光社的田稍差，这年的小春作物长得不怎么样。幸好毛泽东对川西坝子的庄稼不熟悉，看不出好坏。

他走进一块油菜地，这是块"下湿田"，油菜长得稀稀拉拉，只及他大腿高，他站在田里，右手抬到胸前问："能不能长这么高？"憨厚木讷的社长周桂林不知如何回答。毛泽东再把手伸高到颈部："能不能长这么高？"不等周回答，毛泽东的手已伸到头顶："能不能长这么高？"毛泽东有一米八的身高，周只有憨笑，不敢相信油菜能长到比毛主席还高。



"小麦能长这么高吗？"毛泽东的这一比划，后来成为放卫星的高产动力和依据。

毛泽东的这几比，后来成为历史性的。

另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是打破碗花花。

毛泽东当时问周桂林"今年能不能将七害除完？"周表示"一定能除完"。毛泽东问用什么办法，周介绍把打破碗花花丢在粪坑里，可以杀死蛆和沙虫子（孑孓），

引起毛泽东极大的兴趣。

周叫人去扯了一窝送到毛泽东手中，他很仔细地看这种野草，问为什么取这个名。农民出身的本地干部潘克之说，这种草有毒，为了防止小孩们去摘，大人就哄孩子说摘了这种花要打破碗，碗打烂了吃不成饭，就这样得的名。蹲点的省农业厅处长梁禹久补充说，这种草在书上叫野棉花，有毒，可以杀虫。

“这是一个创造，应该推广”毛泽东对刘致台说：“你们今天写稿，明天修改，后天见报。”又对李井泉说：“后天你派人来拿。”



毛泽东在红光社。左为副社长刘贤松，中为县委书记刘致台。

毛泽东还关心地问起社里有没有女社长，周桂林赶紧叫人去叫萧绍群，萧绍群正在家里砍猪草，丢下菜刀就朝门外跑。她后来极为感动地到处讲：“毛主席看我跑来，跳了两个田坎迎上来跟我握手，我手都没有洗。”

问到干部问题时，毛泽东指着李井泉问县、社的干部认不认识。

潘克之答：“认得到，李政委经常到郫县来。”

周桂林冒了一句：“李主席解放的时候就来过郫县。”

“噢，你有两个名字：李政委、李主席。”毛泽东对李说。

李井泉赶忙申明：“合省的时候，当过一段省主席”。

毛泽东指着乡妇女主任游福群问：“那是谁？”刘政台答：“是乡妇联主任。”毛泽东上前问游：“三八节开会没有？”游答：“三八节乡上开了妇女积极分子会。”毛

泽东指着刘致台和潘克之："斗争他们没有？"游回答："没有。"

"三八节么，女人斗男人。"

这是毛泽东留下的最后一句话。然后在暮色中登车而去，前后一个把小时。

1958 年 3 月 20 日郫县县委办公室整理的《毛主席在郫县合兴乡红光社谈话纪要》最后一段这样写道：

主席走后，当天晚上就下大雨，24 队的记工员说，当真话是"龙行一步，百花沾恩"。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春雨贵如油，下午主席来过，我们红光社晚上就下雨，今年保证要增产，这不是沾恩又是什么？"

成都会议结束，毛泽东在李井泉、柯庆施、王任重等人陪同下，乘专列由成渝铁路南下。

一路上，毛泽东兴之所致随意行动多次令陪同人员措手不及，紧张万分。最让他们促不及防的是参观隆昌碳黑厂。

半道上,毛泽东突然提出要到自贡市参观天然气开发，李井泉不知所措，成都铁路局张胡景祥急中生智,说前面的隆昌有个炭黑厂,也有天然气,到那里去看也行 ，毛泽东同意，这才救了急。

这个临时决定引起了一系列的麻烦。

列车到达隆昌时已是下午 6 点。车一停稳，车站的马站长就赶来报告胡景祥，隆昌县的领导人一个都找不到，找不到车子来接。炭黑厂离车站有 20 多里，李井泉真是急了。

毛泽东和柯庆施等一批领导人都下了车在站台上等车呢！这时突见一辆又破又烂的小车驰来，原来是几个保卫人员在内江站漏乘后，弄了辆破车赶到。没有办法，只好将就让毛泽东坐，李井泉陪同挤在后座。柯庆施等人的大队人马如何办呢？

胡景祥问站长能否搞到一辆卡车？站长说，炭黑厂来了辆拉煤的卡车，不知行不行？胡景祥顾不得那么多了，叫把车赶快开来。柯庆施等人一看是辆又脏又破又无座位的煤车，全傻眼了。正在为难之际，只见毛泽东大手一挥呼道："快上嘛！"柯庆施们只好一拥而上。

一辆又旧又破的小车前面开路，其余人挤站在一辆肮脏的煤车上，沿着坑坑洼洼七弯八拐的土路向炭黑厂进发。才开出几里，天又下起雨来。幸好隆昌县的领导听到消息，开了两辆吉普车前来迎接，才使柯庆施等人免受煤污雨淋之苦。

天已全黑了，毛泽东冒着雨兴致勃勃的参观生产现场，他还要去很远的山上看气井，经李井泉、柯庆施劝说方才作罢（见胡景祥:《毛泽东的专列在成渝线上》）。

3 月 29 日，毛泽东一行在重庆码头登上"江峡"号客轮，游览、考察三峡，这是他此行的主要目的：圆他那个"高峡出平湖"、"当今世界殊"的伟人梦。

关于毛泽东这次长江之行的记载很多，多数是讲毛泽东是如何希望修三峡工程的。

事实上，他当初也是顾虑重重。

他在船上征求陪同者的意见时，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说，好是好，就是淹没的土地多了点。

万县地委书记燕汉民说，移民安置是个大问题，他举例说，前几年重庆建狮子滩水电站，移民安置到万县地区的梁平县，至今种种遗留问题难以解决。

毛泽东听后沉思良久道：“是呀，百万人搬出家园，这可是一代人为了国家建设作出的重大贡献，大批移民要生产，要穿衣吃饭，他们的子女要受教育，这些事总得妥善安排。”

接下来的年月不允许毛泽东把理想变为现实，而最终使他打掉念头的是新的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判断。

1969 年 10 月，湖北省委书记张体学当面向他建议上三峡工程，毛泽东说，“现在要准备打仗，你脑壳上顶 200 亿立方米，怕不怕?”后来他又伤感地说：“将来我死了，三峡大坝修成后，不要忘记在祭文中提到我啊。”



毛泽东到过的村庄，被命名为跃进村，随即，众多中央领导到这里参观。

3、新秩序

四川称天府之国，实际上古人所说“天府”是川西平原，更狭义是指都江堰灌区。战国时期蜀郡太守李冰筑都江堰，引岷江水灌溉川西平原，使其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谨”的中国古代最大的自流灌溉区。

自秦汉始，从图霸天下的帝王、偏安一隅的小朝庭到攻城掠地的枭雄，无不垂青于这片良田沃土。

靠了这片肥美的土地，才有了花团锦簇，笙歌燕舞的蜀都，才孕育出司马相如、杨雄、常璩、李白、苏轼等名垂千古的骚人墨客。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梦，也在这里破灭。

1949 年底，一支主要由地方干部组成的队伍从晋西北高原出发，开始了向川西地区的进军。率领这支队伍的是前中共晋绥分局书记，时任入川南下支队政委的李井泉。他们的使命,是接管川西地区各级地方政权。

各级干部的任命是在行军途中进行的。

根据新的区划，川西平原绝大部分县划归温江专区管辖，34 岁的贾启允任中共温江地委书记，31 岁的宋文彬任专署专员。李井泉任川西区书记兼成都市委书记。

1950 年元月 1 日晚，在成都市盐市口一家私人银行的小楼上，刚刚组建的地委领导班子贾启允、宋文彬、王进、葛向民 4 人对到各县的干部进行了分配。

接管各县旧政权的人马也就是县委书记、县长、县委组织部长、公安局长三四个人，加上警卫员、通讯员总共 10 来个人，一辆中吉普装完，分赴各县就任。

贾启允率领的温江专区全班人马乘两辆中吉普赴温江，头天晚上住在旧政府一间小屋稻草铺的地上。几天后，大地主刘文成在温江的一座宅院门口，挂出了温江专员公署的牌子。

从山西老解放区来的“南下干部”们，在此之前对他们即将接管的这块土地知之甚少。他们听到的传说是四川天气之热，把面和好顶在头上，走不多远就被晒熟了；蚊子之凶，一咬核桃大一个疱，而且还没有什么好吃的。有些人因此老大不愿意离开吃面食喝老醋的家乡。

当他们最后进入川西平原时，对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沃土又惊又喜！

黑色的土地象浸了油似的发亮，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布满密如蛛网的河流灌渠，十冬腊月还是满眼的青枝绿叶。北方人最金贵的粮食麦子，居然被视为“杂粮”，真

是名不虚传的天府之国，肥得流油的天然粮仓啊！

然而他们没有料到，他们竟从此为粮食问题苦苦挣扎了 10 多年，为之奔波劳累，心力交瘁，命运沉浮，耗去十之八九的心血！

这是建国后第一代从事农村工作的干部的命运。

如果说，以苏联开创的社会主义革命模式曾经在发展工业上有过辉煌，那么在农业上则鲜有成功的记录。农民似乎是这种模式革命的天敌。其直接后果,是农副产品的长期紧缺甚至造成灾难的粮荒，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其磨难更甚。

新政权创建伊始，第一件事就是征粮。

共产党一到，“不是首先给人民群众一些什么东西，而是首先伸手向群众要粮食”，（见贾启允：《我的回忆》）这使贾启允们深感为难。

然而粮食非征不可。

把川西坝子视若一块煎蛋，成都市就是偏移在东北的蛋黄。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同时，也就承担起向非农业人口供应粮食的责任。成都市几十万人要吃粮，入川的几十万解放军要吃粮，国民党和军阀的几十万起义部队要吃粮，尤其是起义部队，更有“三日无粮军心变”之虞。

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 1950 年 1 月接连发出征粮命令，要求于 2 月份完成征粮任务，征收标准按产量计，地主征一半，富农征三分之一，佃农、中农征五分之一，贫农征二十分之一，赤贫免征。

接到命令,温江专区各级派出大批武装征粮工作组，逐户征收。

大规模的征粮引起一些农民的不满，多年和政府作对的土匪，势力庞大的帮会组织乘机想和共产党来一番较量，以蒋介石“游击干部训练班”为核心的特务组织及国民党散兵游勇找到了机会，一场大规模的武装叛乱迅疾爆发。

2 月 5 日，60 军 178 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离及一个班在成都市郊龙潭寺被枪杀，2 月 11 日，全温江专区叛众达数百股 30 余万人，各县县城均被包围，温江县城被包围两天两夜，各县征粮工作干部 130 多人被杀。

川西军区派出 60 军部队清剿，参加叛乱的大部分是受挑动胁迫的农民，哪里是身经百战的解放军的对手，跑的跑降的降，瞬间土崩瓦解。

（作者注：当年的领导干部多数认为叛乱为国民党敌特策动，与征粮无关。但据作者掌握的资料，国民党统治时期，川西地区是佃农向地主交租，政府向地主征粮，只有少数富农和自耕农向政府交粮，1950 年初的征收面显然比过去扩大了。另外，1949 年底国民党政府已抢先征了粮，并给上粮户开具了前政府的收据，这样，1950 年初的征粮就成了重复征收。当初就有党外人士提出是征粮导制了农民参与叛乱。对此，当时的西南军政领导人贺龙还在市人代会上进行过批评，指出土匪的真正来源是民国党反动派。作者认为温江首任地委书记贾启允在《我的回忆》中的分

析是客观的。他说："我们进川后，……从大局上讲，人民群众是欢欣鼓舞的；但是另一方面，人民群众长期来受国民党的宣传影响，对共产党还存在戒备心理和误解，大家都在看着共产党来了怎么办。然而，当时的客观形势决定了我们进来后不是首先给广大人民群众一些什么东西，而是首先伸手向群众要粮食。我们的宣传工作又由于种种原因不可能做得广泛深入，获得群众的谅解。这就给国民党特务组织以及封建地主反动势力煽动群众进行叛乱找到了机会"。）

叛乱平息后继续征粮，接着是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四大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短短两年时间，几十年战乱不已，五马六道的川西坝子收拾得秩序井然。农民发现"共产党硬是有办法"。

1952 年 1 月，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中国农民千百年来的梦想成为现实，人人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响彻云宵。郫县的一个乡绅向川西区党委报告："过去乡间只有百分之五十拥护你们，现在已有百分之九十拥护你们，空气完全变了。"

同年，贾启允调国家石油总局任副局长，宋文彬任温江地委书记，人称"宋政委"，因为书记同时兼地方军第一政委。正如四川省委(1952 年 9 月 1 日恢复四川省建制)书记李井泉叫"李政委"一样。另一个作用是区别第一书记以下的第二书、第三书记乃至副书记，都叫某书记，就分不出上下了。各级都是党委说了算，政府部门如同党委的附属机构。

宋政委管理的地区包括温江、郫县、新繁、华阳、新都、双流、新津、蒲江、崇庆、大邑、邛崃、灌县、崇宁、彭县、什邡、广汉、金堂共 17 个县，5 百多万人，8 百多万亩耕地。总面积约 12000 平方公里。

直到 50 年代中期，管理这一大片土地的地委机关干部，连警卫员、通信员在内还不上百人，宋政委有事从办公室窗户里伸出头来叫一声，随便哪个部门的干部就跑过来了。

地委和专署总共只有两台美式小吉普，是从潘文华的起义部队里搞来的，县级干部能有一辆自行车就算不错。一般干部下乡或是骑马、坐滑杆，多半是走路，一天几十里路打来回是常事。南下干部们开始穿军装，后来所有的干部——从地委书记到乡干部都是清一色的中山装，头上扣一顶"解放帽"，一年四季很少摘。女干部的标准制服是列宁装，敞领、双排扣、收腰，剪齐耳短发。干部实行供给制，每月几元零用钱，吃穿住用一切公家包干，生了孩子往保育院一送了事。

这是一个天翻地复，紧张忙碌，充满希望的年代，和土改同时进行的民主改革、妇女解放运动使男男女女们都开化起来。

机关单位的新式婚礼发展到当众接吻，还有"二郎山错车"——新郎新娘在一条独凳上拥抱着交换位置之类的新节目。干部们开始学跳舞，相当的场合才有乐队

拌奏，多半只有一只鼓或一只钹，时兴慢三拍，敲一下鼓打两下钹：乓——嚓——嚓。后来“乓嚓嚓”就成了跳舞的代名词，不论是老区新区的干部都爱上了乓嚓嚓。

也有人看不惯，地专机关办舞会时，老资格的地下党员王梓赋就远远地站在一边吐口水：“呸！”长工出身，性格粗鲁的蒲江县委书记许锐则破口大骂：“跳你妈个×！”弄得全县无人敢跳。

“苏联老大哥”的影响无处不在，一般人心目中，苏联就和人间天堂差不多，而且“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喀秋沙》、《红梅花儿开》、《小路》、《共青团之歌》、《莫斯科—北京》等等，人人哼得上几句。

女干部一个接一个的生孩子，反正是供给制，生一个国家养一个。她们爱唱一首歌颂“英雄母亲”的歌：“有一个英雄母亲叫瓦尔瓦拉，她有五个亲生女儿五朵花，……最可爱的小女儿今年才十八！”每个学生青年都知道保尔.科察金、马雅柯夫斯基、西蒙诺夫、卓娅和苏拉，把他们的话大段大段抄在笔记本上。巡回电影放映队放映的多半是苏联影片，后来温江县城建起全区第一座电影院，放映机也是“苏联专家”带来安装的。姑娘们照着苏联画报上的图片剪裁布拉吉，用的是苏联花布。《联共(布)党史教程》、《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苏联版的教科书均列为“干部必读”；专区文工团团员们潜心钻研“斯坦尼”；学校照凯洛夫教育学编排课程。

和猛追苏联时尚的城里人比起来，乡下人的变化不大，男人们大多剃光头，上了岁数的人缠头布，穿蓝土布长袍，外加一条围腰，前襟扎在腰带里，腰带上别一根长长的烟杆，一坐下就抽出一片烟叶卷烟卷，一边吸一边吱吱地吐口水。称不认识的乡下人叫“老乡”，称穿中山服的叫“同志”。最好的休闲活动依然是赶场，看热闹、泡茶馆、冲壳子、听“围鼓”、喝酒、窜亲戚，其乐无穷。

农家屋十之八九是草房，瓦房大院是解放前地主留下的，乡村没有电灯。叫肥皂是“洋咸”，自行车是“洋马”，彩印画片叫“洋画”，时髦是“洋盘”，爱打扮的人是“洋盘货”。独轮的“鸡公车”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推东西也推人，轮轴发出的吱呀声是耳熟能详的乡间乐曲。公路是碎石铺的，晴天汽车屁股后面拖一长串灰尘，来往的车辆很少，汽车过后，大地就留下一片静寂。

冬夜里，乡村死一般无声无息；夏夜里回荡着虫鸣蛙叫、渠水流淌的交响曲。

结了婚的女人叫婆娘，没结婚的叫女子，30 岁以上的女人多半是小脚，或者是缠过几天又作罢的“解放脚”。中年以上的妇女抽水烟，一年四季围着围腰。

1952 年搞民主改革，实行男女平等，自由恋爱，一夫一妻，解除包办婚约，愤愤不平的男人们的顺口溜是“一九五二年，情况大改变，婆娘打男人，手都不敢还”。守旧的老头们窃窃私语：从来只有男人修婆娘，现如今婆娘也敢修男人（离婚）！

男女平等的结果是妇女越来越多的参加田间劳动，追赶新潮的当工人、参军，当干部，郫县妇女当干部的最多，太和场绣花女郑凤兰就是其中佼佼者。

“解放”型妇女剪齐耳短发，穿对门襟衣服。乡下女人不敢穿裙子，否则就会被骂成“骚货”。最高档的化妆品是一角钱一盒的“百雀灵”，还不能当众搽。一块上海产的香皂是贵重礼物，有时足以换得一颗芳心。

4、革农民的命

土改的第一年，温江专区的粮食喜获丰收。对党和政府充满感激之情的农民响应政府的号召，除完成公粮征收任务外，尽可能把余粮卖给国家，1952 年全区的征购量即达到近 10 亿斤，平均每个农户交征购千斤以上。

但征购的粮食满足不了迅速膨胀的吃商品粮的人口的需要。1953 年，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工业和城市人口巨增，粮食供应日趋紧张。

粮食紧张的根本原因实际上非常明显：国家工业化的速度超过了农业的承受力。中国农业人口众多，生产力低下，粮食商品率极低。

以著名的产粮区温江专区为例，1952 年农村人均耕地只有两亩,平坝地区人均只有 1 亩多，亩产大米三四百斤，除去种子、饲料、口粮，公粮，所剩有限。但当时上面流行的看法是：农民不向国家交售余粮，是为了“屯积居奇”，拿到市场上卖高价。因为当时允许粮食自由交易，私营粮商还存在；另一个原因是解放前农民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土改后分到了土地，“裤带一松”，就把增产的粮食“浪费”掉了。

所谓“屯积居奇”显然夸大其辞。即使农民卖高价，凭他们分得的那一份土地能“屯积”几何呢？其时国营粮食购销渠道已形成，市场虽未取缔，已受到相当限制，不可能象国民党统治时期那样兴风作浪。既然是解放了，农民为何不应当松松裤带？难道他们永远应该过半饥半饱的生活吗？

一个简单的供求矛盾进而上升到阶级斗争的理论高度。农民分到了土地，他们的“阶级属性”便发生了变化，由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变成了“富裕农民”，“小资产阶级”。根据列宁“小生产者无时无刻不在自发的产生着资本主义”的教导，“富裕农民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就成为粮食紧张的原因。

曾经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一夜之间就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变成了苏联电影《列宁在 1918》中穷凶极恶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挑战的富农的形象。“国家与农民的矛盾”正式提了出来。什么矛盾呢？形式上是国家工业建设需要粮食，农民

不愿意拿出粮食；实质上是农村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反抗。

是向农民妥协，放慢工业建设速度呢，还是让农民勒紧裤带，加快工业建设呢？主管经济建设的陈云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被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见《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第 1 版第 71 页）

结果是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取缔粮食市场交易，农民除上交公粮外的全部余粮必须交售给国家，由国家统一销售。交公粮、卖余粮统称"征购"。

历史惊人的相似。苏联十月革命后，为了解决城市粮食供应和内战需要，曾采取余粮征集制，强行低价收集农民全部余粮，引起农民极大的反抗。国内战争结束后，便以粮食税取而代之，纳税后的余粮，归农民自由支配，包括自由出售。列宁认为这样做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迅速发展，保障国家工业恢复。建国后，吸取苏联的经验教训，国家也是采用粮食税——公粮的办法。实行统购统销，实际上是重蹈余粮征集制。

"这不是余粮征集制"，李井泉说，国家控制的余粮只在 80－90％，还有 10-20％的余粮在农民手中，可以在自由市场上销售。 但事实证明，这不但是余粮征集制，而且是超余粮征集制。

按照规定，余粮征购采取上面定指标，下边"民主评议"的办法进行。

所谓"民主评议"纯属空活。上面规定的指标过高，让农民"民主评议"根本无法完成。政策又要求根据每户的实际情况，粮多的多卖，少的少卖，缺粮户不仅可以不卖，还可以领到政府发给的购粮证买到国家的供应粮。

这一来矛盾就更大了，土地是按人头均分的，凭什么你该少卖我该多卖呢？指标是一级一级分配下来的，对基层干部来说，不是根据评议核实购多购少的问题，而是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是打击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支援国家建设的大事，完成好坏事关个人前途命运，除了强行摊派别无选择。

（作者注：当年新繁县建设科科长喻权域回忆："各县开四级干部会议，开法是全封闭，对外保密（这是解放后第一次秘密开会）。 开了几天会，任务落实不下去。乡干部计算，一个人一天至少要吃一斤半米，根本不够，哪有余粮？我参加清流乡的干部会，费尽唇舌。村干部讨论后的结论是：要说农民有多少余粮说不上，号召农民'卖节约粮、节省粮食支援国家建设'是可以接受的。……中央分给各省的征购任务，和起来超过征购计划的 5%，即加了 5%的码；省分到专区，加码 5%；专区分到县，加码 5%；县分到区、区分到乡，乡分到村，村分到户，各加码 5%。"）

通常的做法是干部把指标摊派到各户，张榜公布，限期完成，抗拒者强制执行。

温江县昆芦乡一村公布统购任务时，第 16 组的 10 户农民只到了一户，工作干部就派 7 个持枪民兵将组长张世荣和"惯匪"张学云捆绑到村公所吊打。公平乡 4

村中农岳松贵派购“余粮”1400 斤，岳交不出，干部和积极分子就抄了他家的粮食送到仓库。

新都县同兴乡太平村公布统购榜后，富农刘树传看到自家的任务是 6 百斤，去找工作干部拆苦，工作干部说，你再闹，给你加成 1 千斤，刘吓得掉头就跑，工作干部大喊“抓倒”！几个民兵就把刘抓到乡上关起来。

新都县永兴乡的一次“民主评议”是这样进行的：天黑开会，工作干部点名，见有的人未到，下令民兵：“拿绳子去喊”。缺席者捆绑到会后，干部念摊派名单。有的农民叫苦说完不成，干部当即驳回：“你在放屁！”接着继续往下念，又有人叫苦，干部一拍桌子：“不准在下头闹，闹就捆起来！”念完，下令人人表态当面承认，见仍有人不开腔。干部高呼：“不承认行不行？”积极分子响应：“不行！”“不行咋个办？”“向他们斗争！向他们开火！”干部宣布，不承认的“按反革命分子看待”，不开腔的赶紧承认。

成分不好的更无商量余地。

崇庆县苟家乡评产时，一个富农说干部评定的产量高了，当即罚跪，被逼跳水自杀。大邑龙凤乡六村抗拒征购者甚众，干部为杀鸡给猴看，将全村地主包括子女在内全部罚跪。双流县双华 11 村整完不成征购的地主，或脱光衣服(包括女人)推到塘里淹水，或往头上淋水，人人挨打，其中 6 人打得爬不起来。（见 中共温江地委秘书处：《关于温江等五个县在统购统销工作中发生强迫命令现象的通报》，1954 年 11 月 25 日）

也有相当多的农民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尤其是刚刚分到土地的贫苦农民。他们对政府的承诺宣传深信不疑，干部在动员中说，统购统销，就是由政府统一收购，统一销售，不让粮商投机剥削，把粮食买给国家，今后缺粮，由国家供应。这有什么不好呢？

许多人一老一实把口粮都卖了。

5、第一轮饥荒

统购统销从 1953 年秋开始，1954 年初全区普遍出现缺粮，当农民找到干部要求供应粮食时，才发觉大事不妙。得到供应的只是少数农户，大部分缺粮户不仅得不到供应，还被斥之为“闹粮”。这是当时流行的辞汇，含义为明明有粮而“装穷叫苦”，是在地主、富农等反动势力煽动下的反政府行为。

“闹粮”的表现为“装穷叫苦，遗弃子女，向干部、党员要饭吃，甚至围攻区、乡政府。”

温江苏坡乡杨德弟一家统购中卖了两千多斤大米，连往年的存粮都卖光了，年底便无米下锅，家中两个媳妇背着娃娃下雪天跪在路上，哀求干部“退点米给娃娃吃”。

双流的一些农民把女孩子穿上新衣服丢进山里，派出所把孩子收容叫家长领回，他们不领，说“十根指头哪根舍得割，都是因为没米吃。”

有的基层干部愤愤不平。温江文家乡八村的干部对工作干部说，我们当初保证粮不够国家供应，大家把柜柜坛坛都翻空了卖粮，上面不供应，硬是说不起话。工作干部不信：“敢保证没粮？”，村干部拍胸脯：“敢保证全村没得一家人还有米吃。”

彭县隆丰乡农协会主任刘元任，带了 340 多人从乡公所闹到区公所，“喊政府拿米来吃”。

专区返销了少量粮食，同时加紧对“自发势力”的批判教育。6 月份，更大规模的饥荒爆发，缺粮的农民聚集场镇抢购食物，到仓库要求买粮，几近骚乱，尤数“本区最肥富的温江、郫县、崇庆一带发展得最为严重”。

6 月 8 日温江永安乡蓬场，大批外乡农民将街上可吃的东西抢购一光，并涌到饭馆吃饭，有的不给钱，引起武斗，乡场顿时大乱。

6 月 9 日夜，广汉城关突然出现五六百农民，带着口袋、箩框，站在沿街屋檐下，要求仓库卖碎米糠，经县长亲自出面作工作方散去。

6 月 10 日，新津太平乡逢场，粮站出售 1 千多斤酒米，争购者达 1 千多人，没买到米的一哄而起，将场上可吃的东西全部抢光。

6 月 11 日，崇庆安阜镇、6 月 12 日三江乡接连发生哄抢哄买事件。

抢购风刮到地专机关所在的温江县城关，6 月 13 日，温江城关逢场，天色未明，各食品店和合作社门口已挤满了人，一个上午，全城所有食品被抢购一空，无数柜台被挤烂，连贸易公司极少有农民问津的海参、鱿鱼也卖完。

至此，专区各县连续发生几百、几千农民抢购食品事件，一时间人心惶惶，空气紧张。

市场上买不到粮食，农民便抢购副食品、蔬菜填肚子，引起价格暴涨。崇庆县鸡蛋由 3 百元一个(旧币，1956 年兑换新币时，1 万元旧币兑换 1 元新币)，涨到 2500 元一个，洋芋价涨了一二倍，更奇特的，菜贩从成都市 3 百元一斤买来的白菜，到乡下卖 1800 元 1 斤。

温江、郫县、崇庆、新繁每日数千农民涌进成都抢购蔬菜。

对于设在成都的中共四川省委，这些事几乎发生在眼皮子底下，绝对不能容忍。根据省委的指示，地委于 6 月下旬派出工作队，大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坚决镇压

地主、富农、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关、捕、杀了 116 名“破坏国家粮食统购统销的阶级敌人和破坏分子”。（见 中共温江地委办公室：《温江区农村闹粮问题综合情况》，1954 年 8 月 1 日 ）

乱子倒是平息下去，缺粮的问题并未解决，1954 年，温江专区建国后第一次发生了肿病流行和饿死人。

肿病在医学上称为营养不良性水肿，因为先从下肢开始肿，川西坝子俗称“脚肿病”。这年 4 月份，专区卫生部门发现温江、郫县、崇庆、灌县突然出现大批肿病患者，上报省卫生厅。省卫生厅旋即组织成都的医学专家和各医院人员共 160 多人，组成防治肿病医疗队，由省卫生防疫站总支书记郭嘉陵任总指挥分赴 4 县治疗。大家一看就明白是营养不良所致，除了吃饱饭无可救药。

郭嘉陵据实向宋文彬汇报，挨了宋一通训斥：你是不是共产党？郭说是，宋说，你是共产党员，为什么给地主富农说话？你把城市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拉到这里来，和农村自发势力勾结，反对统购统销……。

罪名如此之大，医疗人员只好对营养不良讳莫如深。郭嘉陵回到成都即被撤销党内职务。和他一道去调查的从美国回国的专家丘正文 1957 年被打成右派，发配回理县劳动改造。

宋文彬所说，正是官方对闹粮的统一口径。

崇庆出现肿病后，宋文彬曾到省委向李井泉汇报。宋文彬后来回忆说，那是一个傍晚，天气很热，李井泉坐在家门前的椅子上摇着一把大扇子乘凉。宋文彬汇报后，李井泉说，肿病是川西的地方病，历来就有的。有人说是缺粮，实际上是反对统购统销。并告诫宋“不要站在富裕农民的立场上说话”。于是宋“只能按这种口径讲”。

省里派出的专家的调查结论，也只好称“地方病”、饮食不洁”云云。

基层干部对这种绝泽而鱼式的统购抵触不满的不在少数，了解到真实情况的地、县干部深感痛心。

崇庆县是统购统销的先进县，全县统购超额完成后，造成的后果最严重。县委书记张建中被认为是“同情农民闹粮”，未采取坚决措施，犯了 “立场错误”而被地委解职，另调来新的县委书记张林超。7 月，张林超一到任，便被肿病流行，人畜死亡的情况震惊，他每天骑着自行车在乡下调查，确认是营养不良所致，向地委作了报告，地委派宣传部长景廷瑞到崇庆调查。

景廷瑞，山西灵石县人，贫农家庭出身，靠爱才的乡村教师凑钱考上太原师范，是学校有名的才子，当过教师，1937 年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5 年当了家乡的父

母官——县长。1952 年任大邑县委书记，这时刚上任地委宣传部长。

他自小崇拜的英雄是岳飞，最高的人生追求是报国为民，一脸的浩然心气，胸中纤尘不染，认准一个理，非要论出个事非曲直，有人暗中说他书生气太重。身为宣传部长，有关统购统销、闹粮的宣传口径他自然熟悉。

听了张林超反映的情况，他决心去弄个水落石出，他直接到农民家中，找患肿病的人调查。他问在崇庆羊马乡搞肿病防治工作的老红军、四川医学院的张院长，到底是缺粮还是病？院长说，事情很明白，就象当年长征一样，人饿了，劳累了，营养不够，身体衰竭，倒下去就爬不起来了。

卖光了粮食，又被政府不供应打懵了人们惊惶失措地四处乱窜，有的走着走着就倒在路上，遗弃的孩子沦为乞儿，有的偷东西被人打死，有人走投无路跳河自杀……爱动感情的宣传部长哭了，倾囊而出，将所带的钱全部给了农民。

在地委的汇报会上，景廷瑞抑制不住心中的愤怒，大发议论：

“到崇庆后，看到街上丢的娃娃十几个，一个姓黄的就丢了两个，有的娃娃偷东西被人整死，这不是一两起。廖场有一家三口人都死了，还有一家死四口的。一个生产委员一家死了三口，自己病得起不了床，这也不是一两起。路上走着就跌倒死人。有些人肿，有些人瘦得很，到处都不卖粮食，到成都也没有，有人搞不到粮食半路就跳了河，我知道的就有 3 个……

“说缺粮，我是有顾虑的，十二三岁的娃娃偷盗是天生的吗？病是有，但缺粮的问题更严重。一个村子收玉米，去吃的‘客人’比村子的人多几倍，有的吃玉米芯，屙不下屎，能试的话，咱们试一下，吃几天稗子、玉米芯，看怎么样！

“从地委检查，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冒进了，出了许多问题，多死了人，粮食紧张。二是不了解真缺粮的情况，应该怎样补救，没有将这项工作放在主要地位。去年统购时，就想听粮多，不愿听粮少；在闹粮中，就想听自发势力，不愿听缺粮。”

“农民翻了身，他们感谢党，叫干啥就干啥，叫卖多少就卖多少，开春就缺粮，还不好开口，贫雇农伤得很多，这是自发势力吗？我们的工作都做成了这个样子！党的会议我可以说，背后说当面不说，开除我的党籍。党不开除，自己开除。左是不对的，要分析情况，全国有一半是这样，就是亡党之国，这和立三路线有什么不同？不能一般说发生错误，轻描谈写。左的情绪，就是看问题有小资产阶级片面性……”（见中共温江地委:《中共温江地委宣传部长景廷瑞错误言行材料》，1959 年 12 月）

“左了”、“冒进”、“立三路线”、“亡党亡国”，以及和 5 年后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讲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差不多的“小资产阶级片面性”，全都有了。这些言论要到 59 年再清算，当时党内生活还没有糟到那个程度。

党外人士也比较敢讲话。7月份的省人代会上，有代表把温江专区的事提出来，说统购统销政策有偏差。省委认为有必要统一党内思想，同月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上，李井泉引用了一段翻译得很赘牙的斯大林语录："小资产阶级多头蛇的千百万触角，时此时彼地缠绕着工人阶级的个别成分，投机想钻进了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部机体内，排挤国家垄断制。谁要看不到这点，那他就恰恰因为自己盲目无能，做了小资产阶级的俘虏。"

李政委的用意，"小资产阶级的多头蛇"包括农村的自发势力，说脚肿病是营养不良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省人大会上给统购统销提意见的代表；被多头蛇缠绕的俘虏当然是景廷瑞一类对统购统销抵触不满的干部。

温江地委因对闹粮的自发势力打击不力，和干部中出现对统购统销抵触情绪受到省委批评，地委因此提出一份带检讨性质的报告：《温江区农村闹粮问题综合情况》。

1954年8月9日，省委批示：

"从温江地委办公室关于温江区农村闹粮问题综合情况看，这不单是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作怪，而且是反革命、地主分子和奸商、富农分子联合着有计划、有组织地勾引和组织一部分富裕农民抗拒统购统销政策，进一步破坏人民民主政权的破坏活动。这也正是这次省人民代表大会部分代表叫嚣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有偏差的实质。温江地委根据省委的指示，……采取坚决打击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没有对这116名的破坏分子在政治上的打击，就不能停止他们的破坏活动。"

批示指出，区乡干部中有相当一部分有抵触抗拒情绪，"组织不纯的现象可谓相当严重"，为此"必须进一步整顿内部"。

地委为整顿内部召开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没有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各县反映，农民在统购中卖了"过头粮"，缺粮的事实，不增加供应，是失信于民。景廷瑞置"李政委"的教育于不顾，继续声称脚肿病是缺粮所致。

这些从晋绥来的老干部门，对"左"的错误有特别深刻的印象。李井泉在晋绥区领导土改运动因左得出奇，挨过毛泽东的批评，李井泉的这段老底大家很清楚，至少在那个时候，他们对李政委还不是那么怕得要死。地委决定，一方面增加粮食供应，一方面组织工作组到下面调查，对统购做到心中有数。

接二连三的报告很快堆满地委的案头。

统购过头，农民缺粮已是不争的事实，所谓地富反革命煽动闹粮难以自园其说。崇庆县羊马乡白庙村患肿病的71人，6月15日至7月31日一个半月中死亡18人，均为15岁以下的小孩和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全村78户贫农，死亡5人；55户中农，死亡8人，14户地主，死亡5人。从死亡比例看，地主最高，中农次之，贫

农最低。(见温江地委工作组:《崇庆羊马乡白朝村目前病疫情况及此次解决口粮中存在的问题》,1954 年 8 月)

如此看来，不知谁在“装穷叫苦，煽动闹粮”了。

鉴于 1953 年购过头粮的教训，地委在 1954 年的统购中强调留有余地，但实际上很难做到。省上下达的征购指标有增无减。温江专区计划委员会 1960 年编制的《1952－1960 年粮食征购实绩》显示，1954 年比 1953 年还多征购了 4800 万斤。征购指标是按田亩摊派的，农民为了完成征购，不得不大量减少烟、麻、油菜等经济作物面积。即使如此，也无“余地”可言。

1954 年底，地委干部邓明秋等提供双流县柑梓乡 4 村的一份调查，全村平均每户征购粮食 2229 斤，人平 530 斤。“村对各户都是按余粮百分之百完成征购任务”，报告肯定产量评定高了，统购量大了，返销供应少了，“实际上解决不了问题”。温江地委对这份报告极为重视，印发各县并报省委。地委的批示说：

“在我区现在还是个体农民居多的情况下，个体农民的产量评定，工作再好与农户实际产量也是有出入的，且消费量多少也有很大悬殊。因之统购面已不超过总农户的 80%，统购量占余粮的比例控制在 80%左右为宜；统购量如到 90%即把握不大；达到 100%则必然有问题。就容易发生统购后有些户留粮过紧或伤害口粮问题。各县委在检查工作时特别注意此点，并不要单看表上的数字，因为表同各户的实际往往是有出入的。……明年我们全党是否能从统购统销的圈子里走出来转向互助合作，就看这一段遗留问题解决如何而定。(见中共温江地委批转《邓明秋同志检查双流县柑梓乡统购统销中存在的问题》，1954 年 11 月 19 日)

这是明智而清醒的判断。同时它使我们看到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的某种历史联系。

统购统销的直接目的，是为了从农民手中拿到更多的粮食，这个做法本身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手段，它和农村的个体经济有巨大的矛盾。即使留足口粮，多产多卖，少产少买的原则也会挫伤农民的积极性。实际操作更是困难重重，面对一家一户千差万别的个体农户，要确切掌握每户收了多少，该交多少，留多少，还要叫他们老老实实地如数完成，繁难之极。

看来只有合作化才能和统购统销接轨：土地入了社，农民私有观念谈薄了，不再那么惜售粮食；征购面对集体，化烦为简，抓住几个合作社干部就解决问题。统购统销出现的问题，无疑对合作化进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6、滚带爬进入社会主义

土改当年，温江专区普遍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组织起互助组。

互助组是在土地私有基础上的生产互助组织。按照当时的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构想，这是农业集体化的“最初级形式”。下一步搞土地入股的股份制合作社，即后来所谓的初级社。再下一步，取消土地报酬，土地归集体，即所谓高级社。从而变土地私有为土地公有，变小农经济为社会主义大农业。

党内没有人怀疑这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

小农经济在中国有几千年历史了，农村仍然穷得一踏糊涂。问题是这个改造的过程有多长。毛泽东当时估计需要 10 年到 15 年甚至更多一些时间。苏联版的农业合作化历史证明，步子太快是要吃亏的。中央一再告诫全党，农民个体经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将是大量存在的；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既要反对消极对待的右倾错误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思想，而且把为什么不能急，急了会产生的不利后果讲得很清楚。主持农村工作的中央农工部长邓子恢则明确指出，“今天在全国范围内来说，急躁冒进是主要偏向，是主要危险。”[14]

基于这种清醒的认识，在实行统购统销以前，中央有效地控制着合作化的规模和进程，及时而坚决纠正急躁冒进偏向。这种冒进情绪当时主要来自于满怀革命激情的中下层干部和急于致富的贫困农户。

川西坝子最早实现“互助组化”的是新繁县，其中最风光的是禾登乡新民村的罗世发组和清白江李园村的冯泽应组。县里开群众大会，罗世发、冯泽应戴着大红花，骑在县上奖励的水牛上“走马夸街”。

根据中央的要求，新(解放)区合作化的步子应比老(解放)区更慢点。但是受到鼓舞的新繁县委沉不住气了。“光搞互助组，搞得再好也不算本事。新繁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不搞农业生产合作化？”1952 年初冬，县委决定在罗世发互助组和冯泽应互助组试办两个合作社。

这就是四川试办合作化之始。县里派干部戴声沛、喻权域分头到两个组宣传组织，一个多月后，四川最早的两个农业合作社宣告成立。

新繁县委未经请示搞合作社，令对上级精神说一不二的地委书记宋文彬极为不满，打电话给新繁县委书记曹云生，下令将两个合作社解散。冯泽应的合作社叫散就散，解散罗世发的合作社却遇到困难——农民们不愿意散。

罗世发原是禾登乡乡场的剃头匠学徒，集结在他合作社的多半是和他一样的乡镇贫民，土改时分到了土地，他们“一无耕牛，二无农具，三不会种庄稼，只有光人一个，不搞互助合作就无法生产。”搞合作社土地、耕牛、农具入社、集体劳动，评工记分，按劳分配，对他们极为有利。

还有建社干部描绘的光辉前景：第一步实现合作化，生产飞跃发展；往后，依靠集体力量，修电站，用拖拉机，开汽车盖楼房，大家都过共同富裕的生活……。共产党可是说得到做得到的，乾坤不是一两年就让共产党扭转了吗？如今共产党要领着他们走一条从未走过的路，他们相信听党的话没错，苏联人民走这条路不是已经过上了好日子么？祖祖辈辈简直就没伸过皮的贫苦百姓，谁不想早一天过上这种好日子呢？

“我永远记得那晚上的情景”，亲自参加建社，又动员农民解散的喻权域回忆说：“曹书记、戴声沛和我对社员说了许多话，社员不愿解散，有的社员当场哭起来，许多人跟着抽泣……”

深感同情又不敢违背地委命令的县委书记曹云生问喻权域怎么办，16 岁的建设科“小科长”喻权域说：“农民坚持要办，我们就支持他们办吧，早迟都要办的，晚办不如早办。”曹问：“小喻，你有把握办好吗？”，喻胸脯一挺：“有把握！”。曹说，你们有把握办好，我就打电话报告宋政委。

曹神秘兮兮地把门关上，拨通了宋文彬的电话，详细汇报了罗世发社不愿散的原因，请求地委同意把这个社办下去。宋毫不领情，语气生硬，见曹喋喋不休，说：“解散你们那两个社是李政委决定的，你向李政委直接汇报吧！”说完就摔了电话。

“你看，碰钉子了。”曹悻悻地对喻说：“你说给不给李政委挂电话？”曹是李井泉的老部下，知道冒犯了李政委日子难过。少年气盛的喻权域劝他挂。曹提起话筒，又追问一句：“你们真有把握办好吗？”“有把握！”

长途电话那一头，李井泉语气温和。他仔细听了曹云生的汇报后说，省里正试办一个合作社，把农工部的强手都派去了。你们有没有干部力量？曹云生望了喻权域一眼，回答说：“还行吧。”李井泉说，既然农民不原意散，你们又想办，就试办一个，但你要亲自抓，又作了两条规定：一、“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名字不得上报纸，二、不得组织参观，以免扩大影响。

李政委表了态，宋文彬只好同意，但他又加了一条规定，对外不得称合作社，仍称“罗世发互助组”。又从地委派了干部，组成地、县、区三级联合工作组指导建社工作。四川省第一社“新民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式诞生，社员 15 户。

李井泉在合作化初期的稳健，体现了中央和邓小平主持工作的西南局对政策的把握，也和他吸取晋绥区土改中犯左倾错误的教训有关。

然而 1953 年雄心勃勃的工业化建设开始后，粮食供求矛盾的尖锐使局势发生了变化。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毛泽东在 1953 年 10 月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谈话中说，“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放慢工业化的步伐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加速农业的社会主义革命以适应工业化建设的需要，这不仅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初衷，也是解决粮食危机的最佳途径。

就在作出粮食等农产品统购统销决策的前夕，毛泽东就互助合作运动发表了两次谈话，对合作化进展情况表示极大不满，批评在现阶段不急于改造农村个体经济的意见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他解释说，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共产党为农民做的诸般好事，如发农贷、发救济粮、搞农田基本建设，推广农业技术和新式农具等等，都搞到个体农户头上，就是对农民行小惠，而且是惠及富农和富裕中农。不搞社会主义，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粮食大增产，解决粮食问题，那真是“难矣哉!”他批评“纠正急躁冒进”一股风吹倒了一些不该吹倒的合作社，“应当查出来讲清楚”。他说，党内党外都有议论，说农民还苦，“其实，农村并不是那样苦，……我历来不是那样看的。”

他要求今冬明春合作社要有一个大发展，要分派数字、摊派下去，合乎条件的地方“多多益善”。

毛泽东的讲话通过 1953 年底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贯彻实施，它和两年前中央关于互助合作的决议截然不同。那个决议是建立在“农民个体经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将是大量存在的”基本估介之上。现在情况不同了：“孤立的、分散的、守旧的、落后的个体经济限制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它与社会主义工业化之间日益暴露出很大的矛盾。”所以党在农村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以提高农业生产力。

寄希望于通过合作化解决粮食危机,不仅是身居权力顶峰的毛泽东，还有大批立功心切的中下层干部和急于脱贫的贫穷农户。毛泽东提出的共产党做好事要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以行“大惠”，使合作社享受到比个体农户更多的政策优惠。实行统购统销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土地私有的意义，更刺激了农民入社的“积极性”。

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摊派数字，到 1954 年秋后建立 3 万多个合作社，结果一个冬春就发展到 7 万多个。中央农村工作部见势不妙，1954 年 3 月发出“收缩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警告盲目发展可能会引起“严重的混乱现象”，“得不偿失”。但“收缩”一阵，年底仍达到 10 万个。

统购统销和高征购在农村引起的混乱，使党内头脑清醒的领导人看到合作化过快可能造成的灾难，一再提出反对盲目冒进的主张。而毛泽东的看法恰好相反，他

把混乱的原因归结为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反抗和破坏，因此，必须尽快实现合作化，铲除自发势力的根基。他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基层干部和一些农民办社的“积极性”，认为它是农民迫切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铁证。

上有好者，下有好者，反对者夹在中间，越来越难以控制局势的发展。中央农工部计划 1955 年合作社发展到 30 到 35 万个，结果发展到 67 万个。

实际上这些合作社大部分是在基层干部“直接、间接的威助下轰起来的”。1955 年春中央农工部下令“不论何地均应停止发展新社，全力转向春耕生产和巩固已有社的工作”。

5 月，邓子恢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申明，停止发展是经毛泽东同意的：“原来我们说今年秋天停下来，以后主席说，干脆就停止下来，到明年秋后再看，停止一年半。”他对试图通过合作化解决粮食危机发起抨击：

“事实上，办社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我们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我们不是苏联，不是匈牙利，他们是工业化国家，我们就没有这个条件，没有这个物质基础，我们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搞工业化，可以想见，真正使合作社增产，那是很费劲的。……认为合作社办起来了就会增产，那除非老天爷保护它。认为只要插上社会主义旗帜就增产了，那就不是唯物论。”

他对所谓农民社会主义觉悟高涨不以为然：

“把这个高潮估计过高，把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估计过高，这是主观主义的，……光看他的表面；高高兴兴，双手举起来，甚至哭哭啼啼要求入社，你就认为他们是社会主义觉悟高了。这样看会使我们犯错误的，就助长了干部的冒进情绪。高是高呀，是不是好呢？好是好的，是不是那样好呢？不一定。是不是所有地方都那么好呢？也不一定。……盲目的认为普遍高涨，到处高涨，这里高涨，那里高涨，这是没有好处的。”（邓子恢：“在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1 年 10 月出版）

批的正是毛泽东的基本观点。

亲口说过合作社停止发展 1 年半，不到半年就变卦。

7 月 31 日，毛泽东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长篇报告，全面阐述其基本观点，声称农村的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即将到来，某些人却象小脚女人东摇西摆走路，“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领导已经走在群众的后头，“这种情况必须改变”。现在的情况不是“胜利冲昏了头脑”，而是“胜利吓昏了头脑”，不能容许一些人“利用苏联的经验来为他们的爬行思想作掩护”，如果不加快实现合作化，农村马上就要出现两极分化，“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他要求 1955 年合作社数量翻一番，达到 130 万个。最后，他对党的合作化运动方针作了重要修正，由“积极领导、稳步前进”改为“全面规

划，加强领导”。

这个纠正意义重大。“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大前提是农民“自愿互利”，反对强迫命令；既防急躁冒进，又防放任自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则将运动变成彻头彻尾的政府行为，对农民来说，入不入社，何时入社，入什么样的社从此由不得自己了。

在此之前，四川的合作化运动相对稳健。

对于中央在合作化运动中的意见分歧导制的时收时放，李井泉比喻为“开闸关闸”，崇宁县委书记杨洪魁的名言是“新媳妇子放屁----一股一股的来”。毛泽东这把火一放，李井泉闸门大开，新媳妇顾忌全无。

年初,省委计划当年入社农户达到 20%，年底已有 70%的农户入社，温江专区达 85%以上。

李井泉的合作化热情是和他的权力同时膨胀起来的。

1954 年 2 月，西南局撤销，邓小平调中央工作，李井泉头上少了个把西南地区合作化控制在全国最低水平的婆婆。

1955 年 10 月，也就是毛泽东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又忙着编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时候，西康省撤销，金沙江以东各县并入四川省，李政委治下的版图扩大了 1 倍。

一窝蜂普及合作社后，全省立即开始试办土地归公，耕畜、大型农具“作价入社”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并在这一轮过渡中抢拔头筹，到 1957 年夏，全省绝大多数初级社已转为高级社，入社农户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连滚带爬”(邓子恢语——作者注)把农民拉入了社会主义。

7、减产风波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力受生产关系的制约。中国的农业落后，是受了私有制的小农经济束缚，实现了合作化，用最先进的生产关系取代小农经济，就彻底解放了生产力，一个农业大发展的时代开始了。

谁来组织领导这个社会主义的农业大生产呢？农业现在已经全面纳入计划经济

的轨道，当然应当由党来组织领导。中国的农民愚昧、保守，既无科学知识，更不懂大规模的集体生产，要象把他们拉入合作化那样教会他们先进的农业技术。

1956 年初，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简称“纲要”），对农业发展的方方面面作了周密具体的规定。这是 50 年代计划经济登峰造极的代表作，上至合作社的组织形式，粮食产量，下至增产具体措施，诸如用什么犁犁地、用什么肥肥田、用什么种下种、男女老少一年干多少活儿，一年种几季，乃至农民要认多少字，何时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等等，无一不有明确的指标。

那时候还没有“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的区别，所有的计划都是指令，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而“纲要”则具有宪法的性质，后来果然将其中的增产措施归纳为“八字宪法”。

合作化运动以来，尽管中央一再强调反对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实际上强迫命令从来就未制止过。“纲要”本身就是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的产物。从字面上看，其中的许多规定无可非议，如果它仅仅是给农民的建议，或先作小范围的试验，在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劝导农民推广就好了。然而它是必须不折不扣全面执行的命令，否则就会被视为反党反政府，这一来生产上的乱指挥和虚报浮夸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为贯彻执行“纲要”，温江专区 1956 年初在成都召开地、县、区、乡四级干部会议，一致同意提前 5 年完成纲要规定的任务，全区马上掀起“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的群众性的生产大跃进运动”，到处兴修水利，改良土壤，积肥造肥，扩大复种，改进技术。

其中，最典型的是推广双季稻和密植。

川西坝子虽然土地肥沃，灌溉便利，但日照时间却是全国最低的，所以有“蜀犬吠日”之说，农作物产量因此稳而不高。千百年来农民积累的粮食生产经验是“小春套大春”，小春种麦子、玉米等，大春种水稻。早在 30 年代，就有农业专家试图在川西平原推广双季稻，结果无功而返。传统的水稻栽培技术是一尺见方的大窝稀栽，以利通风、透光和薅秧，是在当时各方面条件制约下合理的栽培技术，强行推广双季稻和密植适得其反。

李井泉给增加复种指数取的新名词是“楼上绣花”。即收了小春抢种一季玉米，收了玉米再插秧；或者收了小春又种双季稻，一年种三熟。“楼上绣花”首先在温江专区的“肥富”区大面积推行，省委一直关注的郫县一举崭露头角。

谚云：“金温江、银郫县，要吃饱饭到崇宁县。”处在川西平原腹心地带的郫县，有“天府之天府”之美誉，距今二千七百多年，被称为蜀人主先的望帝杜宇，在这里建立古蜀国的都邑。

由于它的富庶，由于它紧邻金牛坝招待所，省委有意将其布置为四川新农村的

橱窗。1953 年，郫县合兴乡境内建立起全省第一个国营机耕农场；1954 年，按照苏联模式在犀浦乡建立四川省第一个拖拉机站，装备苏式和匈牙利产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为机耕农场服务和代耕农业社土地。1955 年犀浦、古城两乡关于合作化的一份报告受到毛泽东的赞赏，批示：“这是一个很好的文件，各地可以参照办理。”

1952 年土地改革的当年，郫县获得空前的大丰收，粮食平均亩产达到创纪录的 880 斤，单位面积产量比 1949 年增长三分之一。

1953 年合作化运动开始后，连续 3 年粮食总产停滞不前，这种局面使县委领导颇感焦虑，要求按照纲要的规定大搞农业技术革命，大力提高复种指数，贯彻密植等增产措施，重点推广双季稻。于是“新生事物象雨后春笋一样，纷纷地茁壮地从大地上成长起来。”

省委的“楼上绣花”要求改一年两熟为一年三熟，郫县创造出一年五熟、六熟的“经验”。据称，红光社 18 队的李莲芝在一块田中，第一期种大麦，第二期种早稻，第三期种晚稻，第四期种油菜，创造“四熟”经验。和平乡廖天荣的“一年六熟制”更为复杂：第一期种油菜，间种小麦；第二期种中稻，第三期在荞子田中间种苕子、萝卜。这样的方法共有三四十种之多。

大面积强行推广的“先进经验”，一开始就遭到农民反对，尤其对双季稻的反对呼声强烈。老农抱怨：“种了几十年庄稼，现在不会种合作社的庄稼了”，有人说：“共产党只懂天时(气象预报)，不懂地理(土性)”。

省农业厅的农业专家写信给县委，详细论证郫县不适宜种双季稻的理由，说郫县解放前就试种过双季稻，实践证明得不偿失，县委视为“右倾保守”。农民不同意县上规定的密植要求，说密了要倒伏，“谷倒一包糠”，也被“驳倒”。

为了抢种两季水稻，县委下令提前育秧，并不惜以一比四的稻田面积培育老、壮秧苗。此时都江堰还未放水，县委“号召”农民冒着料峭的春寒担水泡秧田。大部分早稻收割时,已是农历七月，农民问，栽晚稻会有收吗？县上没商量，结果产量很低或基本无收。农民给一年三熟的“楼上绣花”下了个结论：“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

1956 年，全温江专区实现合作化的第一年，也是贯彻“纲要”、推行农业技术改革最多的一年，全区自建国以来第一次出现粮食减产，由此便生出一件乱子。

乱子是当年不顾地委反对，积极参与创办罗世发合作社的喻权域捅出来的，这时他已经是新华社四川分社的记者。这一年他 21 岁，已有一段不凡的工作经历。

他出身四川荣昌县的书香世家，祖上曾作过明朝尚书，父亲早年跟随中共地下党四川省委领导人车跃先从事革命活动，他在荣昌的老家一度就是地下党川南特委机关。1950 年 12 月他从西南革命大学毕业到新繁县任建设科副科长时才 15 岁，人

称："小科长"。1951 年冬大修都江堰，小科长率 2400 人的"新繁支队"参加。这种集体劳动历来以磨洋工、效率底著称，谚曰"修沟淘堰，虱子遭难"，因为参加者有充足的时间捉虱子。小科长首创"小组包工、按方计件，评工记分，按劳分配"的办法，大获成功，成为 18 个县民工完成任务最好，先打道回府的。1953 年当新繁县委宣传干事时，他已经相当"红"了。由于才思敏捷，文笔出众，54 年即调新华社四川分社当记者。

1956 年"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一哄而起，强迫农民入社，生产上的瞎指挥，以及将社员私有财产"彻底归公"之风乍起。煽起这股风的毛泽东这年大部分时间不在北京，从南到北到处游泳，同时提出不当国家主席。

下半年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发现势态严重，再次提出反冒进，连发了几个文件和社论。

喻权域这年夏天在青岛养病，以为领会了中央精神。9 月返回成都后，立即骑车到新繁，沿途听农民诉苦，说种三季搞拐了。他的老上级、县委书记曹云生也私下告诉他大势不妙，要减产！

秋收结束，各县县委书记到地委报帐，喻权域参加。会上发了张统计表，推广"先进经验"最多的 9 县减产，其余报"平产"。原因是提高复种指数的"楼上绣花"不切实际，季节太紧，庄稼没成熟就不得不收了。

宋文彬脸色阴沉地听完这些不祥的报告，嘟嘟囔囔地抱怨是"主观主义加强迫命令的结果"。

喻权域想写篇报道，他盘算了一下：写川西九县水稻减产，影响太大，太扫"李政委"和地委的面子；郫县是省上抓的样板，是包括他在内的记者们常来常往的地方，戳了痛处今后不好见面；新繁是"老家"，得照顾点情面。想去想来选中崇宁，崇宁县小，知名度不大，平时也很少去，正好写批评稿。他到崇宁县跑了 3 天，一个晚上写成下面这篇报道：

好心肠办下的坏事情——风调雨顺的崇宁县为什么水稻会减产

新华社记者 喻权域

川西平原上的奇事

四川省崇宁县水稻减产的消息从川西平原上传开后，引起了很多人的惊呀。这个位于都江堰灌溉系统中游的著名产稻县，在今年这样风调雨顺的情况下，全县 14 万 5 千多亩水稻初步计算竟少收 300 万斤，减产 4％左右。这对于多年不知灾歉的川西平原来说，的确是少见的事情。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坚决执行县里领导机关生产技术改革指示的乡和农业社，减产都很大。灵圣乡 3 个曾被称为"工作搞得很好"的农业社，水稻减产都在 7％

以上，恰恰是全县减产最多的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崇宁县的干部和农民沉痛的地向记者叙述了事情的始末。

生产技术“大”改革

崇宁县今年在全县合作化后进行第一次春耕生产。为了争取丰收，中共崇宁县委员会和崇宁县人民委员会在春耕前夕召开的全县农村干部会议上，提出了一个“生产技术大改革”的计划。

计划规定：废除过去推广有效的水稻“一尺两头栽”的办法，全县 80％的水稻都栽成行距 7 寸或 8 寸(去年只有县农场的部份田这样栽种)。全县 1 万 3 千多亩苕子(养猪饲料作物)提前收割，以便在插秧以前增种 1 季玉米(去年全县只有两千 5 百亩田这样栽种)。全县两万多亩春马铃薯和土烟田里也间种玉米，收割完了再插秧(去年只有很少数农民这样作)。全县 80％的水稻栽插前都要用粪包裹秧苗（去年栽“包粪秧”的占 23％）。此外，全县还要种 1 万另 5 百亩双季稻（往年没有种过）。他们计算了一下。如果这些措施全部实现，水稻就可以增产 8％以上。粮食总产量至少可以增加 20％。

当时，很多干部被这个计划的庞大的增产指标所吸引，没有仔细考虑，便表示拥护，另一些干部（主要是直接指挥和从事生产的农业社干部）却认为这些措施虽然大多不错，但是劳动力不够用，可能影响插秧季节。他们还指出，国营农场密植的水稻是种在贫瘠的田里的，所以分蘖少，能增产；而全县大部份的田是肥沃的田，水稻分蘖多，栽密了就无法薅秧。至于双季稻，他们认为过去没有经验，不宜多种。

但是，县的领导干部认为“合作化后没有办不到的事”。他们不去仔细计算劳动力账，却把提反对意见的人一概斥为“保守主义者”，而加以批判。计划草案通过后，送到了中共温江地委。而中共温江地委对这一计划没有加以讨论或调查研究，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含糊其辞地叫中共崇宁县委“相机而行”。后来，中共四川省委员会指示各地纠正订计划中的冒进情绪时，中共温江地委也只通知中共崇宁县委降低增产指标，仍然没有去计算采取这些措施时全县的劳动力够不够用。

三头六臂也来不及

县里的计划经过乡、村、社逐级传达，一直布置到了所有的生产队，每一级都要求下面百分之百完成。很多生产队队长和社员不同意过分庞大的计划，干部们就指责他们存在“保守思想”。除了要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带头执行计划外，还规定不按计划办事的一律扣发工分，返工重作。干部们成天在田埂上跑来跑去，实行监督。这样强迫命令的结果。计划到是全部执行了。但是，问题也马上明朗化。栽 7

寸或 8 寸行距的“包粪秧”，每亩需要两个人工，比去年多费工一倍，加上增种和间种 3 万多亩玉米，增加了许多农活。虽然每个劳动力每天工作 12 小时，甚至晚上还点着灯干活，还是不能按期完成计划，早稻和中稻的一直拖到夏至节才栽完，比正常的情况迟了半个多月。这以后，农民既要忙着在已经栽秧的田里除草。又要忙着收割玉米、栽插单季晚稻、收割双季稻的早稻和栽插双季的晚稻，工作更加紧张了。社员们反映，即使人人都长出三头六臂也来不及。这时，县的领导机关发现计划上的错误，已经到了骑虎难下之势，只好通知各社放弃一万亩双季稻的晚稻的栽插。

这样一来，大部份水稻没有能除两道草（往年最少两道）；单季晚稻一直拖到小暑节才插完，比正常情况迟了 20 多天。在秧田里养得太久的秧苗都生长不好，还未移栽就含了苞，插进稻田不久就出穗。今年肥料虽多，大多用在增种和间种的玉米以及扩大的土烟上了，以致水稻普遍缺肥，穗子短，颗粒少，空壳特别多。

余波所及

这个不切实际的计划，不仅使水稻减产，别的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也大受影响，提早收割的苕子，每亩只能收干苕 100 多斤，比去年少四分之一。由于急于插秧，很多玉米未成熟的就收割了，每亩只收到 200 多斤，比往年少收好几十斤，原计划全县从增种和间种多收玉米 885 万斤，实际只多收 600 万斤，春马铃薯田间种玉米后，每亩比去年少收马铃薯 200 斤。土烟产量不但减少，而且因为间种的玉米遮去了阳光。烟叶长得很薄，抽起来谈而无味。

减产以后，今年全县农业社平均每个劳动日的报酬由去年的 1.20 元降低到 0.90 元左右。

农民的意见

秋收时，农民们收割那些稀疏而又多空壳的水稻，感到非常伤心。他们反映，一年辛苦落了空。有的说，要不是强迫大面积推广新技术，各个社今年都是大丰收。有的说，就是好事情也被这些凭主观的人办坏了。

唐昌乡长林农业社的一个小伙子曾不满县里的盲目计划，几乎被弄到大会上批判。他愤激地对记者说：“他们（指县、乡干部）望我们农业社多收粮，心肠本来是好的，但是不该凭空乱出主意，又强迫我们执行呀！这不是违反了毛主席走群众路线的政策吗？”

喻权域写好稿子，到地委找宋文彬审查，宋不表态——合作化高潮的第一年就闹减产，事情太敏感，他叫地委农工部长申培林审。

申培林，山西高平县人，长治中学初中生，1937 年参加抗日决死队，1952 年任

华阳县委书记。1954年任地委首任农工部长。他是反冒进的真诚拥护者，这年年底，他在专区合作化干部学校作报告，当着几百名基层干部发表以下言论：

“几年来只考虑国家利益，不考虑农民利益，只考虑增加生产，不考虑社员收入。农民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基础，民富而后国强。

“民富而后国强是办好社的关键。征购任务完不成就算了，社员要吃饭嘛，假如吃不饱，哪个还搞生产呢？

“农业生产每年只能增产百分之几，增产百分之十至二十是古今中外没有的，是办不到的。扩大复种成本高，产量低，劳动效率很低，所以 不能当作我们增产的途径和方向。

“有人说领导决定一切，不是，是群众。领导只是搜集群众的意见办事而已。群众不执行党的政策，要等待，不能按自己的意见去强迫别人执行。

“这一年来强调了粮食，挤掉了经济作物，把肥料、资金都用到粮食作物上去了，这种做法是片面的。消灭了经济、饲料作物，只增产粮食，这个增产有什么用？

“有很多干部不懂得自己是群众选出来的，不是为群众办事而是当官。现在干部和国民党的干部有何区别？如果是一样，我们革命是革啥子？革了一个国民党又来一个国民党。”（见《中共温江地委农工部副部长申培林同志的错误言行材料》，1959年11月）

喻权域在崇宁县采访时，申培林也到崇宁县的君平乡作了调查，发现水稻减产，痛心疾首地对县委干部说：“你们要对人民负责啊！要打报告把真实情况向地委反映。你们知道匈牙利事件是怎么发生的吗？”回来后他向地委交了报告，明言：“崇宁县水稻减产百分之七点二，完成征购后，群众口粮有问题。”

宋文彬不亲自审稿，给到地委来开会的崇宁县委书记杨洪魁打招呼，要他对记者表明不发表为好，要发表，先写崇宁县总的是增产了，因为多种了玉米，然后再写生产中的缺点。杨是否给喻权域转达了这个意见至今是个迷，但事后他曾对新繁县委书记曹云生说：“明明是那么些问题，不好说的。”

据喻权域回忆，那天晚上申培林把崇宁县委书记杨洪魁叫去和他一起审稿，他没讲几句，申就靠在沙发上“鼾声如雷了”，杨逐字审阅，他按杨的意见改动了 40几处。改完，杨把申推醒，问有何意见，申说没意见。喻权域请他们在稿件上签字，申说：“我们是老熟人，还用得着这一套吗？”

这次审稿的细节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反复追查，申培林说他未读原稿，也未发表意见；杨洪魁坚持说他不同意发稿；喻权域则为当时“没有坚持要他们签字”而追悔莫及。

稿件在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删去了标题中的“好心肠办下的坏事情”适逢新华总社副社长朱穆之到四川分社视查，对该报道大加赞偿，要喻权域陪他到农村调查，所见所闻，使他倍感报道切中时弊，鼓励喻说：“新华社记者就是要反映人

民的呼声”，又给四川分社打招呼，给喻提一级工资。

喻权域还没拿到朱穆之给的这一级工资，形势便急转直下。

1956 年的反冒进，和思想文化界的空前活跃一样，都是毛泽东有话在先才出现的。

4 月 25 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关于农业和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上，他说，苏联和一些国家片面注重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沙俄时代的水平。我们要适当调整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他要求兼顾国家、集体和生产者个人的利益。批评“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损害。”

他表现出合作化运动以来对农民少见的体谅:“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他米吃，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他要求：“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

这就是中央 1956 年下半年连发几个反冒进文件和社论的背景。

在 9 月份召开的中共八大上，周恩来指出，1953 年发生过冒进错误，1956 初又发生了这样的偏向。八大决议指出，如果不顾客观条件的限制，规定过高的经济发展速度，“结果反而会妨碍经济发展和计划的完成，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

1956 年是个多事之年，2 月的苏共 20 大上，赫鲁晓夫作了批判斯大林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东欧引发反斯大林主义的浪潮。

5 月，波兰重要工业城市波兹南发生反政府的政治动乱，10 月华沙学生上街游行，波党中央改组。10 月下旬，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发生大规模群众武装起义，迅速波及全国，苏联出兵镇压始得平息。国内，有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闹退社分社。

这一切曾一度促使毛泽东对国家经济建设和政治生活进行反思，直接产物是《论十大关系》、“双百方针”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论断，并体现于八大决议中。

然而，自匈牙利事件以后，毛泽东的态度极剧变化。在 11 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他批评有人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泼冷水，有个“促退委员会”。本来安排 18 年实现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他“一促进就很快”，农业发展纲要规定 1958 年普级高级社，“现在看样子今冬明春就能实现”。

1957 年 1 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的批评升级了。他说 1956 年的反冒进，结果反出了个右倾，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象台风一样”，“似乎合作社大有崩溃灭亡之势”，农业部长廖鲁言泄了气，他下面的干部也泄了气，“横直是不行了，农业发展纲要 40 条也不算数了”。他说，中央的部长、司局长和省一级

干部中，相当一部分出身于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家庭，所以他们回去听到的尽是合作社的坏话。大多数合作社只有一年多的历史，你革了一辈子命还犯错误，怎么能要求合作社一点错误不犯呢？“只要拿出一个办得好的合作社，就可以把反对合作化的一切怪论打下去”。

他说，有些党员什么关都过了，就是过不了社会主义关。他点了河北省委副书记薛迅、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孟用潜的名，因为他们反对统购统销。他“早就料到”，一有风吹草动，党内就会有人起来反对合作化。

他不再说关心农民利益的话，他说，那些替农民叫苦的人，“大多数是家里比较富裕，有余粮出卖的人。这些人的所谓‘苦’，就是有余粮。所谓；‘帮助农民’、‘关心农民’，就是有余粮不要卖给国家。”

他说，苏联的东欧一些国家搞合作化，粮食总要减产多少年，“我们搞了几年合作化，去年大搞 1 年，不但没减产，而且还增产了。如果今年再来一个丰收年，那在合作化历史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就是没有先例的。”同时他又敦促全党重视农业、抓粮食，“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

粮食产量就这样一层一层地涂上更浓重的政治色彩。整个推理的过程是：社会主义＝合作化＝粮食大增产；粮食减产＝否定合作化的优越性＝反社会主义。

1956 年底，李井泉在省委扩大会议上传达毛泽东批“反冒进”的精神，他说，现在有些人对合作化“散布消极情绪”，四川的消极情绪就是喻权域煽动起来的。他亲自念喻权域写的那篇报道，边念边批：“农民点起煤油灯连夜插秧，这个记者不歌颂反而批评，什么思想感情！”

为了对喻的报道进行反击，李井泉派了他的秘书搞了另一份报告，这时他拿出来念。报告说，崇宁县粮食减产，是因为有 2000 亩玉米选错了种子。

喻不服气地想，这 2000 亩玉米即使颗粒无收，也只少几十万斤，而崇宁县是减产三四百万斤啊。

李接着说，喻把稿件送审时，地委农工部长和崇宁县委书记都“坚决反对”，喻不听劝阻，擅自发稿，是无组织无纪律。

喻有口难辩。那时，新闻界确有一些人对“喉舌”、“宣传纪律”、“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等弄不明白，要到反右运动以后才能深刻理解。如此颠倒黑白，分社记者“群情激奋”。

年轻气盛的喻权域给省委写了一份申诉报告，分社领导不敢送；叫他写检讨，他不写。分社领导无奈以分社名义给省委写检讨，实际上为喻申辩。

自以为坚持真理的喻权域继续往火坑里跳。

他见到省委的一份内部通报，同时刊登了他的报道和李井泉秘书的调查报告，

证明喻是在胡说八道，“热血一下子直冲脑门”，提笔给分社杜长邵挺军写信，要求按党章中关于“党员有权向上级直至党中央主席申诉的权利”的规定，将自己的申诉上报。同时发了一通牢骚，其中最“恶毒”的一句话是：“记者在某些领导人眼里，正如司马迁在汉武帝眼里一样，只不过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俳优之流而已。这决不是党的政策!”

喻权域这条小而毒的蛇终于出洞了。1957 年 9 月的一次省市新闻界反右大会上，他被突然宣布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在大字报、大批判的狂风暴雨中，“流着眼泪度过 22 岁生日”，接下来是 21 年的漫漫长夜。

关于申培林、杨洪魁和喻权域在那个审稿之夜的悬案，两年以后也作了结论。申、杨均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主要罪名之一便是“指使右派记者喻权域到崇宁县写反党报道”。

1956 年底的省委扩大会上，不服气的不止喻权域一个。新都县的女县委书记王海香公开承认，生产上的强迫命令导至今年粮食减产。

李井泉为此在温江小组苦口婆心“亲自说服教育了几个钟头”，说减产是富裕中农制造的假象，批评王海香说，郫县这么搞增了产，为什么新都会减少呢？

有人“还是不通”，发牢骚说：“李政委的指示解决了思想问题，解决不了增产和减产的问题。”

对于 1956 年全面合作化后的第一年出现的大面积减产，崇庆县委提出另一个重要原因。

这年该县风调雨顺，水稻长势良好，由于有实事求是的第一书记张林超，“瞎指挥”并不突出，但秋收后各乡上报的产量均低于上年百斤左右.为此,书记张林超据实向地委反映。

宋文彬表示怀疑，一再要张林超清产，张一再调查情况属实，就是交不了帐，很是苦恼。他和县委的干部一起分析原因，得出的结论是，不是 1956 年减产了，而是合作化以前的估产高了。土改以后连年报增产，到 1955 年产量比 1953 年提高了 50%，然而这个产量只是作为向农民征购 粮食的依据，从未加以核实，事实上在个体农户大量存在的情况下，也无法对各户的产量逐一过称。合作化以后，打下的粮食普遍过称入公仓，粮食产量第一次有了比较准确的数据， 结果和过去的估产差了一大截。

（作者注：这是造成 1956 年“减产 ”的更重要的原因。1953 年统购统销以后，估产实际上是政府做的，而为了向农民多征购粮食，各级政府（包括乡村干部）总是乐意高估产量。合作化以后估产由农业社搞，这时参加了合作社的基层干部的利益已和前者连在一起，上报的产量应该更接近于实际。因此与其说是“减产”，不如说证明往年的估产偏高。而“瞎指挥”当时对产量的影响是次要的。）

张林超顾虑重重，不敢给地委讲， 后来被地委逼急了，只好硬着头皮讲了这个原因。宋文彬答复：“你们不要忙于作结论!”派许锐带工作组到一个乡 “清产”，用尽各种办法找“漏洞”，硬把产量算上去了。

这一下使张林超陷于被动，并被认为是右倾，降为副书记，由“清产”有功的许锐顶替第一书记。

到底是增产还是减产呢？

温江专区的内部资料显示，1956 年温江专区粮食征购实绩自 1952 年以来第一次出现负增长，由 1955 年的 106612 万斤，下降至 1956 年的 99189 万斤，下降 7 个百分点，比 1952 年的征购实绩还少 500 多万斤。大面积推行“农业技术改革”的肥富区减幅最大。“金温江”减 13%，“银郫县”和“吃饱饭”的崇宁县合计减 8%。（见《温江专区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温江专区计划委员会 1960 年 7 月编 ）

除非不顾一切的疯狂高征购，再也没有比征购实绩更真实的反映产量了。

但这一年,温江专区上报的数字仍然是增产。

国家公布的 1956 年粮食产量比 1955 增长 200 亿斤，并且第一次把没有达到预期增幅的原因解释为北方出现大面积天灾，宣传口径是，这进一步证明了合作化的优越性，否则不可能大灾之年还能增产。

但是，粮食征购显然出了问题，毛泽东在年底一再催促，必须完成 850 亿斤粮食征购。征购的困难并未使其对粮食产量产生怀疑，只是进一步加深了他对国内外“反社会主义风潮”的警惕，对“有粮不卖”的“富裕农民”的愤慨。

粮食在增产，征购上不去，农民叫苦连天，原因何在呢？合作化的优越不容置疑，粮食增产不容置疑，原因还是农民的自私、落后、自发势力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反抗，富裕农民的叫嚣，地富反革命的破坏，如此等等。

为了证明合作化的优越性，温江地委根据省委指示，反复进行清产，证明“确实是增产了”。

不解其中奥妙的杨洪魁没转过弯子，一口咬定 1956 年水稻减产了，为了使上面相信此话无假，他就让乡社的干部签字盖章。

地委认为他态度不好，再次组织工作组去调查。工作组“发现”1955 年以前的产量是按“老亩”计算的(川西坝子沿用的老亩，相当于 1.115 市亩)而 1956 年的产量是按新亩（市亩）计算的，把 1956 年的产量按老亩折算，增产的问题便迎刃而解。

怎么样？服气了吧？不，杨洪魁说，我们一直是按老亩计算的，“新亩就是老亩”，私下对工作组的清产嗤之以鼻：“那是折起来的，他们胆子大，叫咱就不敢那样做。”

农民们想的是另一回事。

从统购统销到合作化，他们发现土地改革到手的“胜利果实”已化为乌有，那个曾经令他们欢欣鼓舞的，在自己的土地上发家致富的梦想几近幻灭，不得不把未来的希望寄托于“社会主义的美好明天”。

社会主义美好明天是什么样呢？就象电影里的苏联农村一样：拖拉机在田野里奔驰，粮食推积如山，人人吃得白白胖胖，欢天喜地的在俱乐部里唱歌跳舞，住的是洋楼，顿顿打牙祭，新衣服一套又一套，人人讲卫生，个个有文化，如此等等。

1956 年一个大冒进，初级社立足未稳，一步迈入高级社，生产上的乱指挥造成减产，共社员的私有财产，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等等，第一次使农民对那个美好明天产生怀疑。

他们想重新得到曾经是属于自己的一份土地，重新获得对劳动果实的支配权。

退社、闹粮的风潮刮起来了。

8、不通就辩

1957 年 7 月反右派斗争的高潮中，毛泽东提出“对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其中主要的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一次说理斗争。”

8 月 8 日，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这是把主要斗争矛头转向富裕中农的开始。

所谓“富裕中农”，相当一部分是土改后分到土地生活条件好转的贫苦农民，即“新中农”，加上土改前的“老中农”，属于农村的中产阶级。他们人数众多，生产经验丰富，自地主富农政治上打倒，经济上被剥夺以后，成为农村中最有威望和势力的阶层。

毛泽东认为，他们是抵抗社会主义改造的主力。这些曾经为中国革命作出巨大牺牲和贡献的农民，如今已忘恩负义背叛了革命，堕落成“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一心向往走个人发家致富的资本主义道路的一群，他们带头闹退社，有粮不卖给国家，具有极大的煽惑力。共产党很多干部就出身于这种家庭，把他们的影响带到党内，所以必须把主要斗争锋芒指向他们。

“社教”的核心内容实际上是两条：其一、“合作化的优越性问题”。即必须承认合作化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合作化以后粮食增产了，日子过好了。其二、“粮食和其它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即够吃也好，不够吃也好，必须按规定指标完成征购任务。而“秋收以前的辩论，要着重统购统销问题”。

事实上，“社教”有露骨的现实目的，那就是把粮食收上来，把反合作化反统购统销的思想打下去，简而言之，社教就是交粮。

如果说以牺牲农民的利益来实现工业化是承袭苏联的经验，同时辅之以思想政治“教育”则是新发展。承认合作化的优越性与交粮二者构成一个圈套：首先，你必须承认增产、有粮，接下来交粮顺理成章，如同挨了打，还必须说打得舒服一样，这样的日子还长。

仿照反右斗争的方式，毛泽东要求在社教中“先让农民‘鸣放’，即提意见，发议论。然后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批判之。”

人民日报的社论进一步教导：“大鸣大放只不过是让大家把在高粱地里、在茶馆里议论的话，放到小组会、座谈会、辩论会上来讲；让干部们本来听不到的话和看不到的事能够听到和看到，让过去在各种伪装掩盖下的反社会主义的人和他的活动显露出本来面目，……让阴暗的角落受到阳光的照射，就不会发霉了。”（见人民日报社论：《经过大辩论整顿落后社》，1958 年 8 月 10 日头版）和反右比较，倒是真正的阳谋。

“鸣放”一开，高粱地和茶馆里进行的反社会主义活动原形毕露。

他们“叫嚣”：

“土改成绩十分，统购统销搞掉五分，合作化化了五分，现在和国民党一丘样”，“毛主席是李闯王，进了北京，忘了农民”，“土改时，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土改后，共产党有利就干”，“国家好比一个行，都把老百姓的钱都赚过来了，毛主席一二十年也吃不完，现在是国富民穷”，“我经历过皇帝见过官，就没有见过共产党这样管粮食”，“共产党多事，粮食还用管，谁粮食多了不知卖”，“国民党不好，粮油随便买，共产党好，卖过头粮”，“共同享福，种田不见谷”，“如果说合作化有优越性，那就是国家好完成征购。下个命令，要多少，拿多少”，“毛泽东，米缸空”。……（见《农业集体化文件汇编》（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1 年版，715 页-722 页）

然而，对农民可不能象对右派分子，给他戴顶帽子又有何用？田还得他们去种，粮还得由他们去交。除了对地主富农实行“专政”，对大多数心怀不满的农民只有“教育”，教育的方法是“大辩论”。

记者笔下温江县石牛村的一次辩论会是这样进行的：

黑夜，竹村环抱的篱墙里，闪烁着忽明忽暗的灯光，黑压压的人群拥满了堂屋的会场。

“常言说，谎话说不久长，乌云遮不住太阳。现在辩论开始了，谁有意见谁讲？”主持会议的人向大家扫过询问的目光。

“我有话要说！”一个裹着白包头的中年人，慢慢从人群后面挤了出来。 “我向大家报告一下：富裕中农干洪青老婆说，统购饿死了她姐姐，现在弄清楚了，这完全是谎话。……她姐姐生病死的时候，还有几十斤大米放在床底下。”

“你们听，把病死也赖给统购了！”

“问问她，为啥要昧着良心造谣呀！”

“那还用说吗？放出空气，好一颗粮食不缴，再叫国家送她几担大米！”

一阵笑声掠过人们的头顶。

“你们不要笑！人没有饿死，可是，确实饿过肚子。”一个吃得满面红光的青年人，从板凳上站了起来。几天来，他到处叫喊留粮不够吃，这会他又说：“统购那年，我自已就几天没吃饭。”

“没吃饭？李兴才，你吃的啥？”

“他到温江下饭馆去了。”知底细的说。

“新社会的青年人，没受过罪，不知过去的艰难啊！”

“忘本的不光是青年人，现在少数党员也叫腐蚀了！”杨克清转过身来，批评坐在墙角里的余振元：“你还是个党员哩，家中放着三千斤谷子，可是也跟人瞎喊没粮吃，‘家中有余粮，隔壁有戥称’，你长得白白胖胖的，怎能说这种话啊！”

所有的人都望着余振元，他脸上一阵青、一阵红，头底底地向下垂着，两手捂住脸，沉痛地说：“我错了，我喝了资本主义的迷魂汤，被蒙了眼睛，失了立场。”

…………（见纪希晨：《田野上的论战》，人民日报 1957 年 10 月 23 日 2 版）

报纸上所有声称粮食不够吃的农民，不是“吃得红光满面”就是“长得白白胖胖”。不论家中有多少粮食，几千斤也罢，还是秋收后“有几十斤大米放在床下”，都是不缺粮的铁证。家中没吃的被迫到城里挤馆子，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诗人笔下，他们更是一帮阴暗角落里的丑类。

“社里，关于统购问题的辩论正在热烈进行。

一个富农儿子却偷偷的伏在家里发毒霉的粮囤上哭泣。……”

富裕农民及富农的儿子们情愿粮食发霉也不愿卖给国家，存心和社会主义对抗到底，要象土改时那样再来一次斗争。

今天是什么喜事，

张来顺全家都换上新衣；

7 岁的孩子高高举着银行存折，

跟他共患难的老婆，

拿着保存到今天的“打狗棍”。

“来顺，走亲戚吗？”

“不，我是去参加辩论！”

作者声称是写的川西农村，不过看来有欠深入生活，川西坝子何时听说过“来顺”？男人也没有“老婆”，只有“婆娘”。不过“打狗棍”全国通用，它是忆苦思甜的道具，除了用于斗争地主富农，大量用于同那些忘本变质的富裕农民辩论，其中最著名的一根是湖北黄岗县刘介梅的。

据说这个“三代人打长工，三代人讨米”的祖传叫化子解放后当了土改工作组长，参加了共产党，分到了全套家具、农具、健牛、六亩三分好地，娶了老婆，于是干部也不当了，两口子“下蛮力气干”，积下五石谷子的本钱。谁知本钱还没见利，就被统购一空。接着又是合作化，他父亲气得不干活。刘介梅扬言：“算了，只当是没有土改分田”，在会上“横着心，恶言毒语攻击共产党，攻击合作化，攻击统购统销。”

人民日报说，富裕中农占农村人口的 20％到 30％，“他们的动向，往往足以影响整个农村社会主义的改造事业”，他们有走资本主义发财道路的强烈欲望，刘介梅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于是,刘介梅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人物，成千上万的人涌向湖北黄岗县参观“刘介梅今昔对比展览”。展厅的一边是解放前刘介梅一家的全部家当：一只三条腿的床上挂了一床“用了 80 年”的蚊帐，一件“穿过 4 代人”的状如一堆烂棉絮的棉衣，和一张兼作碗柜和饭桌的掉了底的木箱。另一面陈列着着他们现在的财产：地主的雕花大木床、红漆木柜、柏木大桌，90 多件制服、毛衣、皮袄，皮鞋、回力胶鞋摆满一地。展厅中有一尊刘介梅当叫花子时的塑像：头顶破毡帽，身穿烂棉袄，一手持打狗棍，一手挎要饭蓝，里边装一只破瓢，一个烂碗。

如今，通过辩论，“忘本回头”的刘介梅梳着分头，着一身新制服，挽起袖口露出手表，给观众作现场演讲：“刘介梅啊刘价梅，你今天穿的、吃的、用的，哪一样不是共产党，不是社会主义带来的？可是，你攻击了党、攻击了社会主义，你想自己发财……”

刘介梅的的故事拍成了电影，编成了戏，演遍全国，让先富起来的农民无地自容。

上了小学教科书的诗歌,是张长弓的《手拍胸膛想一想》。“在大辩论的会场上，一个富裕中农说粮食不够吃，要抽出车马退社，这时角落里站起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手指着他说，老弟呀，你忘本啦……”

树老根多，

人老话多，

莫嫌我老汉说话哆嗦。

你钱大气粗腰杆壮，

又有骡马又有羊。
入社好象吃了亏，
穷人沾了你的光。
手拍胸膛想一想，
难道人心喂了狼！
……

社教要求“回忆、对比解放前后和合作化前后农民生活的变化”，开“忆苦思甜”思想教育之先河.虽然它有悖于唯物论的进化论，但在当时是行之有效的。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贫苦农民在政治上翻了身，获得了经济上的平等，他们中的许多人当了干部，回到过去是不能想象的。

但是,这种方法不久就要出毛病，几年以后，农民们就开始回忆合作化以前的美好时光，70 年代搞忆苦思甜，那些不知“旧社会”的青年人往往就忆到大饥荒岁月。

不难看出，这种“辩论”实际上就是斗争。

温江石牛村单干户李国成,在辩论中因说了句“要够吃，除非一石八斗”(作者注：老石每石约合 700 余斤谷子，大米 500 斤左右，为旧时川西坝子长年雇工的一般报酬。此话意为农民的留粮标准不应低于此数。）遭到数次批斗。

这还算文明的，实际上武力“辩论”屡见不鲜，“辩论”成了打斗的代名词。“不通就辩”，凡是说征购高了的，粮食不够吃的，说减产的，想退社的、说双季稻、密植搞拐（糟）了的，把粮食卖给私人的等等，统统被揪出来辩论，一说起辩论，心惊胆战。干部说一声：“你龟儿子……拉你去辩论！”农民就规矩了。

到 1958 年就发展成“不通就辩，不信就看，看了不办，就要批判”，看什么呢？看上面搞的稀奇古怪的生产“样板”。

农民粮食是否够吃，实际上是不容置辩的。

人民日报说:“谁说农村留粮不够吃？只要思想对头，口粮就够吃”,“不是缺粮，而是缺社会主义思想”。现在经过辩论，“大家都说了心里话，承认粮食够吃”。但是“打通了思想”并不能解决增加粮食征购量的问题，所以农民还应该在够吃的情况下多节约粮食支援国家建设。继社教以后又有“反贪污、反浪费”的双反运动，反贪污针对基层干部，认为他们多吃多占了粮食；反浪费针对一般农户，认为他们不注意节约，裤带太松，吃粮太多，拖了工业化的后腿。

人民日报打招呼：“今后凡是因为浪费粮食而造成缺粮的，国家和农业社都不应额外供应”。

其实所谓浪费完全是夸大其辞，只是裤带勒紧的程度而已。什么才不叫浪费呢？农民应该继承“糠菜半年粮”的勤俭传统，多吃杂粮、瓜菜、稀饭、“野菜”，只完

成统购，不享受统销。

好了，农村现在已经实现了合作化，取得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胜利，又进行了社教取得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前者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关系的改革将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后者是毛泽东的创造性发展——“灿烂的政治思想之花，必将结出丰硕的经济之果”。

一个顺理成章的生产大跃进就要出现，它的名字叫“生产革命和技术革命”。

在农村，困绕国家工业建设的粮食问题，将通过这次革命得到彻底解决。



当年毛泽东走过这条路是乡间小道，现在，因人口膨胀，早已成为居民区，并被命名为红光路。

9、童话世界

1958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发出大跃进的总动员令。

和前几次会议一样，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再次在会上作深刻检讨。周恩来说，现在的形势“真是一天等于２０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伟大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会更加认识反‘冒进’错误的严重。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代表人，应该从这个错误中得到更多的教训”。（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1958年5月）

毛泽东在会议上几次气势磅博的讲话，把他的豪情壮志发挥得淋漓尽致。

……我讲一个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不要怕马克思。原因马克思也是人，他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一个脑子，跟我们差不多。马克思的东西，不一定要读完，读一部分基本的东西就够了。但我们做的，超过了马克思。

……我问过我身边的一些同志，我们是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他们大家都摇头说，不是的，住在地上。我说，不，我们住在天上。在地球上看到别的星球在天上，如果别的地球上有人，他们一看我们，不就是在天上吗？中国人喜欢神仙，我问他们，我们算不算神仙？他们说，不算。我说，不对，神仙是住在天上的，我们住在地球上即住在天上，为什么不算神仙？如果别的星球上有人，他们不把我们看成神仙吗？第三，问他们中国人算不算洋人？他们说，不算，外国人才算洋人。我说，不对，中国人也叫洋人，因为我们看外国人是洋人，外国人看中国人不也是洋人吗。服从外国一百多年，吓怕了什么都怕。

……从古以来，很多学者、发明家、在开始都是年轻的，都是没人看得起的，学问比较少的人，被压迫的人。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名家往往是最落后的、最怕事的无创造性的人。青年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这种例子多得很。

他举例说：战国时期秦国的甘罗 12 岁当丞相；汉朝贾宜 17 岁被汉文帝找去一天升了三次官；项羽 28 岁自立为西楚霸王；韩信曾受“胯下之辱”；孔夫子年轻时当过吹鼓手；二等圣人颜渊死时才 32 岁；释迦牟尼创立佛教时不过一二十岁；西厢记里的红娘比审问她的老夫人学问好；南北朝时的荀灌娘是个 13 岁的女孩子；唐太宗李世民起兵时才 18 岁，作皇帝时 26 岁；山东罗成 18 岁起兵，岳飞死时 32 岁；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是青年时创造出来的；列宁 31 岁创立布尔斯维克主义；孔明 27 岁当军师；周瑜也是年轻人；三国时的王弼十七八岁就是哲学家；安眠药的发明者是德国一个药房的司药；青霉素是个染匠发明的；达尔文是青年时搞的进化论；最近出名的两个发明家杨振宁、李政道也是青年人；郝建秀 18 岁就创造了纺纱的先进方法；国歌作者聂耳也很年轻；封神演义里的哪吒天不怕地不怕；北魏的兰陵王是个少年将军……所以要敢想、敢说、敢做。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都爆发出来。他说：

……我不晓得什么工业，一窍不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开始不懂，学过几年就懂了，有什么了不起，这是不正常的心理状态，我看，大概只要十几年功夫，我们的国家就可变成工业国。

……“让高山底头，河水让路”，我看这个话很好。高山嘛！我们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河水嘛！我们要你让路，你还敢不让路。

……中国应当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大国，因为人口多嘛！过去林彪同志在延安曾谈到，将来中国比苏联强，那时我还有点不大相信。我想苏联也在进步呀！现在我

相信了，完全有可能，我们这么多人，现在六亿，再过 10 年 8 亿，人多总要做事，总不能光睡觉嘛，吃了饭就干社会主义，无非是搞工业，搞农业嘛，因此说，15 年可以赶上美国。对外还是讲 15 年赶上英国，美国让苏联赶，大家分工赶，不过我们也能赶上。

……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他有“以古非今者杀全家”的禁令。(林彪插话：秦始皇焚书坑儒）秦始皇算什么？他才坑了 460 多人，我们坑了 4 万 6 千人，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有人骂我们是个独裁统治者，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他们说的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外行领导内行，这是一般规律。差不多可以说，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

……插红旗辩风向。凡是有人的地方都要插旗子，不是红旗子，就是白旗子，或者还有灰旗子，不是无产阶级的旗帜，就是资产阶级的旗帜。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任何一个大山小山，任何一亩田，看到那个地方没有旗帜就去插，看到白的就拔，灰的也得拔，黄旗也要拔，黄色工会，等于白旗。（《毛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 年 5 月 8 日－5 月 23 日）

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一天等于 20 年，赶英超美，敢想敢说敢做，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什么样的人间奇迹也会创造出来……。

对于一个有过辉煌历史又饱受凌辱、贫穷、战乱的民族，这些口号的诱惑力、振奋力是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难以体验到的。

一切在今天看来多么荒唐离奇的神话，都会让人信以为真，一切在今天看来多少不可理喻的行为，都会令人热血沸腾。从大字不识的文盲，到留洋归来的专家学者，从狂热冲动的青年，到饱经世故的老者，从黎民百姓到各级干部，很少有人今天敢保证说当年没有狂热过。

建国后短短几年眼花缭乱变革，使人不能不相信没有共产党办不到的事情：几十年四分五裂，兵荒马乱的中国，不是统一在五星红旗之下吗？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豪绅恶霸、达官显贵不是一夜之间打入十八层地狱了吗？世界首富“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不是被志愿军打败了吗？苏联的人造卫星在太空翱翔，美国的卫星不是“倒栽冲”了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民主党派、右派分子不是收拾归一了吗？连钉子都造不出来的中国人，现在不是可以造飞机大炮拖拉机汽车火车了吗？几千年的个体农业，不是都组织起来了吗？……

短短八九年时间，人民看到的奇迹太多了，他们不能不相信会出现一个发展经济的奇迹，不能不为之狂热。

抑制不住兴奋的作家巴金写道：

“在这些日子，我翻着每天的报纸，或者听人们讲话，或者到各处去看看，我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好象活在童话世界里一样，好象在做梦一样。……象万座高炉平地起，一亩小麦 5 千多斤，在好些方面不要 15 年，只要短短几年功夫就赶上英国；象把水引上山，把山削平，把海填满……这样的事，过去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就是编童话的人也不敢想得太多。童话里一个聚宝盆已经了不起了，我们今天的聚宝盆何止千千万万！”

“至于几年以后，我们的祖国将以什么样的面貌在世界上出现，也不是编童话的人几十个奇迹就到止境了，在今天的中国，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奇迹出现。所谓奇迹就是从前认为人力所办不到的。今天再没有中国人办不到的事情了。……要是古人能够活起来看一看今天的世界，他们一定会吓得逃跑，他们会以为遇到神仙了。在他们脑子里今天的许多事情只有神仙才做得出来。……”(见巴金:《变化万千的今天》人民日报 1958 年 7 月 3 日第 8 版)。

整个国家都在童话世界里梦游。也许最能反映这个世界的是民歌了。

郭沫若 1958 年在关于“大规模收集民歌”的讲话中说，民歌作为史料的可靠性，“比史官记载要可靠得多，从某一方面讲，甚至比地下发掘的东西还可靠。”的确如此，如果这种歌唱是由衷的话。至少在大跃进初期，这种歌唱由衷的，工农兵学，男女老幼，从诗人到文盲人人诗兴大发，工厂车间，田间地头到处是赛诗会，朗颂会，墙头上贴着诗，大道小路上竖着诗，报刊杂志上登满诗，人人口里念着诗，“无处不见诗，无人不歌唱”，宣传、文化部门到处“采风”，编发一本又一本的诗集。郭沫若和周杨带头编了一本《红旗歌谣》，收诗三百首，声称：“在它们面前，连唐诗三百首都要逊色了”。一首气吞河山的民歌是：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毛泽东对跃进诗歌倍加赞扬，他为自己亲自发动的全民建设热情深深感动。

1958 年 6 月 30 日他读了人民日报关于余江县消灭的吸虫病的报道“浮想连翩，夜不能寐”，作《送瘟神》二首：“——春风扬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春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实在和“让高山

低头，让河水让路”是同一意境。

郭沫若的诗歌创作达到高产顶峰，几乎天天有诗发表。其《火箭篇》是这一时期的生动写照。

建设遵循总路线，轰轰烈烈活鲜鲜。文化革命上骏马，技术革命箭离弦。／政治挂帅总领导，自力更生学苏联。地大物博人口多，超英超美有何难。／不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繁昌不愧叫繁昌。紧紧追赶麻城县。／不闻钢铁千万二，再过几年一万万？牛郎织女无颜色，盘古女娲骇破胆。／工农生产大跃进，算盘无法再计算，需要电子计算机，大家望着科学院。／……到处都是新李杜，到处都有新屈原，荷马旦丁不稀罕，莎士比亚几千万。／李冰蔡伦接连翩，建筑圣人赛鲁班。哥伯尼同达尔文，牛顿居里肩并肩。／血吸虫病成古典，恶性肿瘤已游仙，人人都是多面手，人口十亿还有多。／人民内部有矛盾，随时展开大辩论。敢想敢说又敢做，矛盾促进大发展。／力争上游争上上，鼓足干劲没边缘。尽快尽多尽好省，一天等于二十年。／各尽所能取所需，将成老生之常谈。人间天国乌托邦，直是家常茶便饭。(郭沫若:《火箭篇》，人民日报 1958 年 9 月 2 日第 8 版)

中共四川省委 1958 年 4 月 26 日发出搜集民歌民谣的通知，到 6 月份就收到 1 万 5 千多首。为民歌选集订稿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兴奋之余赋诗：“势如江海气如虹，万众歌声一代风，羡煞谪仙惊壮志，风流人物数工农。”

试录四川跃进诗歌若干首于下。

玉米稻子密又浓，铺天盖地不透风，就是卫星掉下来，也要弹回半空中。

(仁寿)

一个南瓜三人抱，一个红苕装半筐，半边蕃茄吃不下，半截包谷够你尝。

(丹棱)

太阳能煮饭，大粪能发电，空气能点灯，树叶能织缎，柴草当饲料，野根当蜜饯。(中江)

贺喜把笔都写烂，敲锣把手也打酸，皆因有了总路线，喜报高得堆上天。(重庆)

我们举起手，要叫高山排队走；我们举起手，要叫大河也倒流；向田地要粮，向高山要油，向柴火要棉，向野草要酒。一个天下决心，只包谷杆儿高齐天，娃娃背在白云间，弟弟眉开眼又笑，坐上飞机把它搬。(南充)

一座粮山高万丈，白云缠在半山腰，太阳累得汗长淌，半天爬不上山岗。(遂林)

老鼠奸、麻雀坏，苍蝇蚊子象右派。吸人血，遭病害，偷人幸福搞破坏。千家万户齐动手，擂鼓鸣金除四害。

美国美国我问你，你有什么了不起！小麦产量你失败，水稻而今又丢底。

毛主席两手握乾坤，浑浊黄河要澄清；说啥李冰父子治水，红日当空哪还见星星。

（戈壁舟）

十字路口摆擂台，有本事的都拿出来；驾飞机，开火车，坐不上汽车，也要骑部自行车，千百万人抢火箭，谁愿去推鸡公车，生产战线比身手，英雄跟着人造卫星走！（戈壁舟）

欢潮派，内心焦，早稻丰产传捷报。革命促进派，说到就做到。要高潮，就高潮，增产锣鼓满山敲。可笑秋后算帐派，硬要输得稍都捞不到。（宜宾）

美国美国你注意，说件奇迹吓坏你，我国人民是英雄，早稻亩产一万几。／美国美国纸老虎，敢不敢来打个睹？时间不用 15 年，你会承认全盘输。（三台县委书记王德立）

太阳落坡坡背黄，搓把蓑草拴太阳，太阳套在松树上，一天变作两天长。（奉节）

紧接全民大诗歌运动，一个“在全世界史无前例的群众美术创作运动”又以排山倒海的气势铺天盖地而来。

这股风，从民间艺术发达的江苏省刮起，当地的领导灵机一动，发动农民把绘画作为宣传大跃进的武器。

丕县是最有名的“家家有壁画”的“壁画县”，这个没有一个专业美术人员的县一夜之间冒出 1 万 5 千个“美术骨干”，包括十一、二岁的孩子，也有木匠、扎彩匠，年过 70 的“民间剪纸”老大娘以及所有“会画道道的人才”。一个月完成壁画 18 万 3 千幅。

官湖镇“70 个整天下地劳动的人，在一夜之间就画了壁画五百幅”。他们用红泥沙、石砖粉、烟灰、石灰、树叶汁和猪鬃捆成的画笔“大胆而豪迈地进行创作”：一个人抱不动的大玉米；玉米的稍子被飞机削掉了；在玉米的两端交谈需打电话；画一个大山芋就把大车陷在泥里；画丰收的稻谷象山一般的海浪，把观潮派吓倒在地；画农村“电气化”的电线象蜘蛛网；把化肥厂烟囱画成孙悟空煽不灭的火焰山。“姐姐嘴儿呶，这么大的红薯怎么煮”，一个壮硕的姑娘把一只红薯装进大锅，还有一半冒在锅边……。

美学专家王朝闻欢呼：“这是奇迹，这是美术史上还没有出现过的奇迹”。他说，这些群众美术最可贵的特点，是为总路线作宣传的政治任务，和自由抒发感情的“统一无间”，因为他们感觉和党的路线是一致的。不象没有改造好的画家，愿意画什么和应该化什么对不上头。他们的一些“挂羊头卖狗肉的抒情作品，……即使在描写劳动人民进行生产的时候，也不免强调肉感，掺和着黄色的佐料。”（见王朝闻：《枝高叶大的群众美术》人民日报 1958 年 8 月 30 日第 7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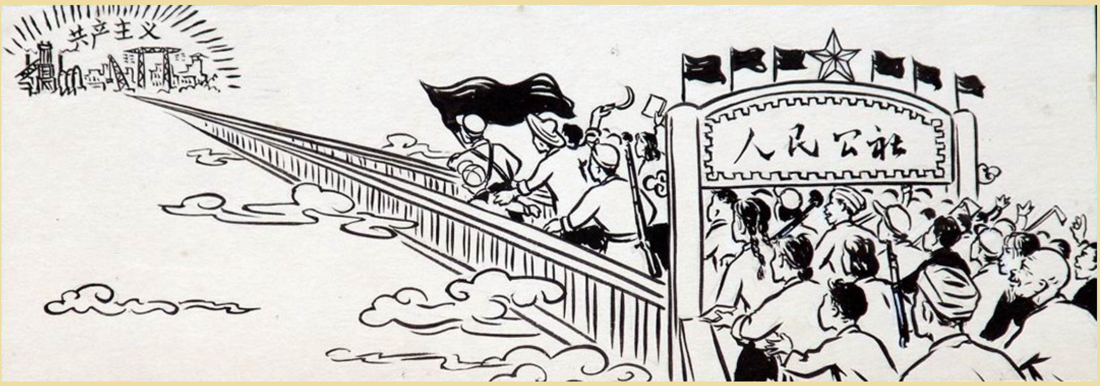
另一篇署名左海的文章说，这些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画，它们开创了中国绘画史的光辉的新时代，它们和旧时代的宫画、文人画、隐逸画、匠人画等都不同。它们把什么画院气、山林气，书卷气，匠人气以及其它各种气一扫而光，它证明了马克

思所说的，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人都是优秀的画家，“现在已经可以看见这个伟大局面的端倪了”。

内容风格大同小异的大众跃进壁画，迅速涂满全国每一个角落，和诗歌运动一起成为大跃进年代无所不在的景观。

无处不在的还有漫天飞舞的红旗。毛泽东讲的“红旗”是政治上的红旗，即社会主义的旗。农民的脑袋没有那么复杂。他们理解的红旗就是实实在在的用红布、红绸做的旗帜。上面叫处处插红旗，于是田野上、山岗上、房顶上处处红旗飞扬，出工时队长社长举着红旗昂首阔步走在前头，后面是锄头扁担箩筐婆娘娃儿一长串。

“力争上游”，也被具体化到每个人头。各类评比用卫星、火箭、火车、汽车、自行车、鸡公车、老牛、乌龟等等表示上游、中游和下游。如果你当了下游，你的名字就会不光彩地列在壁画上的老牛、乌龟、蜗牛之类慢行动物的下面而遭人耻笑，当然更为可怕的是被拉到台上或桌子板凳上去“辩论”。



宣传画：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

大跃进包括“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

在农村，文化革命以政治挂帅、插红旗、拔白旗的“两条道路”斗争为中心，同时有扫除文盲运动，全民诗歌运动、壁画运动，除四害运动，大办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农校等等。

技术革命包括农具改革、运输工具改革、生产技术改革，大搞水利、交通等农田基本建设，大炼钢铁等等，这一切都是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旗帜下，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进行的。

10、迷信扫荡科学

“科学”这个 20 世纪初流入中国的“和式汉语”，直到那时，在一般老百姓中还是个陌生而令人敬畏的字眼。

正如胡适所言：“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中国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辱的态度，那就是‘科学’”。

自从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大讲破除迷信，又写下“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批语后，“卑贱者”们在铺天盖地的宣传声浪中恍然大悟，原来“科学”不过如此。他说:“历史证明”,科学发明大部分是没有文化、没受过多少教育的人，或者是外行所为。飞机的发明者莱特兄弟只读过高小；电机的发明者法拉弟是报童；爱迪生只读过三个月书；轮船的发明者富尔顿是个首饰匠；发明蒸气机的瓦特的父亲是破产的小商人，本人是学徒……知识、学历、专家被嗤之以鼻。名声显赫的科技界名人纷纷表示自己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绣花枕头。深受鼓舞的“卑贱者”们乱想乱干，创造出无数令人眼花嘹乱、头晕目眩的奇迹。要把这些“奇迹”罗列出来，需要一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式的巨著。

为“解决全面丰收与劳动力不足的尖锐矛盾”，1958 年 7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迅速在农村开展农具改良运动的指示，要求全民动手，“人人当工匠，户户是工厂”。

农业部农具改良办公室声称，到 9 月份全国已创造改良农具 54 万余种，推广 2.5 亿件。

北京开办农具革新展览，展出数以千计的“新式农具”，它们大部分为木制手动，有一人操作的“手动式联合收割机”，有数十人才能启动的巨型人力提灌装置，还有类似永动机一类的玩意儿，整个露天展场尤如中世纪博物馆，一批一又一批的各级官员和各地代表在这里汲取斗志和灵感。

36 名“最聪明的”文盲、半文盲被吸收为中国农业机械学会会员，据说他们创造的各种人力机械，可提高工效几十倍到上百倍，甚至“比畜力高几十倍”。

名气最大的新式农具,是闹得沸沸扬扬的双铧犁。这种带轮子，有前后两个铧刀的全金属结构的家伙祖籍东欧，其重型的有 3 百多斤，最轻型的也有 180 多斤，1953 年作为新式农具引进。

这个傻大粗笨的家伙在北方平原旱地上勉强可用，在南方山区和水田里完全是

个劳民伤财的废物，名声奇臭。

1956 年强行推广 160 万部，农民大呼上当，纷纷要求“退犁”。农业部尴尬万分，要科研单位加以改进以适用南方水田。

1958 年 1 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期间到浙江省农科所视察，在试验大楼的走廊里见到一部双铧犁，问起双铧犁的改进工作，所长楼宇立即安排人表演双铧犁犁田，毛泽东亲自扶着犁走了几十米。伟大领袖亲自用双铧犁耕地！浙江立即召开全省农业机械化会议，重申推广双铧犁，针对“说双铧犁太笨重，山区不能耕，缺牛地区根本没条件推广，还不如木犁好”等思想进行“辩论”，要大家承认不是犁不好，而是思想问题没有解决，决定当年推广 3 万台。


毛主席在浙江农业科学研究所的試驗地里　侯　波攝

毛泽东在浙江农业科学研究所的试验田里。此后，他向全国大力推出“农业技术革命”的双铧犁。

为“恢复双轮双铧犁的名誉”，尤其是在南方水田里的名誉，农业部长廖鲁言二月下旬招集南方 13 省，在浙江召开“南方双轮双铧犁改装评比和推广使用经验交流会”，参观了推广双铧犁取得“伟大胜利”的黄岩县焦坑乡。

这次会议上，一批坚持在水田中使用双铧犁的县受到表彰，其中有川西坝子上的双流县。廖鲁言在会上总结说：“过去双铧犁的名誉为什么一度很‘臭’，甚至‘退犁’？……主要是右倾保守思想作怪。”他接着说：“我们也应该作自我批评，农业部就要进行自我检查和批评。”[33]

人民日报的应景“民歌”为双铧犁正名：“两牛拉犁急如风，双铧翻土快如龙，谁说新式农具重，姑娘扶起脸不红”。在上面的催逼下，农民又把锈迹斑斑的双铧犁

抬到田里，买下强行摊派的新犁。大大小小的工厂昼夜赶制，甚至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帮忙造，结果还是废铁一堆。四川前后推广双铧犁 4 万件，郫县红光社就有 30 多部，除了偶尔表演给上面的人看外，没有一个犁手愿意用。

“我们要增产，要跃进，可是打下的粮食运不出去怎么办呢？”记者笔下的农民问。急于向全国调运粮食的四川省委要求交通运输实现“七化”：农村运输车子化；水上运输机械化，汽车运输列车化，车子胶带化，转动轴承化；山区运输驮运化和轨道化，渡口桥梁化、搬运机械化。

川西坝子的 40 万部鸡公车,要求将轮子加大，轮上加胶带，轮轴上装弹子盘（轴承化），还制造出载重一吨的“三轮机公车”。

7 月 12 日，刘少奇从天津坐火车下济南，在车上和到北京参观农具展览会返回的江西都昌县的代表交谈。一个代表说，现在农村搞车子化，就是买不到轮子上用的弹子。“没有就靠自己做呀！”“要象安徽省阜阳专区那样，工厂买不到弹子，就用铁丝拧成小股包在轮轴里，效果很好，你们也这样试试看。”（见人民日报 1958 年 7 月 30 日第 6 版《幸福的夜晚，难忘的接见——记刘少奇同志在列车上和我们开座谈会》）

7 月 26 日,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说：“在一切运转工具中实现滚珠轴承化，是当前农具改革中的主要环节。”社论断言：什么是半机械化呢？“就是把一切以人力、畜力为动力的农业生产工具都安上滚珠轴承，轴承是机械的灵魂。滚珠轴承发展的高度和使用的广泛程度，从来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水平的重要标志，畜力农具加轴承，就是我国农业的半机械化。”

事情原来就这么简单：只要安上滚珠轴承，半机械化就实现了。这对苦于何时才能实现机械化的人们真是天大喜讯。而且“滚珠轴承倒是相当容易制造的”。

社论举例说，安徽阜阳专区只用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建立了 793 个制造滚珠轴承的工厂，并且制造出 15 万套轴承，下个月就可以在全专区实现运输工具轴承化。

几天以后，河南吹嘘说，全省七个专区 108 个县，“基本上做到了县县区区办轴承工业”。浙江发誓在 10 月底之前，把一切改良农具装上轴承。北京又办起滚珠轴承展览会，“按现代化滚动轴承分类，几乎应有尽有”，它们“多半是手工制成的”，质量和上海大厂里生产的差不多。

各省争先恐后要实现这个捡便宜的半机械化，四川自然不甘落后。

四川日报宣称，泸州专区土法制造滚珠，全区 10 多万部水车已装上了滚珠，各地党委都把制造滚珠轴承作为农具改革运动的中心，采用多种土办法制造滚珠。报纸上介绍的制滚珠的土办法工艺如下：一、用钢锯把圆铁棍锯成“小节节”。二、将截下的料放在类似乡下捣蒜的一付模子里，用锤子砸成“圆蛋蛋”。三、用耐火土调上破碗破缸片做成罐罐，把圆蛋蛋放在里边，架上柴火烧红，往凉水里一蘸，“即成了质料坚硬的滚珠”。四、用木料做个带摇把的圆筒，里面装一些玻璃碴子，把滚珠

倒进去摇，就可以把滚珠磨得“光圆净亮”。

四川日报图文并茂的报道，遂宁县用木料制成滚球轴承。奇怪的是，遍地都在造滚珠，却没见做轴套的，实际上许多情况下是在转动部分掏个槽子把铁蛋子放进去了事。

“汽车运输到列车化”是川西平原上又一道景观。8 月 7 日，成灌公路上出现一列拖了 20 辆挂车的汽车列车。列车的车头，是成都几个修汽车的老工人用报废的外国车七拼八凑起来的，取名“万国”式，挂车为竹木结构。这列汽车“共载粮食，百货和食盐 84 吨”，车头披红挂绿，红旗飞舞，一队男女敲锣打鼓，一路上浩浩荡荡，直抵灌县城关。和它比起来，拖三挂五挂的就司空见惯了。

更有驾汽车列车闯二郎山、翻折多山的英雄。

和汽车列车化毗美的一绝是“铁路木轨化”。

大邑安仁区雄心勃发，动手修木轨土火车“区环线”，修出一段后，温江地委就去开现场会，在地委新创办的《都江报》上报道，于是砍树子方便的地方纷纷效法。

邓小平的故乡、穷得要命的广安县胃口更大，7 月份，他们已动工修建“全川第一条县办铁路”，新华社的报道说：“目前修路的人们正在山岭中架云梯、搭天桥、修路基、架桥涵。他们用矿山的轻便铁轨辅上线路，铁轨不够就用木轨包铁皮的办法架设铁道复线。”

成都市的环城小铁路也动工了。

挖坟是全国性的，祖先崇拜鬼神崇拜都在破除之列！一声跃进，立即“退位”。

为了平整土地、改造土壤、扩大耕地面积，全国到处在“动手把祖先的坟墓翻掘起来”。“先进”的农民们豪迈的说：“让祖先也来和我们一起来建设吧”，因为那些棺木和石碑，可以“用来筑桥、铺路、搭瓜棚、修猪圈，稍微坚固一点的棺木，更是造车轮子的好材料。”

集体坟园的牌坊两侧写着“全社齐心搞生产，异姓一堂奉祖先”。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对此攻击：“祖先的神圣的坟墓正在到处受到亵渎”，被骄傲的人们作为笑谈。

土葬时代川西坝子随处可见坟园。大户、大姓有私家坟园，小户、小姓有公共坟园，大大小小的寺庙里有坟园。

坟园有占地之弊，也有护林之利，每处坟园都是一个林盘，里边的树木（许多是年生已久的大树）是不许乱砍的，枯枝败叶则是上好的燃料。

洗劫坟园最彻底的是郫县，毛泽东视查红光公社看见的那个手上有伤的女孩，就是挖坟时震伤的。到公社化以后，林盘里的树木和棺材就几乎全进了小高炉和公共食的大柴灶。

所有的“迷信”扫荡一空，天下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创奇迹的竞赛一浪高过一浪。

农业展览会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王”：树一般的油菜王、棉花王，一窝结几斤谷子的水稻王，桂五六个包包的玉米王，头上分叉的麦子王，南瓜般的红苕王，两人抬的南瓜王，半人高的冬瓜王，扁担长的丝瓜王，河马似的肥猪王，硕大无朋的鸡王、鸭王、兔王……。

新华社报道：66 岁老农把棉花嫁接在椿树上，“有 4 株已经开始长芽”；割去公鸡的生殖器，用酒灌醉，让公鸡孵小鸡，好处是“不影响母鸡下蛋”，如果少数公鸡酒醒后不愿孵蛋，就“再灌上两杯酒”；有人通过小麦和玉米杂交的办法，已培育出在当地一年两熟的小麦，目前正在试验的项目有：棉花和葡萄嫁接，豌豆和扁豆杂交、红薯和洋芋杂交等等”。流行的观点是，用不同的物种杂交产生的新物种，就会具备双方或多方的优势：蕃茄和红薯杂交的品种就会上边接番茄下边长红薯，羊和牛杂交羊就会长得和牛一样大，猪和大象杂交就会长得和象一样大。

如此等等。却没有人想过、或者想过也不敢说因此牛是否会变得羊一样大、象会变得和猪一样大。

郫县郫筒镇 70 多岁的老农魏述之想，如果嫁接成一个顶上结高粱、中间结玉麦，或顶上结谷子，下面结玉麦的新品种，“就能解决全县、全国以至全世界人民的吃饭问题。”

有了这种雄心大志，他先后用谷子和高粱、玉麦、芭茅、芭蕉嫁接；用海椒和洋姜、抱格枣树嫁接；用高粱和玉麦，蕃茄和洋芋嫁结，“并且都活了”，“省、县党政领导都非常重视支持他的研究工作。”

四川日报报道，广安县大良乡齐行一社等 4 个农业社，鼓足干劲发展生猪，“短短十天中生猪由 6 百多只增加到 6 千多只，户平达 30 只”，方法是“大批繁殖小猪”。又载，洪雅县将平乡春光三社一只母猪 20 天内连续产仔两窝，头窝 8 只，每头重 8.6 斤，2 窝 8 头，每头重 2.4 斤。造成这一奇迹的原因是，这只母猪发情期长，头次交配后“情欲未止”，又连配一次，“第一次受精形成一胎盘，第二次受精又形成一胎盘”。可见只要掌握好母猪的排卵期，就可以大大缩短产仔周期，“目前正在推广这种办法。”

高潮迭起、万箭齐发，样样都跟不上一天等于 20 年的需要，样样都必须大跃进，畜力不够就来个配种大跃进。

仁寿县委书记杨汝岱，副县长熊俊超在四川日报上介绍《仁寿怎样实现耕牛“全配县”》的经验。

县委的口号是：“政治挂帅，书记上阵，搞运动、抓突击、常年配、月月配、叫就配、多次配、人工授精配、改造漂沙牛。”“母牛不配完，运动永不休，全配要全孕，争取上北京。”5 月到 6 月，全县已配 1 万多头，占应配母牛的 99.9%。

人民日报介绍，陕西省井泉县出了两个配种女英雄，一个 20 左右，一个年方

25，她们昂首阔步拉着公畜，在县城的集日上，找个宽敞的地方一站，严肃大方，认真地从事着配种工作“明亮的眼睛里，闪烁着骄傲的光芒，有时挑战性的环顾一下四周，好象是在探询，倒要听听谁敢说什么。”男人们“惭愧地底下了头”，老封建们吓得吐舌头说：“这两位姑奶奶胆可真不小了”。

作者赞扬说：“两位姑奶奶”的胆量确比大破天门阵的穆桂英还大，在她们的鼓舞下，“陕西省赵寿山省长也亲自拉种畜配种了。”

四川仁寿县的妇女也不是好惹的，康乐社女社长周文彬为首的 7 个女青年组织了全县第一个“妇女授精点”(原文如此)，不顾旁人出耻笑和家庭责难，搬到牛房住，采取打针、吃药，“公牛诱情”等办法使 11 头漂沙牛全部发情配上了种。

沙牛即母牛，漂沙牛就是无生育能力的母牛，只用来出力。要漂沙牛怀孕，如同要骡子下崽。

但跃进中仁寿人不信这个邪，在“改造漂沙牛，实现全配县”的呼叫声中，采用“综合性催情、人工授精、早期配、热窝配、多次配和月月配的办法，破除了漂沙牛不能生育的迷信。”

富加区劳动社办的“催情院”，5 天内改造了 29 头漂沙牛，“其中一头 21 岁的老母牛也发情配了种”。仁寿的怪招惊动省上，7 月上旬在仁寿召开了全省的“耕牛全配现场会”，要求全省母牛怀孕。

安岳县农民发牢骚：“啥子工作都能大跃进，唯有母牛怀儿不能大跃进”，“未必要估倒老牛生个儿啊？”县上就发动“配种能不能大跃进？”的大辩论，和认为牛不能全部怀孕的右倾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作斗争。

于是，“一个闪电般的耕牛全配运动轰轰烈烈在全县展开了。”安岳县的母牛十有八九是漂沙牛，农民过去也无繁殖耕牛习惯，都是到外地购买。为了让漂沙牛发情，全县办起“催情院”798 个，喂“催情药”、打“催情针”、用公母牛混牧等办法“诱情”，县上五天一检查，区乡天天检查，每头母牛落实专人负责配种，签订合同，怀上奖 5 元，怀不上“照数赔偿”。县上还介绍说：“由于种水牛不足，我们打破迷信，大胆用黄公牛与水母牛交配，已配上了 22 头。”（中共安岳县委：《二十天实现“全配县”的经验》，四川日报 1958 年 8 月 23 日 2 版）

在牛身上打的主意还多，“要耕牛既耕田又产奶”也是其中之一。

提出这个宏伟构想的人算计：到 1957 年底全国有各种母牛(包括奶牛、黄牛、水牛)2100 多万头，如果让它们全部又耕田又产奶，既弥补了畜力不足，还能把我国的奶产品生产水平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8 月 1 4 日至 20 日，全国利用耕牛挤奶现场会在浙江瑞安召开，各地代表参观了对母牛的“使役、挤奶、繁殖综合利用的成就”，据称这里的牛们白天干活，晚上挤奶，肚里还怀着牛崽。通过参观，代表们打破了“认为牛耕了田就不能挤奶，挤

了奶就不能耕田和养活小牛的保守思想；还打破了没有洋种乳牛就不能发展奶类食品工业的迷信思想。”（新华社杭州消息，见《四川农民报》1958 年 8 月 24 日头版）

被奉为粮食生产至宝的深耕、足肥、密植三大措施，搞到骇人听闻的程度。当科学被作为迷信扫荡以后，真正的迷信便横行无忌。一个简单的思维模式是：什么东西好，那就是越多越好。肥料是庄稼的养料，那么肥料施得越多越好；密植可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那么就越密越好；深耕有利于改良土壤，那么就越深越好。账是这么算的；如果增产一百斤稻谷需要 1 千斤肥料，施两千斤肥便可增产 200 斤稻谷，施 1 万斤肥自然会增产 1 千斤稻谷；如果 1 窝稻子长 100 粒谷子，多栽一窝便多一倍产量，密植 10 倍就增加 10 倍的产量；深耕一寸增加 10％的产量，深耕 1 尺就增加 100％的产量，深耕两尺、三尺、四尺，……统统以此类推。

农业部有抓紧积肥的“紧急通知”，人民日报的社论在呼吁“鼓起劲来，大量积肥”，各省、地、市、县有天文数字般的计划指标。牲畜粪、人粪、一粒不撒，大大小小的河沟水塘的沟泥“塘泥”挑干了，稻杆麦杆玉米高梁杆子烧成了草灰，杂草铲来沤做堆肥，还嫌不够，绞尽脑汁“广开肥源”。埋死人的坟头是肥，小路、院坝、屋里屋外经常有人走动的地面刮起一层“千脚泥”，土墙也打倒做了肥料。

人民日报告诉人民；农村的土墙经长期风吹日晒雨淋后，在墙根常发现许多象碱一样的白霜，这就是硝酸盐类的物质，用老土墙做肥料，比河泥肥效高两三倍；每天煮饭所烧的柴草中的植物蛋白燃烧后放出氮气，被灶土吸收，所以灶土也是好肥料。于是到处都在挖土墙打灶台。化肥也没有什么神秘之处，温江专区一夜之间就办起几千个土化肥厂。土专家们只须一把铲子、一张筛子，一只铁锅就制造出种种高效化肥。土化肥厂运动作战，见老墙就挖。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四川日报报道，新繁一块一亩二分的“卫星田”施老墙泥 40 万斤，堆肥 5 万斤，以及人粪、水粪、草木灰、鸡鸭粪数百挑。这还不算，有的蔬菜试验田“每亩施碴肥 170 万斤”（见四川日报 1958 年 8 月 24 日 2 版：《一亩菜地供 2000 人吃》）。不知当时报纸编辑算过没有，这相当于每平方米堆 1.28 吨肥料。

“一亩田能插多少秧？”人民日报介绍广东英德县的经验说，一亩田插二百万到三百万苗是不成问题的，插到 1200 万苗也不能说不行。而常规每亩至多 50 万苗左右。川西坝子传统水稻栽植密度为窝距 1×1 尺，这时按省里的规定，普遍推广 3×7 寸、2×5 寸、2×3 寸，称之为“双龙出海”——宽窄行条栽；“蚂蚁出洞”——单行条栽；“密密杵”——密不透风。

只要上面提倡什么，下面就力争上游把它搞到极端，上面再加以表场推广，又引来新一轮的奇迹竞赛。以深翻土地闻名的河南长葛县吹嘘，他们连续三年深翻土地一尺到二尺，产量因此增加一至数倍，7 月全国深耕农具和改良土壤现场会在长葛召开，要求把全国 16 亿多亩耕地普遍深耕改良一遍，一般深度达到一尺五上下，

丰产田二、三尺以上。一般牲畜犁田不过 5 寸左右，如何才能犁到几尺深呢？办法多种多样；诸如“前犁后镢法”——前面犁，后面挖；“鹞子大翻身法”——和挖塘差不多，只不过挖起的土还要重新填回去；“沟翻条插法”——和挖战壕一样，在地里挖出条条深沟，然后将土填回，庄稼条播在挖过的土里。

上面一声号令，全国“土地大翻身”运动如火如荼，土地一尺又一尺的深挖下去，“深翻卫星”一个又一个冒出来，二尺三尺已不稀罕，四尺五尺不算冒尖，川西蒲江县东北公社玉红大队挖到 7 尺，超过蓝球巨人的身高。

著名作家李准在人民日报上感慨万端地写道，“当你看到一块红薯地里堆满 10 万斤粪，又深翻一丈深的时候，你就会感到之所以能获得这些丰产，主要是人民树立了共产主义的风格——毛泽东的风格。”（见李准：《大好事情 大好景象》人民日报 958 年 10 月 4 日第 8 版）

如此艰巨的深耕任务，畜力望尘莫及，连拖拉机也无能为力。土专家们敢想敢做，各种深耕工具应运而生。温江专区普及最广的是所谓“绳索牵引犁”，而绳索靠什么牵引呢？人！数人、数十人拉着犁头深耕；或者在田头支上绞盘，由人推磨似地转动绞盘，带动绳索，其场面恍若奴隶时代。

11、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在农村，所有的奇迹都是为了创造粮食丰收的奇迹，而所有的奇迹较之于丰收的奇迹都相形见绌。

自从毛泽东 1957 年批评人民日报是“死人办报”以后，这家代表党中央的声音、全国最大、最权威的报纸就生猛起来，引导着全国人民在跃进的道路上狂奔。

1957 年苏联人造卫星上天，中国人民都知道没有比它飞得更高的玩意儿了。1958 年 6 月 8 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坐上了卫星”，有 5 亩小麦亩产 2105 斤，超过湖北省去年创造的小麦亩产 1540 斤的记录。

第二天这颗卫星就失去了光彩：湖北襄阳专区大面积丰产，“亩产 1500-2000 斤成为普遍现象”

6 月 11 日，河北魏县，2394 斤；

6 月 16 日，湖北谷城，4353 斤；

6 月 18 日，河南高丘县，4412 斤；

6 月 21 日，河南辉县，4535 斤；

6 月 23 日，湖北谷城县，4689 斤；

6 月 30 日，河北省安国县，5103 斤；

7 月 2 日，人民日报刊出一份“小麦高产纪录统计”，湖北谷城县庙滩乡新气象五社雄居榜首——5467 斤。麦收季节已尽，这个纪录恐怕无人能与匹敌。

(住口！)7 月 12 日，已放出 29 颗小麦高产卫星的河南省又一颗超级卫星升空，西平县和平社亩产 7320 斤！

当北方小麦产区卫星如织时，南方水稻产区上上下下摩拳擦掌。

中国青年报的社论《水稻也能直上九重天》说：“小麦丰收的礼炮撼天动地。现在全国人民和青年的眼睛都在注视着水稻的收成，既然向来被称作底产作物的小麦都创造了空前未有的奇迹，那么高产作物的水稻能不能来一个更大的丰收呢？我们的答复是十分肯定的，水稻一定能够直上九重天。……一定要把水稻的高产纪录，一个一个地象人造卫星一样，抛上天去。”早稻收割开始后高产纪录节节攀升，数千斤已不稀奇。

6 月底，湖北孝感县长风社的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官木生放出话来，他的水稻高产试验田亩产将达到 1 万斤。

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不服气地说，既然小麦能够亩产 4 千多斤，为什么稻谷不能够亩产万斤呢？他以哲学家的口吻指出：“事情总是这样：想得到就能做得到。”受到鼓舞的官木生在社里办起了“万斤大学，毕业条件是：种得出万斤稻，讲得出万斤道理。万斤大学的门口写着一首诗：“万斤大学开学了，保守思想吓得跑，洋博士也吓得跳，农民喜得嗬嗬笑，只要干劲加钻劲，亩产双万也做得到。”

想到的果然做到。7 月 31 日湖北应城县春光社创亩产 10597 斤；8 月 1 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官木生的“长风社乘长风破万里浪——早稻亩产 1 万 5 千斤”。

同一天中国青年报发表社论《我们需要多少就能产多少》，社论说，“一亩地究竟能打多少粮食？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找到了完全的答案，这就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事实证明，我国的农业生产发展是无限量的，我们需要多少就能产出多少。”

8 月 13 日，人民日报头版通栏大红标题报道，湖北麻城县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亩产 36900 多斤！

牛吹到这个份上，不论是真昏了头还是假昏了头的人，心头都要嘀咕一下。据说毛泽东曾就此请教过科学家，得到了肯定的答复。此事本书作者虽未见到确切的材料，但确有科学家对高产卫星持肯定态度。

1958 年 6 月 16 日的中国青年报刊登了钱学森的一篇短文，题目叫做《粮食亩

产量会有多少？》，全文如下：

“前年卖粮用箩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下，明年火车还嫌小！”

这是江西井冈山农民的一首民歌。我们的土地正在农民双手豪迈的劳动中，付给人们更多的粮食。六月十二日中国青年报第一版上发表了一个动人的消息：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继小麦亩产二千一百零五斤以后，又有二亩九分地平均每亩打下了三千五百三十斤小麦。

土地所能够给人们的粮食产量到顶了吗？

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 太阳光能的 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在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二十多倍！

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 在一亩地里收一百六十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一百六十万斤！

所以，只要我们有必须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



宣传画：熏土积肥放卫星，小麦一定夺高产！

这篇短文插的一幅漫画是，太阳举着标有“太阳能”字样的奶瓶给麦子喂奶：“你把这些都吃掉，还能长大二十倍！”

当然,持怀疑态度的大有人在，只是经历了反右派运动不敢开腔而已。但是尽管他们的，地位和声望已经急剧下降，奇迹制造者仍然觉得有必要让他们出来作证，

需要他们做的只有两件事：给高产卫星捺手印和承认自己的保守、无知。

新华社报道：华中农业科学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到“天下第一田”参观后“豁然开朗”，所长张子明说，“只要到田边一看，一切疑虑就都解决了。……过去我们有些农学家总是想不通；一亩田产万多斤谷，谷穗该怎么摆，禾苗该怎么长呢？现在一看这些问题都解答了，它们可以向空间争取生存地位啊！”副所长郭甫说，“社主任介绍情况时说，‘我们就是怕想不到，想到了的就能做到’，这话对我们启发很大，而我们许多农业科学工作者正是缺乏这种精神，不是想到就做到，而是顾虑重重。”（见人民日报1958年8月13日第5版《田边一看，豁然开朗》）

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郑建楠写道：“我荣幸地参加孝感县早稻丰产验收工作，我亲眼看到长丰社早稻亩产15361斤的奇迹。……他们创造出来史无前例的高度密植典型，这是事实，这是奇迹。”中科院生物学部委员殷宏章写道：“我在安徽枞阳参加了两块高产早稻的丈量和收割，亲眼看见万斤卫星水稻上天，感到无比的兴奋和鼓舞。”他论证道，一般国外的产量分折研究，丰产的谷类作物，每亩叶面积不超过4亩，总干物重量不超过两千斤，一切研究都是在这个圈里打转。我们从万斤田里取回一些标本，测算出每亩干物重量在1万5千斤左右，每亩叶面积达到26亩多。有这么大的叶面积进行光合作用，总产达到1万斤以上是可能的，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显然是落后了，必须奋起直追。（见殷宏章：《科学研究工作要奋起直追》，人民日报1958年8月14日第5版）

但是他没有说明：“密密麻麻象城墙”的稻子怎样进行光合作用。

把若干面积成熟的稻子连根拔起并到一块田里，是放水稻卫星的秘诀。

开始的报道讳莫如深，只字不提。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稍有常识的人一看就明白，实在瞒不过便绞尽脑汁变被动为主动，让科学家出面圆谎，称之为“掇秧密植法”：先“稀植掇秧”，完成营养生长，到打苞时并到一块田里去，“这样腾出的田可以补插一季晚稻，充分挖掘土地的潜力，增产更多的粮食。”于是并秧作假成了名正言顺的“掇秧密植”，各地群起效仿。

有科学家出面作证，有人就在人民日报上信誓旦旦的宣称，亩产奇迹是经过“奇迹鉴定委员会”鉴定的。高产纪录曾经使人们“一日数惊”，现在人们已经见惯不惊，“把奇迹当做平凡的事迹了”。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想得到就做得到”的口号响遍大江南北。

人民日报编辑很快就为“天下第一田”的提法后悔莫及。这时候,纯粹是比谁的胆子大了，胆子大的人多着呢。

8月22日，安徽省繁昌县:43，075斤

9月5日，广东省连县:4，849斤

9 月 18 日，四川郫县:82，525 斤

广西环江县:130，434 斤

河北小站人民公社:152，533 斤

……



四川農民日報

SICHUAN NONGMIN RI BAO

社址：成都市华兴东街　第1070号　报价：每月6角

1958年8月28 星期四 农历戊戌年七月(小)十四 (二十五白露)

天下人民向天府之国投送受慕的眼光

郫县衛星与嫦娥共飲

犀浦乡幸福第一农业社中稻亩产可达四万多斤

昨天，郫县犀浦乡幸福一社十队的一塊中稻高产田开始收割。十六架拌桶收了一天，也只打了一半左右，估計收四万多斤，沒有問題。

这塊田，是由社长刘子成、生产队長李富安等社干和駐社干部及部分社員們搞的試驗田。面积一亩另一毫。中稻圓杆时，他們看到报上登出亩产七千斤小麦"衛星"后，党員刘子成、李富安等和駐社干部商量，决定放出一颗中稻大"衛星，"于是把十六亩二分二厘田的早中稻，在抽穗前十天，移栽到一亩另一毫的田中。7月13日开始移栽，共花了四百四十个劳动日。种子是麻谷。前作物是小麦。深耕一尺二寸，共四犁十八耙。底肥施了千脚泥一万四千斤，老墙泥两万斤，渣肥三千斤，过磷酸钙一千二百斤，麻枯一百四十斤，尿素一百斤，人畜粪二千八百斤。移栽后，又用过磷酸钙作了八次根外追肥。移栽前，曾治螟两次。

这塊田的特点是栽的满天星，計五百八十五万穗，每穗一百四十到二百粒，杆壮籽满，大人站上去也塌不下去。昨天前来参观收割的有一万四千多人，省委書記閻紅彦、廖志高、閻秀峰等同志以及省人委、省政协和各民主党派的許多負責人也都前来参观。省政协、温江地委以及郫县县乡社都分别組織了驗收团，前来监打监收并参加过称和記統，根据昨日已收的部份田来看，大家一致認为亩产超过四万斤沒有問題。

今日，这塊田将继續收打，一顆巨型的中稻衛星即将从郫县高高升起。

斧吊一幫桌一幫，大人立在上面也踏陷得稳。

中共四川省委書記閻紅彦同志在中共温江地委書記宋文彬同志陪同下参观幸福一社的中稻衛星。

郫县是多产衛星的母亲

犀浦六社一塊田亩产三万五千多斤
火光三社一塊田亩产二万九千多斤

号称衛星發射台的郫县，前天又在一塊一点零零五亩的試驗田里，發射出平均亩产三万五千四百四十六点五斤的中稻大衛星。

这塊田是犀浦乡党委委員張吉安和犀浦六社社干們种植的試驗田。深耕一尺四寸到一尺五寸。土質是大泥田。前啊作物是黄油菜。底肥施了五万斤青草，二十五挑底肥，三挑綜合性化肥、四十五挑水粪，麻枯一百一十斤。追肥二次，总共追施渣肥二十挑，草木灰八挑，麻枯十五斤，尿素三十斤，硫酸铵十斤。品种是麻谷。栽的是满天星，每棵十五斤，每片一百九十多颗。这塊田圓杆时曾进行二次移栽。为了防止倒伏，还搭了架子。这塊田的产量、面积，經过中共温江地委监委書記張琦民和中共郫县县委書記高义祿、赵金波等一百五十多人檢查、驗收。正在該县参观的中共达县地委农村工作部長白兰芳也参加了担挑、过称和驗收。

又：郫县古城乡火光三社一队，前天也在一亩零零三的中稻田里，發射出平均亩产二万九千三百九十七点三斤的大衛星，中共郫县县委書記高义祿，古城乡总支第一書記叶文华以及县、乡、社干部二十多人，亲自参加了收割的全部过程，并且进行了細致的驗收。这塊田是火光三社党支部的試驗田，土質并不好，是白鱔泥漕田。

(中共郫县县委办公室、李俸芬、李元隆)

两个衛星对着笑

創造中稻大衛星的幸福一社的社干、社員和縣干部們。

(本报記者刘全王摄)

大跃进年代，各大中小媒体成为卫星催化剂，郫县独领风骚。

第二章 天堂梦

12、高烧一亿度

1956 年的减产，让温江专区大部分县的干部冷静了许多。李政委几个小时的关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说教，也没有让他们的脑子热起来。

1957 年，大部分县都放慢了“技术革命”的步子，恢复传统耕作方法。唯有郫县一枝独秀，在省委领导的扶持关怀下，高举跃进大旗，双季稻面积由 4 千亩扩大到 5 万多亩，全县干部一大半在乡 下指挥农民搞生产，培训出几千名“土专家”，组成全县“新技术推广网”，悬偿征集生产新建议近 3 万条。

年底，人民日报头版报道，四川九个县市达到纲要指标，“其中郫县产量最高，平均亩产 1083 斤”，成为全川第一个千斤县。

这一次郫县出了大风头，不仅成了全省“首举帅旗的先进县”，在全国也有了名气。57 年底到 58 年初，省内外参观取经者达 5 千多人。省里又决定，将崇宁这个殷实肥富，但“工作落后”的小县并入郫县，壮大郫县实力。因为水稻减产的事让新华社记者捅出去“犯了错误”的崇宁县委书记杨洪魁到郫县坐冷板凳。县委门口贴出了 一幅对联：

克勤克俭以乘风破浪的干劲提前实现纲要四十条

戒骄戒躁用排山倒海的雄心壮志稳举帅旗双千斤

横批：跃进再跃进

县长高义禄后来感慨；“那时候我们的脑子真是太热了，不是 1 百度、1 千度、1 万度，是 1 亿度！”1 亿度的高烧就是从这时候升起来的。继 1957 年实现“千斤县”，1958 年的指标定到双千斤。为了稳举帅旗，全县掀起声势浩大的改良土址，积肥造肥、扩大耕地、兴修水利、植树绿化 和除七害运动。被郭沫若称为“新国风”的跃进诗歌响彻全县：“夜晚当白天，月亮 当太阳，星星当月亮”，“挖尽千脚泥，寻找肥林盘，积肥不上 50 万，不算英雄汉”。 志愿军战歌也改编成跃进战歌：“雄纠纠，气昂昂，决心坚如钢。雨当晴，夜当晚， 生产日夜忙……”。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到郫县视查，尤如一剂强烈的兴奋剂，把本来已经热昏的气氛加热到白炽。

陷入热昏状态的不仅是干部，农民也被眼花嘹乱的刺激弄得晕眩了。铺天盖地的宣传鼓动如催眠术和气功师的暗示，光荣与梦想如天国的召唤，人人热血沸腾，有如神助般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1958 年 5 月，就在毛泽东正式启动大跃进战车的八大二次会议召开的同时，郫县举行党代会。这是一个诗歌盛行的时代，人们竟相用诗化的语言表达豪情壮志，连党代会上作报告也不例外。

在做诗、或者说编顺口溜方面、农工部长潘克之是一把好手。本地贫农家庭出身的潘克之虽然只上过几年小学，但聪明过人，能说会道，善于领会上级精神并有创新。他土改时参加工作，两年时间就当了区委书记，1954 年升任县委农工部 长。县里发的文件，大部分是由他口述，县委办公室主任王春莲记录而成。在这次党代会上，他的报告几乎是诗歌连缀。归纳全县各乡的工作成绩，他朗颂道：

太平扫除文盲干劲大，崇兴除四害灭三病有办法；新民技术革新是创造，合兴先进技术创造广；犀浦经营管理有名堂，花园耕作细致赛全县；永定挖沙塘改良土壤，安靖肥料加工厂是榜样，团结使用磷肥矿已推广，永兴创造农业社办劳教，古城养猪全县最多、德元大麻生产很漂亮；友爱土烟赛过花园场，合作养母猪经验很丰富；和平油菜产量高，清河乡创造栽包粪秧。这就是行行出状元，乡乡有特点，事事有先进，样样有创造，只要认真学，外行变内行。

讲到生产上的发明创造，他朗颂：

农业社创造既多又广，生动而惊人。肖传贵创造洋芋栽大箱，刘贤松创造全队 早发栽塘秧，徐清树创造三点钟催芽法，李洪金创造土烟间在玉米箱，刘孝钦提出荞 子点条播，赁伦发提议土烟栽双箱，孙树云创造筒车改用筒槽水，石荣中试验成功老 胡豆行内间种胡豆秧……杨志成人工造粪水，刘贤松和技术人员结合创造高空育秧，周桂林试行水沟育秧，牟青云就搞院坝洒秧，机械农场试行猪喂牛粪，钟永成和张润 高就把猪的扁挑腺割了喂了肥猪片，注射鸡蛋清 10 天长 7 斤，……（见《中共郫县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文件》一九五八年五月）

党代会的诗歌大联唱以县委书记高义禄的报告为最后篇章，他描绘道：“我们县目前的景象是”：

乘风破浪大跃进，万马奔腾总动员。
坚决跟着共产党，誓把郫县变乐园。
粮食赶澄海，水稻追孝感；
亩产一千五，力争达双千。
每户积肥 80 万，单改双、双加番；
密植良种浅水灌，低产变成高产田。

小沟改水渠，铁牛跑得欢。

生猪发展超北川，鸡鸭成群果满园。

全县养蜂 20 万（桶），每户社员都养蚕。

……

社社有电话，队队喇叭安。

文盲全扫除，都把科学钻。

农业中学遍全县，新型农民文武全。

六畜兴旺人健康，三病七害消灭完。

农村修建居民点，家家户户电灯燃。

有余粮、有存款，欢乐歌声遍田园。

人人脸上红光满，老年变得象青年。

光荣伟大共产党，领导我们奔向前。

幸福日子要实现，大家鼓劲干三年。（见《中共郫县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文件》一九五八年五月）

鼓劲干三年，就能过上这般如诗如画的好日子，真是累死累活也心甘。

最幸福和激动的当然是红光社的社员们。

自从毛主席到来的那个傍晚起，人人都沉浸在幸福和兴奋之中。有幸见到伟大领袖的人骄傲而激动地向人们诉说每一个细节，错过机会的后悔不迭。人人争相和毛主席指过手的人握手，以分享一份“龙恩”。人们长时间的回味，追寻和领会伟大领袖的每一个动作、神态，说过的每一句话每一 个字，走过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的每一个脚印。

人们筹划着，要在毛泽东下车的地方修 一个“幸福门”；把毛泽东走过的机耕道修成“幸福路”，路两傍植柏树；修一座纪念馆；建一座“幸福亭”；毛泽东下过的田取名“幸福田”；他跨过的沟上建一座“ 幸福桥”；根据他的指示新建的小学取名“幸福小学”；见过他的 18 名小孩成了“幸福娃”。（作者注：“幸福娃”的命名颇费一番周折，见过毛泽东的孩子一共有 18 名，但仔细审查下来，大部分出生都“不干净”。如毛泽东叫他的医生治过手的王祖玉，父亲王南抗战时当过国民党副官；伍裕宾的父亲当过国民党兵和袍哥小头目；崔启富的父亲成分是“小土地出租；向毛泽东承认“一天打三架”的邓昌洪父亲成分是中农；毛泽东认为“还差点营养”的的余万才父亲是“管制分子”……只有摘打破碗花花给毛主席看的王永章出生贫农，最终只有他享受“幸福娃”的称号）。

幸福万分的温么娘把毛泽东在她院子里看过的小橘子树取名“幸福树 ”，把毛

泽东路过的菜园改成花园，叫“幸福花园”，毛泽东把弄过的水烟锅和烘笼不便以“幸福”命名，也被她精心保存起来。她逢人便说，要是那阵不害火巴眼就好了，害得她毛主席来了都没认出来，抱怨她孙儿不懂事，毛主席问他腔都不敢开。

更名“幸福”的还有：毛泽东到过的灌县新城乡莲花社更名幸福社；刘少奇视查过的犀浦乡第二农业社更名幸福社；邓小平视查过的郫县晨光社更名幸福社。孩子们人人学会了新儿歌：“红光社，开红花，毛主席来到我们家。看我们种的双季稻，夸我们种的好庄稼。……”

一曲颂歌唱遍大江南北：

麦苗儿青来，菜花儿黄，
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
千家万户齐欢笑，
好象春雷响四方。
……

和这首曲调优美的颂歌一样响遍全国的，是毛泽东在红光社发现的打破碗花花。

根据毛泽东 3 月 16 日的当面指示，有关报道两天后就出现在四川日报。3 月 26 日成都会议结束的当天，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专稿：《让毒草为人类服务——四川农民用“打破碗花花”除蚊蝇》，并有川大方文培教授，川医谢成科、徐仲吕、李正化教授等的分析介绍。几天后，这种野草的神奇功效进一步扩大。人民日报说，四川省农业部门的试验证明，这种野草还能够用来消灭蚜虫、土蚕、螟虫和“杀死病菌”。不过当时人们还不知道报纸何以将它吹得神乎其神。

直到 4 月 11 日，毛泽东已到了武汉，人民日报才首次报道毛泽东在四川的消息，刊登毛泽东在红光社观看打破碗花花的照片。

反应敏捷的郭沫若在第二天发表的《百花齐放》组诗中加上“打破碗花花”一首：

我们的白色花冠是五瓣，
有的是淡紫色或者淡蓝，
也有的是双瓣名叫牡丹，
栽培在庭院里也很好看。
但我们的广阔天地是乡间，
农民们用来驱蝇、除蚊、肥田。
茎叶有毒，看是怎样地使用，
只要使用得好并不打破碗。

他对这种“花”的知识显然是从报纸上得知的，不如艾芜谈得真切。他说他小

时有一年打摆子，母亲到小沟边摘了打破碗花，捶烂敷在手上，“从此就不发疟疾了”，建议用它提炼一种治疟疾的外用药。又说四川还有一种叫合麻的野草，手一摸痛得要命，当年张献忠扯来揩屁股，痛如刀割，大骂四川不但人可恶，连草也可恶，“我想也可以研究下子，在毒草中取出有用的药来。”（见艾芜：《我也来谈打破碗花花》，人民日报 1958 年 4 月 17 日第 8 版）

因为是红光社社长，诚实厚道的周桂林成了全国知名人物，他那付光头上扣一顶皱巴巴的制服帽，裤腿挽得老高的形象经常见诸报刊。他是那个时代出身贫苦一心一意跟党走的典型人物。

他原是简阳县的一个孤儿，流落到郫县合兴乡帮长年，因为老实肯干，主人家舍不得放，就留在当地。临解放前川西坝子兵荒马乱。一户姓萧的人家怕 16 岁的女子落到胡宗南的兵痞手里，打急抓把女子嫁给他，她就是后来的副社长萧绍群。

虽说合作化以来,周桂林一直是劳动模范积极分子，实际上一切并不由他主宰。他一天书没读，扫盲后仅写得周桂林三字，为人憨厚木讷，拿不出什么新点子好办法，唯一优秀的是“工作干部”叫干啥就干啥，他的无数拿着讲稿在台上表决心的照片都是别人导演的。他在广播里讲话，别人在傍边说一句，他对着话筒说一句，广播喇叭里都听得见。

合作社以来一直在合兴乡、红光社抓点的干部是农工部长潘克之和县委办公室主任王春莲，1957 年 1 月又有女副县长郑凤兰下放任乡党委第一书记。

毛泽东在红光社转了一个多小时，如何把伟大领袖的一言一行贯彻到工作中去呢？工作干部们反复回忆理解讨论，总结出“关键在于那一比”。你们看，毛主席在油菜田里，左手摸着菜子，右手伸到齐胸的高度问“能不能长这么高？”又比到齐颈的高度问“能不能长这么高？”最后一次比着他的高大的身体的同样高度问“能不能长这么高？”

毛主席这一比， 是在让我们开阔眼界，鼓励我们创造生产奇迹，夺取前人想象不到的大丰收啊！

于是，社里召开群众大会，批判庄稼长得差不多了的“封顶思想”，重新修订增产计划，修改一次上面通不过又修改一次，一直修改 37 次，最后终于“发出豪言壮语：向大地展开冲锋，喝令山河原野献宝；力争粮食翻三番，不达目的不罢休！”“粮食翻三番，中稻过双千，晚稻超早稻，晚秋作物破千关，生猪发展翻两倍，绿肥翻过九万关，保证粮食三千五，力争跨过四千关。”

合兴乡党委第一书记郑凤兰，这年芳龄 26，郫县太和场人，就是画家张大千抗战时移居三年的地方。太和场为著名蜀绣之乡，妇女多以刺绣为生计，郑高小毕业后即在家绣花。她虽文化不高，但聪明伶俐，干练泼辣，倒也算女中人才。

她 17 岁那年当了乡农会妇女委员，1954 年任县妇联主任，1956 年年仅 23 岁当

了副县长。郫县的女干部在温江专区以能干出名，她是其中的姣姣者。她的仕途轨迹和农工部长潘克之惊人相似，又兼志同道合，来往密切，眼下二人恋情已是公开秘密。

毛泽东到红光社时，风云人物郑凤兰错过时机，为一桩好事误了大好事——到湖北参观取经，水稻高产之风就是从那里吹起的。

当时湖北出了两大全国轰动的典型，一个是麻城孝感的水稻高产，一个是红安县的干部试验田。麻城、孝感 1957 年底放出晚稻高产卫星，亩产两三千斤，经验是深耕——足肥——密植，首创卫星田，影响所及不可估量，所谓经验全国竟相效仿。

所谓“干部试验田”则是乱指挥的升级。1957 年后大批干部下放基层，“改造思想，克服官僚主义，领导生产”。红安的经验是，光是带本劳动手册，一把锄头到地里劳动，“很难达到领导生产的目的”。要用领导干部亲自动手种试验田的办法，“打开如何对农业生产全面的、具体的领导的闷葫芦。”县委书记程鹏种了一块花生试验田。当地习惯花生地不上底肥，他偏上；习惯一窝花生一粒种，他下三粒；习惯白子下种，他用“根瘤菌”拌种；习惯宽窝距他搞密植；习惯锄两道草他锄四道；习惯花生苗不浇水，他偏浇。从而“对全县的花生生产实现了具体领导”。县、区、乡、社四级干部统统下去种试验田。

中央转发了湖北省委在红安县总结的《关于干部种试验田的报告》，认为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造，“对于实现党对农业生产具体 领导，起着决定的作用。”

党对农业的领导具体到了上多少肥、下什么种、挖多深、种多密、除几遍草、用什么农具……。如果农民不照办，就做一个样板让他们照着办，“如果不办，就要批判”。在一些人心目中，农民是愚昧、保守、落后、懒散的一群，他们头脑简单，目光短浅，因循守归，抵制一切先进的生产技术，只顾把肚皮胀饱打个人发家致富的小算盘，必须由党来教他们怎样种庄稼。一方面要大破专家权威教科书的“迷信”，一方面是 对“技术革命”的狂热迷信，只要“先进技术”一推广，什么样的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

郑凤兰到湖北就是参观学习这样的经验。回来后就在乡上展开“鸣放辩论”，声称亲眼看到孝感有密植小麦亩产 4 千斤以上的。全乡召开 1 千多人的“密植誓师大会”， 发誓使用 3×7 寸的密植标准栽秧，合符规格的插红旗，上光荣榜，送喜报;不合规格的拔掉重栽。全乡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人人搞革新试验田，她亲自和红光社副社长刘贤松合搞一块。全乡立下亩产双千的誓言。

7 月 7 日至 7 月 16 日，农业部在金牛坝召开南方十二省水稻增产促进会议，给放水稻卫星火上浇油。不知是否受到钱学森关于粮食亩产能达到“两千多斤的 20 多倍”的启发，郑凤兰在会上提出要搞 4 万斤的卫星田，受到农业部长廖鲁言的称赞。这一来，郫县就“烧”得更厉害了。

7 月底，双季稻早稻收割，红光社首次放出一颗亩产 3752 斤的卫星。四川日报的报道说，这块高产田位于毛主席走过的田坎旁，由社长周桂林等人亲自栽种，“他们说这是毛主席走过的地方，一定要它长出好庄稼！”几天之内，郫县全县射出几十枚 3 千斤以上的卫星。

8 月 5 日夜晚，郫县广阔的田野上灯火闪跃，全县 20 多万男女老幼手持灯笼火把，敲锣打鼓从各个角落向县城进发，参加全县庆祝早稻丰收大会。清晨，广场上人头攒动，锣鼓喧天，人声鼎沸，跃进歌声如潮，老太婆们穿着花衣又唱又跳，男人们的光头象刚出土的蘑菇青光一片。县长高义禄宣布，全县早稻获得空前大丰收，平均亩产 1030 斤，比去年增加一倍，获全省冠军，比全省第一个早稻千斤县新繁多 17.4 斤。全省目前出现的 3 千斤以上的早稻卫星都出在郫县。

“这是毛主席来郫县后照出来的红光！是人民冲天干劲开出的鲜花！”

在雷动的口号声、锣鼓声、欢呼声中，省委农工部长杨万选要求郫县“叫中稻、晚稻放出更大卫星，叫明年的粮食再翻一番。”周桂林在大会上结结巴巴的表决心，要让早稻放出万斤以上的大卫星，来回答毛主席的关怀。县委宣布，给放 3 千斤以上卫星的社发奖金 80 元。

80 元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按当时的价格可买大米 1 千斤，更重要的它是一个荣誉，在全民“发功”的状态中，争上游、夺红旗是压倒一切的荣誉，上至省地，下至社队，竞相攀比，谁也不甘做乌龟五八老牛破车的下游。

当一眼就能识破的假话受到鼓励和表扬，甚至堂而皇之上党报、拿奖金，真假是非就失去了意义，重要的是创造无与伦比的奇迹。

13、卫星大赛

让我们看看这种竞赛在两个农业社之间是如何进行的。（见温江地委工作组:《关于合兴乡和平社中稻移栽卫星田的调查情况》1958 年 12 月）

合兴乡和平社与红光社相邻，早稻收割前，驻社干部胡清泉和社长黄子云商定，“今年产量一定要压倒红光，赛全县!”红光社放出早稻 3700 多斤的卫星，当晚和平社干部开会，决定第二天就“放一个更高的卫星把红光压下去！”。红光的 3 千多斤，不说都晓得是假的，他们都假得来，我们未必假不来？商定的办法是“大称小称砣，多填划码单”。

第二天乡党委书记郑凤兰、乡长邱立崇到场验收，郑凤兰亲自“监称”。谷子边打边称、往称上一挂，挑挑都是 300 斤左右。谷子打完，总计亩产 3850 斤，超过红光社。邱立崇是收了一半才赶来的，看了过称登记再看看每挑谷子的分量，起了疑心。谷子称完，他对过称的人说：“我来称一下看我有好重？”他吊在称上一称，190 多斤！不由得心头火起：“我才 1 百零几斤，咋个称出 190 多来了？这是啥子称哦！”监称的郑凤兰立即向他使了一个眼色，邱便哑口不言了，回乡后郑为此事对邱进行了一次严历的批评。

8 月中旬中稻收割，红光社又放出一颗 4 千多斤的卫星，和平社干部闻讯很不服气”。第二天外边在割谷子，干部们就在屋里编划码单，外边谷子还没收完，屋里已经放出了一个亩产 5 千多斤的卫星。

接下来是一场龙争虎斗。

8 月 18 月，红光社 6158 斤。

8 月 21 日（上午），和平社“妇女卫星田”6353 斤。

8 月 21 日（下午），红光社双星齐发，一个 7143 斤，一个 7422 斤。

8 月 22 日（上午），和平社 7422 斤。

8 月 22 日（下午），红光社 8351.9 斤。

和平社的干部对逐步升级式的争斗不耐烦了。22 日晚，干部们决定“干脆做一个大的”，压得他红光抬不起头。

做大的也不那么简单，前期的“卫星”完全是凭空胡报的假数，眼下产量已达神仙数字，吹得越高，名气越大，参观取经者越多，惊动的领导越多，仅有数字显示已经缺乏说服力，必须设法伪造假现场，提供实物依据，还要避免内部走漏风声，外部看出破绽，这就麻烦多了。

社干们选中 12 队的一块试验田，它的妙处在地处偏僻，远离大路，很少有人来往，“便于活动”。操作方案为：一、调集全社各队嘴巴可靠的“积极分子”70 余人参加收割，既造成数十人收打一亩田的高产声势，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收割完毕，以免闻讯者参观检查；二、收打后立即将田犁了，以免谷桩留下破绽；三、将其它田打的谷子集中到这块田打下的谷子中，说是这块田打的；四、将其它田谷草集中到这块田四周堆起来；五、编造高产经验，对外统一口径。

23 日一早，社干部给调来的积极分子安排任务，积极分子们表示：“只要你们安心把红口打开（作者注：开红口为川西袍哥语言，意思是建立新地盘），我们多做几块卫星田、多熬几夜都没关系，你们干部咋个说，我们就咋个做，有啥来头？”正在干得起劲，又有探子报告，红光社今天要放两个上万斤的大卫星，干部当即决定，这块田的产量定为 16720.2 斤。

产量精确到两甚至钱，以显示产量的准确可靠，是造假的通例。数千斤、数万

斤乃至 10 几万斤的高产卫星几乎都有个小数点以后的尾巴。计算方法也是蛮“科学”的，诸如每亩多少窝，每窝多少穗，每穗多少粒，多少粒一斤，都一五一十报得出账的。并且都有某某领导亲自参加收打验收，包括农业专家在内各方人士参观监督验证，不由你不信。

不用说也知道和平社这个“卫星”是乡党委和县委干部参与策划了的，收割时郑凤兰就在场。

第二天，《郫县报》用号外刊出“欢呼中稻巨星腾空，和平社亩产 16720 斤” 的消息；第 3 天，即 8 月 25 日，四川日报报道“郫县连放五颗中稻卫星，”其中最大的是合兴乡和平社 12 队的这颗。报道凭空造谣说，这块田“打几个草就是一挑谷子”，“县委书记高义禄等参加了验收”。看了报纸的人很激动，而周围社队闻讯去参观的人都在发牢骚：“叫我们来看泥巴，谷桩都不留给我们看一下，这种卫星，明天我们照样放得出来！”

这时候，全国的高产卫星已如节日的焰火满天乱窜。

在比胆大方面，全国商品粮第一大省四川还略显逊色。直到 8 月 22 日，湖北、河北已放出三四万斤的大卫星，四川还未出现一颗上万斤的，上上下下颇为焦虑。

8 月 22 日晚，四川日报夜班编辑度过一个激动的夜晚，先是接到新繁县委的电话，对方透过劈劈叭叭的杂音上气不接下的报告，该县清白乡当日收割的一块田亩产 1 万 2 千多斤，声称从早晨 7 点开始，82 人割谷，22 人用 11 张拌桶打谷，用了 8 小时才收完，县委第一书记曹云生，书记邓明秋，清白乡党委书记李银亮“反复核对属实”，还有 3 百多人参观云云。

编辑手忙脚乱记下这则消息.又有四个地方称放出 6 到 7 千斤的卫星，其中有郫县红光社一颗。

记者还没记完，又一台电话铃声大作，新繁县委的胡开玉在电话里激动万分地叫道：“编辑同志，快收吧！我县竹友社亩产 8 千多……”

当编辑刚刚为这组报道写下消息时，新繁红旗乡的消息又到了，亩产 12000 多斤！

8 月 23 日，“新繁中稻亩产突破万斤关”的消息出现在四川日报头版。“谁说四川放不出高产大卫星？”消息的评论骄傲的质问：“我们要反问怀疑论者：既然我省已经放出了突破万斤的大卫星，谁说我省放不出几万斤乃至更大的卫星呢？——我们要放多大的卫星，就一定能放出多大的卫星！”

新繁是郫县的近邻，同是李井泉时时关照的地方，因此成了出风头的竞争对手。

新繁县是合作化以来名声在外的老先进县，有大名鼎鼎的新民社和罗世发，他从 1953 年起就是全国人大代表。郫县是后起之秀，得天独厚的条件是紧靠金牛坝招待所，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视查后，风头正劲，大有压倒新繁之势。

1957 年第一个实现“千斤县”，郫县得分领先；新繁哪肯服输，58 年第一个宣布早稻亩平超千；号称“稳举帅旗”的郫县可是欺得？几天后宣布早稻亩产超千，比新繁多十几斤。四川日报宣布郫县“ 获全省冠军”。

为了回答两县同时收割，善于抢先的郫县为何先不说的质疑，报道解释说：“今年郫县早稻收割的特点是愈收产量愈高”，开始估计不足云云。新繁咽下这口恶气，一举抢拔万斤头筹。

四川的万斤田稍逊风骚，并非缺了胆大者，而是信息不灵。并秧作假是湖北孝感的创举，但是在被人识破以前，密而不宣，新华社介绍的经验是“他们狠狠地搞密插”。

早在 7 月初，合兴乡党委就在红光社搞了一块亩产 4 万斤的试验田，郑凤兰挂帅，红光社副社长刘贤松任副组长。具体措施是：一、高度密植，栽“满天星”，不留窝距行距；二、深耕，用两部“新式步犁”一部在前面耖，第二部接在后面耖，然后 15 个全劳动力在后面挖，“挖到 2.5 尺为止”。三、分层，分期施肥 11 次。郫县县委转发了这份计划，“希各乡党委学习合兴乡党委敢想、敢干、敢作、敢创造的精神”。（见《郫县合兴乡党委在红光社试验水稻四万斤的具体措施》，一九五八年七月八日）

诸如此类的荒唐措施后果不言而喻，密不透风的秧苗在田里沤烂。

到湖北大放卫星时，郑凤兰们就搞不懂， 为何人家长得密不透风的稻子硬是可供人参观，我们只能凭空捏造，连谷桩都不敢让人看到？

湖北麻城了 3 万多斤的“天下第一田”出来后，并秧首次公开化。新华社的消息说，他们在秧苗长到一尺多高的时候，“毅然”把几块田的秧移植到一块田里，形成人根本无法下田的高度密植，得用管子插进去灌水施肥。中国农科院的郑建南称之为“掇秧密植”，认为是一种创造。四川的“水稻专家”从湖北带回的经验称之为“水稻后期移栽”，“二次移栽”等等。事实上，能供人参观的卫星田都是稻子成熟后并拢一堆的，所谓“移栽”纯属事后编造的欺人之谈。把未成熟的稻子密不透风的堆做一堆，只能把稻子活活沤死。

做假者为掩人耳目编造谎言，宣传机器捕风捉影散布谎言，疯狂的卫星大战，把谎言变成灾难。全国群起效尤“后期移栽”的“先进经验”，造成惨重损失。

事实上，把成熟的稻子并做一处作假，虽劳命伤财抛洒无算，倒底有收获；生长期内并秧，则颗粒无收。

有关“水稻后期移栽创高产”的经验，7 月下旬传到郫县，县委如获至宝，召开各乡书记会议，要求各乡搞试验田，“在含苞抽穗前”进行移栽。

结局惨不忍睹；犀浦乡张青山社把 30 多亩正在灌浆的稻子并到公路边的一块田里，以壮观瞻，“结果把稻草都沤黑，沤稀了，粮食颗粒未收。”合兴乡党委正在为夸下的亩产 4 万斤的海口发愁，以为找到救星，把 100 多亩稻子移到几亩田进行“后

期生长”，“一共只收了一万多斤秕壳”。

吃了“先进经验”的亏之后，有人就暗中悟出了门道，所谓后期移栽是不可能的，唯有将成熟的稻子并做一堆，才能做出让人心服口服的假现场。但是如此一来，当然是彻头彻尾的作假，需要高度保密。温江专区工作组事后在合兴乡的一份调查报告中说：

在伪造这些中稻移栽高产卫星之前，县委农工部长潘克之同志曾召集这些党员干部在乡公所开会研究，并提出了这些高产卫星放出后，参观时如何介绍经验的问题。潘克之说：“就说什么实行了深耕，高度密植，分层施肥，适时追肥，囤水灌溉，迂回灌溉，浅一深一浅灌溉等，并教育社员都说得出来……”

在对社员进行了这样的“教育”后，社干部还不放心，再三吩咐社员不准乱说，“记得清楚才说，记不清楚就不准说。有人问，就说不晓得。哪个说错了一句，以后脱不倒手，大人说错，大人负责，小人说错，家长负责……”

一切在都在紧张诡密的气氛中进行，黑夜中持枪民兵分兵把口，来往巡逻，数百社员黑灯瞎火，将成熟的稻子连根拔起，并入一块田中，每并一窝，还要在根部狠狠蹬一脚，让它们“长好”，天一亮，巨型卫星就做成了。

正如四川日报所说，有了这个办法，“我们要放多大的卫星，就一定能放出多大的卫星”。8 月 26 日，犀浦乡放出一颗 4 万多斤的卫星。

接着是合兴乡红光社的 10 万斤田，和平社的 13 万斤田……。

在红光社制造 10 万斤田那个紧张的夜晚，社长周桂林“肚子痛”没去，他很难过：这样子整，实在太对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了。

14、杯水车薪

如同带功报告的会场一样，尽管是满场的手舞足蹈，总有一部分“心不诚”者死活来不了气。在全民性气功态的童话世界里，仍然有许多按常规思维的人，他们被称之为“怀疑派”、“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保守派”、“顽固派”、“反对派”，四川日报的评论员文章还叫他们“黄鳝脑壳”——“四川有句俗话形容那些冥顽不化的人叫‘黄蟮的脑壳——死不化’”。他们一口咬定高产卫星是“吹牛皮、冲壳子”，“算了吧，算帐派，你们已经输得精光，现在是你们最后猛醒的时候了，否则成了

黄鳝脑壳就悔之晚矣！”

“黄鳝脑壳”多半是老农，他们的丑陋模样频繁出现在壁画和报纸上。各级干部中，这样的黄鳝脑壳也有人在，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

在放高产卫星这件石破天惊的大事上，温江地委一开始就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被动状态。

从行政关系来讲，郫县的一切工作，尤其是首屈一指的农业生产，应该由地委一手抓，然而无论从地理上还是实际领导上，郫县离省委都要比地委近得多。“李政委”经常办公的金牛坝招待所就挨着郫县；省里的各种工作组如走马灯似的来来去去，以新华社四川分社，四川日报为主的一个宠大的新闻报道班子常驻郫县；省里的各种指示往往一杆子插到县里，县上的工作往往直接报到省里。当郫县有什么大事报到地委时，可以肯定省上已经知道。更多的时候是地委接到省上的信息或看了报纸，方知郫县又生出什么花样。

地委一般干部没人愿到郫县去：人家是通了天的，架子大着呢，谁愿意去坐冷板凳讨没趣呢？

但是地委的头头们就不敢这样想，夺了彩地委也许沾不到多少光，出了事可休想滑脱。粮食问题事关重大。从统购统销征过头粮出乱子，到 1956 年乱指挥造成的减产，或多或少给他们以教训——脱离实际是要受惩罚的。他们肩上的担子很重，很实际，说一千，道一万，你得把粮食交出来才算数。单是一个百万人口的省会成都，一朝没粮，该当何罪？

不过，要说谁一开始头脑就很清醒可是假话。整个国家尤如一个蒸笼，热的、冷的、清醒的、糊涂的都难免被蒸热、蒸烫、蒸晕。主管农业的书记曾�每天拿着报纸心急火燎：连穷得叮当响的河南安徽都干出几千斤，守着名甲天下的天府之国居然无所作为！连省上的农业专家参观回来也这么说，还有可怀疑的吗？

为了迎头赶上，地委接连组织一批又一批的参观团分赴河南、湖北、安徽、浙江、福建、广东、甘肃等省参观考查，结果大失所望。

号称创造油菜亩产 5 千斤的甘肃某县，参观团一去县委就说：“别参观了，是假的，记者看到县报上的一篇消息就捅到全国去了。”

浙江某县所谓的碗、胡豆亩产 2 千多斤，去后县委说只有三、四百斤。参观团说，我们在国家统计局的公报里看见的呀！县委说，统计部门上报时未经我的审查。

安徽麻亩产 2100 斤，假的。去湖北回来的人讲，水稻产量也有问题，有的社队干部私下对参观团说，收的时候都没听说放卫星，收完了给我们打招呼：外面的人问，就说有 1 万多斤。……

当神话被重复一千遍的时候，他相信过神话；当神话被揭穿以后，他更坚信常识。曾�清醒了。主管着全区的农业，他感到责任重大，那是几百万张嘴巴，10 来

亿斤征购粮的问题啊！虚报浮夸后果不堪设想。

秋收开始，曾笳突然接到省农业厅的电话，说郫县已经出现 6 千斤以上的卫星田，省上准备在那里开水稻生产现场会，他立即答复，等我们调查清楚再说。他派地委办公室副主任杨彬前去调查，杨回来报告，不是 6 千，是 6 百，社队干部说，他们根本没报过，是县里报上去的。

曾笳拿起电话告诉农业厅，现场会不能开，没得那回事。接着打电话给郫县第一书记刘致台，要他说清楚是怎么回事。电话那头口气不小："这还不算，我们还有产万斤的田呢！"

曾笳压住心头的火气："那当然好。有把握的，先给地委报告，我们要亲自验收。未经地委验收，不能向上报。"

眼下他正窝着一肚子火。统购统销以来，粮食收割前的估产，收割时的核产，收割后的清产已经形成了规矩，粮食产量都是逐级核实上报的。今年早稻收割开始就全乱套了，尤其是郫县，简直就不把地委放在眼里。有一点很清楚，高产最终要落实到征购上，万一征购完不成，他是担戴不起的。地委常委中，对高产卫星持怀疑态度的占压倒多数，地委发出通知：凡各县放高产卫星，一律先报地委，经地委验收后才能宣传，否则不予承认。

这一纸通知尤如向燎原烈火泼去一瓢水，根本无济于事。先斩后奏，斩了不奏比比皆是，地委会刘家大院门口终日锣鼓喧天，报喜的队伍你来我往。接到喜报：看到报上的消息地委的调查组火速赶到现场，要么已经"收完"，要么子虚乌有……。

8 月 23 日，万斤卫星从天府之国冉冉升起，巴山蜀水一片欢呼。

从报上得知消息温江地委的头儿们如同咽下一只苍蝇。宋文彬打电话问曹云生，曹承认是"二次移栽"。

8 月 25 日，地委再次受到重创，四川日报头版报道，郫县合兴、古城，崇兴三乡接连放出 5 颗万斤中稻卫星，其中最大的是合兴乡和平社的 1 万 6 千多斤的卫星。

地委办公室派龚朝浦，付正坤二人立即前往调查，看到是犁过的田。访问了几个老农后，二人打电话到川报说，我们调查了，这块田实际只产几百斤，你们这样做有损党报威信！报社并不理睬。

8 月 26 日下午，郫县报告，犀浦乡有一块田可收 3 万多斤。

"不要收，我们马上来验收！"曾笳对着话筒大吼。

当地委的干部傍晚赶到时，那块所谓的高产田已是光秃秃一片，县、乡干部称："收割完毕"。

这回曾笳可真火了，在电话里厉声责问郫县第一书记刘致台："叫你们不要收为什么要收？这样做不对嘛！……"

刘致台似乎并不计较："不要急，还有一块比这块产量还高，估计有 4 万多斤呢！"

8 月 27 日上午，除主持召开各县农业书记会议的曾笳外，宋文彬率领地委全部常委赶赴犀浦，一下汽车，他们便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但见成都到犀浦的公路上大小汽车排成了长龙，人流如潮，成千上万的人把一块稻田围得水泄不通，挎着相机，拿着笔记本的记者在人群中窜来窜去，电影摄影机吱转吱动。那块稻田——不如说是一个稻堆，稻子密密麻麻挤在一起，从上面看去一片金黄的谷粒。有人用鸡蛋放在上面掉不下去；小孩在上面蹦跳着；一个须发皆白的老汉拿着洋铁皮做的话筒站在稻子上大叫大嚷；照机劈里叭啦乱响……。

县里显然早已将消息捅了出去，单是看几十辆小车，就知道省、市、各厅局的人差不多都到齐，这种热闹欢庆的场面很快抹去宋文彬对县上又一次“先斩后奏”引起的不快，他堆起笑脸，和人们握手寒喧，接受种种由衷的或不由衷的表扬、祝贺和恭维。

成都市委书记米建书握着他的手连声道贺——温江地区粮食大丰收，对这一年多来工业人口猛增的成都市，实在是天大的喜讯。

上午参观，下午开始收割，一百多农民涌进这块只有一亩多的田里收打，县委的验收团验收，地委常委、组织部长郭岚亲自把称。

县上的干部在人们的拥簇下介绍“并秧移载”经验：他们是在 7 月 13 日，将 16 亩田的中稻在抽穗前 10 天并到一亩田中，进行“后期生长 ”，放出的这颗大卫星。

省委书记阎红彦、廖志高、阎秀峰，以及省人委、省政协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均到与现场参观。

第一书记李井泉眼下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整个大跃进期间热度最高的一次会议，一系列骇人听闻的高产指标和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定就是在这次会上作出的。由于李井泉不在，使这颗卫星的发射遭到重大挫折。而下达“熄火”令的正是李井泉信任的阎秀峰。44 岁的省委书记阎秀峰兼任省委秘书长，主管宣传工作。

据阎秀峰当年的秘书岳忠回忆，当他们在田边参观时，他听见有人小声议论说这是造假，他回头一看，是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几位水稻专家。岳问，你们怎么知道是假的？专家扯起一窝谷子说：“这根是死的，是稻子成熟时才移并在一起的。”岳随即找到几个熟悉的当地干部打听，证实实际上是将 32 亩成熟的稻子并到一起。

返回成都的路上，岳给阎秀峰讲了这些情况，阎秀峰立即叫岳忠通知各报社领导和农科所的那几位专家到省政府开会。会上，专家们直言不讳地指出，稻子是成熟后并起来的，所谓“移栽并秧，后期生长”纯属无稽之谈。阎秀峰在会上宣布：“这样的高产卫星是劳民伤财，各报不要发表这种消息。”

一百多人干了一个下午，一亩多田的稻子没有收完。当晚地县两级领导干部回郫县。晚饭后，宋文彬接到阎秀峰电话，说省、市机关有人反映，今天他们参观发

现这块高产田有问题，是假的。

宋文彬立即召集县委刘致台、潘克之、郑凤兰等开会，宋态度很严肃："你们讲讲，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是真的就好，如果是假的，现在还好收场。现在不讲清楚，今后事情闹大了就不好办……"。

县上几位一口咬定，真的！

宋文彬又羞又恼，咬紧牙关，脸色铁青，一直接一支的抽烟。

并秧移栽作为上了报的"高产经验"是不能否认的，于是问题集中到移栽的时间上。这块田无疑是成熟后并作一堆的，但县上坚持说是一个半月前稻子含苞抽穗时移栽。会开到凌晨一点不欢而散。

根据阎秀峰的指示，四川日报等 28 日没有报道已在成都闹得满城风雨的这块卫星田消息。

而《四川农民日报》据说是因为总编没有参加 27 日阎秀峰主持的会议，第二天(28 日)用整个头版大张旗鼓地作了宣传报道，称"郫县卫星与常娥共饮"，"犀浦乡幸福第一农业社中稻亩产可达 4 万多斤".刊出的照片有省委副书记廖志高在宋文彬的陪同下参观卫星田；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头站立在稻子上，"创造中稻大卫星"的干部社员合影。

8 月 26 日谁也没见过的那块号称 3 万斤卫星田的消息也挤在头版，报道鼓吹，"郫县是多产卫星的母亲"，"卫星发射台"。

28 日，成都市和各县闻讯前来参观的人将这块田围得水泄不通。收打完毕，经"验收团核定"，当场宣布这块田亩产为 45217 斤 5 两 8 钱。

这天上午，曾笳率各县主管农业的书记到犀浦参观。刘致台大言不惭向各县介绍，他们在 7 月 13 日含苞抽穗前将稻子移栽到这块田进行后期生长云云。

话没说完，曾笳当头一捧："你们这个万斤田有何用？要多花多少劳动力？腾出来的田有何用？有本事，直接搞出万斤田来！"

"有啊，我们有直接长出的万斤田。"刘致台说。

"哪里有？"

"马路边上就有。"

"好嘛，究竟哪块有把握，带我们去看看。"

刘致台让人带曾笳一行来到马路边的一块田，田边竖了一块牌子，

上书："万斤田　每亩 4 万蔸　每蔸 25 穗　每穗 250 粒"

曾笳看看牌子，再看看田里的稻子，说："好，我们下去数一数，看够不够这个数！"他和另外两名地委干部下到田里，在不同的位置数了 10 多穗稻子，平均每穗只有八、九十粒。

曾笳脸色陡变，破口大骂："你们睁起眼睛说瞎话啊？明明只有这么多，为啥那

样写？你给我算一下，怎么会有一万斤？”

当天下午，地、县两级关于并秧时间、并秧利弊的追辩继续进行。县里一口咬定，并秧时间是 7 月 13 日，并让犀浦乡党委书记赵宗福和社支书到会作证。

当晚，省委通知县委，关于犀浦万斤田的消息“暂缓发表”。

宋文彬请省委农工部翌日到犀浦共同调查。29 日上午，省委农工部长杨万选，处长史立言 ，地委宋文彬，县委刘致台共同在犀浦一社召集社长，驻社干部座谈。

当过李井泉秘书，长期在犀浦蹲点的史立言私下对宋文彬说：“查什么，用不着查，假的！几十亩成熟的稻子并做一块，几百人晚上偷偷摸摸地干，稻子的根都没长进土，轻轻一提就起来了。”

调查结果正如史立言所言，稻子是 8 月 13 日才并的，比县委坚持说的整整晚一个月。宋文彬咬牙切齿，给县委下了三道命令：一、公开召集群众大会承认错误；二、作书面检讨；三、给作假者以处分。

宋随即赶往成都，向阎秀峰作了汇报，阎表示同意宋的处理。

县委的检讨还没送上来，地委就挨了一记耳光。

9 月 3 日，人民日报刊登署名苏方一篇特稿——“卫星田畔庆丰收”：

成都近郊的一块卫星田被参观的人围得水泄不通。望着这丰盛的庄稼，大家不住的啧啧地赞叹着。一个老教授拿着一穗稻子左看右看，用手颠了又颠，连声说：“了不得，奇迹！奇迹！”一个年青姑娘把脸贴到稻穗上亲了又亲，闻了又闻；更多的人都弯下身子，去看那挤在一起的稻梗。你看，稻梗长得多密，稻穗铺得多厚啊！这沉甸甸的浅黄色的稻海，象一张有弹性的大沙发，别说鸡蛋堕不下去，便是风也透不过。你看，那几个粗壮的成年人在稻穗上站得多稳！他们好象站在厚厚的地毯上，跳着，裂开嘴笑着，惹得参观的人拍手欢呼，惹得摄影记者的镁光灯直闪。一只蹲在田坎边 癞哈蟆被笑声惊动了，想躲到稻田里去。可怜的小东西，你找错门路了。这密密的稻 梗结成的墙，你能穿过去吗？果然它蹦了几次都被挡回来了，急得它满地乱爬……

田里，社员们正在紧张的劳动，割的割，打的打。稻子长得这么密，用手搂都搂不过来，收割起来多么费劲！昨天他们一百多人整整割了一个下午，才把这一亩零一点点的庄稼收割了一小半。今天天一亮，他们立刻又来到田里奔忙了。……你可知道，在这密密的稻田里施肥是多么不容易呀，肥料根本洒不进去，他们不得不把肥料溶在 水里，用喷雾器喷在稻子上，然后再用水冲到根部去。……

这显然是一场斗争的产物——有人不同意宣传，有人坚持要宣传。它巧妙地回避了两个敏感的问题：1、产量，2、所在县乡。但凡是参观过犀浦四万斤田的人一

眼就能看出，说的就是它。

但胜败之数，早已钦定！

人民日报 9 月 5 日关于广东连县亩产 6 万斤的报道，给郫县县委以更大的支持。这篇报道首次公开并肯定了并秧移栽。报道说，他们“把 62 亩 2 分田抽穗的禾苗集中进行高度密植。”从而创造了这一高产奇迹。

9 月 10 日，县委终于向省、地作出书面检讨报告。这份所谓的检讨堪称厚颜无耻，强辞夺理的杰作。

在解释为什么 8 月 26 日的“3 万斤田”没让地委验收，和为什么 事前没有说明“并秧”问题时，报告说：

8 月 26 日下午，县委办公室接得犀浦党委电话报告：该乡六社有一亩多中稻麻谷儿估计亩产达到两万斤，县委书记高义禄同志接到办公室情况汇报后，一面指示办公室立即报告地委，一面即前往犀浦验收。由于边收、边打、边过称组织得较好，收打过称约三分之一面积时，即发现达 3 万多斤，顿时，大家都喊叫起来，说是一块高产卫星。参加验收的县委书记高义禄、赵金波同志商议：“地委来不来验收，没有消息，是收完，还是留一部分？”议论纷纷，正在犹豫，犀浦乡党委书记赵忠福和县委书记赵金波提出说：一社还有一块比这块好，可能上 4 万斤。高义禄同志得悉后即决定全部收完，“地委如果来看，再看一社的”，这就是 4 万斤卫星田的发现。在此以前，县委从未听到过犀浦党委向县委报告有 4 万斤高产卫星，也没有得到过报告，说他们进行过移栽并秧工作。

关于并秧造假问题，报告说：

水稻后期移栽创造高产是从 7 月下旬有所了解的。8 月 2 号县委召开了各乡党委、总支书记会议，作了明确布置，每乡搞两亩，在含苞抽穗前移栽。……这一段从县委指导思想来说是没有什么错误的，问题是出在对古城乡发现的一块半吊黄谷子进行移栽并秧，县委 8 月 19 日发了通报批评，24 号又去验收，报社(指《郫县报》)又出了“号外”。这在实际上就是承认了半吊黄的并栽秧子，也是对的。当时，也曾发生思想斗争，“究竟承认不承认是高产卫星？”研究后决定验收，听取群众意见，如果群众认为是对的，反映是好的，今后有推广价值的，就承认。验收结果，经群众讨论，一致赞成这个办法，认为迟了一点，明年改进。这样……就草率的、没有报请地委而作了决定。

（见中共郫县县委：《关于犀浦乡四万多斤卫星田虚假问题的检查和检讨的报告》，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

8 月初就作了每乡搞两亩并秧移栽的“明确布置”，24 号又验收了并“半吊黄谷

子”的高产田，县报发了号外，怎么会不知道西浦的两块高产田是并秧？还要假装正经说：“问题是如果县委采取谨慎作风，先同地委宋政委前往弄清情况后再报告省委，不会招致参观面大，造成后果严重，使省委处于被动，这是必须接受的一个教训。”

在轻描谈写地作了一番“认识问题”的检讨之后，主要责任就推到了执行县委“明确布置”搞并秧的乡党委书记赵宗福身上：县委“根本不怀疑一个党委书记能够在县委、地委 面前说谎话，”而问题正是出在这个重要环节上”。

由于“犀浦党委书记赵宗福汇报假情况一再欺骗党”，县委要求“在犀浦从党内到党外，由该乡党委书记赵宗福同志，宣布一社高产卫星经过，从思想作风上，检讨自己弄虚作假的根源。并由县委书记赵金波同志主持，于最后将情况及检讨报告县委，再对有关人员分别处分。”

检讨做了——弄虚作假的罪魁祸首是赵宗福；开群众大会公开检讨——由赵宗福在犀浦进行；处分有关人员——赵宗福及其有关人员。地委的命令全部执行。赵宗福后来被撤职，但既没公开检讨更没挨批斗，他只是一个意外的牺牲品。

事实上郫县县委底气十足，眼下“移栽”卫星映红了半边天，其内幕已是公开的秘密，全国都在这么干，地委、省委几个人反对算什么？何况还有李政委呢！

因此，他们敢于在“检讨”的最后理直气壮地宣称：

至于移栽并秧工作，从其措施来说，我们认为是正确的，它对明年的大增产将会发生重大作用，我们决不泄气……

地委刚刚接到郫县的检讨报告，又挨了一记重重的耳光。9 月 12 日，四川日报头版刊出爆炸性新闻：郫县友爱乡亩产突破 8 万斤！

这是到这天为止全国最大的高产卫星，四川第一次在高产卫星上夺取全国冠军。报道的标题公然宣称“并秧移栽经验好——郫县上空出现万斤以上卫星群”。而且毫不忌讳地说，友爱乡 11 社于 8 月 15 日至 16 日，出动 310 个社员，用两天两夜的时间将 35 亩正在“散子”的秧子移到这块田里，创造了亩产 82525 斤的高产奇迹。到 9 月 9 日止，全县已放出万斤以上中稻卫星 35 颗，其中一次移栽的 13 块，并秧移栽的 22 块。

报道进一步说明并秧的好处：“当湖北，安徽省放出万斤以上的卫星后，他们认为，并秧移栽可以试验一亩田究竟可以密植、高产到什么程度，还可以腾出田来增种 一季，使一年二季或三季的庄稼种上四季五季。”“最近，郫县县委研究了全县中稻卫星的情况，认为并秧移栽是增产粮食的重要方法。因为这样就可以做到，早稻移栽可腾出田来栽中稻；中稻移栽后再栽晚稻。这样，再加上小春和晚秋作物，郫县明年即可做到一年四熟甚至五熟。县委准备大力推广移栽并秧法。”

不错，我们是并的秧，成熟了并又怎么样？这块 8 万斤的卫星田就是“散子”

（即将收割）时并的。这是增产粮食的重要方法，我们不仅这样做了，而且准备大力推广。刚刚检讨的错误全部翻案！而且是在省委的喉舌，四川日报上堂而皇之的翻案！

与其说这是县委向地委的公开宣战，不如说是省委对包括温江地委在内的所有反对派的公开批评。消息在省委机关报四川日报上发表，针对性如此之强，足以表明省委对此事的态度。省委的态度何以来了个 180 度大转弯？原因是第一书记李井泉从北戴河回来了。

只要李政委在，李政委就是省委，省委就是李政委；四川日报就是李政委的喉舌。他亲阅、亲审，甚至连何日见报、登几版几条都写得清清楚楚，决非报社可以左右。

8 月 17 日至 8 月 30 日，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考虑的是“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骇人听闻的高产似乎已经是既成的事。刚刚当上政治局委员几个月的李井泉腾云驾雾飞回四川，听说省委一些人反对郫县的万斤田，火气很大。眼看河北河南湖北安徽广东等省出尽风头，急不可待地要在四川搞出点震惊全国的名堂来，尤其对郫县寄与重望。

从 8 月份以来，李井泉就通过四川日报对“黄鳝脑壳” 们大加鞑伐。乘北戴河会议的东风，李井泉向反对派们发起猛烈反击，继广东 6 万斤卫星发射后一个星期，以超凡的雄心和胆量发射了郫县 8 万斤卫星。

然而也不是人人都对他言听计从。资历比他老的省长李大章有自有主见，陕北红军的创始人之一、身经百战的传奇英雄阎红彦反感说假话，连他的老部下阎秀峰、宋文彬也还没转过弯来。虽然四川日报对并秧大吹大擂，内部的反对呼声始终压不下来。

10 月 21 日，童话世界里出现了一个现实世界的声音，人民日报刊登署名孙渊的文章——《水稻后期并秧值得研究》，文章说，有的地方为了搞高产卫星，临时把几块田的庄稼稠密地移植到一块试验田里，这种做法“在今天很难用来指导一般农田的生产，……还是以不采取这种时间过晚的后期并秧为好。”实际上揭了高产卫星的老底，公开否认了这种做法。

并秧不敢吹了，但李政委不甘心。在一次省级机关会议上，特别通知温江地委领导到会，酸溜溜的挖苦，“郫县的 4 万斤田是假的，你们搞块真的嘛”。李政委不甘心，郫县新繁自然不甘心，搞了一篇介绍 14 块一次性移栽（含苞抽穗前移栽）的万斤田的材料，到处散发。在一次会议上，李井泉装模作样问宋文彬，你们那里有 14 块万斤田，你们是不是验收过？宋答，我们有验收的规定，但下边先斩后奏没验收成，新繁的一万斤登报后，我们问过是后期并秧，第二块是郫县的 1.6 万斤，我们去田都耕了，是真是假不清楚。

李政委追得紧，是要地委承认万斤田的“既成事实”，恢复郫县的名誉，并非要地委调查落实。地委有人偏偏要去揭老底，证明一次性移栽纯属谎言，所有的万斤田都是并秧，对郫县的处理没有错。秋收到年底，地委派出工作组反复对郫县的所谓一次性移栽万斤田进行调查，逐个加以揭穿，尤其抓住合兴、犀浦两个卫星发射基地不放。

并秧移栽的卫星田受挫后，郫县转而鼓吹“一次性移栽”万斤田，尤其是合兴乡和平社那块连谷桩都没见到的 1.6 万多斤的卫星，被吹得天花乱坠。省农业厅、农科所前去总结经验，省科技展览馆展出，省委农工部通报全省，成为全省推广万斤田的样板。

11 月，卫星田所在的 12 队队长练志元光荣出席中国农科院在苏州召开的全国水稻会议，在大会上第一个介绍经验，出尽风头。

11 月底，地委的一个工作组突然出现在和平社，向县委驻社干部胡清泉、分支书记黄子云等说明，此次专门调查 1.6 万多斤卫星田的情况。已多次同地委干部周旋的乡社干部立刻紧急行动。

当晚，胡、黄二人赶往 12 队，将正在参加“大兵团夜战”的社员召回，破例宣布今晚、明早不出工，一律参加会议。会上，干部向全体社员布置；不准和地委干部说话，他们要问，就照我们说的说，记不清楚就说不晓得。并威胁社员说：“哪个说了一句是假的，今后就脱不倒手！……”

地委工作组的处境，有如少剑波的小分队初进夹皮沟，队干部带着社员和工作组捉迷藏。

工作组在报告中写道：

社员在田里做活时，排长见我们来了，立刻把社员喊到一个屋基后边躲起，等我们走近时，又把社员喊到屋基前边。……社员跟我们说：“你们再多转几天，要把我们弄安逸（四川方言，‘舒服’之意。——编者），一天光转圈圈，不做活路，二天还要把人弄来看不到……”

活人不可能看不到，想给上边来的干部一诉衷肠的大有人在，于是工作组走到哪里，恨不得把社员挖个洞藏起来的队干部就跟踪到哪里，对凡是和工作组谈过话的社员一一进行追问。工作组找幼儿园几个带孩子的老太婆了解情况——

连长黎国元……便说：“等他们走后，把那几个老太婆弄来审问一下，看她们说了些什么。”

该队曾经放过一个亩产 6753 斤的“妇女试验田卫星”，工作组试图进行调查，队干部怕她们报产量口径不统一露了马脚，就叫搞卫星田的那 8 个妇女，把产量写在手背上，读来背得。练学清、方惠英二人在做活时，便一边看到手背上读：“6753、

6753……”

其余 6 个文盲妇女怕写上也读不准记不住，干脆不写也不读，向队干部保证“问到我们时，我们就说记不得了。”

工作组打破僵局，在于他们向群众交了底，申明上级领导坚决反对弄虚作假。当终于解除了群众的顾虑后，他们吃惊的发现，原来老百姓心头雪亮：

“国民党时候瞒上不瞒下，现在是瞒下不瞒上，搞假卫星上面是通了的……”

工作组解释：不对，上面也是反对弄虚作假的，是下面的人欺骗了上面。社员才宽了点心，“原来上面还是不通啊？”（见温江地委工作组：《关于合兴乡和平社中稻移栽卫星田的调查情况》1958 年 12 月）。

于是工作组终于查了个水落石出，写成书面材料上报地委。宋文彬看了不作批示，叫秘书长杨玉成存档。搞假卫星地委是不通的，上面呢？他不敢和李政委唱对台戏。

15、粮食多了怎么办

漫天飞舞的高产卫星，编织出一幅粮食堆积如山的幻影。

农业部估计，1958 年的粮食产量将达到 1 万亿斤以上，比 1957 年翻两番有余。刚刚上任国家统计局长的前温江地委书记贾启允，提出“统计机关不是监督监察机关”，“统计工作的基本任务是为各级党政领导工作、为计划工作服务”的新方针，使统计数字适合大跃进的需要。

8 月初，毛泽东自得地对来访的赫鲁晓夫说：1949 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

说完这个话，他就去了河北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报告说，今年全县要拿到 12 亿斤粮食。毛泽东高兴地瞪大眼睛：“你们全县 31 万多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粮食多了怎么办？”

张国忠一愣，表示还没想过这个问题。

毛泽东说，“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社员们

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粮食多了，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 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么？”（见《毛主席到了徐水》，人民日报 1958 年 8 月 11 日第 2 版）。

粮食多了怎么办？这是一个幸福得让人晕眩的问题，沉醉在这个幸福的晕眩中的远不止是毛泽东。困绕国家工业化建设多年的粮食问题，居然一个大跃进就彻底解决了！

给徐水县的干部提出的这个问题，也是毛泽东正在思考的问题。既然粮食多得吃不完，就可以放开手脚大办工业。那个时代钢铁产量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的主要标志，根据“抓主要矛盾”的哲学思考，他在农业上提出以粮为纲，现在他又提出以钢为纲：“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样东西，就什么都不怕了。”

粮食多了还有什么不好办？共产党人为之前赴后继的大同社会不是指日可待了吗？毛泽东离开徐水两天，中央农工部副部长陈正人就赶到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古往今来多少先哲追求的理想社会——公社，在中国的土地上诞生了。

8 月举行的中央北戴河会议，把粮食多了怎么办的思考变为决策，一是建立人民公社，二是掀起大炼钢铁运动。会议作出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欢呼：“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

毛泽东把人民公社精辟地归纳为“一大二公”。大，就是规模大，公，就是彻底的公有化。建国以来他坚定不移，力排众议选择的农村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以辉煌的胜利证明了他的伟大正确。粮食是怎么一夜之间堆积如山的呢？不就是坚决铲除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不断提高公有化程度创造出来的奇迹么？

正如一首诗唱道的：

单干好比独木桥，
走一步来摇三摇；
互助组好比石板桥，
风吹雨打不坚牢；
合作社铁桥虽然好，
人多车稠挤不了；
人民公社是金桥，
通向天堂路一条。

天堂之路是越大越好，越公越好。一般为一乡一社、甚至一区一社、一县一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兵学商合一，“管天管地管神仙”。原农业社的一切财产归公社，取消自留地，社员的房屋、牲畜、林木全部归公、吃饭不要钱、按月拿工资，公共食堂吃饭，小孩进托儿所、幼儿园，老人进敬老院，丧失劳动力者集体抚养……

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再也没有比 1958 年底那样接近天堂了。人们唱道：

党中央，毛主席，大旗一指拿主意。这个主意无价宝，五亿农民都说好。无价宝、宝无价，名字就叫公社化，农业社、小并大，从今以后天不怕。不怕涝、不怕旱，玉皇龙王随手转，五谷丰登吃不了，一亩小麦打十万。不怕穷、不怕白，两大革命一齐来，技术，文化闹革命，闹得地动天也动，农村干起大工厂，进村好象进了城。又是农，又是工，又做买卖又当兵，办了中学办大学，农民又是大学生。人人都是多面手，八臂哪吒难夸口，组织起来军事化，行动起来战斗化，过日子，集体化，三化好处非常大……公社好，公社好，幸福生活来到了！

山东范县规划在三年之内过渡到共产主义，县委第一书记诗曰："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毛泽东看了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乎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

署名胡华的作者在人民日报上宣布，《天下为公的理想逐步实现了》：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一幅人类高尚道德和幸福生活的美丽图画。中国历史上真正具有天下为公精神并为此目标而奋斗牺牲的，是中国共产党人。 当中国共产党人在极端白色恐怖之下，抛头颅、洒热血，前扑后继，历尽千难万苦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时，一些自以为聪明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曾在一旁叹息说："其志可嘉，其愚不可及也"。

可是，曾几何时，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就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大变化，……你走到人民公社看一看，欢笑着的托儿所的儿童，晒着太阳安祥地下跳棋的老人，架着枪突击种麦的青壮年妇女，有着丰盛饭菜的食堂，清洁的浴室、医院……。这一切，显示着"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的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已不是空想，而是逐步成为现实了。你去看一看每个公社的规划，那都是一幅幅最美的图画，比"礼运篇"所描写的更加宏伟、更加丰富、更加美丽。

真正"天下为公"的时代到来了。这是人类通向共产主义的新的曙光！

"公社"这个词，川西坝子的农民并不陌生。建国前川西地区有庞大的袍哥（即哥老会）组织，局部地区成年男子参加袍哥组织者十之七八，其势力之强大，足以 与政府、军伐抗衡，乃至中共地下党组织也要利用其力量。而袍哥的组织就叫"公社"。如著名的崇庆县商业口岸三江乡的袍哥组织就叫"三江公社"，下设"分社"、"小社"。袍哥内部拜把结义、同舟共济之类的信条，和中国农民的平均主义理想一脉相承。

不难想象，当他们又一次听到"公社"这个词时，必定会触动某根神经。而"人民公社"的美丽图画，对大多数人来说实在太诱人了。

和全国一样，温江专区在 10 多天的时间里全部实现公社化。乡政府换上了公社

的牌子，高级社变成了大队或管理区，土改后更换过的地名社名，又一次被更具时代特色的名称取代，诸如先锋、上游、红光、幸福、跃进、丰收、卫星、火箭、红旗……重复者甚多。

温江上游公社是个典型的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的大社。这个社以温江城关为中心，由 6 个乡、167 个农业社，以及城关居民组成，拥有 18300 多户、74000 多人口，12 万亩良田。

记者这样描写建社盛况：

“天府之国”中的温江县，这些日子，城镇里，村庄中，稻田傍，到处张贴、竖立着节日的对联，标语和牌坊。太阳还没升起，人们就踏着露水，穿过正在收割的田野，从四面八方涌向挂着“上游人民公社”牌子的房子跟前，敲锣打鼓、欢天喜地的把他们的申请书、决心书、保证书送到社委会来。

写得密密麻麻、盖满手印，代表了千万颗心的入社申请书，一夜之间，就收了一万六七千张，申请入社的川流不息的人群，使得支部书记尹建德整夜几乎没有睡眠。刚刚睡下，就又被贫农周德全和串连来的 20 多户农民喊醒来。62 岁的彭大娘，点着火把，用拐杖敲着门说：“可不能把老娘丢在社外边，我要多抱几窝鸡来入社！”……少数曾顽固地要走资本主义老路的单干富裕农民，看了两年之后，如今也都急如星火地要求入社。曾公开宣布要和合作社比赛十年的单干上中农朱太元，几次申请入社。干部故意对他说：“我们比赛还没完哩！”朱太元说：“我早挂了免战牌，我可不愿再在社外当反面教员”。当他将生产资料全部入社、被批准做公社社员的时候，他高兴得逢人便说：“从单干到公社，我是一步登天！”

公开的宣传似乎是谁也不愿错过这趟通往天堂的列车，实际上农民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从 60 岁老大娘的鸡、充当“反面教员”的单干户，到相对富裕的农业社，统统“化”为一炉。

四川日报上反面教员的丑态如下：

“辛辛苦苦闹腾两三年，好不容易积累一些钱，眼看归公社，实在心痛。”

坐在角落里的老上中农尚之清，一向以会打小算盘著名，人称“尚孔明”。当尚孔明转弯抹角说出他不愿意与穷社合并，要求分掉公共积累时，会场里立刻响起一片反驳声。

这时，贫农彭金华走到屋中，打着手势说：“……我们可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刚富裕起来就看不起穷社了。我们由穷变富，还不是靠着人多力大的合作社！”

彭金华一针见血的发言，使大家猛然醒过来，认识到只有“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才能有幸福的未来。当大家一致决议把高级社的全部公共财产、公共积累、储备粮，一文不少的移交给人民公社的时候，热烈的掌声压倒了深夜的秋雨声。

这掌声里一半是眼泪，一半是幻想，人人如洪流中的一片落叶，身不由已。

在李政委的亲自关怀指导下，1958 年 9 月 28 日，川西坝子天字第一号超级大社——红光人民公社宣告成立。

它由犀浦、合兴、团结、合作、安靖五个乡组成，有近 1.7 万农户，7.5 万多人，良田 13 万余亩。公社机关设犀浦乡，离李政委常驻的金牛坝招待所仅几公里之遥，26 岁的副县长郑凤兰任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周桂林任副社长。政社合一的时候，有人对公社的伟大理解过了头，提出“党社合一”的主张，立刻被驳回。社长的头衔无足轻重。

毛泽东到过的老红光社，现在是红光公社合兴分社的红光管区，周桂林仍是支书。

毛泽东在红光社田里几次比划，已演化为这次巡视的核心，被反复描述，回味、摩仿的和丈量，做足了文章。国庆前夕，老红光社的全体社员给毛主席写信报喜：

……自您老人家 3 月 16 日下午来我们红光社后，就给我们带来了莫大的鼓舞和幸福。特别是您老人家在油菜田里用手比着一人多高问我们“能不能长这么高？”和在麦地里比着八寸长问我们“能不能长这么长？”对我们印象更深，启发更大。您这一比，好象是一把钥匙把我们的心窍打开了。

看！主席，您这一比给我们生产上起了多大的作用，给予我们多么大的鼓舞！……全社今年获得了惊人的大丰收，小春粮食比去年增加了 2.4 倍；早稻亩产达到 1614 斤；中稻亩产 2805 斤；全社粮食产量比去年增加了 3 倍左右。水稻不仅获得了大面积丰收，还出现了 3 块万斤以上的亩产卫星……

现在，我们又按您的指示和我们大家的心愿，欢天喜地成立了人民公社。以后，我们要以更大的革命干劲，进一步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争取 1959 年油菜亩产 1 千斤，小麦亩产 8 千斤，早稻亩产 5 千斤，中稻亩产 1 万斤，粮食亩产 1 万 5 千斤的成就，再一次向您报喜。

最后祝您

身体健康 万寿无疆

郫县红光社全体社员敬上

1958 年 9 月 29 日

（见《四川日报》一九五八年九月三十日《红光社在国庆前夕给毛主席的报喜信》）

毛泽东在红光社逗留时间最长的是前甲长温小凤的家，连“工作干部”都不屑一顾的温幺娘，第一次接待的官方人物就是毛泽东。

温幺娘本人名叫林赛华，有关方面慎重酎酌，决定把温字去掉，但又没“林大娘”这个叫法，除非她男人姓林。报纸就不惜麻烦称“林赛华老大娘”。林赛华老大娘天天还在叨念：“唉！要是那阵不生火巴眼就对了”，还在怪罪孙儿不争气：“毛主席问你几岁了都说不出来！”她成天捧着那只毛主席把弄过的水烟锅，逢人便追述每

一个细节。她的幸福花园里栽满了美人蕉、凤仙花、晚香王、蝴蝶花，当中是一棵铁甲松。

她叫来访的作家袁鹰回北京给毛主席捎个信，毛主席叫她喂两头猪，她就把大猪卖了养了两头小猪，原来这里不种红苕，政府号召增产，她就带头种红苕。

毛主席生日前夕，“幸福娃”们给毛主席写信：“今年春天您到我们社里来的时候，我们这一群小娃儿都见到过您，我们是多么幸福啊！”余万才说：“您说我还差点营养，现在我们吃食堂，比在家里吃得好吃得饱，长得结实多了。”邓洪昌说：“ 您问我一天打几架，我真不好意思，我以后保证不打架了。”

一个秋雨绵绵的夜晚，灌县云遮雾罩的大山中，一队姑娘背着沉重的煤炭艰难爬行，她们是红光公社“红光炼铁炉”的运输队员。

好容易挣扎上山，往下一看黑茫茫 一片不知下山路在何处。姑娘们哭了起来. 一个小姑娘勇敢地说：“哭啥子，回不去住‘青山旅馆’嘛”。姑娘们只得在山上过了又冷又湿又饿又怕的一夜。

这位勇敢的小姑娘就是毛主席叫医生给她治过手伤的王祖运。自从见了毛主席，她干活好极积，调到山上练铁后，每次背炭比别的姑娘都多。四川日报说，她已经有了爱有了家——荒山野岭上的铁厂。

年底的一天，周桂林接到通知，要他到北京参加全国农业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人人都说这下要见到毛主席了。刺绣小组的姑娘们送来一对枕套，农药厂送来了用打破碗花制成的“红光杀虫剂”，肥料厂送来了泥巴、草灰和尿水和成的“红光钾镁化肥”，林赛华老大娘摘了 12 个橘子送来，有人拿来了蜂密……

整整一个夜晚，周桂林翻来复去的想，见了毛主席说啥子。其实他的耽心是多余，临行前人们就塞给他一份讲稿，说什么都在上面了。

讲稿题目是“1 千 9 百多万斤粮食是按毛主席的当面指示放出来的大红光”。

里面又一次讲到毛泽东意味深长的比划，是鼓励他们夺取高产的“当面指示”。讲稿列举在毛主席的鼓舞下红光社创造的种种奇迹，诸如原来计划每人积肥 10 万斤，毛主席来后，社员提出每户积肥 50 万斤，“结果每户积肥达到 82 万斤”——也就是 410 吨，需要 82 辆 5 吨载重汽车才能拉走，而他们最先进的运输工具是鸡公车；全社 9 百多户积的肥，就是 40 万吨。

当然，写材料的人是不会考虑这些小事的。他们继续写道，1958 年，全社的粮食总产量达到 1 千 9 百多万斤，平均亩产 3716 斤。周桂林还得到会上去讲，今年每人粮食平均达到 4756 斤，平均收入 450 元；明年就可以使每个社员有粮食 1 万斤，每人收入达 1500 元。

16、人民母社

四川日报活跃的记者石韫玉感叹道:“这一年，四川农村象是一个大战场，每个农业社又象是一个大工厂，白天千军万马齐出动，夜来明灯万盏满天红，生产运动开始就是高潮，高潮就是开始。”

这还是公社化以前的景象，公社成立后，这个大战场更是撕杀得日月无光了。

全川一夜之间竖起几十万座土炉子，上千万炼铁大军不分白天黑夜大干。

温江专区无缺煤缺铁矿，一样得炼。全专区抽调 50 万以上精壮劳力，由各县第一书记亲自带队，组成炼铁大兵团，背起背包、粮食、扛起锄头扁担浩浩荡向西部山区进发，没有煤就砍树，没有矿就遍山乱找，炼铁大军吃住在山上，还得有千千万万的支前大军做后勤保障。崇庆县的炼铁兵团需要砖砌炉子，县上组织数万学生工人机关干部街道居民拆城墙，不分昼夜往山上运砖，道路为之阻塞。城镇各单位无一不是炉火熊熊，家家户户的金属器具——从古董到老太婆的簪子全部进了炉子，变成质量低劣的土铁。

五花八门的炼铁术气魄最为宏大的是“大窑炼钢”:选一块山谷凹地，将周围山上的树木剃头似的砍光，一层木头、一层矿石的填满，然后放起大火，连烧数日，待木头燃尽，抠出烧得矿不是矿，铁不是铁的东西，敲锣打鼓报喜去也。

除了公社化和大炼钢铁，北戴河会议安排的战斗任务还多:要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把一切“白旗”、“灰旗”、“黄旗”统统拔掉，制定比 1958 年更大的增产丰收计划，掀起更大生产高潮;要把土地全部深耕一遍，标准是一尺以上，丰产田二尺以上;要突击积肥、造肥，分层施肥;要大搞水利工程，去冬大干一下，中国的灌溉面积已占世界“三分之一以上”，只要再苦干两个冬春，就可以完全实现水利化;要继续除四害，虽然四害“在许多地方已经消灭了”，但是稍一放松又会繁殖起来，所以要一年到头不放松，创造出更多四无乡、四无县、四无省。

样样都是党中央的重要指示，样样都必须全力以赴，坚决完成。每个人都被大跃进的鞭子驱赶得团团转，地少人多的中国突然之间只嫌人少、劳力紧缺了。右派份子说什么人口多了积累少发展慢，帝国主义污蔑新中国解决不了吃饭问题。看吧，

当把每个中国男人从茶铺里、南墙下，把女人从锅台边、炕头上吆喝出来，会造就多么巨大的生产力！

到了这个时候，就足以证明人多是件好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

创造人间奇迹的方法是“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大兵团作战，象三大战役一鼓荡平蒋家王朝一样，几个回合就大功告成。

以公社为单位，根据战斗任务，把社员按班、排、连、营编制成各种“兵团”，如秋收兵团，炼钢兵团，以及以性别年龄编制的青年兵团，妇女兵团等等，在全社范围内“游动作战”，或跨社、跨县的 “大会战”。

以年轻人组成的“野战兵团”背着背包、扛着工具和抢枝，高举红旗列队行进，“一、二、一，一二三——四!”，“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共产主义社会一定来到，一定来到！”，威武雄壮，歌声嘹亮。

野战食堂一路跟进，埋锅 造饭，或走哪吃哪。哪里劳动哪里宿营，没住的塔草棚、睡稻草。有条件男女分开，无条件挤做一处——绝无暗结珠胎之事。

全川农村人口密度首屈一指的温江专区，劳动力骤然紧张，遍布城镇乡场一年四季高朋满座的茶铺人迹杳无，“游手好闲”乡镇居民统统赶到乡下劳动。

这边厢“大办工业”调走大批劳力，那边厢田边地头胡干蛮干。

强行推广的几十万亩双季晚稻到 9 月份还未抽穗，有着吓人的高产指标却面临着绝收的危险。这是川西坝子一阵秋雨一阵凉的季节，一场同大自然绝望的战斗打响了。

崇宁县召开保晚稻丰收誓师大会，发誓让晚稻快快生长，早早成熟，“千条良计一齐下，一项低温奈我何？”各社组织大军日夜守护田间，灵圣乡用草木灰、鸡、牛屎等“热性肥料”提高地温；君平乡每人“自动节约菜油三至五两”混合粪肥施到田里；万寿乡给几十亩“晚稻大卫星田”抽沟排水，拦腰搭架、分厢梳头(用手梳去秧窝周围的黄叶)。金星社战低温的绝招是：一、田中喷暖气法，在田埂四周生火，用竹筒把暖气输入田中；二、在田埂四周放火盆“抵抗低温侵袭”；三、用牛骨头熬油喷射促进提早抽穗扬花。

眼看只有收草的份儿，卫星照放不误。郫县的“一次移载”经验普遍推广，大邑县委书记侯宪率队参观郫县犀浦的万斤田后，立即布置各乡干部回去把还未出穗的晚稻全部并秧移栽 ，以创造高产。地委工作组干部梁进学说，使不得，郫县的万斤田明明是谷子都熟了才并的 ，现在并恐怕不行，侯宪同意先搞一部分试试，结果不言而喻。然而报纸继续鼓吹这种荒谬的试验。温江专区的《都江报》描述崇宁县放晚稻 10 万斤卫星的场面：

夜晚，秋雨绵绵，田坝里，煤汽灯的淡光四射。近百名社员，把一亩二分田，

深耕到一尺，用 60 万斤肥土，分层面土六寸。这是一块卫星田，社员们要在今年气温较低的情况下，想尽办法，使这块晚稻的亩产量，突破 10 万斤的大关。

以党支部书记刘天福为首组成的晚稻保护队，队员们每天天刚亮就奔下田么露水，排除田水，赶施草木灰等热性肥，社员们逐田逐块地用竹梳去掉黄秧叶子，让晚稻秧苗通风透光。

一天深夜，刘天福大叫起来："秧苗坏了"，醒来，却是一梦。

漫游稻田，不时可以看到生着木炭的火盆，输散热气的烟囱横躺在秧田上空——在这里，低温在人们冲天的革命干劲面前，偷偷地溜了。

刘天福的恶梦不是梦，"一次移栽"的高产田，未能抽穗杨花就沤烂在田里。

除了大炼钢铁，这一个秋冬最雄伟的画面是"让土地大翻身"的深耕运动。

自从毛泽东 1958 年 1 月在浙江农科所得到一本威兼氏的《土壤学》，地就越挖越深了。中央关于深耕运动的指示，一半的篇幅都在讲土壤知识，指出一年来农业生产大跃进和高产卫星的大量涌现，充分证明"深耕是农业生产技术措施的中心"。而今农业生产技术措施已归纳为"土、肥、水、种（子）、密（植）、保（苗）、管（理）、工（具）"的"八字宪法"，具有法律一样的强制性和不可动摇性，深耕又是这个农业生产法律的中心，地必须不折不扣地挖下去。

为了把川西坝子精耕细作了几千年的土地彻底翻个身，温江专区规定的深耕改土程序为：1、用犁犁、或用锄头挖第一层"表土"；2、把表土搬运到一边；3、翻第二层"生土"；4、把生土砌成中空的土堆；5、在生土堆中燃起柴火"熏土"；6、在熏土上泼粪水；7、将熏土敲碎、铺平；8、在熏土层上施渣肥、堆肥、老墙土千脚泥等；9、将表土搬回、铺平、耙细……如果是放"深耕卫星"挖地数尺，以此类推。

一种叫作"绳索牵引机"的深耕工具应而生，据说可以解决牛力和劳力紧张的矛盾，提高效力若干倍云云。"绳索牵引"实际上是人牵引，在田边支一个绞盘，一根绳子拽住犁，若干人推动绞盘牵引犁田，场面甚为古怪。人民日报报道，温江专区以每天 1 千部的速度制作绳索牵引机。

《都江报》说，大邑县委书记候宪亲自督战，全县苦战五六昼夜，就实现了"绳索牵引机化"。

一时间，平原上遍地是坟场一般密密麻麻的熏土堆，丘陵山区更是"坡上有坡，山上有山"，白天黑夜遍地火光，烟雾弥漫。四川日报记者描写了大邑县的这一"惊心动魄"的场面：

一走进四川大邑县境，就看到一种惊心动魄的情景，红旗招展下，成千成万的深翻大军，按照军事化的编制，一队队的摆开阵势，吆着牛，挥动着锄，转动着绳索牵 引机，运送着泥巴，不分昼夜风雨地在田野里战斗。

报道说，这个县在一半主要劳动力上山炼铁的情况下，从 10 多岁的小孩到 70 岁的老人全都投入到战斗中来，组成野战兵团，打破乡社队界限，采用运动战、阵地战的方法，四处安营扎寨，轮番转移作战，“白天紧张劳动一天，天黑又连续夜战”。夜战是这样进行的：

时间刚到午夜 1 点，群风公社熟睡在营棚里的人们，一听见号声，就从男女宿舍中奔跑出来，到河边洗了脸，马上排队集合在田边。这时候，女分支部书记杨淑贞望了望黑云沉沉的天空，卷起被露水打湿的裤筒，舞起手中的红旗，精神抖擞的开始在队前讲话，……

当中队在大雾中散开的时候，以每头耕牛和绳索牵引机为中心的战斗小组，立刻在火把照跃下耕作起来。前头的耕牛一犁开地面，跟在犁沟后面的人，马上将翻起的泥土搬开，然后再搬动绳索牵引机，在新土上重翻一遍……

阴云密布的天空，不多会儿就下起雨来。雨渐渐由小变大，湿透了大家的衣衫，可是没有一个人离开田间。

“深耕卫星”更是蔚为壮观。

深耕的土地上到处挖起战壕似的深坑，叠起一列列土墙似的土埂，修起一座座碉 堡似的熏土窑。穿着花格衬衫的青年女突击队队长李玉芬，站在战壕似的深沟里，抓起 一把熏烧过的泥土，激动地说：“你们闻，这泥巴多香啊！我们要争取一亩地打 10 万斤小麦哩！”

大炼钢铁，修水库、电站、铁路、公路、工厂，一批批的男劳力离开了田土，仅修建后来半途而废的岷江电站和成灌铁路，温江专区就调集了 10 万民工。

到大规模深耕熏土开始时，“深耕兵团”的队伍已经很不成样子了，它包括妇女、娃儿、婆婆、大爷以及残废人、多年卧床不起的病人等等，一路上娃儿哭女人叫，在冬季的凄风苦雨中“奔赴战场”。

大邑县群风公社两腿完全瘫痪的青年周长根“为了创造美好幸福的明天”，每天用两手爬行到田间，匍匐在泥土里，一只手撑地，一只手抡土。记者歌颂：“残废英雄周长根，爬行运土感动人……”

朝阳公社 80 多岁的周老汉站在田边，举着火巴通夜为夜战的人们照明。某中队 2 百多人，只有 4 名男人犁田，干了几天，4 个男人当了逃兵，跑到附近工厂当工人阶级去了，中队长杨秀英把妇女们召集起来宣誓：“让他们逃吧！我们自己学耕地！”四川日报鼓吹：“半劳顶全劳，妇女赛男子，老汉赛壮年”，“男子上前线、妇女顶住干，决心搞深耕，亩产要破万！”田里只见女人不见男人，就有人背地里挖苦人民公社是“人民母社”。

“人民母社”在大兵团运动战中打得精疲力竭，连收庄稼的时间和力气都没有了。

温江专区这一年的粮食产量至今是个迷，但有一样肯定是大丰收——红苕。川西坝子历史上很少种红苕，1956 年开始为提高复种指数大面积种植，1958 年全区秋红苕逾百万亩，长得极好，但到挖红苕的时候几乎腾不出劳力了。从省到县又是开会又是发紧急通知，要求不烂掉一根红苕，无济于事。红苕要么烂在地里，要么挖起来堆在地边烂掉。

红苕大量浪费的又一个原因，出自于农民最欢喜的一件事——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

作家除迟唱道："吃饭不要钱，几曾听说过？吃饭不要钱，哪里看见过？／自古所没有，世界也从无，哪能有这事？怕是说梦话。／吃饭不要钱，谁知是真的！就在咱公社，菜蔬也免费。／生产翻几番，粮食吃不完。吃饭不要钱，梦想要实现。／消息传出去，世界要震动。东方一片红，万岁毛泽东。"

在农民心目中，这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入了社，就是"公家"的人、国家的人了，国家的饭大家吃，吃完了国家负责。一切都共了产，只剩赤条条一付身子，一只肚皮，唯有吃进嘴里才是自己的。人人都在死吃憨胀往肚子里捞，不吃白不吃。毛泽东说一天可以吃五顿，有人吃到六顿，有的食堂从早到晚开流水席，随时想吃就吃，吃得有些人发呕。分粮到户时，先吃粗粮，细粮细水长流，现在先吃好的，白生生的大米饭把肚儿胀个滚圆，谁在乎红苕？

基层干部虽然被迫浮报高产，对粮食倒底有多少心中还是有数的，但是他们虽心有隐忧，却无力抵制已经政治化的"敞开肚皮吃"，否则就意味着对大丰收表示怀疑。大邑安仁公社成立后，开始司务长每顿饭用粮多少要过称记帐，县委第一书记侯宪发现后在全县电话会上批评说："食堂煮饭用粮还要过称？这是不相信 58 年产量的表现！"于是全县就管他三七二十一乱吃开了，连过路行人也可以随便走进哪个食堂吃饭。

亏了这几个月的好吃好胀，大部分人才能在精疲力竭的劳动中撑下来，有的竟然还长好了。崇宁县老光棍白辉山端着大斗碗只是笑："咳，安逸，公社不得了！"，他 50 岁了，"突然长了好些肉"。土改以来，人们一直在议论农民不顾大局，裤带太松，把增产的粮食"浪费"了，实际上他们从来没有今天这样浪费过。一方面大量的晚秋作物收不上来，一方面秋收的粮食，包括合作社时期的老家底都被放开肚皮挥霍无几。

"招之即来"的几千万大办工业的大军吃着高标准的商品粮，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农民在放开肚皮吃粮，无人收割的庄稼在地里发芽腐烂，上边仍然在思考"粮食多了怎么办"。

毛泽东参照威兼氏的《土壤学》，提出用三分之一的地种庄稼，三分之一种草，三分之一休闲的"三三制"。真的，如果一亩地能打几万斤粮食，用那么多人，那么

多地种粮食干什么呢？少种、高产、多收，其余的时间学文化，搞科研，唱唱歌，跳跳舞，做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

人民日报社论欢呼这是农田耕作制度的大革命。社论说，今年全国出现了许多小面积的高产卫星，但是“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明年我们一定能够在大面积上创造丰产奇迹。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小面积土地上得到足够的农产品，同时放弃一部分低产耕地。“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大面积高产可能不可能的问题，而是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去实现大面积高产的问题。”

这个称之为“田园化”的农业革命构想在宣传画中描绘的景象是：鲜花遍地，绿草如毡，集体农舍的楼房掩映于浓荫之中，外加一小块庄稼长得象小山似的农田，男女老少欢天喜地各得其所——几乎就是宗教绘画中极乐世界的翻版。

1959 年的生产目标——少种、高产、多收的指示层层下达，又一轮更大规模的吹牛竞赛拉开序幕，1958 年的“卫星点”要变成 1959 年“卫星片”，面积动辄数千亩数万亩，高产田 5 万 10 万下不来。

四川省委召开万人生产动员大会，提出 1959 年全川要搞 1 千万亩万斤田，同时缩小耕地面积，抽出劳力大办工业。

四川日报刊登农业厅长赵孟明的文章说 ，有充分的根据证明这是可以办到的，1958 年的实践证明，有了高指标就会创造高产，我们“一定能够实现千万亩亩产万斤粮。”

17、万斤田争论

这一年，温江地委书记曾筘 41 岁。

1938 年春寒料峭的时节，四川逢溪县蓬南乡里走出 3 个衣衫单薄的青年，他们的目的地是心中的圣地延安。其中一个皮肤白净，爱说爱笑的就是曾筘。他是乡里的小学教员，父亲是个不走运的小地主，破产后如今守着 20 亩田的家当。

在成都努力餐馆，他们见到老板、中共四川省地下党领导人车跃先，车说到延安只有步行，三个人凑了凑带的 21 块银元，走！

每一个银元都是在饿得迈不开腿时，才掏出来的，到西安 3 个人还剩两毛钱。往延安的路上，饿得走不动了，几个书生放不下脸面讨饭。曾筘提议到小学校去化

缘，穷教师总会帮穷教师嘛，果然得了一饱，一路屡试不爽。当他们完成 28 天的长征望见延安的宝塔，一个个已是又黑又瘦。

1939 年任太原分区青委书记，1941 年任县委宣传部长，1948 年任县委书记，1949 年底南下任温江地委宣传部长，1952 年任地委副书记，一路顺风满帆。

他厌烦政治学习，不看“干部必读”，开会经常迟到，不爱批阅文件，不爱写讲话稿。爱跳舞，场场不漏；爱看连环画，一坐上地委的美式吉普，就从公文包里把它们掏出来；好吃，一听说哪里有好吃的就跑去了；他脾气火暴，说话带把：“球！他妈的！” 他讨厌转弯抹角，言不由衷，口是心非，见风使舵，阿臾奉迎。他的快人快语、口无遮拦是人们经常议论的话题。有人说他胸怀坦荡，正直豪爽，嫉恶如仇；有人说他恃才傲物，目中无人，自由散漫，有人嫌他锋芒太露，缺少涵养；有人则暗暗为他捏一把汗……，但没人否认他有才华、有能力。

自打到外地学习高产经验的干部回来报告，所谓的卫星纯属造假以后，他的脾气就越来越坏，怪话越来越多了。地委干部张学仪，刘文英到郫县红光社调查回来，向他汇报干部半夜叫社员把谷子并到一块，还不准社员说，他霍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这他妈的和国民党有什么区别！一天吃了饭尽干这些没出息的事。他妈的不领导群众搞生产，专搞欺骗！……”吓得张、刘把更糟糕的事吞了回去：“有些事真不敢给曾书记谈，他急了连你一起骂得狗血淋头。”

他不分场合的骂，从本省骂到外省，从下面骂到上面。他在召集的各县农业书记会上骂：“今年上半年大家都踏踏实实的干，就是他妈的河南吹起来以后，大家就跟着吹。 郫县给我们干了一件坏事，他们现在还坚持有一万斤的，弄得多被动？河南还有万斤县，又是一个千斤省，现在呢？现了原形，粮食不但不外调，还要调入，吹牛真是害死人！”他在食堂吃饭时骂：“球！河南的钢铁卫星放那么高，弄得别人赶都赶不赢， 闹球半天，它才是假的！”他大不敬的骂：“有些领导头脑发热，就相信那些说假话的人。吹牛的人吃得开，老老实实反映情况就说你是观潮派。”“多快和好省就是有矛盾，数量和质量就是有矛盾。”“现在的球报纸，我看都不想看，抓住一点就瞎吹……”

最后一句是开地委常委会时说的。“你说什么？”第一书记宋文彬觉得太过分了，曾篇理直气壮：“现在的报纸尽球瞎吹牛，今天这个小厂制成拖拉机啦，明天那个小烂厂制成汽车啦，都是乱找零配件凑成的，能算是生产出来的东西？工业就那么简单！要不，你给我成批生产嘛，我一看这些消息就头痛。”

他到处泼冷水，下面汇报工具改革的辉煌成绩，他听都不听：“啥子工具改革，技术革命，东改西改还是用不得。让群众把饭吃饱，一下就突击上去了。”人家带他参观土化肥厂，他指着生产的泥蛋子问：“这就叫化肥？能起什么用？”弄得人家脸红脖子粗。

主管着全专区的农业，他对大炼钢铁气不打一处：“球！上去那么多人，庄稼丢在地里收不起来，炼那点铁，还不够吃咧！”“这真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太盲目了，农业搞不好就吃钢铁吗？”第一书记抓工业是党中央的规定，他公然声称要“顶住”，“叫第一书记天天守住炉子，不出铁还是不出铁，事情总是有个发展规律嘛。”他向全专区主管农业的县委书记下令：“工业、农业、一家一个电话会，太不象话了！你们记着，这是我说的，我负责，今后通知开工业电话会，你们谁也不准参加！”想了想他又补充一句：“除李政委召开的以外……”眼下李政委正坐镇金牛坝亲自督阵大炼钢铁，三天两头把地、县头儿抓去开会呢。

这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 49 岁。

他是江西临川县人，1927 年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参军。到广东后曾任东江特委秘书长，1930 年到中央苏区，1931 年任红 35 军政委，长征时任中央直属纵队政治处主任。抗战时任八路军 120 师 358 旅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晋绥分局书记。

他和毛泽东首次相识于 1930 年，那时他在红四军前委作通讯联络工作，这对他的政治生涯至关重要。他第一次受挫是在领导晋绥区土改时，采取一系列极左政策，加之作风专横，引起晋绥区干部的普遍不满。毛泽东亲自出面做工作纠正错误，毛选第 4 卷中《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说的就是这回事。这次打击使他在任川西区党委书记时颇为谨慎。

1952 年恢复四川省建制，他做了省委书记兼省主席，老百姓叫他李主席，干部叫李政委，这是区别书记和副书记的尊称。1954 年 2 月西南局撤销，李政委手脚放得更开，从晋绥分局跟他南下的干部们发现，首长的老毛病似乎又犯了。

他个头矮小敦实，头发花白，有些驼背，看上去比年长 10 岁的李大章还老。操一口四川人很难听懂的江西老表话，写一手大个大个的字。他目无定睛，很少正眼看人，脸上难得出现笑容。无论多么轻松的场合，他一出现就鸦雀无声。训斥干部就象骂孩子，省委副书记也有被当众训斥的，对敢于和他作对的人具有惊人的记忆力。

1956 年 7 月第一届省党代会选举，初选，一名代表斗胆不投李政委的票，正式选举，李政委就少了 8 张选票。党代会结束，李政委把地县委书记们留下，花两天时间就这一重大事件端正态度。“敢不投李政委的票，太不象话了！”有人愤怒地表示；“肯定是穿凡尔丁衣服的人干的”，（作者注：建国初期实行供给制，四川厅局级以上干部发凡尔丁呢制服，此话意为高级干部所为）有人提供线索。

公安机关秘密侦察，首要目标是初选时带头造反的那个人。曾经怀疑到成都市长李宗林，取指纹和选票上的指纹核对，不象，案子就拖了下来。

在支撑他的地位的基石中，最粗重的一块就是粮食，而建国初期急于实现工业化的贫困岁月里，粮食几乎就是整个国家的基石。四川粮食第一大省的地位，是从抗日战争时期确立的。8 年抗战，四川提供军粮 240 亿斤以上，占国民党统治区三

分之一，从全国各地逃难来的人们惊奇地发现，天府之国真是名不虚传。1953 年到 1957 年，四川上交中央粮食 160 多亿斤，为全国商品粮第一大基地，其中 1957 年为最高峰，净调 58 亿多斤，相当于全国各地调交中央粮食总量的 37%。而同期全川农民的留粮水平和城市人口口粮标准都低于全国。（见《当代中国的四川》第 25、74、81、442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中央三分之一以上的粮食来自四川，这个政绩真是太显赫了，而李井泉在成都会议期间的精心接待，一定也给伟大领袖留下深刻印象。

毛泽东表扬说，四川的高级化，李井泉从容不迫，不慌不忙。全体到会人员合影时，他破例让李井泉坐在他的身边。一个多月后的八届五中全会，李井泉和柯庆施、谭震林一起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这在省委书记中是独一无二的，足见中央对四川和交粮有功的李井泉的看重。

这一来，李政委的形象就更加令人生畏了。

1958 年年底，种种不妙的迹象，尤其是粮食征购进展缓慢，使毛泽东觉查到出了问题。

11 月初，在郑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带领大家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批评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作法。“农民总还是农民”，他说，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不能要求一下子完成这个过程。接下来在武昌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上，他表示已经识破了下面的骗局，说现在横竖是放卫星，争名誉，管他假不假；只有 100 头猪，为了应付参观，就去借 200 头，看后送回。什么半年、一年扫盲我就不太相信；又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现在的严重问题，不仅是下面作假，而且我们都相信，从中央、地、县都相信，这就危险。“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也破除了。”“我有点恐慌，怕犯冒险主义错误。”他批转了云南省委一份反映一些地方发生肿病的材料，说我们对人民生活关心不够，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见毛泽东：《一个教训》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12 月 12 日，他又直截了当的作自我批评：北戴河会议，我犯了一个错误，想了 1070 万吨钢、人民公社、金门打炮三件事，别的事没想。

随后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他又批评有人头脑太热，可能跌筋头。全会对一哄而起，各显神通的人民公社加以规范，对北戴河会议规定的高指标稍加调整。

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一传达，曾笳手舞足蹈：“看吧，看这次中央八届六中全会是怎样分析？是反左还是反右？”得意之际，嘴巴又放炮，在电话会议上对县委书记们讲：“党对大跃进的成绩估计高了，人民公社办早了，大办钢铁要求急了，党犯了错误。”

八届六中全会是降温的，从武昌开会回来的李井泉却没有丝毫降温的迹象。12月底，省委在金牛坝召开地委书记会会议，布置 1959 年的更大跃进任务。地委书记宋文彬刚开了一天会就病了，通知曾箭代表地委参加会议。

关于宋文彬的这场病，大多数人认为是他不愿当面得罪李政委采取的一种回避手段。这年 40 岁的宋文彬的是从家乡山西离石县的农会干起，一步步走出来的。他 1938 年参加革命，1949 年南下之前已是地委书记。他是温江专区首任专员，1952 年贾启允走后即任书记。作为晋绥区的老干部，他对老上司李井泉的脾气颇为熟悉，后者也一直给他重用与信任。

他身材魁梧，相貌威严，工作勤奋，作风严谨。他从不跳舞，每天工作 16 小时以上。他的政治信条是“宁可犯政治错误，决不犯组织错误”。他对上面的指示说一不二，同时也要求下面对他的指示说一不二，如果有人打折扣，他就气得牙啮咬得咯嘣响，一支接一支猛抽着烟在屋里打转。自从放高产卫星开始，他担心的发现自己的看法和李政委有了分歧。对郫县的处理，显然已经引起李政委的不满，而地委反复调查的结果，又证明所有的万斤田都是假的。他既怕犯对上面的精神理解不透、贯彻不力的错误，也怕犯违背下面的实际情况生出乱子犯错误。说他称病回避的根据是，这次会上李井泉提出 1959 年全川要搞一千万亩万斤田，给温江专区下达的任务是 400 万亩！（作者注：宋文彬对此事的回忆是：“党中央郑州会议后，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同志来西南视察工作，李井泉同志陪同邓小平同志到贵州省视察工作，给省委打电话回来，要四川省 1959 年种亩产 1 万斤的水稻 1 千万亩，亩产五千斤的水稻多少万亩，亩产两千斤的水稻多少万亩，省委召开地、市、州委电话会议，省委书记、省长李大章同志进行了传达，具体布置我们温江地区亩产 1 万斤的水稻 400 万亩。”见宋文彬《〈我对原温江地区“大跃进”中的两个特殊问题的主要情况的交代〉》)。

宋文彬不敢表态，但曾箭这门大炮会作何反应他很清楚。曾箭赶到金牛坝，宋文彬神色凄凉地告诉他这个消息。曾箭头一下子大了：这不是大白天说梦话嘛！哪来的万斤田？所有的万斤田都是胡吹乱造，实际上千斤都上不了，全专区总共才 500 多万亩稻田，造假都弄不出 400 万亩万斤田啊！

“曾箭，你们的 400 万亩万斤田怎么样，能完成吗？”大会上，李井泉点名要温江专区表态。

曾箭回答：“400 万亩恐怕有问题。”

“你们郫县今年就出了那么多万斤田嘛。温江专区条件那么好，可以大面积推广嘛。”

“郫县的万斤田现在还不敢肯定，恐怕靠不住。”

“哦，你对郫县的万斤田还有怀疑？”

“恐怕有问题。”

李政委的脸红了，这是他发怒骂人的前奏。在场的全川各专区主要领导的心都悬起来了，谁都知道郫县是李政委一手栽培的样板，郫县的高产卫星名扬全国，曾箳竟敢在大会上当面否认，只一个“假”字未出口的而已！

李政委下令叫障县县委书记刘致台到会作证。

刘致台匆匆赶到后，李井泉指着曾箳对刘说：

“你说说，你们的万斤田到底有没有？曾箳怀疑是假的。”

“肯定是有的嘛。”刘致台说，接着他举出红光社的一块1万零600斤的万斤田。

李井泉接着问曾箳：“这怎么说呢？”

曾箳愤怒已极，郫县报告的万斤田，地委逐一调查核实全是假的，怎么又凭空生出一块来？他回答：

“这是个大问题，这块田有没有我们还要调查一下。”

李政委的脸再一次涨红了。全场一片死寂，等待着暴风骤雨的降临。

然而，李政委竟然平息下来，挥了挥手道：“好吧，那就算了，散会。”

李井泉真的相信有万斤田吗？也许任何一个当时有可能对他提出这个问题的人，都很难得到正面的回答。

对他来说，万斤田是个政治问题，而不是实际问题；不是真假有无的问题，而是该不该宣传的问题。对那些信誓旦旦吹牛撒谎的人，他看重的是 他们的“积极性”，根本没有想过要追究是否真有其事。他相信，高指标是迫使下面千方百计夺取高产的强大动力，指标越高，压力越大，干劲越大，要求 1 万，说不定就能干到 3 千 5 千，要求 1 千，就只有 5 百 8 百了。

这一套思路，来源于毛泽东的“两本帐” 的办法。与其说李井泉相信万斤田，不如说他太想让下面的干部群相信有万斤田。

如果曾箳就此罢休，这场风波也许就平息下去，他个人的命运也许不会象后来那样糟糕。可是曾箳难以理解李政委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良苦用心。一散会他就打电话给地委农工部长申培林，要他立即组织调查刘致台声称的那块万斤田，并特别嘱咐：不要找干部和“积极分子”了解，要找一般群众了解，他们一定做了应付调查的准备。

这是申培林很乐于做的事。为了避“一家之言”之嫌，他分别从宣传部、农业局、团委抽调了干部，考虑到郫县与地委的对立情绪，还特意安排一名刚从郫县调来的干部参加，组成一支七八人的工作组前往调查。

地委工作组前脚一到，消息就传到李政委耳朵里。省委副秘书长周颐赶快给曾箳通风报信：“老曾，听说你派人到郫县调查，你把李政委弄火了……”

深知李政委脾气的宋文彬发觉曾箳在点炸药包，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迫不及待地要把嗤嗤作响的导火索掐灭。他找到曾箳，告诉他赶快把工作组收回来。

曾箍不听："查清楚了就收。"宋说，"查清楚了不是和李政委唱对台戏，将李政委的军吗？" 曾箍还是不听。

宋文彬掉过头又去找刘致台，劝他去跟李政委说，那块田的产量我们再调查一下，"把问题缓和一下。"刘致台哭丧着脸说他不敢讲，他怕李政委。宋文彬急得眼泪都流出来了："那你不是逼我们地委作检讨吗？"

李井泉真的火了。当初他咽下那口气，是不愿意在会议上把矛盾激化，从而演变为一场证实谁是谁非的具体化的调查，这是他最没有把握，因而也最不愿意做的事。曾箍这一手，就把他逼到了墙脚。如果调查证明是假的，再让曾箍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拿到会上散布，不仅使他蒙受羞辱，而且直接影响高产指标的落实，他决不能容忍！

"他派人调查，我亲自去调查！"

他是这样调查的：他让刘致台通知县委有关干部到金牛坝面议。指示：过去报的卫星田，都被否定了，这块田一定要保！立即写材料，郑凤兰到大会介绍经验。

县上的几位干部绞尽脑汁的编造，县委办公室主任王春莲记录，苦熬一个通宵，署名第一书记郑凤兰的"红光社水稻亩产 10681 斤的经验"大功告成。郑凤兰拿着一份走上金牛坝礼堂讲台，四川日报总编拿着一份直奔编辑部。

曾经在报纸上大吹大擂的那些高产卫星都按下不表，单讲红光社"青年种植组"这块闻所未闻的卫星田。"这个产量是经过县委和我们乡党委核实，并且群众也一致认为产量是确实的。"经验生动、具体，考虑到了方方面面可能的质疑，充分显示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力。

这个田的处境，上无遮阴挡阳，下无沟渠，四周靠田，被围在当中，长方形，农民称之为"保肋田"（最好的田）。土质是大泥田，农民说："结上尖、出子头"，科学家称之为"千粒重"的意思。前期作物是黄油菜，4 月 27 日扯完菜子，5 月 6 日移栽秧子，8 月 24 日收割，青年种植组的成员 6 人都是共青团员。

毛泽东的著名比划也拿出来为这块万斤田撑腰。

他老人家指示我们，要小麦吊吊长 8 寸左右（毛主席当时是打的手势，约有 8 寸左右），油菜长一人高（也是打的手势），这对我们启发很大，也启发了青年种植组的同志们，他们马上把指标改为 3 千 5 百斤。以后又修改了两次，改成 5 千斤、7 千斤……每修改一次指标，就增添一次措施，不断革命，不断前进……总之，经验只有一条，听党的话。

郑凤兰继续念道，这块田她是亲眼所见的。

我自己亲自看过这块田，确实长的很好。社员们形容，密的来"麻雀飞不起来"。到收割时，谷子有些倒，但未倒下去。老农民说，这叫"牛吃草"的形式……

"这个田的产量是否正确呢？"郑凤兰问，她回答：

县上及我们乡上经过几次核对，群众认为是正确的，据社员说：那天一共只收了这块田，三亩打四千多个草，190 多挑谷子，50 多个社员，13 张拌桶，割、打、担整整闹了一天。

地委早就有言在先，所有的卫星田必须报地委，地委验收后才能确认。曾笳在会上一口咬定，这块田地委从未听说，更未验收，作何解释？原来他们非常的谦虚谨慎。

抽穗到测产，预计有 8 千斤，但又不敢说。说是“人怕老来穷，谷怕午时风”就没有往上报。……副乡长胡清泉同志去测产，说可以打到 8 千斤。那时候，大家还不大相信，预料不到可产 1 万斤或 8 千斤。……这块谷子收割以前，种植组的青年们用电话报告县团委书记，请去验收，他们说有事情，顾不上去，就这样耽误了，没有前去验收，只有社上、乡上的同志验收。收割完很久，我们自己没有去总结，也没有派人去总结。直到最近地委、县委对万斤亩的反复调查，才引起我们的重视，才派人去做了调查。

天哪，原来县上、乡上是“最近”，也就是打下的谷子都快吃完时，才发现这块万斤田的啊！郑凤兰面不改色：

如果我们思想解放得更彻底些，根本不止产 1 万斤。……去年这时，我们连 1 千斤也不敢承认，今年这时，我们大闹万斤，我们的经验也丰富了。18

郑凤兰话音一落，李政委带头鼓掌，各专区头头们鼓掌。曾笳不动手。

李井泉问：“曾笳，你说是真的还是假的？”

曾笳闷不作声，李再次追问。

曾笳还是那句话：“这个问题以后再说，这块田我们过去不晓得，有没有那么多还搞不清楚。”

这位政治局委员终于忍无可忍，他面色通红，声音发抖：“啊？你还不信？我们这个会场里有怀疑派，秋后算帐派！你——”他指着曾笳：“你要秋后算帐吗？”

曾笳想，信不信秋后算帐可以解决，可眼下冬至已过。

李政委真的上火了：

“谁不相信水稻一万斤，谁就不是共产党！”“亩产一万斤，是共产党的创造嘛！你不相信，你的党性到哪里去了？你居心不良!”

这个场面把宋文彬吓坏了，他离开座位上前对李井泉说：“需不需要我们地委做检讨？”

李没好气的说“不要”。在稍微平静了一下以后，他竟又冒出这样的话：“没有 1 万，也有五六千嘛，这是群众的积极性嘛……”

他对郑凤兰精确到每亩多少窝、每窝多少穗、每穗多少粒，多少粒一两计算出的产量，随口就打了四五成折扣，令台下的人有一种大彻大悟的感觉。李政委的用

意是要“瞒下”，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啊。

此时的宋文彬已经对李政委的用意心领神会。他知道曾箍这个漏子捅大了，他竟然逼着李政委提供伪证，而且不打自招承认是伪证。

总得搭个梯子让立在悬崖上的李政委下台啊。郑凤兰发言后的那天晚上，宋文彬和专员宫韫书找到曾箍，帮助他认识错误，以便第二天在大会上作检讨。

宋、宫刚说了几句，曾就顶了回去：“检讨？ 检讨什么？我说的哪点不是事实？”接下去就滔滔不绝的讲了一大通郫县如何弄虚作假的情况。宋、宫二人无言以对，他们何偿不知道曾箍讲的是事实。

三人相对无言、默然枯坐。熬到天快亮时，宋文彬终于憋出一句：“这恐怕是阶级问题。”这当然是说曾箍出身地主，阶级立场有问题；或者说是告诉曾箍，可以从阶级立场上作检讨。结果又给曾箍顶了回来：“万斤田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这和阶级有什么关系？”

这天早晨，省委副秘书长周颐给曾箍带来了好消息：“井泉同志说了，怕你思想不通，就不在大会上作检讨了。”

是啊，把曾箍逼到绝路上，他横下一条心继续捣乱如何收场？

郑凤兰在会上念的那篇胡编乱诌，满纸谎言的“经验”，第二天即 1959 年 1 月 5 日出现在四川日报头版。1 月 7 日四川日报发表社论，对以曾箍为代表的“算帐派”进行不点名批判。

在“少种高产多收”的洪流里，也还有算帐派。这种人尽管是个别的，但影响极坏。这种人不仅根本不相信今年会有一个更大的跃进，而且对去年的伟大成就，也抱着否定的态度。他们对于广大群众一年来辛勤劳动所取得的伟大成果，不但不加以赞扬、歌颂，反而站在群众之外，指手划脚，评头品足，吹毛求庇。他们甚至闭着眼睛，把去年个别地方估产不够准确——这个本来是难免的现象，当成虚假，企图以此来否定成绩。……你说不能高产，那就请你睁开眼睛看一看；红光人民公社水稻亩产 1 万多斤，不是高产又是什么？（见四川日报社论：《高举少种、高产、多收的红旗奋勇前进》1959 年 1 月 7 日 头版。）

事情越闹越大，申培林又来凑一把火，跑到金牛坝给曾箍报告调查结果，说郑凤兰吹的那块“保肋田”，实际上只收了 6 百多斤，曾箍问宋文彬听不听汇报，宋文彬气不打一处：“我不听，回去再扯！”

这理是没法讲了。宋文彬作检讨，承认地委对少种、高产、多收态度不坚定，缺乏信心，在帮助郫县纠正虚假现象时“急了一些”，对其成绩鼓励支持不够。曾箍也作了检讨，“承认”这不是真假问题，而是相不相信党和群众力量的“立场问题”，“感情问题”。

李政委也作了“让步”，省委给温江专区下达的万斤田指标从 400 万亩万斤田降

低到 140 万亩。

这个任务完不完得成，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各级手里都有秘而不宣的第二本帐、第三本帐，但是公开谁也不能讲，尤其对老百姓不能讲，以调动其积极性。

实际上,老百姓早就看穿了。正如他们对调查万斤田的地委工作组所言，“共产党是瞒下不瞒上”。

18、仗义执言

当金牛坝省委三级干部会议还在大肆宣扬郫县的高产卫星，下达数以千万亩的大面积高产指标时，一个事关肚皮的大事严酷地摆在人们面前——粮食征购出问题了。

根据层层虚报的产量，四川省 1958 年粮食产量达 960 亿斤，比 1957 年增产 1 倍以上。

省上据此下达了一个远远超过 1957 年的征购指标。然而到秋收结束，全省粮食入库实绩仅完成年度计划的三分之一，比去年同期还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和虚报浮夸粮食产量一样，征购中的弄虚作假开始出现。天哪，这可是吹不得的哟。

四川日报评论员文章赶紧指出：

“有些地区发现打白条、卖空仓、以少卖多，甚至不验质入库，开了凭单就算了事的现象。这些现象必须立即纠正。否则，今年入库的粮食将是一笔糊涂帐，不是库存无数，就是粮账不符。”

这是注定的。统购统销以来，粮食产量从来就是一笔糊涂帐，只有粮食征购从不含糊。1958 年的大跃进，这笔糊涂帐就做大了。不是人们算不来帐，是不准你算帐，否则就是“算帐派”，把你当“白旗”拔掉。那笔大糊涂帐是一面高高飘扬的大红旗，不允许受到任何怀疑和污染，下面就得一笔一笔把这笔帐凑齐，首先是把高征购的粮食凑齐，凑不齐脱不了手。万般无奈，人们只好在征购上做手脚，把入库粮食也搞成一笔糊涂帐。

温江专区 1958 年的大糊涂帐是 90 亿斤，省上下达的征购任务是 20 亿斤，比 1957 年增加将近 1 倍。经过讨价还价，实际派购 15 亿斤。在宋文彬看来，这是在排除浮夸成分后的保守数字，完成当没有问题。

然而问题大大的有。全区小春入库没有完成，早稻入库没有完成，大春入库才搞到一半，已经气息奄奄，一些县干脆停了下来，有的叫劳力缺乏，有的干脆就说无粮可交了。

怎么会没粮呢？宋文彬掰着指头给县委书记们算帐：把征购粮、社员口粮、种子粮、饲料粮、公社提留粮统统算上，离 90 亿的总产量还差一长截哪！

当然没有，事实上温江地区 1958 年的粮食产量仅比 1957 年略有增长，而增长部分主要是红苕等杂粮，主粮水稻有减无增。往年农民交征购后剩下的粮食仅能果腹，突然增加 50％的征购，从何而来？

农工部长申培林脑袋清醒得多。1958 年年底，他给长期在基层搞调查，反右中挨过批的农工部秘书燕征交待，要他下去参加一个大队的分配决算，把产量问题彻底搞清楚。燕征等人到温江柳江公社二大队调查结果，该大队 1958 年 1957 年减产 9％，完成征购任务后，社员所剩无几，现已有两个生产队食堂停伙。

心中有数的农工部长接着召集温江万春公社部分大队长、生产队长座谈产量问题。

一开始没人开腔。申培林就先说：你们往年的水稻产量亩产才几百斤，今年为啥一下就产了 1 千多斤？到底实在不实在？是不是大家认为今年是大跃进，产量不高，咋个说明得了大跃进？所以大家都争，都在争光荣，是不是这样的？你们应该老老实实说清楚，是多少就是多少。

说完，就先问三大队胡国良：“你现在还有库存粮食多少？”

胡回答：“不清楚，回去翻查才晓得。”

申很严肃的说：“你为啥不弄清楚？如果不把产量底子搞确实，迷迷糊糊，二天没有那么多粮食，社员没吃的咋个办？要知道农民三天不吃饭就要造反！”

摸清了申部长的虚实，大家就七嘴八舌吐真话了。

队长邓洪兴说：“我们报那个 1 千多斤的产量，是翻一番的跃进产量，实际才几百斤。”大队长周宗根说：“我们的产量硬是红旗产量，实际上我们的几个队只有一个队亩产 6 百多，其它都是 5 百多。”“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红旗产量，跃进产量。”……

座谈会后，申培林又组织几个会计辅导员翻查各队仓库，得出的结果是，把全部库存的粮食拿完也完不成征购任务。

申一一记下，对如何完成征购未置一辞。却在全公社大队以上干部会上说：“做工作要踏实，不能吹牛，象郫县的产量，那怕他在报纸上再登得多，要完成国家任务后，农民还有吃的，那才是对的。”（见《中共温江地委农工部副部长申培林同志错误言行材料》，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日。）

申把记下的这笔帐算给宋文彬听，宋表示怀疑，让他再去查查。当家人有当家人的难处，郫县的吹牛固然令他愤怒，但他也不愿正眼去看那笔大糊涂帐，他更担

心申培林之类的帐张扬开来，会引起普遍的抵制征购，那可是他吃罪不起的事。申看穿了宋的心思，也就按下不表。

领导干部有清醒、糊涂或装糊涂之分，一般干部则是敢说和不敢说的问题。这年月，说真话是要拿个人前途命运作抵押的，但就是有人敢于这样做。

张慎，崇庆县人，重庆勉仁学院毕业，解放初入党，温江地区农业局干部。1957年他在温江公平乡写了一本长篇调查报告，反映合作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被打成“内定右旅”，下放温江石牛公社劳改。痛恨右派分子的干部群众向他泼过粪水。但是他没有记仇，

当灾难降临到这些曾经凌辱过他的人们身上时，他用他已经比较灰暗的前途和命运再次抵押，向中共中央写信反映情况。

早在58年9月，他就向中央写信反映过温江地区虚报产量的情况，这封信是寄给人民日报转交的，大约被头脑热昏的编辑们扔到一边去了。

从年底开始，收不够粮食的各级重新抡起“反瞒产私分”的棍子，深知农民苦衷的张慎愤愤不平，1959年1月19日，又“鼓起勇气”写了第二封信。

最近一个月来，这个地区先后出现了公粮迟迟完不成任务的情况，一般是完成到70%左右就再上不去了，各种各样的会议开过了，仍然解决不了问题，……这是解放以来从没有发生过的现象。

他在信中说，据他的了解，有两个社去年亩产6百来斤，今年产量基本持平。但一个社去年的征购任务是20多万斤，今年是50万斤，一个社去年任务50万斤，今年是70多万斤。去年征购量占总产的53%，今年征购占总产的66%，征购后每亩余下的粮食仅有180斤左右。看来征购指标是高了。

他说，也许这两个社的情况是个别的，1958年确实大部份地区都丰收了，完不成是因为瞒了产，但他接着问道：

几年来我们对农民的教育工作难道白做了吗？难道农民的觉悟在公社化后反而降低了吗？为什么增产了反而完不成征购了呢？瞒产的粮食在哪里呢？公社化以前粮食分到社员家里，还有瞒的可能。现在分的粮食都放在集体的仓库里，社员吃食堂，粮食卖无地方卖，藏无地方藏，怎么瞒呢？

他写道，现在的基层干部很难办，上面一再告诫他们对大跃进“不能动摇”，谁说粮食不够，就是右倾思想，就会给党带来“政治上的损失”，于是只有尽可能把余下的粮食多吃一段时间，谁也不愿意当“出头鸟”。

不过我认为假如我们不正视现实，不去认真调查处理这些问题……那么损失不在于我们实事求是地处理了这件事，而损失正在于我们不敢正视它。正如一个社员说：“你们再冲壳子，再等十天就要现象！”

面临粮食征购不上来的可怕局面，温江地委从58年12月底开始，接二连三地

发出紧急通知进行催逼，执行的口径和报纸宣传上级的文件一样，首先必须肯定 1958 年是前所未有的大增产，不承认就是右倾、是政治立场问题。既然增了产，就应该完成增加了的征购任务。反过来，如果不完成征购，就是否定 58 年是增产，就是否定党的总路线、大跃进。

当初，在很大程度上把虚报浮夸视同儿戏的基层干部，这才发觉问题严重上当受骗了。“力争上游”原来是要拿粮食来兑现的！而且拿不出粮食的风险，比争不上上游更为凶险。除了横下一条心，把所有的粮食都交上去，他们别无选择。

28 岁的张慎摇动秃笔—— 他唯一的武器，开始写他的第三封信。

中央并转毛主席。前几天的来信想来收到，这两天情况又有发展。这个地区各地在总结 58 年大跃进成绩时把产量肯定起来，肯定的仍然是过去虚报的数字 1 千几百斤，产量定下来后接着是征购，写决心书、保证书，有的拿党籍作保证……完不清到大会上作交待，完清到大会上报喜，结果连种子口粮全部过称，还不够征购任务，要过关还须加上虚报才行。有的干部说，反正是脱不了手了，上完为原则，只要自己没有舞弊，随便怎样处理都可以，反正一颗谷子都没有了……

接着他说出当时许多善良百姓、正直干部苦苦思考的一个问题。“这种情况不知毛主席是否知道？”

人人都不敢向上说实话，怕一说就受到批判不划算，都在互相观望，拖一天算一天，吃稀饭，扣口粮，甚至全吃萝卜当顿，七八天不见米的情况也有出现。善于弄虚作假的人对上采用涂改单据的办法虚报完成任务，对下压缩社员口粮，受到表扬。实事求是报产量的受批判。

英明的党、英明的毛主席啊！

快快来澄清这个地区的情况吧，要不然在不会长的时间里，将会出现难以估计的损失——生产上的损失，不，政治上的损失！

今晚彻底未眠给您——亲爱的党再写这封信。

5 天以后的 1959 年 1 月 30 日，他再次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痛心疾首地呼吁：“一些人为了廉价的荣誉。竟连群众的起码要求：吃饱饭也不顾及”，要求中央立即派出检查组，加以“澄清、制裁”。“眼看开春以后就要播种，现在种子交了如何播种？”

他写道，有一个中队长受了批判服毒自杀，送到医院抢救，队上群众络绎不绝地去看他，说他是为了大家才落到这般田地的，可见“这样拖的时间越久，对我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损失就越大”。他再次对上头谍谍不休的所谓“瞒产私分”的问题加以反驳：

公共食堂建立时，群众欢欣鼓舞，许多地方都出现过交出私人存粮的事，说明群众对党的信任，对公共食堂的信任，对吃饭问题也很“放心”。而且现在社员家里

的灶都几乎全部打光，社员以食堂重新规划居住点，一部份院子已经迁光，集中并入几个院子居住，迁来迁去也没发现什么粮食，瞒产私分的可能性究竟还有多大呢？

他最后写道：

迫切最严重的问题，……因此，我决定第三次向中央反映这种情况，并盼中央迅速来。这种看法和这种情况的反映现在被看成右倾思想的典型，甚至还会有比这更严重的“分折”，因此我没有勇气向领导上直言。但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件关系到党和群众最调查澄清……。

中央办公厅将张慎的三封信转到四川省委，省委办公厅秘书处原信抄出供省委领导参阅，并写了一段提要：

化名“直言”者寄给党中央写信，反映温江地区 58 年粮食增产有虚假现象，今年公粮完不成，口粮不够吃。他认为，58 年全区最多平均只收 700 斤，说成 1 千斤，这是上面硬报的，不然为什么现在征购完不成，口粮不够？现将原信抄出，请参阅。

一周以后，省委又将原件打印转温江地委，所作的批示口气就大不相同了。

温江地委:

现将化名“直言”寄给党中央的信转给你们。这封信上所讲的，可能不是外面人的意见而是我们内部反对者的意见。因此，请你们将这封匿名信印发各县委，结合去年粮食增产情况和目前还不完成公粮征购情况进行讨论。这是一场思想斗争，是有一定代表性的，不能简单一看了之。

中共四川省委

1959 年 2 月 20 日

省委（或者说省委主要领导）在“增产”和征购问题上的敏感，对内部反对意见之警觉，已经到了神经质的地步。

事实上，从 1958 年底以来，随着毛泽东在一些问题上开始清醒，1959 年初的政治气候已有微妙的变化，张慎在信中反复提到的中央八届六中全会是一个明显的标志。稍有政治头脑的干部都注意到了这个变化，原来不敢讲真话的略为一振；原来贯于说假话的神经变得脆弱，一有风吹草动，就象听到巴甫罗夫的铃声一样猛扑过去。

19、一级哄一级，农民哄肚皮

整整一个冬季，潮湿、阴冷的川西坝子充斥着交粮的催促声，地委机关所在的刘家大院里，没日没夜不是地委常委会就是县委书记会，十万火急的通知如雪片漫天飞舞，各级工作组在乡间小道、田埂农舍窜来窜去。走投无路的社队干部要么阳奉阴违，开会赌咒发誓，散会不见下文；要么破罐破摔，交光了事，哪黑哪歇；要么东躲西藏，踪影杳无。被虚报的产量冲昏了头的领导机关却认定粮食收不上来，是被农民隐瞒私分掉了，使尽种种手段进行催逼。

大邑安仁公社(即后来闻名全国的大地主刘文彩的故乡)是个有 2 万多人的公社，人均稻田 1.2 亩，1958 年实际亩产 5 百多斤。而征购任务人均 500 斤，亩均 414 斤，征购任务占到产量的四分之三。大春收获以后，经过几个月的催收，到 1959 年 2 月，几乎所有的粮食搜刮一空，仍然完不成征购任务。

有的农民为了生存，不得不将为数可怜的一点粮食藏匿转移，被搜出来后，又被作为“粮食确实是有”的铁证。瓦窑管区社员郄元甫在月黑风高之夜，把半口袋米放到崇庆县地界的一个草堆里，被那边的人发现拿去吃了，却不敢声张，悄悄找到那边的队干部说：“米我不要了，把口袋还给我。”

郄元甫之所以吃哑巴亏，是怕担私藏粮食的罪名，其罪大恶极，简直就和私藏武器图谋造反差不多。但郄元甫因为舍不得一只口袋，走漏了风声，就被拉到会上斗争，死活要他吐出究竟还藏了多少粮食。

聪明一点的自认倒霉，7 中队社员挖坟积肥，挖出一罐子粮食，工作组干部认为发现重大线索，宣布：谁埋的谁领回去，不予处罚，试图放长线钓大鱼。不见鱼儿上钩，又布置各队干部“必须找到藏粮的人”。

这些零零星星的蜘蛛马迹，在一些干部头脑中勾画出一个巨大的地下粮库，它是由那些对国家粮食征购充满敌意的基层干部营建，由农民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淹没着的。

县委接连召开大会，批斗完不成征购任务的社队干部，勒令突击“就地入库”完成征购。此举大见成效，几天之内，大部分没完成征购的队都“扫清”了。如此“大干”一下，果然成效显著，看来窝藏属实。实际纯属自欺欺人。全部决窍出在“就地入库”四个字上。已经吃够说假话苦头的基层干部，再一次在高压之下作假，假得更加荒诞离奇。

“就地入库”的方案，源于“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焦虑。

1958 年秋收时节，人民日报就在大肆宣传抢修仓库，以存放成倍增加的粮食。其时就有在国家粮仓堆放不下的情况下，将征购粮食就地存放在社、队以至社员家中的方案提出。川西坝子包括周边山区，当时交通运输条件极差，运送公粮几乎全靠肩挑手推，须花费大量劳力。1958 年底劳动力极度紧缺，从解决劳力不足的矛盾看，“就地入库”似乎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这是一个钻空子的绝好机会。到国家仓库交粮，要经过粮食部门严格的过称、验收；“就地入库”则由社、队自收自验自报，然后由粮食部门派人来验收。于是五花八门的作假手段应时而生。

广为流行的办法是造假仓，先在仓房里堆满谷草之类，面上盖一层谷子，谎称有多少斤，应付粮食部门和上级检查。 另一种是称“转转粮”，其法如戏台子上演曹孟德“百万大军下江南”，几个兵兵将将前台后台轮番打转一样，前面将粮食过称后，转一个圈又从后门挑进仓库，如此“转转”不已，如果不被发现，要多少粮食都给你称得出来。

除了国家征购，还有“群众生活”，这也是上级十分关心并需要检查落实的。为了证明口粮充足，公共食堂有米下炊，人民公社无比优越，也要采取诸如此类的手法，眼睁睁地哄自己的肚皮。

安仁乡(公社)的征购任务，就这样在短短几天之内大部分“扫清”。

岂止是安仁乡，全地区所有的地方都抓住就地入库这根救命稻草，玩起又一轮弄虚作假的把戏， 以应付泰山压顶般的征购任务。没有发现这个卯窍，或者不愿昧良心作假的，连口粮种子都交完，也完不成征购任务；作假的“完成”了征购，自己还有点可吃，于是到处都出现一个怪现象：“闹粮的都没完成征购，完成征购的反而不闹。”

对就地入库的把戏，很难说地县一级的领导都蒙在鼓里。

事实上，有关就地入库中弄虚作假的情况一开始就不断有人揭露和反映，但上面的反应相当“迟钝”。在很大程度上“就地入库”何偿不是他们的救命稻草呢？他们同下面有共同的难言之隐，过于认真，下面完不成，怎么向上面交差？不如睁只眼闭只眼图个一时敷衍。万一今后兑不了现东窗事发，还有朝下面一推了之的退路。

彭县县委女书记樊希平带人下去检查就地入库，走了一圈，干部们叽叽喳喳议论仓库是假的，樊打招呼：到此为止，回县上谁也不准再讲！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看得这么穿。

下放到崇庆县大划公社任党委书记的县委组织部长魏立民发现，全社的征购工作完成到 70％左右时便“走不动了”。

1959 年 1 月，他顶着寒风，步行到全社各管理区逐一调查，将现存的口粮、种

子、饲料粮逐一过称登记，算下来全社粮食与原报的足足有 400 万斤的差距，虚报的产量除去超额的征购，落到农民口中的粮食所剩无几。公共食堂的现状更令他触目惊心，春节还未到，农民碗里已是清汤寡水的菜稀饭，或是粒米不见的红萝卜。这是一马平川、土肥水美的天府之国啊！联想到几年前这里爆发的“脚肿病”，他不寒而粟。

回到公社，他立即给县委第一书记许锐挂电话说，粮食征购已经过头，食堂已是停伙或半停伙状态，干部压力大，半夜都在说梦话，“天哪，完不成咋个整啊”，希望减少征购任务。

回答是“不！”

这位堂堂的男子汉哭了：“我是个共产党员，党的任务完成不好我有责任，但完成了群众生活怎么办，怎么办啊？……”

思虑再三他横下一条心。他这样想：“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我也是冲着这个参加党的，难道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可以是两回事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我想我无愧于党。”于是,他在公社干部会上宣布：“把口粮打紧一点，征购任务完成多少算多少！”

县委书记庞汉元下来检查，他明说：“任务是完不成了，不然你们就把我调回去。”

直言不讳也罢，遮遮掩掩半真半假也罢，造假仓，称转转粮也罢，几乎所有的县都开始在 1958 年的产量上打折扣，以此为完不成征购开脱，为返还粮食寻找根据。唯有郫县立场坚定，不承认产量有任何虚报不实之处，不承认群众有缺粮断炊之虞，不承认征购有完不成的危险，不承认他们的“就地入库”有任何弄虚作假。

换句话，郫县的情况是生产大丰收，征购全完成，群众吃得饱，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巨大优越性体现得淋漓尽致。

然而有人硬要在这幅大红罩子上戳洞。这次问题出在内部，带头的是本地农民出身的粮食局长叶成章。

粮食部门的工作性质使他们来不得半点虚假，他们的工作性质如同出纳，收多少就得支多少，收支不符则为贪污，谁能担戴得起这个弥天大罪？任你牛皮吹得太阳从西边升起，他们必须收一斤算一斤。

就地入库的把戏耍开以后，粮食部门同上上下下的矛盾立刻尖锐起来，各县普遍出现公社、县委一个帐，粮食部门一个帐，互不承认的情况。知趣点的，大家麻麻杂杂，你不逼我认帐，我也不揭你老底，反正到处都是 “两本帐”，说得过去就说，说不过去再说。偏偏郫县容不得有半点说不过去的地方，要逼粮食部门认帐；偏偏郫县县委的帐又和粮食部门的帐差得最远，又有个油盐不进的粮食局长，事情就闹大了。

据郫县粮食部门的统计，全县从小春开始就没有完成分配的征购任务，特别是

县委(也是省委)的大红旗红光公社进展最慢。整个大放卫星的秋收，征购实绩实在凄凉。这一年，郫县征购任务 1.4 亿斤(不含崇宁)，到 12 月底仅完成 6 千多万斤，还有大半没有着落。而红光公社尤其糟糕，6 千多万斤的征购任务只完成 30％，尚差 4 千多万斤。

粮食部门考虑到下面劳动力确实紧张；专门在农村设立 38 个就近收购点，又沿公路设立随征随调的若干收购点，以减轻农民交粮负担。应该说如此一来，完全没有必要搞什么就地入库，因为粮食部门的收购点，就在附近，也不用操心什么装不装得下的问题。

叶成章这一手，实际上已经堵住了就地入库的借口。然而县委却不愿放弃这个漏洞，就在入库工作几乎陷于停顿之时，县委突然以劳力不够为由，提出搞就地入库，“这样全县便普遍开花每个大队收起粮食来了。”

1959 年 1 月 20 日，县上召开催收粮食的“整社大会”，形式和上面讲到的大邑县安仁乡一样，会开到半截，各乡回去突击入库。4 天后，即有永定、安靖等乡到会“报捷”，接着犀浦也报基本完成。可是粮食部门设在这些乡的收购点根本没收到粮食。

粮食部门在国家仓库和农村设点收不到粮食，公社却报就地入库完成了任务，怎么办呢？粮食部门只有根据各乡向县委报的就地入库数字到社队查仓查粮。

一查就漏馅。叶成章到红光公社团结乡查出的结果是：“用谷草、拌桶、晒席把底层坝得很高，上面装一层粮食，划一些假的过称码单，即报有多少万斤粮食。”粮食局不断向县委反映诸如此类的情况，“县委一直不表示态度。”

你不表态，咱们就各报各的帐。一开会汇报征购工作，叶成章就掏出本子报告：粮食局统计，已完成多少万斤；各公社自报，已完成多少万斤。县上如此，到专区开会照样如此。县上催他给就地入库办粮食部门手续，他说行，我们亲自去称，有多少办多少。县委书记高义禄找他“个别谈话”，说你把公社报的数字认了，今后出了问题，县委给你们承担。他还是那句话：“我们过了称才算数。”

要想在这位一丝不苟的粮食局长手头蒙混过关真是太难了，况且他又得到地委的支持。县委第一书记刘致台一再在地委召开的会上申明，公社上报的就地入库数字“是有根据的”，粮食部门拿出的数据小，主要问题在粮食部门，却得不到什么支持。

专区粮食局长商鸿仪公开支持自己的部下，主管征购的地委书记曹少克只认粮食局报的数字，事情就这么僵着。

如果郫县采取其它一些县的做法，不怕脸上无光，在大糊涂帐上退缩，也出不了什么大麻烦。但是意气风发的郫县不能这样，他们不能容忍一个小小的粮食局长给郫县抹黑，给大红大紫的红光公社抹黑，让观潮派算帐派抓把柄看笑话。于是想办法嫁祸于粮食部门。

祸水是怎么泼到粮食部门头上的呢？

从 1956 年开始，郫县粮食部门开始采用“二联单”的入库记帐凭据制度。合作社的人交粮到国家粮库，由粮库开具一式二联的入库划码单，交粮人员收一联，粮库收一联，作为核算凭据。

公社化初期，郫县县人委据此发出文件，规定粮食入库由原来合作社与粮食部门结算，变成以公社为单位和粮食部门结算。于是入库程序变为这样：合作社(公社化后为生产队)把粮食交到粮库，粮库仍然开具一式二联的划码单，粮库留一联，另一联不是给交粮的合作社，而是归总后交公社派驻仓库的“财粮员”结算，合作社自己反而没有入库凭据了。

问题就出在这里。

合作社交了粮食拿不到入库凭据，但他们手头有份自己填记的划码单，这是他们唯一的交粮“凭证”。从法律的角度讲，它是无效的，然而从逻辑上却不能完全推翻它。我交了粮没有？你不能回答没有；你给了我凭据吗？没有；你不给凭据，我这里有凭据，你算你的，我算我的。这不生出事非来了么？

这是共产风造成的财务手续不清的一个典型。

尽管如此，如果不是蓄意制造混乱，澄清事非并不为难。因为交粮时那份一式二联的划码单，是由合作社交粮人员与仓库收粮人员共同填写的，粮食部门开具给公社的入库凭据，都附有各合作社的入库划码单，粮食部门与结算单位(公社)的手续是健全的，数字是清楚的。

然而，就是有人要蓄意捣乱。

从 1959 年 1 月下旬到 2 月上旬，全县各公社都在连更宵夜的制造假帐。他们利用交粮人员没有拿到入库凭据，只有自划的码单的空子，把凭空胡编的合作社交粮划码单拼凑起来，并让社员签名，大部分公社一夜之间就把征购的巨大差额填补无缺。发动社员签名是一件颇得人心的事，对被超额征购压得喘不过气的合作社及社员来说，如果有上面支持，他们是很乐意这样做的。

从造假仓的“就地入库”，到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做假帐，而且是全县性的，叶成章忍无可忍，他告诉县委，不能作数！回答是：为什么你们的数字才这么多？主要是你们右倾思想在作怪，我们的数字是完成了任务的，你们不承认我们承认，你安心将县委的军，与县委作对，要报就报我们的数字，不报就不准报！等数字搞清楚再报。

叶成章要的就是这句话。他组织全县各乡财粮员和粮站收粮会计在县上集中对帐，结果不言自明：粮食部门的统计数字准确无误。

这一次，叶成章聪明了，他要各公社总支书记签字盖章，表示核对无误，以防今后翻案。所有的总支书记都照办了，唯独红光公社各乡总支书记（公社化后一般

是一乡一社，红光公社是数乡一社的超级大社）矢口抵赖，死不签字。

就象曾笳在金牛坝把李政委逼到墙角一样，叶成章把县委逼到了墙角，迫使其撕破一切面具。县委领导在各公社总支书记会上对签字盖章的总支书记严训斥训斥："你们就相信才完成哪么一点数字吗？为什么那么轻易就盖了章呢？58 年大跃进的成绩哪里去了！"

这一骂，让总支书记们长出了一口气。他们原以为查帐是要动真的，在事实面前不得不认帐。既然有县委撑腰，他们怕什么？于是群起翻案，什么黑纸白字，神圣公章统统不认了。（见叶成章：《对刘致台同志五八年在郫县粮食工作上的态度和问题的揭发》，一九六四年十月。）

叶成章万万没有料到，所谓查帐竟是如此结局。不过到此为止，他也象崇庆县委组织部长魏立民那样横下一条心，他倒要看看，这几千万斤粮食能否从天上掉下来。

看来还是红光公社胸有成竹，与县委息息相通，硬不向事实投降。不仅如此，在这次对帐开始的前几天，县委和红光公社已经在毛泽东视查过的红光社搞了一份报告，题为："红光社 58 年水稻增产收入、支出核实报告"，作为向叶成章之流"怀疑派、反对派"展开反击的重磅炮弹。这份广为散发的材料试图证明，红光社 1958 年水稻平均亩产 1598 斤是"铁的事实"。且看他们如何把这笔大糊涂帐做平。

两个多月前，社长周桂林带去北京的那份材料明明白白写着，红光社 1958 年"粮食 亩产 3716 斤，总产 1900 多万斤。"而且标题就叫《1 千 9 百多万斤粮食是按毛主席当面指示放出来的大红光》。现在，又变成了"水稻"亩产 1598 斤，总产 1090 万斤，小小一个躲闪，800 多万斤粮食就不见了。

不动声色先砍下一刀后，报告申明，58 年确实是解放以来增产最多、最大的一年，"盘古至今没有过这样的好收成，这是百分之百的社员承认的事实。"

但有的社员有顾虑："产量是我们向上报的，现在数目扣不起，拿不出那样多，怕脱不倒手，非常心焦。"

社员心焦的是粮食交完了吃什么，怕"数目扣不起"而"非常心焦"的是靠弄虚作假捞好处的人，为此，他们开列出下列清单：

交纳国家公粮，统购 325 万斤。

办食堂前后社员分回家去 53 万余斤，人均 137 斤。办食堂 168 天吃 147 万斤，人平 1 天 1.57 斤。

外来人员吃 5 万余斤。

猪吃 86 万余斤，其中保管不好霉烂 22 万斤。

突击、熬夜吃去 3 万余斤。

换胡豆、还种 43 万余斤。

留种 32 万余斤。

留口粮 48 万余斤。

半米谷子 48 万余斤。

1961 年红光社浮夸问题被揭露后，查实 1958 年的水稻亩产只有 5 百多斤，仅仅 是虚报数的三分之一。可见上述开支，每一项都是值得怀疑的。连风筛下的“半米谷子”都凑了数，可见其煞费苦心。尽管如此，按上列开支，每亩也只凑到 1178 斤，“与上报的 1598 斤差 420 斤”。

悬殊这样大的问题，我们反复进行讨论，群众中了解，召集各家座谈，共同的答复是：谷子长得好的很，增产硬是多，上报产量是实在的，没有虚报，为什么悬殊这样大呢？

报告回答，因为“毛谷子水分重”，收中稻时下雨，“谷衣子(即谷叶)特别多，特别重”，“霉烂严重”。如此交待了每亩 420 斤的差额后，“我们思想上放下了一个包袱”，事实证明“亩产 1598 斤确实是事实”。

胡编乱造的种种开支，加上虚报的征购，留粮的假仓，风掉的瘪壳，谷草，水，巨额的霉烂，终于将大糊涂帐摆平了。

郫县县委据此发出一份宣言：

红光社——永远是一面红旗。

怀疑派硬说 58 年不是大丰收，红光社让水稻亩产 1598 斤的铁的事实，给了反对派一个响亮的耳光。

红光社真正是一个好社。第一、征购超额完成的好；第二、生活安排的好；第 三、群众生产搞的很好，那些怀疑征购完不成，生活搞不好，59 年不能更大跃进的种 种谬论，应当从这个事实中清醒过来。

共产党员们、共青团员们、全体社干同志们：县委号召你们学习红光社，争取当个三好社。

告诉你吧怀疑派、反对派，你们的算盘打错了，你们的诡计永远破产了。

红光社的全体社干社员同志们，祝你们继续鼓足干劲，争取更大跃进，永远是一面红旗。

中共郫县县委

1959 年 2 月 22 日

1958 年，温江地区粮食征购实绩为 12 亿多斤，比 1957 年增长 16％，大大低于最初计划增长 1 倍的要求。不过，达到这个数字已经够艰难了，至少多征购的将近两亿斤，完全是从农民口中掏出来的口粮。

第 三 章　走向深渊

20、子虚乌有的“瞒产私分”

1959 年春节过后，成都市郊的场镇和市区的大街小巷涌入大批乡下人，他们不是象往年那样来城里看热闹和购物，也不是提着土特产来城里走亲戚。他们两手空空，一窝蜂地扑向餐馆、糖果店、农付产品市场等一切有现成食品出售的地方，掏出兜里所有的钱猛买猛吃，末了还大包小包的带走。

这是 1954 年那一幕的重演，只是规模更大，来势更猛，可供农民裹腹的选择余地更小。公社化以后，自留地没收，一切农副产品归公、农民的生命系于公共食堂，除此之外，他们唯一的生路就是进城买东西吃了。

城里也今非昔比。粮食是钱买不到的，城镇人口凭户、购粮证、粮票定量购粮，标准已经降到饿不死的地步。但眼下餐馆吃饭不用粮票，当然也决无美味佳肴，一律的米饭加大锅菜，没有肉食，只许吃，不许带走。糖果店里可以买到糕点——掉在地上也摔不烂的面饼、瓦块似的饼干，都是用糖精做的。能买到的含淀粉的食品还有称之为“肥儿粉”的婴儿米粉，凉粉。上述一切都是限量供应，卖完收摊关门。

即使如此，那时候到城里吃馆子、买糕点对农民尚属奢侈行为，一般情况鲜有问津，突然之间，他们在餐馆、糖果店门口排起长龙，肥儿粉、凉粉一上市便被抢购一光。一个可怕的消息在大街小巷的窃窃私语中传播开来：农民没吃的了！

在农业大丰收，共产主义指日可待的鼓噪声中，这种场面实在有碍观瞻，有损大局。阶级斗争嗅觉灵敏的人，又发现了敌人阶级煽动，企图给大跃进、人民公社抹黑、破坏生产等等。然而在 1959 年开始有限纠左的政治气候下，大多数人不这么认为，省委、地委均派出工作组，到成都市周边各县调查，结果证明，农民确实没吃的了。

双流至成都的公路上人流滚滚，尤如赶场一般，全是到成都吃饭抢购食品的，有携家带口的，也有基层干部带领成群结队的。

工作组走访了离成都市 10 多公里的簇桥、金花两个公社，每到一处，立即被群

众团团围住，哭的哭、骂的骂，诉苦不迭。工作组问他们有没有米吃，能否吃饱？众人七嘴八舌：“尽是吃菜，有米？象点眼药一样！”“昨天一人分了几两豆渣，够啥子嘛。”“我们这些老头儿进不了城，死了当柴烧！”“饭都没吃饱，那有劲搞生产，前天我担尿水摔到沟头。”

…………

（见四川省委工作组：《关于了解双流簇桥、金花人民公社生产生活情况的汇报》，1959 年 3 月 13 日）。

工作组“参观”的 8 个食堂，不是“断米停火”，就是“断米未停火”。其中断米时间最长的一个 380 人的食堂，从年初至 3 月近百天的时间里只吃过稀饭 3 次，其余尽吃青菜萝卜。断米停火的食堂“有菜有米就分给社员，没有就让社员自行解决”。断米未停火的食堂“春节以后一直以蔬菜、野菜为食。”

农民有几个钱到城里去“奢侈”呢？于是不得不变卖家产。“将自己的床、桌、椅、箱子、黄桶等打碎作木柴卖，有的还卖了自己的蚊帐。”妇女杨淑华将蚊帐拿到成都卖了 2 元 8 角，向城里人买了 7 斤高价米(二角五一斤，当时国家价为一角二)，“剩下的钱吃了一顿饭就花光了。”

下饭馆不光是为了自己吃，更多的人是为了买到米饭带回家里。这种行为是违反“只准吃，不准带出堂”的规定的，不得不偷偷摸摸进行。3 营 9 连（作者注：公社化后的军事化编制）的周大娘把床卖了 3 元 3 角，在饭馆买了 6 碗饭，自己舍不得吃，全部偷偷倒在围腰里带回给孩子吃。

省委财贸部工作组在新都县调查的情况是，全县 1958 年征购比 1957 年高出将近二分之一，春节过后食堂陆续停伙。马家公社的 50 个食堂，吃 3 顿的 1 个，吃两顿的 16 个，吃 1 顿的 21 个，未开伙的 21 个。“开伙的大部分吃青菜、油菜苔、苕菜、红萝卜等。”

情况糟糕到如此地步，如果不是直接到基层找群众调查，什么都休想知道。从报纸、广播到各级领导的文件、汇报，农民还在食堂里“放开肚皮”大吃大喝呢，实际上那个短暂的幸福时光早已过去，眼下他们的日子正以一天等于 20 年的速度滑落。而饱受政治运动惊吓的当地干部极少敢在上级工作面前吐露真情，只能信口雌黄。

汇报情况双流簇桥公社书记说成群结队到成都去的社员是“卖柴搞副业”，停伙的食堂是因为“社员把粮食分回去自己吃”。双流县县长目光更敏锐，说停伙的食堂是因为怕把粮食调剂走，把粮食“转移、埋伏”了，并举例说簇桥某小社转移了 3 万斤黄谷到加工厂，某小社将几万斤红苕埋到地里，上面栽厚皮菜掩盖，县上正在开会批判“本位主义”，“对个别坏分子准备打击”云云。

类似的情况哪里都一样。

工作组来到华阳白家公社的一个食堂，发现煮中饭时，151 人吃饭只煮了 20 斤米，其余全是菜。炊事员说，这顿饭都是做来给你们看的，平时一顿只煮两三斤米，一人两瓢儿，米都见不到。说话间 20 多个男女老幼围了上来诉苦：“干部吃干饭，我们就吃这种菜汤汤”，“娃儿饿得拉倒妈妈要吃饭，喊他们咋个长身体啊！”说着妇女们全都哭了。

背着孩子的妇女杜秀英从屋里揣出半盆菜汤，哭着问：“我们一天吃这么多够不够？半岁娃儿光吃菜行不行？”

工作组干部安慰说，这些情况上面不了解，了解了会解决的。杜秀英泪水涟涟地说：“毛主席是对的，粮食是给我们配够了的，就是他们(指干部)不拿给我们吃，每顿吃两瓢儿菜汤汤，锄头都拿不起，哪有劲搞生产。我背上这个半岁大的娃儿吃不下，请队长给点米拿回去煮，队长都不批。”

她当即掏出那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写着她断了奶水，娃儿又吃不下菜，请求给 5 斤米给娃儿煮稀饭，要工作组“盖章证明”。工作组爱莫能助。

因为是贫农出身，爱人又是党员，杜秀英才敢在工作组面前直言不讳说这么多。大部分社员则左顾右盼，欲言又止。

一个女社员刚说了一句，他男人便骂道：“你多事，人家都过得出来，你管这些事干啥？他们问了就走了，二天总要把你整惨！”

工作组走出食堂，4 名妇女尾随而至，见四下无人，说：“杨队长跟我们说了的，检查团来了要说每天吃三顿干饭，每顿三菜一汤，哪个乱说割他的耳朵。还说有困难大家克服，为啥子他天天吃干饭呢？”

一个 60 多岁的老太婆神秘兮兮地把工作组干部拉到屋里，一开腔就泣不成声：“社里叫我搞生产，我这么大岁数了，肚子又饿，咋个做得动”，又指着她 3 岁的小外甥说“娃儿一天拉倒衣服要饭吃……”工作组问吃不饱怎么办，妇女们说，有的捡点草药卖给供销社，有的弄点柴去卖，卖了钱就在成都吃饭，买肥儿粉、面包、带点回来给娃儿吃。

工作组转身找到干部，听到的完全两样。管区会计说，我们的食堂没停过伙，主要劳力每月 40 斤米，妇女 30 斤，每天两顿干饭，吃得好，吃得饱，“有的还拿给亲戚朋友吃”。到成都吃饭的现象，“可能是坏人钻空子”。

公社党委书记杜金元对为啥尽吃菜稀饭的解释是：“凡是吃稀饭的，都是社员要求的，因为他们喜欢吃稀饭。”谈到社员到成都吃东西的情况，杜一口否认：“这种情况不会有，我们还未发现，如果有恐怕是个别坏人，或富裕中农从中破坏，”县委办公室主任杨绍勋干脆说“我们还未掌握到这种情况”。[3]

不论形势多么严峻，所有的干部，不论真心或违心，对外的口径都是一致的：58 年的粮食是大丰收，目前出现的缺粮现象是一种假象，是农民自私自利的思想作

怪和坏人挑动，他们装穷叫苦，把粮食隐藏起来，怕增加征购，怕被“共产”，有的则是跟着起哄。藏匿粮食偷偷煮食的确存在，任何面临饥饿威胁人都会有这样的行为动机，然而它被夸大到戏剧化的程度。

如此普遍的饥荒爆发得如此之早，乍一看的确有些反常。拿温江专区来讲，即使考虑到高征购的因素，也不至于一开年就停伙断粮啊，粮食都到哪去了呢？

相当一部分粮食是被共产风卷走的。公社化以前分粮到户，自家开伙时，人人精打细算，唯恐吃多了接不上趟。粮食不够好好歹歹也要过下去，何时吃干，何时吃稀，何时瓜菜代之，各家心头有个打米碗，不必政府操心。一旦进了“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的公共食堂，心态顿时逆转，唯恐吃少了吃亏。有史以来，中国农民没有如此憨吃憨胀过。本来就紧张得要命的粮食，经得住这样几吃呢。当人们发现仓库已经见底，而共产主义似乎越来越遥远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

华阳中和乡朝阳 4 社就是这样被迅速吃“垮”的。

公共食堂吃粮，从开支上大体可分为 4 个阶段：第一阶段公社建立前，开始收中稻时约一个月，那时只吃三顿，大小人平均一斤米。第二阶段，大战四秋时约 50 天，公社让社员敞开肚子吃，……每天吃四顿大米饭，平均每人每天耗大米 1 斤半还多。第三阶段：从 58 年 12 月到 59 年 1 月底，这段时间晚上加班少了，一般吃三顿，同时用粮也有点计划，但仍是三顿干饭，平均每人每日吃大米 1 斤 2 两左右。第四阶段：从 2 月份开始，由于粮食少了，开始定额定量，每人每天大米 12 两。最近几天(3 月上旬)每日定量已降到 4 两了。……

被共产风卷走的粮食还很多。公社建立初期，粮食的余缺由公社在全社范围内随意“调剂”，甚至由上级跨公社“调剂”，数百数千人的生产兵团运动作战，象蝗虫一般走到哪吃到哪，所到生产队食堂损失惨重。机关干部、工厂工人、学生等组成的检查团、参观团、支农大军也在这块残缺的饼子上补上一口，动辄数百千人的现场会，誓师会、评比会让“先进单位”的粮食大遭其殃。人数众多的脱产文工团、体育队、武装民兵、红专学校在吃粮，修路开矿，大炼钢铁调人又调粮，……有多少粮食住得住这么折腾？

公社化的前景固然诱人，尚不足以根除农民世世代代积淀下的防患于未然的心理，只要有可能，他们多半还是偷偷摸摸藏下一点粮食，这些粮食是公社化以前分粮到户时积攒下，公社化时又没全部交出去的，数量极其有限。眼看势头不妙，一些有心计的基层干部也想留一手，或是有组织地隐藏一些粮食，或是分一部分粮食给社员，这就是当时喧嚷如雷的所谓“瞒产私分”。

毛泽东是相信农民把粮食藏起来了的，“谢谢几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他说，“就是这些事情推动了我，我就想一想。”想什么呢？他发觉公社在所有制上这一步迈得太大了，共产风吹过头了，引起了普遍的瞒产私分和消极怠工，必须来

一次清理整顿。否则粮食收不上来，大跃进将难以为继，这是他内心最为担忧的一件事。1959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5 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亲自提出了整顿人民公社的 14 句话：

统一领导，队为基础；

分级管理，权力下放；

三级核算，各计盈亏；

分配计划，由社决定；

适当积累，合理调剂；

物资劳动，等价交换；

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队为基础，就是以过去的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从大概念讲，就是把所有制规模退回到高级社。毛泽东相信“产品本来有余”，如果把“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的问题解决了，给农民让让步农民就会停止反抗，交出粮食，继续跃进。

21、给农民“算”出粮食

从 1959 年 3 月份开始的全国性整社运动规模空前，从省到县都召开“万人大会”，又叫“万人算帐大会”，内容是：肯定大跃进的成绩，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是九个指头的问题；清理退赔被共产风刮掉的财产，落实“14 句话”——这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农民交粮。

这是中央的主旨。在四川则成为一场批右倾思想，查瞒产私分，整基层干部的运动。

3 月 11 日至 20 日，省委在重庆召开省、地、县、公社、管理区、生产队六级干部大会。

李井泉在第一天的报告中为大会定下调子，他把原先公布的 1958 年全省粮食产量稍稍打了一点折扣后，质问：“这样大的成绩不叫大跃进叫什么跃进？”他说，58 年是大丰收，征购完成以后，口粮应该是富裕的。接着他就点温江的名：“但我们看

见，偏偏是产粮区拿不出粮食来，如温江有几个县出现瞒产是很普遍的。”他说所谓缺粮是“乱闹”，把权力下放一点，他们就会把粮食拿出来。“54 年统购统销多了一点就发生闹粮，是少了 58 年的大丰收，但在所有制问题上未搞好，就增加了本位主义，也在闹粮，这是乱闹。只要承认是他的，把所有制问题处理恰当，他是会多卖的”。

他把权力下放称之为与农民的“等价交换”。他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告诉我们，我们同农民的矛盾“可以说存在着相当紧张的状态”。由于我们向全民所有制过度的步子太快，农民的觉悟达不到，所以就不交粮食，不搞生产。他把权力下放描述为迫不得已对农民的让步、应付危机的一笔交易：我们在所有制上退一步，让你们捞了好处，你们就得把隐藏的粮食交出来，把万斤田搞上去。

李井泉付出的“代价”有多大呢？第二次郑州会议作出的《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明确规定，所谓“队为基础”的队，是指相当于原高级农业社的队。就在省委万人大会召开期间，毛泽东又打招呼说，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或管理区。”（毛泽东：《党内通信——关于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1959 年 3 月 15 日）

而李井泉则在万人大会上宣布：“队为基础，在我们这里是管理区”。（见《3 月 11 日李政委在省委六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59 年 3 月 11 日）

四川公社化以后，除少数如红光公社一类的超级大社，均实行公社、管理区、生产队的三级管理体制。生产队即相当于过去的高级社。以郫县为例，1957 年春，全县有高级社 356 个，初级社 38 个，共计农业社 394 个，每社平均 115 户，耕地 896 亩。公社化以后，1959 年全县有 14 个公社，120 个管理区，522 个生产队，平均每个生产队 107 户，耕地 811 亩。（见《郫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11 月第 1 版 251－254 页。）

可见，中央规定的队为基础，在四川无疑就是生产队。李井泉自行其事，是因为他相信把核算单位下放到管理区，付出的代价已经够沉重的了。

根据李政委定下的调子，万人大会“一致赞成”绝大多数公社实行管理区为核算单位，有的(如新繁新民公社)继续保持以公社为核算单位。在接着召开的各县算帐大会上，干部群众下放核算单位呼声强烈，广汉向阳公社的一分报告说，绝大多数社员和小社主任都同意以生产队进行核算。但温江专区只批准了少数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的山区实行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

农民要为李政委的退让所付的第二笔代价，是继续按他在生产上的乱指挥命令干下去。“这也是等价交换”，他威胁说：“分权是为了搞好万斤田，不搞好，就不分。”他说，1959 年更大丰收的形势已经形成，特别是搞大面积丰产田，千万亩的万斤运动，搞不到万斤搞几千斤也了不起，“原来的计划、指标、安排都不要变，要坚决保持。”提起这件事，他的火气就上来了。紧接着的农业生产动员誓师大会上，他召集

温江专区的一些公社党委书记开会。

公社的同志刚刚坐下，李井泉劈头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的水稻指标定下来没有？”接着就说：“亩产一万斤的有多少？请举手！”

起初没有人举手，大家看到李井泉神色不对，少数人勉强举了手。李井泉很不满意，接着又问：“亩产 5 千斤的举手，”在到会干部中，不到三分之一的人举了手。最后，李井泉向没有举手的人说：“最低亩产不能低于两千斤，两千斤的举手。”大家只好都把手举起来。

这就是在传达“纠左”的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的万人大会上发生的事。李政委当然不可能把中央的文件精神都吞下去，他有他的解释，台下的人也有自己的理解。

毛泽东故技重施，要求大鸣放展开全民讨论，使干部，尤其是公社和县一级干部，“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一调三收款，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在会议展开的鸣放讨论中，以为真的要反共产风的“怀疑派、算帐派”们就按奈不住了。

温江永盛公社管区分支书记陈绍清说：原来我们合作社有 8 支鱼船，28 只鱼老鸦，每年要收入 4 千多元。有一个纸厂，还有 20 多万斤原料。有一个打米厂，一部缝纫机，一共要值 12 万元左右，我们刚把货款还清，就一齐收归公社了，一只鱼老鸦都没给我们留。广汉永丰公社生产队长刘明山说：大跃进是造国际影响，去年报产量，就象今年说小麦亩产 3 千斤一样，结果是假的、虚的。目前粮食为啥这样紧张呢？因为去年大部分作物都减产了。新都马家公社分支书记刘尚元说：去年打谷子两本帐，一本是实际帐，一本是假帐，每亩多报 1 千多斤，所以连谷种上完都完不成国家任务。郫县友爱公社徐文安说：公社化后出来三种人，一种歪人，一种懒人，一种装病的人。大邑小组有人说：公社化以后积极的消极了，消极的更消极了。小猪不大，大猪不肥，有公无私，光进不出。温江永安公社生产队长岳体富说，公社化以后，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所以带来这么多消极因素，要搞好生产只有坚决办好原来的农业社。金堂县洪福公社管区分支书记刘顺清说：现在还有啥子搞头，从前小社死了人睡棺材，现在公社死了人睡火匣子（薄木板钉的棺材），将来到了共产主义死了人，只有睡米树子(谷草廉子) 。……

这种情况，毛泽东是早就估计到了的，他说，“我们应该沉得住气，在一段时间内，不声不响，硬着头皮顶住，让那些人去充分暴露他们自己。”

李井泉说得更明白：“不怕，等他们说得不成话了……我们还有 57 年大辩论的经验。”

不知利害的人一边“放”，各地的内部简报一面跟踪记录，温江地委的简报说：“个别人否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有些人员虽然还未敞开讲话，但已看出苗头，……”；“今天的辩论中，有的怀疑派、算帐派和反对派继续出来向我们攻击和反扑”。摸底

排队工作秘密而紧张的进行，3 天鸣放辩论结束，人人头上都打上了左、中、右的记号。温江专区的排队情况是：全区到会干部 802 人，肯定 58 年是大丰收，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拥护公社体制方针的 668 人；有某些错误观点的 92 人；怀疑派、算帐派和反对派 42 人。后者 42 人中，有 28 个是在会上暴露的，有 14 个是“在家里放了，在这里没有放”。可见话一出口，很难滑脱。（见 1 省委六级干部大会材料《温江专区小组讨论情况简报》，1959 年 3 月 14 日——3 月 16 日。）

这些观潮派、算帐派、反对派是毛泽东一再指示要选择安排到会的，给他们暴露的时间是 3 天。3 天后，反击开始，温江专区小组的简报形容说，“他们的恶意攻击，引起绝大多数同志的无比愤怒，争辩异常激烈，直到午夜尚不开交……。”讲了几句实话，斗到深更半夜脱不了手，其他人见势不妙，赶忙转向。纷纷承认隐瞒私分了粮食，粮食不仅有，而且“吃到大春还有余。”地委农工部长申培林开会回来垂头丧气，向宣传部长景廷瑞叹息：“错误不纠正，又批说真话的人！”

继四川省万人大会后各县进行的万人算帐大会，大算特算 1958 年的粮食丰收帐。农民不仅要接受强加给他们高产数字，还要承担强加给他们的瞒产罪过，而且是饿着肚皮承担。

温江专区各县的算帐大会从 4 月下旬开始，直到 5 月中旬结束。16 个县参加会议人员达 9 万多人，其中社员代表 15000 多人。省委定下的会议主旨是：“加强对基层领导的教育，及时批判右倾情绪，自始自终抓住农村一切矛盾的焦点——粮食问题，把它搞深搞透。”

算去算来，还是围着那笔永远算不清的大糊涂帐转，算不清楚，就用根本不存在的瞒产私分数来凑。让我们从邛崃、蒲江两县的算帐大会，看看窟窿是如何填的。

第一步，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抓住典型，批判斗争，坦白交待。到会干部 8463 人，查出有贪污、挪用行为者 2876 人。贪污挪用金额近 15 万元，人平均 50 元。集体隐瞒、私分现金 10 万元。

第二步，报瞒产私分。算帐进入高潮，“庚即全面转入粮食问题”。宣布省委政策：报出私分数量，一不增加征购，二不调剂共产，三不追究责任。不报，则要追究责任。打消顾虑后很快全面突破，经坦白交待，全县社社队队都有瞒产私分，共报隐藏私分粮食 3600 万斤，平均每队 24000 斤。

第三步，落实产量。对五笔帐：国家征购；社员分配；种子、饲料、工业、副业用粮；食堂用粮；隐藏、私分、盗窃。一笔笔加起来，58 年的大丰收“落实得实实在在”。

第四步，安排生活。私分坦白了，生活问题自然就解决了，办法是“必须把隐藏私分的粮食拿出来办食堂。”到会人员人均自报投粮 260 斤，又对各户社员逐一排队，计算出全县可交出私分粮食 1155 万斤，“完全解决了粮食问题”。（《中共邛峡、

蒲江县委关于五级干部算帐大会解决粮食安排生活的简 报》，1959 年 5 月 3 日。）

什邡县四平公社是全县“闹粮”最早的公社，从 3 月起，全公社 76 个食堂勉强有 19 个在支撑外，其它要么尽吃菜，要么关门大吉。“闹得最凶”的第 10 耕作区全体党团员联名写信，签名盖章，要求公社解决口粮，保证实在无粮，若查出来愿受纪律处分。公社党委按照县委指示，“首先把 58 年产量同 57 年比较，扎死向国家要粮的口子”，然后拿他们开刀。公社党委总结的逼粮经验是：

一般说服社员要有六个过程：第一，开腔就说没有粮食；第二，不开腔； 第三，“打敏笑”(作者注：川西方言，意为窃笑。)；第四，承认有点不多；第五，承认比较多的数量；第六，回家商量一下拿出粮食来。

一颗粮食没有，还能来开会吗？而不把吊命的几颗粮食抖出来，就不散会。“回家商量一下”还是不拿出来就搜，搜出来便组织全社干部开现场会，由藏有粮食的干部社员现身说法。接着是全公社挖地三尺式的逐户大搜查，所有藏粮的花样都被“查出和揭穿”，连藏在棺材里的都搜了出来，留的谷种也当作“隐瞒的吃粮”，如此彻底的搜查，共搜出多少呢？全社近两万人，共搜出 21 万斤，人平 10 来斤。于是公社向县委报告“这样闹缺粮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中共什邡县委批转四平公社关于发动群众投出粮食办好食堂的报告》 1959 年 4 月 25 日。）

这是一场残酷的游戏，所谓自报投粮完全是强制性的。邛崃太平公社对“顽固户”采取“评出他们该投多少，就要他们投多少”的办法。抄家式的搜查比比皆是。广汉向阳公社陈世秀由于未报投粮，被干部将房子折毁，令其跪地交待，把全家 10 多口人赶进一间破房。

全温江专区经过算帐，共“揭露”出隐藏私分粮食近 2.8 亿斤，现金近 900 万元，成果巨大。把这些粮食都翻出来，“投入”到停伙的食堂，闹粮的叫嚣自然应该平息。况且省上的政策宽松仁慈，申明不增加征购，不共产，不追究责任，全部自投自消，投入的粮食或付现金，或换成粮票自己受用……方方面面考虑周到了，唯独欠考虑的是这些粮食是否存在。

地县两级对算帐拼凑出的隐藏私分数字，并非完全心中无数。地委宣传部长景廷瑞参加了大邑县的算帐大会，县上坦白交待批判斗争闹得乌烟障气的时候，他就下到曾经是大地主刘文彩领地的安仁公社一个生产队的食堂搞调查。这个食堂 7 月份以来便断断续续停伙，是所谓“关了食堂闹粮”，隐瞒私分的典型。他一查，不是那回事。这个队有田、地 430 亩，人口 450，公粮统购 17.6 万斤，平均每亩负担 4 百斤以上，哪里还有什么存粮。动员了半天，连地委干部都带头到亲戚家动员，也没弄出几颗粮食。

景廷瑞对公社总支书记说，我小时候在华北老家，经常是糠菜半年粮，为了支援国家建设，应该向社员提倡。总支书记为难的说，我们这里解放前也没吃过糠啊，

未必现在还吃？给我们点粮食算了。大地主刘文彩的大院和他的兄弟刘文辉的公馆巍巍峨峨矗立在空旷的田野上，景廷瑞想，这可关系到党的威望，于是给宋文彬打了份报告，要求给这个队供应粮食，以保证人均每天吃到半斤粮。

地委从59年初一直有工作组呆在安仁，却没有反映过缺粮停伙的问题。情况如此不好，怎么不据实报告？这使他无法容忍。宣传部一名蹲点干部所在的食堂停了伙，他问他有无其事，对方称没有。“你不老实！”他火了：“我们的乌纱帽要紧，还是党的事业要紧？”

能够把党的事业看得比乌纱帽更重要、或者说竟可以为此不惜丢乌纱帽的人肯定不多。问题还在于，你如何判断什么是“党的事业”呢？大跃进、人民公社、反瞒产私分，难道不是党正在进行的事业么？这一切在当时是很难从理论上说清楚的，真正起作用的是人的良知。

地处山区的邛崃宝林公社被算出有1百多万斤存粮，“完全解决了粮食问题”。但地委工作组邓朝贵调查后向宋文彬报告：该社3月份以来已两次由国家调剂粮食共68万斤，但粮食仍然十分紧张，农民家里都被搜查过，存粮可能性极小。现一般食堂每人每天4两米稀饭，社员干活到中午“就喊饿得不行”，工间休息大人小孩都在山上摘野菜，晚上煮来填肚子，“情况很不好”。有一个大队秋收后留三四万斤谷种，卖统购粮卖去3万多斤，又吃了几千斤，现在还剩1千多斤了。眼看就要栽秧，宋文彬急令邛崃县委解决。

金堂县算帐大会挖出一大堆浪费、私分粮食，把1958年的大丰收凑足后，到会的社队干部心惊胆战，“把数字搞出来，拿啥子去跟社员兑现呢？”心照不宣的县委给他们出主意：小社应把以下四笔帐算在支出帐上。即一、小社隐瞒私分了的；二、公共食堂无计划浪费掉了的；三、收起来保管不好而霉烂的；四、过去帐上记掉了的。县上说，把这些帐合计起来，“就按人平均摊派到社员户作为伙食支出”。

本来就不存在，就算是大家吃了吧，空收对空支，令基层干部松一大口气。

一般说来，地委对下面的要求多少会给点救助。1959年的继续跃进，意味着全区将承受更大的征购重负，一旦闹到无种下田、农民无力种田的地步，结局将是灾难性的。

22、出气筒

大跃进以来积累的矛盾在 1959 年的算帐运动中集中爆发，充当爆炸牺牲品的是大批基层干部。毛泽东说，不清算干部的经济帐和思想作风帐，就不能解除群众的怨气，而干部本身也会被毁掉。这一着十分灵验，中国老百姓极少会把气出在皇帝头上的。而大跃进公社化的确也“毁掉”了一批干部，只要有机会，特别有上面的策动鼓励，老百姓很乐意拿他们当出气筒。

算帐运动对基层干部打击面之大，十之六七不能幸免。据地委统计，全区参加算帐大会的 7 万多名干部，近 3 万人有“贪污盗窃”行为，人均贪污现金 50 元以上，粮食 80 斤以上。加上“挪用”、“多吃多占”的，共有 48000 多人犯错误，占到会干部总数的 64％。(见中共温江地委领导小组:《关于全区各县五级干部会议算帐情况简报》,1959 年 5 月 8 日。)

群众说，“58 年干部变坏了”。他们是随着权力的迅速膨胀而迅速腐败的。56 年普及高级社实行“村社合一”即政社合一，农业社从从生产组织变成了基层政权组织。“管天管地管神仙”的公社成立后，公社头头被称为“万户候”，拥有封建领主式的权力。他们只对上级负责，对下权力无边，合作化以来的干部贪污盗窃、多吃多占，打人骂人现象恶性发展。

粮食集中到食堂，不准社员在家里做饭，使干部拥有一个前所未有的令人恐惧的权力——社员的吃饭权，实质上无异于对社员的生杀大权。它足以对付任何形式的挑战，同时也给他们侵吞公物和生活特殊化大开方便之门。在社员生活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一些干部竞相开办干部小灶，向下勒索，侵占公物，与社员生活形成强烈反差，命运掌握在干部手上的社员敢怒不敢言。广汉县向阳公社小灶“天天有鱼有肉”。上行下效，下面的 4 个耕作区(相当于管理区)也都搞起干部食堂。

群众吃稀的，他们吃干的，群众吃菜，他们吃肉，群众吃一顿肉，他们吃几天肉。群众呼之为“高灶”。

在一耕区书记巫某办起的高灶里，经常以开会的名义聚集干部吃喝，有时一次就吃掉一头猪。成立公社时乡上下令各户投鸡办集体养鸡场，巫某“经常叫人晚上去鸡场偷鸡”，鸡场的鸡“越看越稀”，半年减少一半。有一次他们偷鸡被社员黄绍田撞见，黄说了几句气愤说，巫某怀恨在心，后来竟借口说黄“抵抗投鸡”(黄的鸡公社化前卖了)把黄弄在群众会上斗争， 剥了衣服施以毒打，“浑身打得呈猪肝色，其状很惨”。

公共食堂炊事员掌握勺把子的权力了得。汤汤水水的大锅稀饭，见了顺眼的勺子沉底一搂，就吃得扎实一点，见了不顺眼的皮面上一划，清汤寡水儿皮菜叶，谁个得罪得起？半夜三更煮好的吃，往家中输送救济，近水楼台。这样的美差，往往落到干部亲属或亲信头上。社员食堂如此，“高灶”的油水就更大了。公社书记巫某的老婆在高灶当炊事员，不但给自己的男人吃得特别好，还经常弄些肉、米回家，群众很不满意的说：“干部、家属吃胖了，社员大众吃瘦了”，社员刘光兴说一句“高灶炊事员吃得又白又胖”，就被扣了3个月工资。

制造社员生活好的假象蒙骗上级检查，是他们的重要工作。2 月份县委检查团到这个耕作区检查食堂生活，来时正在开中饭，干部怕败露实情，命令社员一律停止吃饭，“有些动作慢的，碗还在嘴边都被抢下，不许再吃”，食堂盛稀饭的桶也被踢翻几个。然后“支使干部装成社员去接待检查团，参加座谈会，谈好不说孬。”

在巫某的治下，全耕作区 3215 人中，受干部辱骂过的 1056 人，挨过打的 287 人，被扣过工资的 425 人，被饿饭罚款的 193 人。三中队长陈某“天天都要打人，有时要打几个”。社员罗信能“被陈某捆在要树上一天一夜，爱人在病中得知活活气死，”陈某还纠集人在大河边设卡持枪拦动过路行人的棉花、红苕、鸡鸭等，罪名是“盗卖国家统购物资”，甚至鸣抢吓人，群众说，“大河边和解放前土匪抢人差不多了。”（见 8 《广汉县委关于向阳公社算帐的初步情况简报》，1959 年 4 月 25 日。）

打人是那个时代农村的特色。建国伊始，每次运动都有人难免皮肉之苦。从打地主、打富农、打反革命、打“老虎”、打右派，到打落后分子、打有右派言论的，打代表“富裕农民思想”的，打不听话的……从“敌我矛盾”打到“人民内部矛盾”，从阶级敌人打到思想敌人，干部打群众，群众有机会就打干部。

形形色色、三天两头的群众会、辩论会、斗争会发展到顶锋便是打。打人的花样丰富多彩、时时更新，捆索子、吊鸭儿袅水、站高板凳、跪瓦碴子、灌辣椒水、泼粪、淹水、砸石头，烟火熏、冬天下水田冻、喂狗屎……耳光拳脚更是家常便饭。公社化以来，干部打人的现象愈加普遍和严重，个别地方发展到骇人听闻的程度。

万人算帐大会期间，金堂县人和公社大批社员揭露控拆的干部打人情况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新一轮挨打的惨叫是和跃进锣鼓一起响起来的。

公社总支书记李义和的规定是：“干部不要打，社员打两下没来头”，“打人要会打，要打内伤，不要打外伤”。

1958 年 3 月，全乡召开一次对地、富、反、坏的“公判大会”，每个被判的人都当场遭到毒打，大部分人被打伤，个别打成残废，从此拉开大规模打人的序幕。打完这些阶级敌人，接下来就打一般群众。

1958 年初，农村开展“反浪费、反保守”的“双反运动”。反浪费，是针对农

民说粮食不够吃，认为农民把粮食“浪费”了。反保守，是针对农民对高产指标和生产上的乱指挥不满，认为是保守思想作祟。

各地情况惊人相似，5 月，人和乡许多农户断粮，有的靠吃糠苟延，要求国家供应粮食(这本来是统购时的承诺)。同时在种大春中，不少农民反对乡上的高产指标和所谓新的耕作技术。于是乡上掀起大规模“双反”运动，把要求供应粮食的定为“浪费分子”，反对乡上生产指令的定为“保守分子”，并要求全乡党员团员群众人人按态度划为四类，三、四类为斗争对象。乡长唐某亲自主持八耕区的“排类”斗争会，一个晚上就打了 33 人，被罚跪瓦片、跪板凳的更多，并在会上传达了总支书记李义和“打两下没来头”的指示。

这样，“各生产队马上打开了”。有两个生产队群众不忍动手打乡邻，唐某就让两队互换打手，终于打了起来。总支委员肖某在一个耕区“掌握会场”时，见一些生产队干部不动手，骂他们“同情坏人”亲自调人来打。社员刘少明反抗，劳训队长张某抓起板凳把刘的脑壳打得鲜血长流。农民李昌田、张德海、徐守荣看到到处都在开会打人，说了句“打人怕不对吧”，立刻被抓起来打了一顿。社员唐正康缺粮断炊，糠亦吃尽，向队长李某请求开证明买糠，李说他“闹粮”，立即开会斗争，耳朵被打聋。60 多岁的社员唐朝福口粮困难，在地上捡了几颗抛撒的包谷，李“一脚踢在唐的小腹上，次日晨即死去。”

下面打人大会打过，又把地主、富农、“四类分子”，单干户集中到乡上“训练”，训练方法是打、骂、跪。有的女社员“被打掉了裤子。”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大跃进开始，人和乡以“打下游”为中心的又一轮打人运动拉开序幕。

先是“评游”，每 7 天评一次上游、中游、下游，张榜公布，开大会“消灭下游”。主持会议的干部喊：“现在还没有转变的下游怎么办？”下面的违法乱纪分子就喊叫“拉出来说”，各耕区立即打开了，名曰“打下游”。

8 月上旬，全乡召开跃进誓师大会，各耕区社员列队前往。上游走前面，中游走中间，下游扫尾。前面的举红纸写的牌子，画飞机、火箭之类，列上游人员名单；中间的绿纸牌子，画鸡公车、自行车之类，列中游名单；后面白纸牌子，画小脚女人、乌龟之类，列下游名单。进入会场，上、中、下游分开席地而座，乡干部带头高呼“彻底批判中游”，“坚决消灭下游”，“下游”个个勾头缩脑，心惊胆颤。

誓师大会后，全乡办起 9 所“马列主义学校”，集中被打斗过的人“学习”。学习内容包括：听干部训话——“中游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绊脚石，下游对社会主义建设危害最大”，“闹粮的和中、下游都是社会渣子”；坦白交待——“不说，又打起来罗！”；服劳役——很多人修蓄水池把脚都泡烂了。妇女生病最多，支持不了经常哭。跑是不可能的，学校有“治安员”背着枪看守。

比“马列主义学校”档次更高的是“劳训队”，队员包括地主、说怪话的“反革命”，外乡的“流窜犯”，评类评出的“四类分子，吵嘴、打架、小偷小摸者，给干部提意见的，甚至因为需要采石工具，就绑几个石匠进来”，“为了霸占别人妻子而把男人送进去的。”

“劳训”内容是采石头、挨打、饿饭。除了 3 个小队长和两个会计未被打吊外，其余 48 人皆未幸免，其中 4 人致死。还发明了两种名曰“不用人打”的刑罚。一种是要受刑的人双手或单手托起一大鹅卵石，手臂伸直，名曰“举重”。一种是将一条板凳四脚朝天，受刑者双手双脚放在四条凳腿上，手脚伸直，腰背挺起，名曰“地崩子”。

公社成立后，这帮干部打得更顺手，打人的口实更充足了。“打得起来”的干部被称之为“有干劲，有能力”，“打不起来”的叫没干劲、能力弱。

公社把一些场镇居民赶到乡下，将他们的房子“充公”。

公社书记李义和蓄意霸占乡政府隔壁一个寡妇许秀德(中农)的房屋，借口动员场镇居民下村劳动，要许搬走，许不答应，李便责令乡干部朱某先后对其全家及女婿进行 10 余次“辩论”毒打，并没收其购粮证，许的 90 多岁的母亲曾两次向李义和下跪，有一次赶场时当着群众向他跪下瞌头求饶，李骂她“反对共产党”，“反对政府”，终将房子霸占。群众骂李是“活阎王”。

生产队长李某以“打小偷”、“打懒王”、“打闹粮”等为名，亲自主持和动手吊打的社员有 15 人之多，打吊后死亡 3 人。搞大兵团生产时，李某规定迟到的不准吃饭，端起的饭碗亦被打掉。……又规定妇女出工时一律不准带小孩，一见到妇女带小孩即骂“把小孩给我丢在苕窖头窖起！”或者命令把小孩装在口袋里挂在树上，致使许多妇女伤心流泪。孕妇曹彦珍从淮口买两只兔子，被诬为偷窍，……拳打脚踢，打得该孕妇下身流血，次日上吊自杀，死后肠子都流出来了。

人和公社打人事件被揭露后，李某投水自杀。社员仍恨之入骨，纷纷在自己门口和路边点燃艾火名曰“送瘟神”，口念“在世是恶人，死了是恶鬼”，有的社员在他投水的池塘里撒菜子咒他“永不转生”。（见省委检查团温江地委分团：《关于金堂县人和人民公社干部严重违法 乱纪的情况报告》，1959）

事实上，把打人的责任都推到基层干部头上是不公平的。来自上面的强迫命令，历次文武兼备的政治运动，干部的文化、政治素质乃至群众的文化素质，都是形成乱打人的直接间接原因。一般来说，死人的最大原因是缺粮，但如果同时存在打人的现象，往往便被归结到打人或干部作风上，难免有夸大其辞的成份。

对大多数干部来说，“算帐大会”是一场无妄之灾。上面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他们头上，群众自然便把所有的怨气发泄在他们头上。一报还一报，他们也免不了皮肉之苦。有的是群众积怨太深打的，有的是上面支持这样干。

金堂县龙威公社同乐管区 8 名主要干部，算帐中被定为贪污盗窃，违法乱纪行为的就有 6 个。县上五级干部算帐大会后，公社总支派出了一个清帐小组，限期三天之内把帐查清赔清。这些所谓的贪污盗窃帐大多夸大不实，即使有一些，也都吃去用光，三天之内拿什么去赔呢？清帐小组便开群众大会，发动群众斗争揭发，不坦白就“交群众整”，保管孙祥云因坦白不彻底，就被拉到会外“用火烧石头打”。付支书曾永忠“检讨不深刻”，支书庄某“就给他几拳”，下面就有人喊：

“干部是克剥成家！”

“当官不想钱，枉自读圣贤！”

“你狗日的东西，鸣放时弄我去斗争，给我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

“拉出来跪倒！”

“挎他的衣服！”

“拿石头打！”

有贪污的干部，不仅被打斗，他们的家都被搜查过，凡是能变钱的东西都被搜去卖了，一直把贪污款退完为止。如保管孙祥云家中用的、穿的以及其母亲、妻子赔嫁的枕头、被子，祖父辈留下的细碗、磁罐、自己的手电筒、钢笔等全部一扫而光搜尽。该区干部议论说，“当干部犯了错误比地主还整得得惨”。

干部打群众、群众打干部，今天一阵风，一批干部倒霉；明天一阵风，一批干部遭秧，这年头谁的日子都不好过。

这年头日子最不好过的是诚实、正直的干部。

4 月 21 日，郫县召开万人算帐大会，粮食局与县委和红光公社在粮食入库数上的争端再次爆发。会上，粮食局长叶成章下令将各公社分大队的入库数字张榜公布，将红光公社谎报 2 千 3 百多万斤入库数的事公开向几千名全县各级干部端了出来。这一手真的把那些有头有脸有后台的戳痛了。

张榜的当天晚上，红光公社几十个社队干部冲进县粮食局，大哄大闹：

“为啥子我们的入库粮食不给我们算数？”

“是不是要否认我们大跃进的成绩？”

“粮食局有好多贪污分子？”

天哪，这可是两千多万斤粮食呀，县上一个集中的大仓库都装不完，粮食局纵有天大的胆子，贪污下来往哪里堆呢？粮食局干部摊开帐本，一笔笔给他们算，一张张凭据对，闹事者根本不看不听，一味扯起嗓门乱吼。叶成章看得清楚，他们哪里有心算帐，明明是来示威的。真正的对手是背后的唆使者。

郫县的消息灵通得很，这一闹又惊动了省上的领导。省委书记廖志高亲自到郫

县调查，专门找叶成章谈话，叶成章自然如实汇报，廖志高没有表态。廖一走刘致台就找到叶“气势汹汹”地问：

“你给廖书记究竟谈了什么？”

“汇报了入库手续问题。”

刘勃然大怒：“我不晓得你们是什么思想！不知道你们乱七八糟说了些什么，也不知道你们给专区说了些什么！”

因为乱报入库的事，刘致台不久前在地委又挨了批，心头正窝着火，他知道是叶告的状，现在又居然背着他不按县委的意思，把事情捅到省里，不能不让他恼羞成怒。

叶成章莫名其妙挨了一顿臭骂，一时反应不过来：“我向上级领导汇报情况情况是错误吗？还是我反映的情况不真实？给省委领导汇报情况，什么时候讲过必须通过县委呢？”

象这本书中提到过的新华社记者喻权域、地委干部张慎、以及那个时代许许多多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那样，回到家里，叶成章打开党章，重温党章中关于党员有义务“向党的领导机关直到党的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同党内外一切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现象进行斗争”的规定，心中充满浩然正气，决心在任何打击下决不后退半步。

不出所料，几天以后，县委书记赵金波、王知琛向叶传达县委意见：粮食入库帐目不清问题，主要由你负责任，取消了“三联单”的入库手续没有向县委汇报过，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另一方面粮食部门把几千万斤粮食收了不算数，问题这样严重，还不承认，是一种右倾思想，是失职行为。县委决定给你“停职待查”处分。

使用两联单是县政府文件规定；“几千万斤粮食收了不算数”，到哪里去了呢？然而一顶“右倾思想”的帽子，就取消了你辩解的余地。第二天，“停职待查”的决定在大会宣布。

局长不问青红皂白丢了乌纱，粮食局的干部并没有屈服。实际上他们没有退步的余地，谁能担戴得起几千万斤粮食的责任啊。算帐大会结束，红光公社 各乡、各队财粮人员留下继续对帐，到 5 月 9 日，逐月、逐日、逐队、逐笔全部核对清楚，粮食局统计的入库数准确无误，公社多报的几千万斤纯属子虚乌有。但是公社仍然不认帐。

不认帐的背景，在几天后李井泉给温江专区县委书记的讲话中可见端倪，他批评说，有的人“否认别人成绩，冷言冷语”他补充说：“我看有些人对郫县就是这样，不服气。”并提出验收产量时要使用“三联单据制”。

岂止是不服气，郫县放卫星吹牛，粮食征购作假，反而出尽风头，大受李政委

恩宠，地委和其它县愤愤不平者大有人在，有一个叶成章出来硬顶，大家就想趁此机会把郫县的这条尾把踩住。

7 月，地委监察委员会（简称地监委）付书记李兆业、专署财委主任张晋宝率检查组，彻底检查红光公社粮食入库情况。检查组一到，就让县长潘太华通知叶成章汇报情况。鉴于上次给廖志高汇报的教训，叶请示刘致台，刘指示他“不参加汇报”。检查组见叶不到，便直接通知他本人，县委才同意汇报。结果叶怨枉挨了检查组一顿批：“你是不是不想把问题弄清楚？”

叶成章说，把问题彻底弄清楚并不难，只是要多化些气力。红光公社征购的粮食，一部分在粮食局犀浦粮站，一部分在他们“就地入库”的仓库里。把全部仓库里的粮食重新翻一道称，是我们报的数，那就是他们的问题；是他们报的数，就是我们的问题。冤冤不解闹了几个月，看来这是唯一的办法了，检查组说，翻！

地委检查组汇同县委、粮食局、红光公社三方代表，浩浩荡荡开赴红光公社，先翻粮食局犀蒲仓库，两千多万斤粮食全部重新过称，与帐面统计完全一致。然后查公社的“就地入库”仓库。拿着公社凭空捏造的入库单据，要么根本找不到仓库，要么是假仓。

地委干部龚朝浦和几个检查人员来到一个仓库，从仓门望去，粮食已经堆到屋顶，敲一敲，也不是空响。他不放心，叫一个农民搭梯子进去看看，那农民从仓门一望，说是“黑骨隆冬看不清楚”，龚说，你爬进去看看，那农民一伸腿，只听得一声惊叫，脚板一幌就没了下文。

仓库是空的，只用一些谷子贴着仓门堆了一个很陡的斜面。老半天才把那个滚到仓底，惊魂未定的农民拉出来。

下面纷纷坦白，划码单是假的。这下叫公社拿话来说。事实摆在面前，郑凤兰等公社干部表示“认帐”，地委结论：问题已经澄清，粮食局统计无误。“主要是公社书记郑凤兰、钟光林等弄虚作假，欺骗党组织”，并写出正式书面报告。

县长潘太华、县监委书记白关和亲自参与检查翻仓，红光公社干部承认弄虚作假，一道道防线宣告崩溃，但是县委决心死守最后一道防线，拒不承认地委的调查结论，和地委检查组大吵大闹。

双方都清楚，县委最后一道防线后面站着何等人物。地委检查组打道回府不了了之，对他们来说，事实真相已经一清二楚。

23、“饿死都不要管他”

1958年底曾箝和李井泉直接对抗的那次会议，最终以曾箝作检讨和地委的投降告终。历来小心谨慎的宋文彬着实吓了一跳，祸是曾箝闯下的，问题可不是他一个人的。为了给李政委一个交待，地委几次开会由曾箝作检查，宋文彬也作自我检查，重申曾箝是“阶级立场问题”。

无论是真心还是违心，大家心里都明白了李政委的怪异思路：高指标是宣传，是旗帜，是鼓舞人心的手段，完不完得成是一回事，吹不吹又是一回事，吹，才能有压力，逼着你打破常规走新路，按省委的高产措施办，就能尽快实现这个目标。

实际上，“吹”的根本目的是高征购——吹得多自然要征得多。

省委给温江专区下达的1959年粮食生产任务是：“保证”产量达到140亿斤，比1958年虚报的90亿斤增加60%，其中万斤田140万亩，也就是说，140万亩万斤田搞成了的话，用不到五分之一的土地就可完成全年高产计划了，所以是“留有充分余地的”。

同时，为贯彻少种高产多收的方针，变广种薄收为少种多收，放弃70万亩山区耕地和平坝地区差地。地委以此指标为“第二本帐”分配各县，各县又把指标翻番，总计上报粮食产量330亿斤，高产片300万亩，作为鼓舞干劲的“第一本帐”。

大吹大擂的万斤运动和一意孤行的疯狂密植给生产造成的恶果，在小春作物生长后期已经冷冰冰的出现。

3月下旬，郫县红光公社的油菜地里发生了许多“奇怪”的现象。有的菜籽“还未开花就干了，无花更无果”，有的“花开后没有角心”，有的“有角心没有颗粒”，同时出现大面积的油菜黑菌病，叶子发黑后生霉，然后全部干掉。基层干部解释原因时，除强调“天气过冷”外，承认“窝子太密”（比过去密一倍以上），油菜象麻杆似的“立起长，不横起长”人称“一柱香”。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接着，经不起春季一阵和风细雨的“袭击”，正在抽穗扬花的的大面积高度密植的小麦倒伏在地。四川日报羞答答的承认：“各地高产田的小麦，或多或少有一部分叶色过于浓绿，叶片又大又厚，叶尖下垂；或者是因为通风透光不良，麦杆基部节间变长，颜色变白。这部分小麦，遇到风雨，容易倒伏。”可怜的麦子！为争夺阳光和空气竞相拨高“疯长”，杆子象豆芽似的弱不禁风了。

温江地委发出指示，号召全区各级党委“集中3百万劳动人民的智慧，开展防

止小麦倒伏的群众运动”。办法有：每天早晨用竹杆打麦苗上的露水雨水减轻负荷；将麦苗的脚叶、老叶扯掉，以利通风透光，增强茎杆硬度；用晒席、篾席等搭成防风屏障，或在麦田上搭防雨棚，雨天盖上，晴天揭开等等。对已经倒伏的麦子，用手或竹杆扶起来，搭上架子支撑；扶起后用草拴住；“上端成鱼尾形，下端三角形”……。

华阳县胜利公社宣称发明了一种“防伏素”。四川日报说，他们苦心研究，根据植物茎杆需要钾、磷元素的原理，把骨粉，磷矿粉和在堆肥里，经过几天发酵，制成细粉，就成了“防伏素”。先在一亩多地的倒伏麦地里试验，“原来麦苗完全平躺在地里，施后几天就全部撑起腰来，而且长得更加健壮。”现在他们已经掀起大造大施小麦防伏素的热潮，已生产出数百万斤防伏素。其实纯粹打胡乱说。

尽管小春作物已亮红灯，仍然不能对高产密植等提出丝毫疑问，大春生产还要坚定不移的这么干下去。1959 年 4 月 19 日省委发布农业生产八项规定，严格规定各类作物播种面积、施肥数量、深耕尺度和密植规格，要求各地坚持“抓思想、抓典型、 抓小运动，至始至终都抓紧，”把高产万斤推向高潮。紧接着，温江地委在郫县红光公社召开全区生产现场会。会议宣称，全区小春作物长势良好，“空前大丰收的景象已经超过了大跃进的 1958 年”。

高产卫星一而再、再而三被揭穿，小春作物险象毕露的红光公社继续充当跃进旗手，400 多名会议代表参观听取了他们“大搞万斤指挥田”的经验。

会议规定，今年全区的 1 百多万亩高产水稻，全部深耕 1.5 尺，每亩施肥 20 万斤，密植 4-6 万窝。

1958 年局部推行的疯狂密植，就这样被强行推广到全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地处高山丘陵地带的邛崃在宝山公社放荒山上的土地，强迫社员整村搬迁到山下，组成“大兵团”搞万斤田。（作者注：据专区卫生局长高吉辰 1961 年调查统计，该社 195 9－1960 两年间非正常死亡 4000 多人，占全公社人口的 40%以上。高告诉作者，这个情况他当时没有报地委，但是“绝对可靠”。）

大邑青霞公社的玉米地全部实行“聚土、定向、双行、错窝、密植”，距离用尺子量，方向用“定向器”逐窝纠正。蒲江县寿安公社去年搞密植试验田吃了大亏，5 个乡党委书记研究来研究去，再搞大面积密植后果不堪设想，认为最多栽 8 寸见方，但又不敢给县上讲，就找来检查工作的地委办公室副主任田春向地委通融。宋文彬答复不行，“因为你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组织，这是党中央规定的，应该执行。”

党中央确实有这个规定。四川省委 1959 年 4 月 19 日发布的农业生产八条规定，得到中央肯定，4 月 26 日批转各省、市、自治区。指示说：在农业生产问题上，有些地方存在着松劲现象，在克服浮夸虚报倾向后又出现了一种指标订得越低越好的倾向。这种倾向也应当注意克服，应象四川省委一样，作出些必要的规定，把生产

运动搞起来。(见《当代中国的四川(上)》第 94 页)。

这是对李井泉的巨大鼓舞。自大跃进以来，吹得最热闹的当数河北、河南、湖北、安徽、广东等省。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他们中大部分开始急速转舵，有的还纠正得较为彻底，如最先放水稻卫星，并对四川影响颇大的湖北省，表现得很有勇气。他们在 1959 年 4 月 26 日给中央的一分报告中承认，“回想起来，我们当时的脑子，热到很高的程度了”，是“胜利冲昏头脑”、“感想代替政策”。

经过领导的一再表扬，“卫星”越放越高，头脑越来越膨胀，这样不加分析地表扬的结果，客观上起了一个极坏的作用，这就是，表扬了某些弄虚作假和强迫命令的现象，从而使许多了解真情的人，不敢说实话。

他们坦率地承认，粮食情况“越来越紧张”，“形成我们一个严重的精神负担”。

从旧历年到现在，闹粮之风，此起彼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越是“红旗”的越叫喊得厉害，有名的麻城县、谷城县、孝感县、红安县，一片叫喊之声，……春荒相当严重，粮食调运不及时，估计有些地方还可能发生夏荒。拥有二百多万人的武汉市，曾经一度处于供应紧张的状况……

他们心情沉重，言辞恳切。

1958 年，全党全民苦战一年，却造成这样紧张被动的局面，使我们焦灼不安。我们意识到，这种紧张被动的局面，是对于我们领导工作中所犯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错误的一种“惩罚”。尽管中央没有惩罚我们，群众也没有要求惩罚我们，而我们从内心感受到这种惩罚，我们将永远记住这个沉痛的教训！(见湖北省委关于省委扩大会议的情况报告》，1959 年 4 月 26 日。)

人民公社的发源地河北省 1959 年 5 月 3 日给中央的报告说，对播种过密的小麦试验田，“必须坚决疏苗”，广东省委 1959 年 4 月 28 日的报告说，目前已经“饿肿了一些人”：

在农村，凡有上调任务的地区，也要先安排好当地群众口粮与在群众中做好思想工作，否则，调粮必出乱子。

他们给中央进言：

公社化以后取消了家庭副业是群众最不满意的问题之一。不要怕社员有了 一点家庭副业，就会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见《广东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工作情况和部署的报告》，1959 年 4 月 28 日)

正当全国大多数地区都在急流涌退的时候，李井泉却高举红旗勇往直前，既不承认错误，更不谈缺粮。这正是一个显示对总路线、大跃进的一往无前的决心，势如破竹、不为一时挫折吓倒的凌云壮志的机会。在全国各地一片缺粮的呻吟中，四川要力挽狂澜，扶危厦于即倒，大批的调出粮食，哪怕饿死人也在所不惜。

然而这时却发生了一件他意料之外的事。

1959 年 4 月 29 日，毛泽东写了一封党内通信，谈了关于农业方面六个问题的意见。这是自 1958 年底纠左以来，他走得最远的一次。

关于生产指标，他说，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的可能性。例如，去年亩年实际只有 3 百斤的，能增产 1 百斤、2 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 8 百斤、1 千斤，1 千 2 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

关于密植问题，他说，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越密越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命令。

关于节约粮食问题。他针对公社化以后一度实行的“放开肚皮吃”说，要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他把自已一度很热心的“少种、高产、多收”否定了。他说，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 10 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3 年以内，大部不可行。3 年以内，要力争多种。农业机械化也不能过急，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后要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

关于讲真话问题，是这封信最精采的部分，他告诫人们：

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以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中央 4 月 26 日刚刚批转了四川省委关于农业生产的八条规定，3 天过后毛泽东就写了这封信，在思维正常的人看来，显然是对“八条规定”中的高指标，瞎指挥的尖锐批评，李井泉处境相当不妙。然而李井泉居然胸有成竹，公开和毛泽东唱反调。

5 月 3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把这毛泽东的封信用电话传达到四川省委，李井泉指示：“发到县委，口头传达到公社，经过酝酿后再传达到生产队中去，不要转弯太急，防止消极情绪。”

在接着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李井泉一再强调，要“从积极的方面理解”。会议印发的“纪录稿”仍然坚持“八条规定”中的 高指标和密植规格，声称《党内通信》中指出的主观主义，强迫命令当然要反对，“但是保守主义、尾巴主义也要反

对”，全省 1959 年的粮食生产高指标“不能动摇”。李井泉还说，估计《党内通信》传达到基层后，“会产生放任自流和消极情绪”，要大家有所防范。

李政委大剂量的预防针难以防治心灵的感染，接到《党内通信》的干部们惊喜万分，主席把话真是说到他们心坎上了。迅速漫延的“消极情绪”使省委的高产措施面临泡汤的威胁，坐立不安的李井泉一不做二不休，下令将发到县委的党内通信收回。

文件是收回了，影响却收不回。此时此刻，李井泉最关心的是如何消除《党内通信》造成的“消极影响”。

5 月 14 日，省委又召开地、市委第一书记紧急电话会议，传达李井泉关于密植的紧急指示。他说他从重庆回成都时，沿途在武胜、南充、绵阳等地对密植问题作了调查，结果增产了，今年有把握比去年增产得更多。又说郫县红光公社去年实行 2×2×7 寸密植，亩产达到 1900 斤，如果不倒伏，可以达到 3 千斤。他要求在群众中进行教育，大量提倡 2×7 寸、3×6 寸、3×7 寸的密植，并保证“肯定是无危险的”。他最后说，现在各地对密植意见不统一，这种“过分耽心”的情绪，是不必要的。

为了稳住各地区的头头，省委在重庆传达毛泽东党内通信后，又分片组织学习讨论，竭力挽回“消极影响”。

在川北片区的学习讨论会上，宋文彬在会上表示自己是“稳健派”，下就传到李井泉那里，正在川北视察途中的李井泉连打几次电话给宋，斥责宋是在“散布冷空气”，吓得宋找专员宫韫书商量，如何向李政委作检讨，商量结果是暂时放一放，看局势如何发展。

接着,李井泉又打电话告诉宋，说 3×7 寸密植要坚持搞，他已打电话问了广东的陶铸，陶铸也说没问题。（作者注：宋文彬回忆，在这次会议期间廖志高对他说，主席之所以写这封信，是因为北京有人吹冷风，主席有压力）。

5 月 18 日，李井泉在金牛坝召集温江专区领导和各县第一书记开会，无所忌讳的宣称，要自己心里有底，不要“人家一说密植不行，自己心中就没底了。”“三六寸、三七寸、二七寸没什么怀疑的了，没有什么危险的，罗世发社去年三六寸、三七寸粮食打了两千多斤嘛，有人经验罗，今年大部分地区可以搞好。”

散布了“冷空气”的宋文彬提心吊胆，知道要挨批了。不过，政委还是给他留了情面；“有的同志做不了好事，也做不了坏事”，他脸对着宋文彬目光却滑到一边：“对温江的工作几年有这个感觉”。

针对毛泽东党内通信中讲真话的问题，他作了不同的解释。他说讲假话有两种表现，一种是“以多报少”的瞒产私分，一种是“以少报多”的浮夸。接着他就为后一种假话辩解，他说，浮夸主要是“我们不摸底”，并不是为了荣誉和出人头地。他把新繁县委书记扯进来：“曹云生你是不是想多报一二百斤才好当县委书记嘛？我

看不是的。”

浮夸不是为了个人荣誉，为了什么呢？

主要还是国家要多拿一点，农民想多吃一点的矛盾。……我们和农民的争执点就是粮食、油料少了，争夺粮油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是这样。凭良心说，我们还是想国家多拿一点，你就不想国家多拿一点？

毛泽东在刚刚下达的党内通信中明白无误地提倡讲真话、反对讲假话，李井泉明目张胆唱反调，是他要同毛泽东对抗吗？不，没有任何事实证明他对毛泽东有丝毫不忠。他相信他比别人更理解毛泽东，这样做更符合毛泽东本意，不会有风险。他让温江专区的领导干部们领会这一点：

主席的方法论就是，当他看准了问题的时候，就下决心搞下去，气魄很大，莫可阻止，无论如何也要搞下去。……在可能的条件下，能办到的事一定要争取实现，到一定时候防止出问题，一防就可以了，束手束脚是什么也搞不成的。

李井泉非但知道缺粮，而且知道征购多了会饿死人。话已经说得很明白，浮夸的目的，是要和农民争夺粮食，争夺来干啥呢？调给中央。他以“莫可阻止”的气魄告诉大家：

“粮食、毛猪一定要调出去……死人也要完成粮食上调任务，要打扁担，我打温江、打新都，打温江这不影响全局。这里又没有外国记者。

“今年那些关着食堂闹粮的，饿死也不要管他。”（见温江地委办公室:《李政委 5 月 18 日在温江专区各县委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整理稿》，1959 年 5 月 21 日。）

24、主席的方法论

事实证明，李井泉是了解毛泽东的。

1958 年底到 1959 上半年毛泽东的纠左，往往被估价过高。这种估价又导制把他在庐山会议的表现看做“翻云复雨”。事实上他在根本的问题上从未动摇过，他胸有成竹地相信，大跃进出现的问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他要纠正的，是比他还左的左，这些问题一经纠正，便会继续大踏步前进。

以“一句顶一万句”虔诚，是不可能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有些话尽

管言之凿凿，其实并不代表他的真实思想。许多人就是因为过于听信了他的某些话倒霉的。把握毛主席晚年思想，简而言之宁可信其左，不可信其右，就算左过了头，不过是认识问题；右，则是立场问题。对这种“方法论”他有过清楚的自我表白。文革初期他在给江清的一封信中，讲了一些对林彪搞个人崇拜不满的“黑话”，然后他就告诉江清，“今后右派可能会利用我的话得势一时，左派则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见 5 毛泽东 1966 年 7 月 8 日给江青的信。）

在这一段纠左期间，毛泽东的“另一些话”是什么呢？

他说，大跃进的成绩必须肯定，必须继续进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完全肯定了的。如果对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这个前无古人的几亿人民的社会运动，只能从实践中逐步取得经验，“谁要说一个广大的社会运动能够完全没有缺点，那他就不过是一个空想家，或者是一个观潮派算帐派，或者简直是敌对分子。” 他一面要大家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讲商品生产，价值法则，一面又要大家读《张鲁传》，把张鲁政教合一的原始公社和人民公社对比。他一面批评搞浮夸风共产风穷过渡，又表扬“他们表现了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极大的积极性”，这种非常宝贵的积极性“应当坚决加以保护”。

看毛泽东 1959 年 4 月 29 日的党内通信，人们往往忽略了最后一段话。他说“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于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他真心希望的是调动积极性，继续大跃进。李井泉“要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正是毛泽东的本意。

掌握了“主席的方法论”的李井泉肆无忌惮。毛泽东说根本不要管上面规定的高指标，只管现实可能性，省委的高指标不变。眼下正在插秧，毛泽东说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命令，李井泉偏要下死硬命令。1959 年 5 月 19 日，四川日报头版通栏刊出省委批转的郫县密植经验。批文说，郫县去年普遍推行的 3×6 寸、3×7 寸条栽密植——即所谓“双龙出海”实践证明完全成功，“证明省委所提倡普遍推行的密植规格肯定是可行的，并且是没有什么危险的方法。”而郫县经验中没有提到的 2×7 寸条栽密植——即所谓“蚂蚁出洞”实际证明“产量更高”。

毛泽东的《党内通信》是写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的。1959 年 5 月 7 日，中央又发出农业的 5 条紧急指示，其中的一条明令将毛主席的党内通信，“立即发到生产小队，在群众中普遍地进行传达讨论执行。”李井泉根本不理采。

连文件都没看到的公社以下干部所理解的，就只有经李政委消化过的“主席指

标”了。在郫县蹲点的省委书记阎秀峰是这样给公社党委书记们“传达”的：

主席指示，目的是为了增产，更好的走群众路线，包产要适当，栽秧子规格要经过群众讨论，把群众的更大积极性调动起来。离开了现实不对，也不能只反映群众落后的一面，不能把能办到的事否定了。拿已经成功的事实来教育群众，去年已经有的榜样，上万斤，有决心立雄心大志，并不是不可能实现万斤的。（见《省委阎书记在 5 月 26 日郫县县委召开的各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记录》，1959 年 5 月 28 日）。

包产怎样才适当呢？郫县的包产指标是平均亩产 3600 斤，口号是“一切从高产出发！别人做不到的，我们就要做到！”

5 月 7 日中央紧急指示还规定：一、纠正少种高产，放荒土地的做法，凡一切可以耕种土地全部都要种庄稼。二、将 80%以上的猪下放给生产小队和私人喂养。三、恢复自留地，自留地不少于占有耕地的 5%。

毛猪若下放给私人喂养，必须分给自留地，否则无法解决饲料问题。对于任何所有制上的倒退，李井泉都要顽强抵抗的。省委的规定是：毛猪下放到生产队饲养，划给一定的饲料地，不分自留地。不分自留地，毛猪私人喂养自然无法实行。实际上恢复自留地和毛猪私养均未执行。

5 月到 6 月，来自中央的纠左达到高潮。5 月 26 日，中央在关于夏收分配的指示中，给公共食堂开了一个大口子，规定：可以办全体社员参加的食堂，也可以办一部分社员参加的食堂；食堂可以是常年的，也可以是农忙的；可以农忙多办，农闲少办，灵活执行。食堂范围太大的，可适当缩小。口粮应该分配到户，分配到社员，以人定量。在公共食堂吃饭的，粮食交给食堂，节约归个人；不在食堂吃饭的，粮食全部交给个人保管食用。

这就等于说，公共食堂可办可不办。中央一松口，全国许多地区食堂一哄而散。中央指示的关键之处是口粮分配到户，只要实行了这一条，食堂便会土崩瓦解。没有什么办法比这更能克服当时的粮食危机了，中国农民生存能力之顽强举世无匹，把粮食分到户，自留地分下去，给他们一点掌握自己命运的机会，他们就会创造生存的奇迹。

然而四川省委不给他们这个机会。他们把中央的指示归纳为“以人定量、分配到户、食堂吃饭、节余自得”四句话。其解释是：食堂要办下去，分配的粮食由食堂保管，节余部分也由食堂保管，不能把粮食分给个人，实际上除了“食堂吃饭”以外其它三句都成了空话。他们很清楚，粮食一分给个人，公共食堂必然瓦解，更重要的是，粮食一旦分配到户，会给粮食征收造成巨大的困难。

温江地委书记曾�在向各县传达省委的 4 句话时，作了不同的解释，他在电话会议上“歪曲省委的指示”说：粮食一定要分到户，粮食分到户，也就免了“节约归已”的麻烦，把粮食分到户，除了他吃的自然还是他的。至于粮食分到户，社员

会不会把粮食交到食堂去搭伙，他含糊其辞地说："反正我都讲了，我的责任尽了"。他能说什么呢？省委已经明确规定，食堂必须办下去。

显然是发现部分地方顶住不办，1959 年 6 月 11 日，中央发出一个更为彻底的纠左指示，作出 4 条规定：

一、允许社员自养猪、羊、鸡、鸭等家畜家禽，私有私养的完全归个人所得。

二、恢复自留地。不管社员喂不喂猪，在食堂吃饭或在家吃饭，都应分给。自留地生产的产品由社员自由支配。

三、鼓励社员种植零星空地，谁种谁收。

四、归还社员屋前屋后林木果树。

和毛泽东的党内通信一样，中央的指示直接发到"生产队支部委员会"，并要求把这 4 件事"用布告形式向群众公布，并认真实行，取信于民。"

四川省委拒不执行。不把文件下发生产队，不张榜公布，不准社员养私猪，不分自留地。

作为省一级的党组织，公然一再拒不执行中央的明确规定，这在当时是罕见的。四川因此失去了许多减少经济和人民生命损失的机会。

1959 年温江专区大幅度提高小麦种植面积，经历一个冬春精疲力竭的奋战，搞了大面积的丰产田，直到麦收前，地委对小春大丰收一直是充满信心的。供上级观瞻的高度密植的麦子密匝匝、绿油油的景观，也煞是逗人喜爱。地委在策划小春征购时，手面很大，既考虑增加征购量，又要提高群众吃粮水平，规定每个社员留粮 1 百斤，按估产的数字，如此分配下来还绰绰有余。

麦收一开始，这座海市蜃楼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大面积的"高产田"造成的大面积减产，抵销了扩大种植面积增加的收获，严重的春荒使小春作物成为农民生存的唯一希望。总的局面是，完成了征购农民就没有吃的，按地委 100 斤的标准留够口粮，征购就没有着落。

直到大跃进之前，川西坝子的农民一般情况下都是吃所谓的"盖盖粮"，即农民头年大春分回的谷子，可以吃到第二年大春。他们不习惯吃面食，其手艺之拙劣到只会揪面疙瘩。能够办到的话，他们会尽可能将麦子充征购，以减轻大春征购负担，多留大米吃。现在"盖盖粮"变成了"节节粮"，即大春分的粮食接不上趟，吃完上季等下季，季节与季节之间是断粮期。

现在他们断粮已非一日，麦子一成熟，"国家要多拿一点，农民想多吃一点"的矛盾就白热化了。地委财贸部长马炳宗，专署粮食局长商鸿仪等，在温江三圣、永兴两个公社调查后向地委报告，这两个乡今年搞万斤田，麦子种得太密，大量倒伏，人均产量只有 1 百来斤，现在农民一面打麦子一面吃麦子，"打一堆吃一堆"，吃的

是连麸的面糊糊。他们检查了 7 个食堂，个个如此。农民会不会把大米藏起来，把麦子吃光以抗拒征购呢？或者见上面干部来了吃麦子装穷呢？不是。

检查厨房和泗水缸，连一颗米粒也未见到。问群众每顿吃多少米，因干部在场，无人敢言。……有的干部说，群众认为吃连麸面好，可以节省粮食，但干部不在场时，群众反映“麦须须卡喉咙”“拿猪食子喂人”。……小春的豌豆、胡豆、洋芋也早已吃完。（见马炳忠、商鸿仪：《下乡研究粮食情况报告》，1959 年 5 月 28 日）。

征购铁板钉钉，每人 1 百斤的留粮也要“兑现”，报告说，“若以尽麦子计算口粮，则可以说没有余粮征购了”。所以，他们的意见是，“为了激发生产情绪，征购应当酌减一点。”保证每人 100 斤口粮的承诺也要兑现，办法是：一、把小春杂粮算进去；二、把吃了的麦子算进去。

杂粮早已吃光，吃了的麦子已变做粪，把二者都算进去，100 斤“留粮”等于零。

对于要维护万斤田声誉，证实密植巨大优越性的郫县，任务就更艰巨了。小春收割开始，大面积高产田严重减产的噩耗搞得县委焦燥不安。为了证明增产确凿无疑，在郫县蹲点的省委书记阎秀峰带领县委检查团到崇兴公社落实产量，找到了一个提高产量的秘诀。他们发现已经打过的油菜杆打得不干净，并且“抛撒严重”。四川日报报道说，“阎秀峰同志亲自打了已经打过的两捆菜杆，第一捆打出 11 两菜子，第二捆打了 21 两，平均每捆一斤。在已筛过的 6 箩菜子壳里，又筛出 5 两菜子。”于是检查团当场和社员算了一笔帐：每亩菜子 30 捆，每捆抛撒一斤，就是 30 斤，每亩 100 箩菜壳计算，又抛撒 4 斤 10 两；打场和晒坝上抛撒，每亩平均又是 7 斤 4 两。三笔帐加起来，平均每亩抛撒 40 斤 11 两。全县 12 万 2 千亩油菜，每亩以 40 斤计算，共抛撒 408 万斤。30 每百斤菜子出油 40 斤，408 万斤共出油 1713600 斤，以全县 30 万人计，每人平均损失 5 斤 11 两多油。

这类貌视“科学”的算帐方式当时极为流行，——用一个个别的例子，多半是胡编乱造的例子，推及一般，煞有介事，以此作为指导工作的依据。郫县县委立即发出“紧急指示”，严令将全部收打过的菜杆、菜壳进行翻打和重筛，未打二道的不准动用，各级干部必须亲自翻打，作出榜样，开现场会用事实教育群众。四川日报为此发表社论说，多少年来，人们常用“天收一半，地收一半”这句话来形容收打小春作物的抛撒浪费现象，谁都认为这是一句谚语，是一种夸张。看了郫县的事实，就应该承认这不是夸张，“丰收果实千真不确地有丢掉一半的可能。”一亩油菜收打粗糙，就要抛撒菜子 40 斤 11 两，而去年全省油菜平均产量只有 90 多斤，这不是一半么？这是多么惊人的损失！

帐就是这么乱算的。实际上某些人更感兴趣的不在于真正做到“颗粒还家”，而是巨大的“抛撒浪费”数字，不论它们实际上能否“翻打”出来，都是可以堂而皇之计入产量帐的。继发现油菜的巨大抛撒后，郫县又推出万寿公社先锋管区小麦二

次翻打的经验。他们把打过的小麦捆子分到户，按每捆翻打半斤计算，“多的归社员自收”，据称是对国家、对公社、对社员都有利，“社员反映很好”。温江地委 6 月 11 日也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普遍翻打一次，通知说，我区今年小春获得空前大丰收，特别是小春油菜更为突出，无论单产总产都增加 50%左右，但收打不干净。全区再翻打一次，可多收小麦二、三千万斤，油菜 1 千多万斤。

“翻打”游戏一箭双雕，既可为高产凑一笔数，又可解决农民的口粮问题：分几捆麦杆给你翻打，就做你的口粮了；分几捆油菜杆给你，你就有油吃了。许多地方就是这么干的。

大面积高产田的惨重失败，使农民对瞎指挥深恶痛绝。金堂县赵渡公社嘉陵耕区的高产小麦田，每亩下种 1 百多斤，比往常多七八倍，扬花时为防止倒伏，全部搭架子支撑，结果全部沤烂，“几乎没有收割的价值”。收割时农民无心清理田里的一窝乱草，说：“收几万斤的卫星麦子，哪个喊我们种的哪个来收嘛”，“哪个卖屁股的喊我们搞的密植！”

眼睁睁的事实摆在面前，水稻还要搞密植。干部下命令，农民说，麦子减了产，征购不给我们减，秧子还要按你们规定的栽，可以，你们先给我们下保证，弄拐了减了产，国家减征购！

谁个敢下这个保证？谁个又敢不照上面的话说？最好的办法是瞒上不瞒下，全耕区搞了 100 多亩密植水稻，供上级检查团检查，检查团一走，“社员又下田去把秧子扯稀了一半。”

下面越抵制，上面越是查得历害。郫县全县干部组成若干检查团，没日没夜在田间地头奔忙，检查水稻密植规格，没达到标准的“毫不留情，一律补足或重栽”。还有更历害的一手——各社队组织“土工作队”互相检查。“他们不仅是被检查者，而且是检查者；既检查自己的生产，也检查别人的生产，这就激发了他们的责任感”，实际上激发的是要遭秧大家遭秧的报复心理。

据说有的基层干部受本位主义影响和“面子”束缚，在本队不敢按原则办事。一到别的生产队“一下子就认真负责起来了”。对不起，你对我们“认真负责”，我们也不饶了你们。这种办法和金堂县仁和乡的“换着打”有异曲同工之妙。经土工作队互相残杀，郫县的高度密植很快“全面落实”。

死不改悔的强迫命令，有增无减的高征购，顶住不放的“一大二公”，使农民完全丧失了生产的信心，曾经是“红旗单位”的金堂赵渡公社嘉陵管区现在“大不相同了”。

社里不顺眼的事一天比一天多。干部放弃领导，忙于赶场，睡大觉。社员呢，无人管理，想搞生产的，东旋西摆够了，半晌午才出工做活路，不乐意的就去河边捉鱼，挖树格蔸赚现线。……有的社员存有“几望”思想：一望早晨起来迟，二望

食堂勤开，三望休息时间多。有人编成这样一首歌谣：出工号，哒哒响，一两个钟头上不了战场；收工号，刚一响，脚杆马上离田旁，三窝麦子不扯完，急急忙忙跑食堂……

食堂也没有什么指望。小春收割后一个多月，温江专区大部分食堂就停伙了。一些基层干部眼看集体存粮无法维持到秋收，索性将粮食分给社员吊命。一部分则是难为无米之炊，不得不关门让社员自寻生路。勉强还在办的，多以糠菜充饥。“糠菜半年粮”的口号再次叫响。上面提口号，下面编歪诗，1958 年诗歌运动涌现的人才创作活跃：“一进食堂门，稀饭几大盆，锅里起波浪，警防烫死人”，“开水一桶，麸子一捧，肚子胀爆，机巴拉肿”……

高产、多收继续吹，少种的确不敢再干了。不仅要恢复“休闲”的土地，还要把力所能及的土地也种上庄稼。

6 月，温江专区根据省委指示，开展“不空一寸土，见缝就插针，每人百斤粮食”运动，要求利用一切零星荒地，每人增收 1 百斤粮食。不见下面有动静，地委又补发一个通知，规定“见缝插针”谁种谁收，公社各级不得收归公有，亦不能顶分给社员的口粮。

这倒是挺诱人的。但是被朝令夕改、出尔反尔的政策变化弄得情绪低落、满腹疑虑的农民仍然“迟疑观望”。经一再动员保证，农民们干起来了，当粮食成熟的时候，他们的担心再次不幸成为现实。庐山会议的结果使各级的承诺再次变为谎言，“见缝插针”的粮食不是收归公有，就是顶了口粮。

25、良知真情

李井泉按照“主席的方法论”坚决抵制纠左，一个人在广汉根据中央指示大搞“倒退”，此人就是温江地委副书记曾笳。

曾笳为了地委要给李政委一个交待所作的检讨，实在是极不严肃。妻子宋立华问他检讨什么，他说“我检讨嘴巴不好”。实际上他嘴巴继续不好，公开发牢骚说：“红光公社的郑凤兰，倒霉就倒霉在这小女子身上。我们说了几句老实话，郑凤兰在那里讲了几句假话，结果是我们挨批评，郫县就是不老实。”

李政委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1959 年初，宋文彬就告诉他，省委的意思，要你下放劳动，并且是“以普通社员的身分参加劳动”。曾说，好，我就喜欢劳动。当了几天社员，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下来，宋文彬就把他叫回来，要他下去抓个纠正共产风的试点，这正合他的口味，1959 年初到了广汉县北外公社的一个生产队蹲点。

蹲点的三中队就在北门外，一出城就看见一群群的农民在胡豆田里摘——准确的说是抢胡豆。他楞了，二月间胡豆还没“饱米”啊，现在摘太可惜了嘛。马上找干部社员开会了解，大家说，现在以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庄稼收了统一分配，哪个中队缺吃的，就到有吃的队上去调，现在队队都缺粮，队队都怕自已吃亏，所以胡豆还没熟都去抢，“你不抢人家要抢，哪个抢到该哪个，反正都是大家的。”胡豆抢完了，地却没人去犁，其它春耕工作也丢在那里，道理是一样：大家的活大家做，你不做我也不做，哪个又愿意给“大家”做呢？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不优越性暴露无遗，曾笳就要在这个问题上下手。先拿最能体现优越性的“吃饭不要钱”开刀。那时候有一幅到处引用的对联说：“自从盘古开天地哪见吃饭不要钱？而今人民掌乾坤从此生产不靠天！”红光公社“富裕农民”范克成也曾在家门口贴了一幅对联：“吃饭不要钱有何趣味，作事要长远无过乐观”，这位预言家的话很快就兑现了。多吃了粮食不说，还吃坏了品德，干活路一群一伙打打闹闹，锄头变成了板凳和拐杖，间或高高举起，自由落下。队上有 3 户广汉县城人，公社化后下放当农民，饭一吃就到街上坐茶馆，根本不出工。曾笳一天到城里剪头，见队上一个进城担粪的小伙子躺在理发摊的长凳上睡觉，他剪完了头，小伙子还躺在那儿。他问，你一天担几挑？“1 挑”。你能够担几挑？“8 挑”。为啥只担一挑？“吃饭不要钱，按月发工资， 挑那么多做啥？”

曾笳第一着，取消“吃饭不要钱，按月发工资”，社员出工评工记分，按工分决定吃粮标准和工资标准，不劳动者不得食，不得钱。一下子出工问题就解决了。

第二着，划小基本核算单位。中央规定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原高级社，省委规定下放到管理区。曾笳蹲点的 3 中队 111 户人家，相当于原高级社。曾笳按中央的办，把基本核算单位定在中队。结果还是不行，全队 1 百多户人家，三五户一个居住点，生产队长派工“哨子吹烂，脚杆跑断”，社员出工象鸭子翻田坎一窝蜂，生产效率极低。实践证明，不仅省里的规定行不通，中央的规定也行不通。

4 月全县万人算帐大会上，曾笳向基层干部和社员代表提出一个问题：以原先的小社(初级社)为核算单位如何？

回答他的是大喜过望的一片欢呼：

“这样干我们保证把生产搞好！”

“累死都情愿！”

“早就该这样干了！”

曾箈和县委干部研究决定，先以生产落后，缺粮严重的向阳公社搞试点，把核算单位下放到原初级社。他向宋文彬汇报说，这是群众的要求，宋文彬同意试一试。

以过去的初级社为核算单位，必须把现在的生产队划小，但这样一来，就成了公社——管理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四级核算，和中央规定的“三级核算，队为基础”的原则不符。曾箈提出，把生产队一级取消，把管理区划小，搞成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三级，实际上就是大跃进收场后不得不实行的那种体制。

第三着，“搞垮”公共食堂。他蹲点的中队，4 百多人全在一个食堂吃饭，住得远的吃一顿饭来回跑 10 多里，老年人一日两餐走路都困难，遇到雨天更惨。曾箈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3 个月时间只吃过一次肉，肉端出来，几百只土碗在地上摆开，几百双电筒似的眼睛盯着饮事员的瓢儿，男人们的喉结在滚动，女人们紧紧地抓住孩子，生怕他们会扑过去，这碗少了，那碗多了，添过去，匀过来……曾箈看着表，整整分了两个半小时！

过去一家一户的小锅小灶，多半用谷草麦草树枝树叶做燃料，现在几百人的大锅大灶，非烧柴烧煤不可，川西坝子不出煤，外地运来的太贵买不起，只有砍树子。树子砍光了砍竹子，竹子砍光拆房子，烧农具，曾箈决定给这个怪物动动手术。先把全中队 1 百多户人家划成 5 个小队，每队 20 多户，把土地、耕 牛、农具、包工包产的权力全部下放到小队，食堂也就顺理成章地分成 5 个。

让它存在也是迫不得已，实际上他迫不及待想把这颗“萌芽”掐掉。他到处高谈阔论：“苏联的集体农庄还是各吃各的嘛。我看到共产主义也不会有公共食堂”，“还是一家一户吃有计划”。地委拨给县上的救济粮，他决定直接分到户，理由是：“分到食堂几天就吃光了，分到户还可以多吃几天”，以人定量，分配到户的中央指示一下来，他不理采省委的解释，要求全公社将小春粮食分配到户，食堂名存实亡。

第四着，下放毛猪，分自留地。公社化以后，社员毛猪全部入社，不准社员私人养猪，曾箈见集体养猪场的猪瘦得站都站不起来，心痛的对干部说，公社化前全区毛猪每月增加 10 万头，公社化以后每月减少 8 万头，只有把毛猪下放给社员才是出路。中央下达毛猪饲养“公私并举”的方针后，他说，要放就放到底，将集体养猪场解散，毛猪全部下放给私人喂养，并分给养猪户自留地。

既然大气候是纠左，对深恶痛绝的万斤田他自然不会放过。他指着县人委试验田立的万斤田牌子：“吹那么大的牛干什么？自欺欺人嘛，取掉！”毛泽东的党内通信一到，他更是乐不可支，公社的包产指标已按 2000 到 2500 斤落实到每一块田，他下令降到“包产 600，争取 1 千”。栽秧的时候，省、地的密植命令如 12 道金牌，他对社队干部说，搞两块密的，其它按老办法栽。有人担心县上追究，他说：“不管他们的，就按我们说的办”。听说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在新繁大丰公社提倡栽七八寸见方的秧子，他叹道：“田家英真把农民的心意摸到了！”

和曾笳一样有良心的干部在四川省委领导中也不乏其人，他们只不过无法改变省委就是李政委，李政委就是省委的现实。省委副书记、副省长阎红彦对虚报浮夸深恶痛绝，曾在省委常委会上说李井泉“打肿脸充胖子”。 会后省委书记阎秀峰告诉他：以后有不同意见，不要在会上讲，“李政委没这个习惯”。阎红彦问：这是他叫你讲的，还是你个人的意见？阎秀峰说：是我个人的意见。阎红彦说：是你个人的意见就别讲，“我还没那个习惯呢！”他向自己的老部下、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明朗叹息：“我们党的事业，坏就坏在这帮败家子手里”。

就在省委号召“二次翻打”，为 59 年小春高产凑数时，阎红彦在仁寿县检查小春产量，亲自参加收打油菜，过称时发现生产队长作假，这位陕北大汉压住火气说：“我知道，这是上面要你们搞的，你不能不服从。但你想过没有？油菜报多了，社员还吃不吃油啊？粮食报多了，社员还吃不吃饭啊？共产党干革命为了什么？就是为了人民。这样做，是在坑害人民，是在犯罪！”

7 月份，他再次到仁寿明察暗访，所见所闻令他触目惊心，回来连夜给省里写信：

省委并大章同志：

我 17 日到达仁寿，……从 6 月中旬开始，先后陆续发现缺粮情况严重和被迫停伙的食堂有 1918 个，约有 15 万人。其中方家区情况最为严重，……和平管区第 4 队共 8 个食堂，从农历 4 月 29 日到领粮止的 35 天中，平均每人只吃粮 7 斤多(谷子 3.7 斤，嫩包谷 3.8 斤)，而且有 10 天未吃盐，断粮后社员各自寻食，该队共 48 户社员变卖衣服，蚊帐……　6 月下旬起该县流行一种水肿病，据县委说，全县发病最高时达 56289 人，……截至 20 日止，因水肿病死亡的全县有 197 人……有些干部硬不承认有问题，明明有人由于断粮而变卖家具被盖，往成都跑，有水肿病人，而硬说没有或说这是落后社队的个别现象。”(见贺安华:《共和国上将之死》，成都出版社，1994 年版 240 页。)

阎红彦的信写给李大章，是因为对李大章的信任。在省委领导干部中，李大章资格最老，他 1920 年赴法勤工俭学，曾与周恩来邓小平共事，任青年团旅欧支部秘书长。1942 年中央太行分局成立，邓小平、李大章为分局正、副书记。和一班对李政委唯唯喏喏的人比起来，他是最有独立人格的，然而他也无力回天。在他之上，毕竟还有一手遮天的政治局委员李井泉。半年多的纠左，并未触及根本，宁左勿右的大气候并未改变。 就这样，一个地方官员，无论有多少人与他意见相左，只要有最高决策者的信任，他就可以一意孤行，为所欲为。

阎红彦只有摆脱了这道阴影，他才能多少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1959 年 9 月，阎红彦调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一到云南到就砍公共食堂：“我们共产党人天天讲从实际出发，现在的做法离实际何止十万八千里！必须解散公共食堂，”听得下面的干部目瞪口呆。经他拍胸脯保证“一切后果由我承担”，大部分地方食堂解散了，还有

少数工于心计的人下一半、留一半，阎就骂他们“品质恶劣”，“好象过去资本家，两个儿子一个送到共产党，一个送到国民党。”

1959 年春天开始，富甲天下的川西坝子的农民开始大批流亡。流亡的目的是为了找一碗饭吃，最好的选择是当工人。整个大跃进期间，既使在农村大批饿死人的情况下，工厂和基本建设单位粮食都有最底限度的保障，而且吃的是“最高标准”。仅仅这一点，就让农民垂涎三尺。有关加强工农联盟、缩小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的伟大历史进步被大肆渲染，实际上差别是越来越大了。社会地位上，自从城乡区分户籍以后，农民便成为只有向国家交售产品的义务，却不享受国家供给的贱民；政治上，农民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土壤，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经济上，他们的私有财产被剥夺殆尽，除了有劳动的义务，不知道还有什么“权利”，发家致富的希望彻底断绝不说，作为粮食的生产者，竟落到食不裹腹的地步。千百年来对土地、家乡眷念的遗传基因似乎发生突变，他们纷纷出走，大办工业和规模巨大的基本建设给了他们改变处境的机会。即使找不到这样的机会，为了活命也迫使许多人东奔西跑，浪迹天涯。女人愿意嫁到任何一个穷乡僻壤——只要有吃的。

7 月，一次更大规模的流亡席卷川西坝子，成都市的大街小巷、旅馆车站、餐馆、糖果铺挤满了脸青面黑、神情凄凉的农民，每日少则数万人，多则 10 数万人，他们有的提着几个鸡蛋，或一只鸡、鸭，想给城里人换点粮食，有的背着个小包袱，寻求招雇，更多的人则是两手空空，只想来吃一顿饭或买点可吃的东西回去，入夜，大批人卷缩街头露宿。据温江地委和成都市委“动员农民回乡联合办公室”统计，7 月 20 日在西城区饭馆吃饭的农民达 53428 人次，“挤购糖果”的 7850 人次。少得可怜的馆子其拥挤程度从以下的统计中可见一斑；7 月 20 日，香雪海饭店进餐人数 3528 人次，竹林小餐 2706 人次，东华饭馆进餐人数 2100 人次；7 月 21 日，香雪海饭店 3331 人次，竟成园 4658 人次。华阳胜利、桂溪、石羊等乡“档获”进城购食品农民，查出饼干 1400 斤，糖果 400 斤，面包 800 多个，蔬菜 2 千斤，煤油 20 斤……

由于进入成都市的十之八九是温江专区的农民。地委和成都市委专门成立 “动员农民回乡联合办公室”共同采取措施阻止农民进城。地委采取的措施是：各县各公社严格清点人数，保证“不走一个”，个别确有事需进城的，须经公社批准并出具介绍信；对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严加管理，一律不得进城；对夏征未完成、又停伙又放人进城的社队，查清情况严加处理；在靠近成都的场、镇设立检查站，“制止、档回”进城农民；有重点地供应粮食给缺粮伙食团，全地区共解决 475 万斤(人平 1 斤多)。

成都市采取的措施是：动员户籍员、饮食糖果业服务员、居民积极分子“全线

出击”，劝说农民返乡；限制饮食糖果业供应时间和数量，饭菜不许出堂；白吃不给钱者加以“处理”，公安部门加强对旅馆、街头巡逻；农民所带鸡、鸡蛋等必须进入市场按规定价格出售，用粮食交换鸡、蛋者，卖买双方均予处罚……

农民有自发进城的，也有基层干部支持出走的。有的社队给社员出具外出证明：“兹证明某某等到成都支援各厂运输”，“该人身体条件差，不适应农村劳动，同意到成都市擦皮鞋”云云。

许多被“查获”的农民死活不回去，向清查的人员倾倒苦水。简阳县董家乡的一个生产队长说：“订生产计划的时候，你订三千斤，我订两千斤，实际只收了 2 百多斤，任务完不成不敢说，怕辩论，脱不倒手。青黄不接的时候，叫你清麦杆子(所谓‘二次翻打’也)，清得到好多吃好多。”一个农民说：“我们社停了一个多月的伙食了，小娃娃扳螃蟹吃，我来吃点饭，买点饭回去给老的、小的吃”。黄瓦街辖区一个旅馆清出 7 个农民，走到半路，一个女人躺下硬是不走，两个干部去动员时，其他的就一哄而散溜之乎也。温江万春公社农民苏万东在人民商场吃了三角钱的饭拿不出钱，被档到派出所后说：“随便咋个处理，我就是不回去，回去社长要打我。”崇庆县羊马乡 19 岁的女青年曾德芳双哭又闹：“我来成都找我哥的，你们要我走，我就跳河死！”双流农民吴绍远说：“我们来成都是不得已，前几次回去吃了两把菜，每人每天只分两斤茄子，”坚决不回去。

数以万计的饥饿的农民涌进城市，想象起来令人恐惧，然而他们却驯良、规矩得令人感动，在 10 多天的“联合清理”过程中，没有发生过值得一提的刑事案件。例如：“联合办公室”21 号的简报统计，当天全市发生刑事案件 11 件，其中够“立卡”的 2 件，这 2 件是：1、“伪军官”王志刚来成都投靠其兄王洪翔，因王洪翔“不管其生活”，于 7 月 19 日盗窃城皇庙 8 号张文华下装一条，又于 21 日在簸箕街盗窃架架车一部和 30 斤钢材到天回镇废品收购站销赃，被破获。2、邛崃农民杜顺廷，20 晚在苏坡桥偷去大小鸡各一支，被青羊宫派出所抓获。且“态度极端蛮横”，说：“公社 1 个多月不开伙，逼得我去偷，随便政府咋个处理……。”

农民的悲惨处境引起了市民的广泛同情。营门口 95 号妇女郭中先说：“农民好惨啊！连饭都没有吃的，都是干部捣的鬼，整得来农民饿肚皮。”一个老太婆看见糖果店不卖糖果给农民，说：“工人和农民分家了，不卖东西给他们吃了。”浆洗街设有路卡阻挡农民进城，一些市民替农民打抱不平：“城头这些人这么寡孽，二天他们到乡坝头来，还是把他们卡起来。”

7 月 21 日上午，省长李大章在省委召开的动员农民回乡会议上，强调要坚持说服动员，切忌简单生硬作法，把农民当敌人；农民挤饭馆吃饭不应制止，除了粮食以外的东西应该允许农民购买、带回。根据大章同志指示精神，对流落街头的农民按县籍进行了集中，由市、县共同派员接待和做工作，商业部们供应饭菜，使其“饱

肚子”回乡。在动员集中时，所有工作人员不准携带武器，公安人员不着警服。规定除米、面外农民购买物品一律不得扣留，排队吃饭购物的一律不准拉、押和集中，并通知饭馆、糖果店不得向农民惜售。进城出售禽、蛋的农民除进行价格管理，不应阻留干涉。（见 6 温江地委、成都市委动员农民返乡联合办公室简报，1959 年 7 月 19 日至 23 日。）

得碗饭吃，农民就老老实实跟着县社干部回乡。再过两月，他们就享受不到这种优厚待遇了。

26、惭愧万家百姓心

田家英，成都人，原名曾正昌，幼年丧父。曾就读省立城北中学和成都县立中学。田家英是他少年时代在成都刊物上发表文章的笔名。后因生活艰难辍学，在药店当学徒。1937 年，年方 16 岁的田家英奔赴延安。从 1948 年起，一直任毛主席的随身秘书，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他才华出众，是一个虔诚的理想主义者，满脑袋以天下为已任，忧国忧民的书生意气，唯一的爱好是收集字画。在大跃进之前，他深得毛泽东赏识。1959 年初春，田家英受毛泽东之托，回四川老家调查农村情况，工作组中还有毛泽东的另一位秘书逄先知。省里对这位来自毛主席身边的“田主任”既不敢怠慢，也有所警惕——谁知道他安的什么心眼儿？最初他的目标是郫县，但 2 月 17 日他到红光公社去调查后，人家就看出他是什么心眼儿了。严格地说，这算不上调查。公社书记郑凤兰拿个本子，一条一款地汇报，这是她三天两头要做的事。当郑说到今年贯彻少种高产多收的方针，层层搞万斤田时，田问：“你们搞少种高产多收，是减少复种指数，还是搞间隙地？”又说：“少种高产多收，我认为在郫县这样土地肥沃的地方，减少复种指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是对的。象安岳，丢土地太多了。”

安岳是省委树的少种高产多收典型。这一棒，就打到省委头上。当郑读到整社中富裕农民对公社化不满，开展了辩论时，田问：“辩论如何辩法？斗争没有？”又是一棒。讲到幼儿园，他问“死娃娃没有？”，讲到建居民点搞“田园化”他说：“不要把地占多了”……（见《田主任了解犀浦公社的情况》，1959 年 2 月 17 日。郫县县委办公

室整理）。

很快别人就发觉来者不善，他也很快发觉在郫县难以有所作为。省、地、县的干部随时伺侯，走到哪跟到哪，所去的地方都作了精心准备。本来他此行是保密的，这样一来和公开视察有什么两样？他决心甩掉这队“尾巴”，到新繁县去。

新繁与郫县毗邻，各方面条件在仲伯之间，也是省里的重点，也有个和红光公社不相上下的先进典型——新民公社。大跃进以来，两个县一直较着劲，你追我赶，大搞竞赛，卫星放得不相上下。另外，田家英的一个舅母就住在新繁的崇义乡的乡场上。他对新繁县干部罗远述说：“我舅母该不会哄我嘛。”

你选择蹲点的崇义乡距成都以北 10 公里，公社化后改为崇义公社，田家英想给它改个响亮点的名字：“粮食产量上不去，社员肚皮吃不饱，你崇尚义气有什么用？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夺取粮食大丰收，改个‘大丰’公社好不好？”干部社员一致同意。

他在社员大会上说：从前，李太白上韩荆州书说，“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什么是万户侯？我看我们公社的党委书记就象万户侯，万多人的领导嘛，任务是什么？上报国家，下安黎民。拿什么去报国安民？第一就是粮食，民以食为天。国家的粮食储备多多的，老百姓的肚皮吃得饱的，公社书记的首要任务就算完成了，就是党的好干部。作到“万家生佛”，就是一个好的“万户侯”。

大丰公社的干部社员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他从何来，只知道他叫“田主任”。田主任一口道地的家乡话，见人就笑嘻嘻地打招呼，一有空就这家院坝窜那家院坝，男女老少都摆得起龙门阵。他最喜欢娃娃，经常手头抱一个，背上背一个，老乡们给他取个外号叫“送子娘娘”。公社的小灶他不去，和社员一起吃公共食堂。割麦子、栽秧子，出工收工跟社员一起。社里积肥，他拉起架架车去成都拉大粪，有时一天住返两趟，有一次差点摔到粪坑里去。有天晚上，他跟两个干部刚装满一车粪，下起瓢泼大雨，只好把车子存放了，到省委招待所投宿。门卫见这几个裤脚高挽浑身透湿粪臭哄哄的角色，硬是不准进去，幸好招待所长出门遇见，原是认得的，才得住下。

走进老百姓的生活，他的心就一天比一天揪紧了。刚去不久，他就听说农民到附近的天回镇挤馆子吃饭。他专程去调查，只见几家小小的馆子门前人头涌涌，几百农民排着长队买饭吃，有的买了饭倒在兜里就走。馆子每天供应有限量，人多饭少，争先恐后，哄闹不息。看得他眉头紧皱：“玄火！”（四川方言，意为危险）。

他搭伙的公共食堂更玄火，每天几瓢稀饭，根本见不到油晕。一位姓陈的大娘饿着肚子走了老远的路，食堂拿罐罐打了一家人的稀饭，刚出食堂门脚一软，稀饭泼了一地，她守着那摊稀饭哭得好伤心。田家英劝她：“不要紧，另外打就是了”。“另外打？咋个会打给你嘛！”他掏出自己的 5 斤粮票，让陈大娘到食堂称米，食堂

没米，只好称了 5 斤连麸面。

大丰公社的老百姓中流传一个故事：田主任双手叉腰，抬头望着“公共食堂万岁”的标语说：“万岁？我看恐怕是半岁。”

“上报国家，下安黎民”的书生意气，激励他想尽一切办法弄清事实真相。公社号称 1958 年亩产 1 千多斤，还放出 24000 斤的高产卫星，除去征购，存粮充裕。田家英到处找老百姓摆龙门阵，弯来绕去总要扯到产量上去，听到的回答竟如背颂同一篇课文。

“你们每亩产多少斤喃？”

“卫星田产了 24000 斤。”

“真有那么多吗？”

“广播头都广播了，那还有假。”

“一般的田呢？”

“少说也有一两千嘛”

“产量那么高，为啥子公共食堂稀饭捞清，还吃连麸面呢？”

“丰收不忘节约嘛”。

他不死心，努力用行动去缩短“田主任”和黎民百姓的距离。一天，他在场口遇到混熟了的大队干部林功谦，和他谈了很久，林被他的真诚打动了。

“田主任，说老实话，充其量只有 6 百多斤。”

产量加番虚报，除去征购，老百姓倒底还有多少口粮。他到一个生产队，问队长马世才还有多少口粮，马说还有 3 万斤，田要他打开仓库看。仓库打开，确也象有 3 万斤的堆头。田踩上去，松泡泡象海绵，用竹棍一桶，谷子象沙子似地漏下去，露出了垫在下面的稻草。他开玩笑地说了一句：“这谷子恍壳太多了。”

他怎么能责怪这个生产队长？这是他们的“口粮”啊！他们是在强咽泪水作假，用他们的肚皮作代价去装点别人需要的“丰收”神话啊！

假话如此之猖獗，绝大多数人是出于无奈和恐惧。人总得生存，如果现实环境是讲真话意味着大祸临头，你能怪人们不老实吗？在那个时代，能够做到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在不危及个人生存的情况下尽可能不说假话，真就算好人了。新繁县委书记曹云生就是这样的好人，这一年他已经 50 岁，在全温江专区县以上领导干部中岁数最大，被称为“曹老头”。曹老头待人谦和，工作踏实，省里把新繁作为象郫县一类的先进典型抓，他觉得“日子难过”。 田家英到新繁，李井泉事先就给他打了招呼，无外乎要他有所提防。这一来他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一边是命运在其股掌之中的李政委，一边是毛主席身边的人；假话不能讲，真话又不敢说；躲着不见面说不过去，见了面更说不过去。

田家英何等聪明之人，曹老头的难言之隐怎能不理解，他见了曹老头从不打破

沙锅问到底。有一次他问：新繁推广双季稻，效果究竟好不好？曹摸棱两可地说，这事省里搞过一次大辩论，有不同意见，现在还很难作结论。田给他背了几句古文："橘生于南为橘，生于北，则为枳"，解释说，同样的果树，在淮北和淮南结出的果子完全是两回事，凡事不能生搬硬套，要因地制宜。

有一次两人议论到密植，田家英又讲了一个故事：古时候，有个驼子，种的果树长得又快又高，结的果子又早又多又好。有人问他决窍何在，驼子道，他并无奇技，不过顺应事物本性，尊重自然规律罢了。而有个官员，从早到晚忙忙碌碌，叫老百姓如何耕植，如何收割，好象是很关心老百姓，结果反倒给老百姓带来灾难（见唐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

将近 40 年后，年近 90 的曹老头回忆起这段往事不胜唏嘘："田家英太耿直了，40 多岁就走了……。"

毛泽东的《党内通信》下达后，田家英在省委的一次会议上和李井泉发生一场争执，田争辩说，省委规定的密植标准根本行不通，根据他在崇义乡(即大丰公社)的调查，去年搞密植造成减产，产量纯属虚报。5 月 18 日在对温江专区县委书记的讲话中，李井泉耿耿于怀的谈到此事：

崇义乡去年产量没有那么多？崇义乡为什么要多报一点呢？为什么不愿把产量帐拿出来呢？崇义乡没有瞒产私分是不可能的。

田家英是大丰人不幸岁月中的幸运，他参加省委传达《党内通信》的会议后，不理采李井泉"发到县委，口头传达到公社，经过酝酿再传达到生产队"那一套，叫人马上赶回大丰公社传达："找几个口齿清楚的女娃娃当广播员，一天播几次，连播几天，让全公社都听到毛主席的声音。"他自己又在社员大会上亲自念了三遍，提出：秧子栽稀栽密，不作硬性规定，不强求一致，根据不同情况自行决定。他安慰省、地领导说，这是"政策性试验"，"即使我失败了，也不过一个公社，四川有几千个公社，影响不了大局。"结果大丰公社"另搞一套"的消息不胫而走，试图效法者蠢蠢欲动，有影响大局之势。省委随即通知说，"大丰有田主任，他在搞试点，应当例外。"

用政治恐怖维护高产神话，以便不顾老百姓死活的进行高征购的做法，深深地伤害了田家英，他必须揭穿这个神话，让中央了解老百姓的苦难，他选中名声赫赫新民公社。公社书记罗世发后来回忆说：

"那一年热天，突然接到县委通知，田家英要到新民来调查。我一想，烫！高产卫星是"水"的，推广双季稻，搞密植，明明估倒牯牛下儿。说真的得罪省上，说假的得罪中央，两头脱不倒手，我就安排了三个生产队长向田家英汇报，我躲开了……"。

三个生产队长讲了实话，田家英找到罗世发，看他说不说实话。

“田家英问我，58 年产量究竟是多少？我说，这个问题说不清楚，干干湿湿，新亩老亩，虫打鼠耗，还有抛撒浪费，看你咋个算？田有那么多，只能抽查估产，可能有虚报浮夸，也可能有瞒产私分，莫法说准确。总之，新繁的产量比郫县差一篾片。”

话说得精明圆滑到家了，但田家英看到了精明圆滑后面的东西。1959 年 6 月下旬，田家英离川去参加庐山会议时，他约罗世发再谈一次。谈话是在省委招待所田家英的房间里进行的罗世发后来回忆说：

“我按约定的时间和田家英谈得很多。他对我说：‘我为什么来找你？因为你是著名的劳动模范，是全国人大代表，是有身份的人。你应该代表农民说他们心头想说的话。你是共产党员，就应该有党性，对党忠诚老实……他掏出笔记本，讲了在大丰公社调查到的真实情况，讲了说大活假话的危害，还讲了毛主席的《党内通信》。他说，中央已经着手纠正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这些错误了，你还有什么顾虑不能反映真实情况呢？他说得那么诚恳，那么尽情尽理，我还有啥子话说？我就把 1958 年怎样搞真假两本帐，上报的产量是假的，一五一十的给他谈了……”（见刘冠群：《田家英在大丰》，《红岩春秋》杂志 1986 年第 6 期）。

这才是真正的罗世发。田家英立即安排留在大丰的工作组，把罗世发反映的情况整理上报中央。离开大丰前，愤怒的田家英在公社火神庙坝子上召开几千人的群众大会，高声宣布：

“向党讲了老实话的同志们，请放心！今后如果有人敢打击报复，你们就到北京来找我，来回车票不要你们掏钱！”

田家英是直接从成都启程，从重庆乘船前往参加庐山会议的。6 月 28 日，在从武汉驰往九江的江轮上，他和李井泉又发生了冲突。当时他和周小舟、毛泽东的英文秘书林克等聚在甲板上，谈起在河南、四川调查的情况，感慨万端地说，我们党历来提倡说真话，现在都是假话满天飞，越吹越离奇，牛吹得越大越受表扬，讲真话的老是挨批。正谈得起劲，柯庆施、李井泉等人走过来，柯庆施问，谈什么这样热闹？田说，现在可是有些地方在饿死人了。李井泉立刻反驳：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田没有和他争辩，因为他戳的就是李的痛处。

李井泉对田家英的反感是可以想象的。这个人曾在省委的会议上公开反对密植。这个人把毛泽东的党内通信在社员大会上宣读，在广播里播放。这个人不顾省委的密植命令，在他的鼻子尖下另搞一套。这个人——他马上就会知道，竟对他多年扶植的先进典型罗世发进行策反，揭他的老底。还有更要命的，这个人随时可以“上达天听”而他却莫可奈何。

家乡的境况和挨饿的亲身感受，给田家英的印象太深了，在庐山他不止一次给

好些人谈起在家乡蹲点调查的情况，谈到“真假两个罗世发”的问题，罗世发已经承认高产是上面逼迫下虚报的，他有一个专门的材料。7 月 11 日晚，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和李锐谈话，田家英祥细汇报了他在四川蹲点的情况。

众所周知，庐山会议是以反左开始，以反右告终的。会议的上半阶段，田家英的心情相当轻松，会上畅所欲言，会后游山赋诗，忘情物外。相反李井泉的日子倒是不太好过。在李井泉主持的西南组开会时，田家英再次谈到下面受压虚报产量的问题，虽然受到李的压制“以致讲不下去”，但毕竟使李井泉如坐针毡。后来李井泉作了检讨，他说他“并不怕讲缺点，只是对把缺点讲的过分有点抵触。”他承认头脑确有些发热也有官僚主义，钢铁说有把握完成，实际没有办到，农业产量上报数字过多，农村劳动力动员过多等等。

比起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的检讨发言，李井泉简直就算不上作检讨。吴芝圃说：河南共产风刮得历害，虚报浮夸也最历害，特向各省道歉。王任重心情沉重，说今春湖北 500 万人缺粮，吃粮水平比统购统销开始后的 54 年最困难的时候还低，教训确实沉痛，很难过。四川此时的情况比湖北有过之无不及，李井泉居然未置一辞。

李井泉公然拒不按规定传达毛泽东的党内通信，一再抵制中央纠左的一系列指示，按道理应该受到惩罚，然而毛泽东则给予出乎预料的宽容和谅解。7 月 11 日田家英告了李井泉的状的那次谈话中，毛泽东解释说：李井泉是挑担子的人，容易有脾气。还主动承担责任说。我提倡过密植，(关于密植)现在是中间偏右派。

7 月 23 日，“硬着头皮顶住”的毛泽东终于开始反击，彻底扭转了会议的方向。至此，在声讨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喧嚣声中，1958 年底以来逐步得到纠正的错误大部分被重新肯定，奄奄一息的大跃进列车再次嘶叫着向黑暗的深渊狂奔而去。

李井泉押下的这一注开始大量进帐了。7 月 23 的讲话中，毛泽东在讲到公共食堂问题时，表扬了四川：

“还有一个四川、一个云南、一个贵州、一个湖北，还有一个上海(上海有 11 个县)，90%以上还在食堂里。试试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 4 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四句话？我是个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试试看。三分之一的人口对 5 亿农民来说，多少人？1 亿 5 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开天辟地了。……如果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海等等，那么，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面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

在虚报浮夸方面，李井泉受到巨大鼓舞。8 月 1 日、8 月 11 日毛泽东两次肯定它的好处。

“放卫星好，放了许多假卫星，还要放的。大放假卫星，有极大处好，无假哪里来真？有假卫星，才有真卫星。”

“浮夸之风呢？吹一吹极有好处。你不吹？总要吹的。”

浮夸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不放假卫星，就出不来真卫星；有浮夸，才会有实事求是。这套相对主义的哲学使毛泽东往往以常人不可理喻的眼光看待问题，和文化革命的“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一脉相承。李井泉确实掌握了这个方法论。

李井泉在批判彭德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在批彭德怀时扬言：你们有一个俱乐部，我们也有一个俱乐部，用来对付你们那个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田家英称之为左派司令部。当彭德怀的信件被印发讨论，毛泽东尚未表态时，田家英告诉李锐，由柯庆施、李井泉等人挂帅的左派司令部正在积极活动，他们知道彭德怀同毛泽东有宿怨，挑动说这封信的矛头是针对毛泽东的。还散布彭德怀在拉队伍，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万岁”。李锐认为，导致毛泽东突然翻脸的，除了他本身的原因外，也与这些人的煽动有关。

在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下，所有的人都不能不参与对彭德怀的批判，但李井泉无疑最卖力者之一，会议后期分组批判彭德怀时，李井泉是第四组的负责人。李锐回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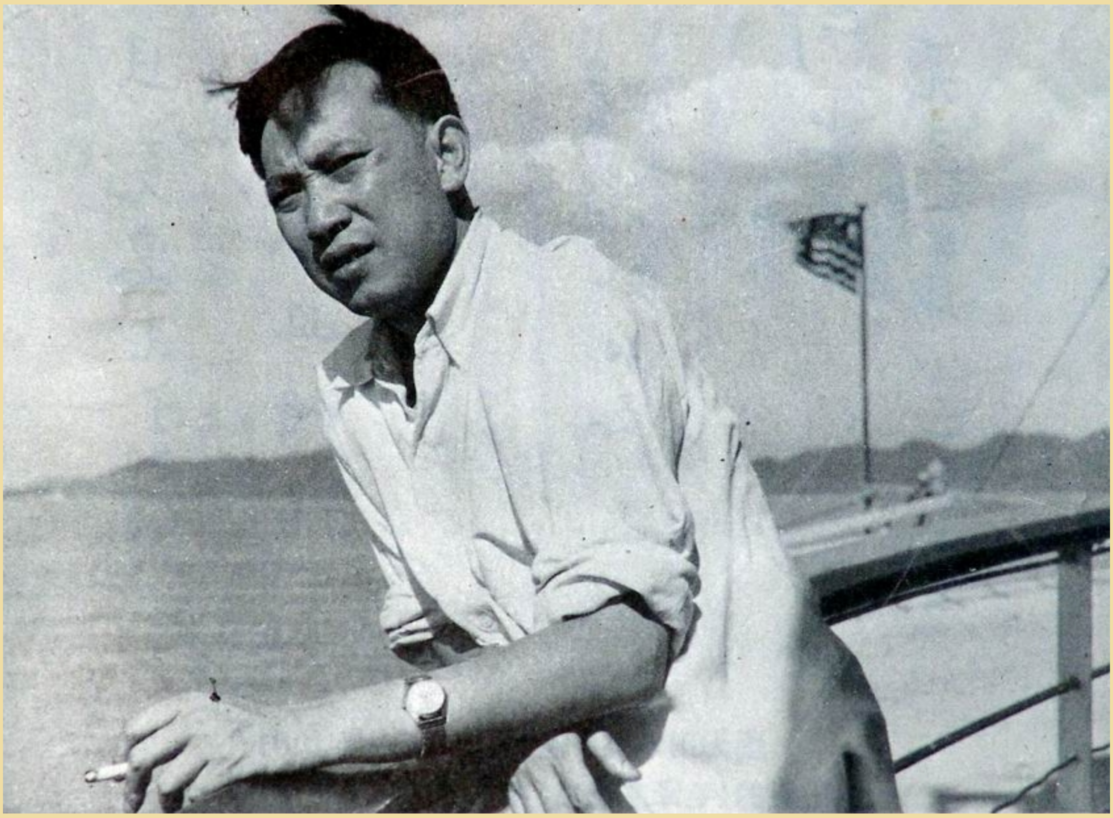
“第四组大概是火力最旺盛的一个组。及今回顾，那种激烈场面，人声鼎沸，我自己心颤不已，实难忘怀……。”

7 月 23 日听完毛泽东陡然翻脸的那次讲话后，田家英、陈伯达、吴冷西、李锐四名“秀才”心头沉甸甸地离开会场，沿山路走去。离他们不远，彭德怀挡住离开会场的毛泽东，申明他的信只是供主席个人参考的，毛不应该印发给大会。四个人一声不吭的走着，仅仅数天以前，毛泽东还找过田家英、李锐等人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态度十分和霭。陈伯达、吴冷西则表示过拥护彭德怀信中的观点。一夜之间，他们就成了“离右派只有 30 公里”的“动摇分子”，一记闷棒把几个人打晕了。李锐悲凉地写道：

“走到半山腰的一个石亭中(大概是小天池)，大家停下来，还是没有人吱声。亭中有一块天然大石，上刻明人王阳明诗句：昨夜月明山顶宿，隐隐雷声翻山谷。晓来却问山下人，风雨三更卷茅屋。……在亭中，远望长江天际流去，近听山中松涛沉吟，大家仍无言相对。见到亭中几个石柱无一联刻，有人提议，写一副对联吧，我捡起地下烧焦的松枝，还没有想好联句时，家英抬手写了这一首有名的旧联：

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以他所处的地位，要讨毛泽东之好以求自荣，实在是太容易不过，但他却作了完全不同的选择。他此时的忧伤决不是出于自危，而是对国家、人民和党的前途的担忧，和内心深处的一种幻灭感。他私下对人说，有朝一日离开中南海时，准备向“主公”提三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



田家英因庐山会议而受到毛的批评，打入冷宫。这是田家英上庐山时，在九江到庐山的船上所摄。

如此局势下，继续留在大丰的中央工作组处境肯定不妙，而且面临极大的政治风险。8 月 6 日，留在新繁的逄先知突然接到北京的电话，说田家英有要紧工作，要工作组立即撤回北京。逄先知全然不知庐山发生的一切，临行前特地拜访了新繁县委书记曹云生，这一次，曹把心里话全掏出来了。他说：你们做得对(指反对浮夸和过度密植)。你们如果象地方干部一样，真实情况不向中央讲，国家就危险。但地方干部象你们这样做，就要挨批判，他们上面还有省委、地委、县委。他再三叮嘱，这些话是“内部讲的”，不能讲出去。

逄先知 8 月 9 日赶回北京，不知出了什么事，跟在庐山的田家英通了电话。田只是说，他在会上同李井泉有争论，而且争论得很激烈，主要是高产密植和产量浮夸问题，不过多数人都同情他。要你们回来，主要是怕你们处境艰难。事后他对逄先知说，他确实感到，毛泽东头脑已不那么清醒了，听不得不同意见的情绪越来越明显，到庐山会议后期他感到已无回天之力了！(见逄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版)

毛泽东在会上点了田家英的名，说他历来比较偏右，还是放他过了这一关。然而田家英精神上的打击是致命的。

公共食堂前打碎了饭罐伤心痛哭的老太婆，场镇的饭馆前为抢购到一碗米饭排

起的长龙，棍子一戳就露出谷草的“存粮”，令人头晕目眩、脚粑手软的饥饿，穷凶极恶、荒诞无比的生产命令，惊愧不定支支吾吾的基层干部，……他就置身于随时可以中止这一切的那个人身边，可他为他们做了什么呢？他曾经拍着胸脯向那些以为毛主席英明伟大，是下面乱整的善良百姓保证，谁敢打击报复讲真话的人，就来北京找他，……

庐山会议后那些忧虑的日子里，他以无颜见家乡父老的心情写下这样一首诗：

十年京兆一书生，爱书爱字不爱名。

一饭膏粱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

1966 年 5 月 23 日，觉查到毛泽东发动文革意图的田家英在家中自尽，从精神幻灭走向肉体幻灭，年仅 44 岁。

27、政治测验

1959 年的 8 月到 9 月，四川省委在成渝两市召开整整一个月的省委扩大会，传达“庐山会议”精神。会议一开头是所谓的“政治测验”，到会的 1300 余名市、地、州干部在不了解任何背景的情况下，先阅读彭德怀的意见书，张闻天的发言和李云仲给毛泽东的信三个文件，读后人人必须表态。李云仲是原为国家基本建设局副局长，时任东北协作区办公厅综合组组长。他于 6 月 9 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达一万多字的信，对大跃进提出尖锐批评 ，直言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后期批发了《李云仲意见书》，写了近 3000 字的批示，称李是“一个得不偿失主义者，有些地方简直是‘有失无得’论者”。当然到会的干部开始是看不到毛泽东的批示的。

不过测验答案并非滴水不漏。一些政治上受到信任的领导干部被打了招呼，于是作了旗帜鲜明的表态，一些警觉性较强的干部含糊其辞。对三个文件表示支持的只是少数正直而又未得到内部消息的人。表完态，才放毛泽东讲话录音，传达中央决议。在参加会议的人中间，“揭发出 50 几个或者是右倾分子，或者是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从中筛选出 8 个“典型”在大会上重点批判。其中批得最凶，并戴上“反党集团”帽子的，是泸州地委第一书记邓自力、书记崔章、专员陈怀堂。

所谓以邓自力为首的邓、崔、陈反党集团，干了些什么反党勾当呢？毛泽东的

《党内通信》下达后，邓自力在泸州地区解散公共食堂，把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小队，给社员分自留地，实行生猪私有私养等，解万民于倒悬，被泸州老百姓呼之为“邓青天”。以地委的名义，在全专区范围内普遍推行这些作法，为全川绝无仅有。邓自力搞这一套，下有老百姓支持，上有这一时期中央文件指示作依据，所以他敢和李井泉硬抗，对李井泉的刺激可想而知，只是当时不便下手。如今气候一变，立即被作为典型抓了出来，在省委扩大会上轮番批斗，会开到一半，有关泸州地委右倾机主义错误的材料已下发各地、市、县委。

大会重点批判的 8 个人中，李井泉认为最坏的是省委农工部副部长夏戎。“8 个同志比较”，他说，“如果讲品质坏，我看第一个要算夏戎，……坏是坏透顶了。”他补充说，“当然还没有彭德怀那样坏。”

夏戎的确有“劣迹”，他带着检查团下去，社队干部带他们参观高产田，他扯起一把稻子当着众人吼：“这样的稻子能打几千斤？”仁寿县报告棉花亩产千斤，他挖苦：“连杆子一起称差不多。”但这还不是他真正坏透顶的地方。后来省委农工部组织的批斗会上，有人突然质问：第一次省党代会，你为什么不投李政委的票!

夏戎莫名其妙：我投了李政委的票啊。但人们不容辩解，硬说就是他干的。1956 年 7 月四川省第一次党代会，谁第一个不投李政委票的案子，至今还在侦破。包围圈缩小到夏戎身上，所以他坏透顶。李井泉下令，“可以保留党籍，到农村去锻练。”

从庐山凯旋归来的李井泉精神焕发，斗志昂扬，讲话的口气摹仿气势磅博，挥洒自如的“领袖”风格。9 月 26 日下午，他向参加省委扩大会议的干部发表总结讲话，他们经过 1 个月的表态、惊骇、转弯、揭发、检讨、批判、被批判，已如惊弓之鸟。

会议的前一阶段等于练兵，后面这一段是打仗。这次打仗是打的很激烈的，放了些机关抢、迫击炮、但没有放原子弹。……这个会议有成绩，一个是在 1600 人中间，揭发出 50 几个或者是右倾分子，或者是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人数不多，主席讲百分之一、二、 三、四、五，但是他们影响比较大，所以要加以批判。

会议期间，泸州专区下放的公共食堂，已经勒令全部恢复。火速泡制的最新材料，声称群众一直反对解散食堂，对恢复食堂欢欣鼓舞，这些颠倒黑白的谎言很合李井泉的口味。

泸州地区近来情况也好起来了，食堂也恢复了，印那些材料中同志们也看到了，他们那些人里面有许多积极分子是不赞成解散食堂的，他们不是这样问吗：“这是上级的命令，还是要我们自己散伙？可见他们是不赞成的。而且为着反对解散公共食堂，他们采取“阳奉阴违，两面派的手法”，表面上报解散食堂，实际上没有解散，这叫革命的两面派，这有什么不好！这也是虚报浮夸，但是这个虚报浮夸应该提倡。

说起“虚报浮夸”他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在东拉西扯数落了右倾分子的种

种罪行之后，他又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开始阐述高指标的伟大作用，以及对实事求是的不屑。

越低越好，叫做老实！越高越坏，越虚夸。……现在有些人似乎觉得自己订计划不高不低，最科学了，最马列主义了，但开会讲起来就没多大劲头，……以后我们不能那样公布，同志们敢想敢干想多搞点，是个好事情，他的措施也会积极起来。

计划订得“不高不低”不是马列主义，怎么订是马列主义呢？他喋喋不休地放他那张关于高指标有利调动积极性的老唱片。

有些同志比较积极，想多搞点，不是坏事情，可以鞭策我们前进。订得愈低愈好的那个人，就松驰了，反正礼拜六、礼拜天就有过的了，可以带上老婆、孩子逛公园等等，他也照常生活下去，但是没有突出成绩。有人讲，黄克诚这个人，自己讲是老右倾机会主义，他要丢了什么东西也不会，但是要他捡回什么东西也捡不到什么，最多捡个鸡子回来。我们一些同志不要只想捡个鸡子，要捞就捞一大把，搞些雄心大志，我是提倡这个东西的。

搞雄心大志，“要捞就捞一大把”，即使失败了，也比讲老实话强。

作检讨也可以伸伸抖抖的检讨，……教训也可以多得一点。那些以为讲老实话，不高不低的人，连个教训都得不到。你得到什么教训呢？“既无主观主义，又无右倾保守！”

左实在太可爱了，连犯错误都可爱，因为他们得到了宝贵的“教训”！实事求是(还别提右倾保守)不犯错误本身就是错误，而且——

实际上说没有右倾保守，也不见得。……你就一天到晚吃了饭、睡觉，睡了觉就上班，那才没有味道，反正下次开会又要作检讨就是了。

他幸福地回忆起如何在毛主席的教育鼓舞下，树立起这种雄心大志的。

毛主席经常鼓舞我们要游泳，要到长江里去游。修三峡水库我怕重庆淹了，我说：“哎哟！我不赞成把水位提得那样高！”他说：“你不赞成？重庆江里将来变成一个海，海里将来可以大游泳，你不赞成吗？”这个话一讲就把我讲通了。有了大海这就有力地告诉我们一个伟大远景，如果将来真变成了大海，整个世界都要变样，不要说全国，要发多大的电力，总要有个大嘛……

讲到这里，他开始激动了。从 1958 年放卫星开始，为了表现这种“雄心大志”，他可谓顶住了方方面面的压力，现在可以出一口恶气了。

我想辩护几句，万斤亩是我吹起来的，我现在主张拼命搞！……今年不搞，明年还要搞，总要搞起来。我在想，你们不赞成万斤亩？我说两季嘛，再不行三季嘛，你说作不到？……不要悲观失望，他们不信，我们就拼命搞出结果给他们看。……

他有些失控。

至于一年到不了，二年；二年到不了，三年；三年到不了，五年；五年到不了，

十年。试试看，十年到不了，我在时，我要作检讨，我死了，我告诉我的儿子替我检讨。

除非他死了他儿子继续搞，否则凭什么儿子该替老子作检讨？事实上他的确发过这样的誓言。大约是脑袋充血的缘故，他张开了想象的肢膀。在谈到米丘林的生物杂交学说时，他关切的问道：

红旗公社牛与猪交配，不知长起来没有？……中国人与外国人生的杂种，听说也要聪明些，……总之，希望同志们以一种伟大的气魄去领导生产的斗争。

这位满脑袋万斤田、杂交、一大二公、"要捞就捞一大把"伟大气魄的全省最高领导好不容易收回话题，讲起正在从上到下全面展开的反右倾运动。中央规定，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决议，不发到公社，只能口头传达，而李井泉要求，把提到"彭德怀反党集团"的省委文件下发到公社。他承认，这样做"同中央有点出入"，但是"我看关系不大，不要紧"。再次表现了他为我所用的气魄。（见《井泉同志在省委第一届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总结》（录音整理），1959 年 9 月 26 日下午。）

省上批判大会召开的同时，反右倾运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各级大规模展开，其方法是省委扩大会的故技重演。经验丰富或听到风声的含糊其辞王顾左右而言它，不知底细或正气浩然者见堂堂彭总都那样讲，勇气大增，嘴巴放炮。到突然开始"反击"，早已证据确凿，悔之晚矣。

在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中采取这种诱供式的方法整人，对人的心灵的伤害和社会政治环境的毒化都是深远的。不难想象，彭德怀、张闻天、李云仲那些真诚中肯的批评，会在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心中产生共鸣。对于因此而惨遭不幸，以及侥幸躲过的人，今后的选择要么钳口不言，要么心口不一地过日子；对于用这种方法整人或口是心非捞到好处的人，受的是另一种伤害——人格和良心的堕落。

为了把暗藏的右倾份子挖出来，主持运动者还千方百计动员大家"鸣放"，以"引蛇出洞"，把不久前对付"右派"的一套搬到党内来。温江专区各县反右倾运动的五级干部会议编发的大批简报，记录了这种坑人的手段是如何进行的。

郫县报告，他们将运动分为 4 个阶段进行，一、大鸣大放，畅所欲言；二、组织先进队伍，进行大会发言，肯定成绩，树立正面典型；三、大会重点批判，小会自觉检查，问题严重的右倾分子，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处分；四、学习省、地委关于"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增产节约粮食，胜利渡过灾荒"的指示，安排当前工作，订入库、生产计划，大抓晚秋作物……

鸣放——划类——批判、处分——交征购，全区所有的县都是按这个程序进行的。新都县关于"鸣放阶段"的一份简报以惊人坦率记载了这一过程。

从发展情况来看，开始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顾虑。在读了反面材料后反映说："这些话与我知道的农村情况简直符合，打到'心心'头去了。"有的人在思想上与反面

材料脉脉相通，但不敢说出来，害怕“说出来当右派划不来”、“怕当典型人物，半天下不了台台”。有的是观火拿脉，互相观望，思想顾虑大……

反右以后，基层干部对这一套“引蛇出洞”的手段心有余悸，有些人也确实学乖了。为了把这些“观火拿脉”家伙的话勾引出来，组织者就有安排一些人作诱导性发言，并加以表扬鼓励。

针对这些思想顾虑，一方面我们在讨论中树立敢想、敢说、敢暴露的典型，另一方面是引导大家摆事实摆问题，以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增产、毛猪下放、生产措施等问题，结合本区本队情况摆问题摆看法后，鸣放逐步导向深入……

树立“敢暴露”的典型，把平时窃窃私语的话题公开摆出来，谁经受得起这种“引导”？基层干部心中压抑已久的怒火终于象火山一样喷发了。以下是新都县的“鸣放”中基层干部的部分言论。

他们说，人民公社把人民害苦了：

——在短短的时间内，互助组变小社，小社变大社，大社变公社，时间太短，成立小社还学习 40 天，公社开会就宣布成立。

——又没收自留地，又收鸡，说了发工资又不兑现，分配不给现钱，连买草鞋的钱都没有，对社员打击太大了，情绪咋个会高嘛！就是县长来都没劲。

——公社化后明说吃饭不要钱，实际上还不是我变牛抵来的。

——公社化后，车子(鸡公车)没得了，竹子砍光了，毛猪喂死了，肥料也少了，现在连沤粪的胡豆杆杆都没有了。

——说得安逸，每个月发工资，结果几个月不发；卖狗皮膏药。过去一年妇女挑花每个月都挣七八元，现在一个全劳力每个月才两元。

——公社化以前社员自留地的菜长得好安逸哦，现在草比菜高。

——大兵团作战，早晨三四点钟起床，咋个照顾老人娃儿嘛。食堂吃饭几里路，下雨天拖儿带女也要去，数九寒天老年人硬是伤心。

——大兵团作战，几十个人一天挖 5 分地。往年家一个劳力一天栽秧子两三亩，现在栽两三分。

——大兵团作战，好儿好女不相见，好夫好妻不团园，坝起通铺睡，有娃娃的妇女清不到假，硬难过得很。(有的)娃娃都掉到茅坑头淹死了。

——晚上大兵团夜战，拆社员的房子打火把，下雨顶簸箕、戴斗笠，睡在田坎边上，一点没有盖，好惨啊。

——今年粮食紧张和去年政府叫放开肚皮吃有关，我们不放开吃，还批评我们保守。

——过去社员猪牛死了好伤心，现在死了安逸，好吃肉。

——幼儿园搞不起来，管他的哟，垮了算了。

——人民公社还万岁啊？

他们说，大跃进是损失惨重的“大跃退”

——不叫大跃进，叫大跃退。

——大跃进拆老墙，积硝泥，有的根本不拆，点起火烧。火车站当面的大院子烧了一个晚上，天都红了。

——我们上山炼铁，点25个炉子，才流四两铁，我算了一下成本，比金子还投价。

——油菜增产了，油少了；猪增加了，肉少了；粮食增产了，饭吃少了。明年再增产，不晓得吃啥子。

——说是发展重工业，机器又没看到，还不是叫我们这些肉牛去整。

他们对瞎指挥和浮夸深恶痛绝。

——共产党啥子都合适，就是栽秧子稀密不合适。社员不通，干部90%以上都不通。通了是嘴巴通，思想不通。

——过去生产由我们自己搞，现在由上面派来的工作干部搞。你管我栽稀栽密，把征购完成了事。

——谷子栽稀了打1千斤还说是不接受先进经验，栽得密打1百斤还是受表扬。

——栽秧子工作干部拿尺子来量，打谷子就不来了。不密植骂得你狂迷狂眼的，收成不好，又喊你找原因。

——密植，我看就象下猪儿一样，下多了就不壮。秧子稀了三窝就是一把，密了七八窝一把，你看哪个划得来？

——每亩叫用30万斤肥，就是铺一层砖也没那么重，这不是鬼整鬼吗？

——拿些田来空起，安排少种多收，连大春都没有种，后来看不对头，又叫种，季节都错过了。

——干部外行变成内行，我们内行变成外行，老农民都种不来庄稼了。

——整社查瞒产，摆余粮，哪来的余粮啊，把谷种拿来摆起，显屁儿白。

——你们说增了产，我们肚皮没有增产，你们捆、打、吊，我们抵、赖、拖。

最令他们痛恨的是不顾农民死活的高征购。

——每亩才5百斤，就征购5百斤，叫我们吃啥子！

——去年完成公粮、统购任务，每天晚上都喊到公社开会，说不好就斗争，象逼地主退押一样。

——弄死都弄不够他们，比地主还凶。

——过去打下谷子地主跟到屁股追，生怕你不交租子。现在政府喊你赶快拿去上粮，生怕你吃了。

没有什么比饥饿对他们的打击更大了。

——吃这么孬，我骨头都松了。

——现在妇女都生不出奶，小娃儿好惨啊。

——吃好多饭干好多活路，群众说把饭吃饱，随便喊干啥都可以，就是把赖格宝(蟾蜍)么进城都可以。

——我一群小娃儿，一天总共几两米，安心把人饿死。说关心儿童，瘦得象干猴儿一样，象这个样子就叫毛主席的好儿童啊？

——社员饿，我们也饿，咋个带头呢？上粮到火车站几十里路，我试过，推到半路就饿了，只有吃水。

——连劳改队都当不到，劳改队一天还有两顿干饭嘛。

——建立公社生活好，吃大月饼——糠枯。

——马路上的石头，如果煮得粑都吃了。

——过去人跟到猪撵，现在猪跟到人撵。人都没吃的，还有猪吃的啊。

——今天食堂的人推米去上公粮，社员都上吊了，开开门舌头一人两寸半，逗起好长，咋个办啊……

在这种情况下，要使人不作今昔对比，不对政策乃至政府产生怀疑是不可能的。

——解放前案桌上肉都卖臭了。为啥解放后没肉吃？

——现在不如过去当长年，当长年都吃得饱。我硬想去帮人。

——以前是“要想新衣嫁那天，要想吃饭八月间”现在都不行了。到过年过节，社员心都焦烂了。

——过去帮长年一个月还有两斤烟吃，现在连帮长年都不如。

——现在是大家哄，上级哄我们，我们哄上头，社员也哄，总之大家互相哄，哄去哄来哄了肚皮。

——现在是国富民穷。

——究竟是干部作风问题，还是政策问题？

（见中共新都县委:《关于召开五级干部会议鸣放阶段情况简报》，1959 年 9 月 14 日 - 30 日。）

如果不是白纸黑字记录在案，很难相信这些话是在 1959 年反右倾运动中，出自社队干部之口。原来他们既不愚蠢也有良心，他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无时无刻不希望尽快结束这一切。他们在反复的诱导下，以为上面真的要开言纳谏，拨乱反正，所以把咽在肚子里的话吐出来，没想到上面是在罗织蛛网，诱其入围。

新都县委的简报说，经过两天的鸣放，问题已经“摊开”，紧接着便转入了澄清事实、提高思想的“辩论”。划分左、中、右三类人员的名单，也暗中排列出来了。

初步排类的情况是，农村干部(包括下放干部在内)参加五级干部会议的 690 人，其中一类的 31 人，二类 264 人，三类 75 人。……

三类，既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有公社总支书记 4 人，管理区党支部书记 23 人，

生产队干部 48 人。这是县上的大会搞的，回去各公社还要搞，就远远不止这个数了。（见《郫县县委扩大会议简报》，1959 年 9 月 16 日。）

反右倾运动的划类经过规范，共分四类："决心大、干劲足，完成各项任务坚决，力争上游"的为一类；思想基本坚定，属于中游的为二类；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为三类；戴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为四类。

类别一定，你的命运也就定了。先是批判斗争，检举揭发，检查交待，然后撤职查办。在郫县县委扩大会上，22 个公社党委书记有 5 人分别划入三、四类；其中大会批判的有竹瓦公社党委书记姜吉福，红光公社党委副书记刘德明，兰寿先。

在接下来召开的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上，1012 人中，有 375 人在会上作检查交待，占到会人数的 37%。划为三、四类的开初有 99 人，一些吓坏了的干部赶紧回去把征购完成，才得已幸免，最后划定三、四类人员 55 人。

除了"鸣放"出来的言论要批判，工作中的"右倾"罪行也得一一清算。 这些罪行包括：推翻、压低产量，不完成国家征购；停伙、分粮到户，妄图搞垮共产主义萌芽的公共食堂；给社员分自留地；将毛猪下放到户，"恢复毛猪私有制"；把核算单位划小，以及"工中缺乏朝气，干劲不足"等等。

翻开当时已经下发的中央文件，这些所谓罪行全都有根有据。例如，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郫县竹瓦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姜吉福，他干了什么呢？一、分粮到户，"实际变相解散了食堂"；二、"假借中央政策"，下放毛猪给社员私养；三、同意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什么叫"假借中央政策呢"？这其中哪一条不是中央明文规定的呢？

因为中央现在的政策又变了。年初以来好不容易纠正过来的一点点东西，现在又全部翻了过去。唯有弄虚作假、谎报征购翻不过来，然而这个罪名却一把掌推到基层干部头上，幕后支使者洗涮一净，这又是郫县创造的一个奇迹。

征购入库时，手段更为恶劣，弄虚作假，报恍帐，造假单据，……红光公社犀浦一大队分支书记刘子成，两年征购都没完成任务，为了想蒙混过关，假报完成任务的划码单，给国家交泥巴谷子，隐瞒 33 万斤谷子给社员吃。……唐元公社社长宋万立，今年小春入库时，在二管区弄虚作假，报假帐，亲自加盖私章，向公社多报完成了 5 千多斤。……

郫县的聪明之处，还在于他们不象其它县(如新都)那样，处心积虑的发动鸣放。在县委扩大会和随即召开的生产队长以上会议上，均是"开门见山"， 直接开展揭发批判。然而从实际发生的情况看，很难认为是出于保护干部的动机，更大的可能是因为郫县的问题太多，隐衷太多、短处太多、鸣放出来不好收场，徒授人以柄，有损先进形象。然而鸣放是上面的安排，不能不搞，否则坏人不充分暴露，运动不彻底也不好交待。所以运动开展到公社以下，才发动"鸣放"。

基层的鸣放也极为小心谨慎。如红光公社最初在三个管区采用三种不同方法试点。红光管区(即老红光社)是“边放边辩”。一放出来就“辩”回去，剩下的话当然吐不出来了。犀浦管区是“根据以往言行直接检查辩论”，只算老帐，根本就不让你放。只有幸福管区是“先鸣放后辩论”，仅仅在小范围内这一放，就不难看出为何如此小心谨慎了。

——啥子大跃进罗，据我看只有三点：1、上公粮是大跃进，男女老少一齐发动，白黑连夜往国家仓库头推。2、打谷子是大跃进，连夜打下来晒都不晒就拿走了。3、割麦子是大跃进，白天割，晚上打，第二天就拿走，这不是大跃进么？

——啥子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拿我来说，未必一个人三个人都供不起？

——高级社就出懒人，公社化就更懒。

——把田退给我，你们把啥子都给我没收了，简直把我整垮杆了。

——亩产一千多斤，连草都称不够。铺盖窝头挤眼睛，自己哄自己。

——如今真是怪事情，草长来比谷子深，恍壳用仓装。

——啥子三七寸，栽起倒好看，长起不好看。头数今年欠收，每亩才打七八斗，以前每亩打一石二、三，往年几窝一把，今年几十窝一把，米都小颗些。

——以前吃肉是打牙祭，现在吃饭是打牙祭。

——现在的农民是又饿、又痨、又累，上了公粮统购就没有吃的。一天喝点吹汤饭，饿来两根骨头三根筋，倒在石板上起不来，……还不如过去当长年。

——往年我喂的猪随随便便都是两百斤，现在喂来光架架，才几十斤就杀了。猪没有粮食喂，屙的屎都是黑的。

……

说这些换话的都撞到枪口上去了。

28、让历史去作结论

1959 年 8 月 16 日，毛泽东在庐山的别墅里奋笔疾书：“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

建国以来，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与党内许多领导人屡屡发生分歧，以至发展到“炸平庐山”，推翻他的路线、动摇他的权威，威胁他领导地位的地步。他断然认定，推动历史发展的阶级斗争，已经转移到党内。他要向党内的资产阶级宣战，并且“其乐无穷”地战斗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息。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从此往后的运动，主要就是“革革过命的人的命”了。在温江专区干部中，谁是资产阶级代言人呢？

1959 年 11 月 8 日，温江地委向四川省委送交了关于地委书记曾�，地委委员、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申培林，地委委员、地委宣传部长景廷瑞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报告。

曾筠的罪状是：1、反对我国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攻击人民公社办早了，散布核算单位宜小不宜大，在广汉北外公社把土地、农具、耕牛、包产权等下放到生产小组。2、反对大办钢铁，攻击大办钢铁要求急了，得不偿失。3、攻击 58 年农业大跃进是吹起来的，59 年大跃进又失败了。4、以深恶痛绝的态度漫骂革命的群众运动。5、反对办公共食堂，背着地委把蹲点生产队的公共食堂划小，把粮食分给个人。6、反对毛猪公养，把蹲点生产队的毛猪分给社员，并分给社员自留地。7、不尊重地委集体领导、信口开河，发表违反党的原则的意见。

报告说：以上材料证明，曾筠同志是一个没有从根本上改造的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民主革命时期麻麻糊糊混过了关，到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最后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私有制时，就暴露了原形。

原形毕露的曾筠此时病倒在床，几个月同农民同吃同住彻底搞垮了他的身体，脚肿了，多年的肺结核病复发。一次大吐血之后，被送往专区医院住院治疗。病情稍有好转就挨批斗，作检讨。人人都必须揭发。童养媳出身的妻子宋立华也要和她地主阶级出身的丈夫划清界限，地委副书记职务撤销，降为副专员。人们熟悉的那位风风火火，口直心快的地委书记从此销声匿迹。

农工部长申培林是老右倾，如今新帐老帐一起算：一、从 1950 年以来，一贯对征购抵触，认为农民生活苦，鼓吹农民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基础，民富而后国强是办好社的关键。二、反对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主张依靠富裕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三、鼓励发展个体经济，认为打击个体经济、发展集体经济是反动的平均主义思想。四、反对总路线、否定大跃进，专搞阴暗面的东西。五、 反对党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强调因地制宜，取消国家计划。六、在反右倾斗争 中态度恶劣，坚持错误立场，毫无悔改诚意。

申培林“否定大跃进”的重大罪行之一，是伙同曾筠在 1958 年底金牛坝会议期间，调查李政委支持的那块万斤田。有趣的是，批判者谁也不说问题的关键——到底是真是假，却翻来复去的追究所谓“专找坏人了解”的“立场问题”。下面是批判

时的一段记录：

申：关于去郫县调查 1 万零 6 百斤的卫星田产量的问题，去调查是形式，实际上是去否定。因为乡干部弄假产量，他们还不承认弄假，坚持 1 万零 6 百斤。

问：去之前你和曾书记研究过没有？

申：打电话找过我。

问：老曾咋个谈？

申：他说，我说没有那么多，刘致台坚持说有那么多，他在省委和刘致台顶在一起。

问：去郫县调查，找受过打击的、落后分子，甚至地主都可以，是不是和老曾研究过？

申：和老曾研究，他说找干部，积极分子调查不行，乡上对他们已经作过布置，找干部谈不清。

问：不对！……两次和曾书记谈了什么要交待！（见《申培林交待与曾笳同志的一些活动材料》，1959 年 11 月 14 日。）

他是一个有独立思想，性格倔强的人。早在合作化运动初期，他就抱有不同见解。身为农工部长的这些年，他一直在矛盾痛苦中渡日，他的整个农业思想都和现行政策格格不入，却眼睁睁地看着事情飞快地朝他理想相反的方向发展下去。曾经预见到的问题和灾难几乎都成为现实，丝毫不能给他以先见之明的得意，只能增加身在其位，无力回天的痛苦。他对宋文彬的对上唯命是从，对下主观武断颇有意见，于是上面就觉得他桀傲不驯；他对“积极分子”嗤之以鼻，于是下面又反映他摆臭架子。

那年头清醒的人并非都不幸，如果你清醒而又能审时度势、随机应变、能曲能伸的话，说不定还有好事。怕就怕清醒而又执着，申培林恰恰属于这类。他“态度顽固，猖狂已极”，在愤怒的声讨和疾言厉色的逼问下，可以长达半天铁青着脸死不开口，甚至据理申辩。由于态度恶劣，他成为批斗重点，从 59 年 10 月到 60 年 3 月，整整斗了他半年。

看着批斗他的人一张张青黄浮肿的脸，更坚定了他“顽抗”下去的决心。看到他的脸一天天“胖”起来，腿抖得越来越厉害，宋文彬问：“你是不是病了？”意思是劝他到医院去躲躲。他知道宋文彬的意思，却不愿领情，他居然这样想：“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再这样搞下去会饿死多少人？”

他被停了职，和地专机关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一起，去罗世发的新民公社“劳动锻炼”。临走，他给人们留下一句话：“让历史去作结论。”

宋文彬给宣传部长景廷瑞定了三个“右倾论点”：一是说“潮流真可怕”，二是说经济规律是残酷无情的，三是说反右倾须防左。一开始整理的材料即按此三点归

纳罪状。景廷瑞申辩："潮流真可怕"是省委宣传部的一个干部讲的，并非他的发明；"经济规律是残酷无情的"是斯大林的原话；反右必须防左是党的"七大"文件上写的，毛主席总结的。批斗者无言以对，不得不推翻另列罪状。

上报省委的文件称：宣传部部长景廷瑞"右倾机会主义观点是一贯性的，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关键时期，他都以右倾机会议观点和党对立"。其罪行为：一、1952 年领导土改、镇反中右倾；三反运动认为斗争过火，"老虎"是逼供出来的。二、1953 年认为粮食统购统销搞左了，到处搜集材料，把农民生活描绘得凄惨万状，叫嚣要"亡党亡国"。三、1956 年肃反中为反坏分子开脱，使大批坏人漏网。四、认为浮夸风是党内外没有民主，干部、农民不敢讲真话，叫嚣"潮流真可怕"。五、到处叫嚣征购高了农民没粮食吃，认为干群关系、工农联盟可能会出大问题。六、认为以管理区为核算单位、生猪公养违反了经济规律，竭力主张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七、认为目前应当反左而不是反右，对彭德怀的反党纲领表示"完全同意"。

景廷瑞是专区地专级干部中唯一"政治测验"不级格的。读了彭德怀的意见书后，"他迫不及待地赞扬完全正确，并表示完全同意。"也是唯一因"违反省委批示"，擅自向下传达《党内通信》而受到批判的。其实他还没有象田家英那样传达到社员，只是动作过快，在省委下令收回之前传达到了下放公社的生产队一级。景廷瑞实际上 1954 年之后就失去了上面的信任，那一年他因为统购统销一些地方收过"过头粮"导致肿病和死人大发议论，被狠狠记了一笔。那一年地委成立常委，按规矩组织、宣传部长都应该进常委的，偏偏他这个宣传部长不是常委，搞得宣传部的干部都掉了份。他自己也没个当官的派头，最爱跟农民一起干活，夏天老是一件脏兮兮的背心一身汗臭。1958 年上半年他就带着宣传部的大部分干部到大邑安仁乡蹲点，兼乡党总支第一书记，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气力大，一百多斤的担子挑起跑，连农民都佩服，而他要求干部们和他一样干，可把大伙搞苦了，累得晚上脚都不想洗，用报纸擦擦脚上的泥就睡下了。有人发牢骚："只要一根扁担，一双筷子，其它都不要了"。食堂停伙时，他把自己的粮票送给濒临死亡的农民。

有一次他爱人田征来找他，从县上找到公社不见人影，最后在一个草堆边看见他，正埋头啃一块黑糊糊的饼子。反右倾以后停职，他为"40 多岁就不能为党工作"而伤心流泪。后来降职降级安排任工交部副部长，靠边站的日子过不下去，干脆到下面和民工们一起修公路。一次宋文彬乘车路过工地，同车的一个干部发现了他，说"那不是景部长吗？"宋文彬停车一看，愣了半天才认出人来。

反右倾运动是对合作化以来"右倾思想"的总清算，凡是在这期间有过"错误思想行为"的干部统统"炒回锅肉"。崇庆县委组织部长魏立民 1957 年到大划乡调查脚肿病时，说肿病至死的人是饿死的，差点脱不到手，同年兼任大划公社党委书

记，又因反映 1958 年产量不实被调离大划，责成反省。他不服气，1959 年大春收割时亲自到几个生产队组织收打，现场过称。反右倾运动这些老帐都一一翻出来，被定为“严重右倾”。

被“炒回锅肉”最有代表性的有两位前县委第一书记：一位是崇庆县委第一书记张林超，一位是崇宁县委第一书记杨洪魁。

张林超，山西芮城县人，前小学教师，1943 年入党，1954 年 6 月任崇庆县委第一书记。上任尹始，正遇到崇庆肿病流行，人畜死亡严重，他调查的结论是：粮食统购过多，营养不良所致。56 年合作化高潮和瞎指挥，导制水稻减产，许多人怕给合作化“抹黑”，不敢反映，他亲自下去调查，证明减产属实，打报告给地委要求减少征购。同时认为当年粮食产量下降，是因为合作化以前的估产不实，实际上证明了那几年统购统销是高估产、高征购。由于在粮食问题上“一贯动摇妥协”，他由第一书记降为管农业的书记。第一书记由性格暴燥语言粗鲁、只有小学文化的许锐担任。大办钢铁时，全县抽调数万人上山，以后又要再抽调两万人，他坚决反对，在取得曾箛的支持后，派人分赴各乡把上山的人阻挡回去。反右倾开始时，许锐提出“处理”30%的干部，张林超在他主管的怀远地区，提出只处理 1.5%的干部。

保护别人结果是给自己罪加一等，从 1954 年的老帐算起，他被多次批判，又从管农业的书记降为管多种经营的书记，地位已是江河日下。但这一切没有动摇他的信念。他大部分时间骑着自行车在乡下工作，和社员一起劳动，回县上晚了，就在食堂抓两个冷馒头，1960 年他患了营养不良性肝炎，深深的忧虑和自责使他无心躺下，以至发展到肝硬化，1963 年底病逝，年仅 40 岁。下葬之日，崇庆县的大批干部群众自发前往送葬，许多人一进灵堂便泣不成声，有人写下未署名的悼念长诗《我们的县委书记》。老百姓心中的那杆称是公平的。

被认为在 1956 年怂勇新华社记者喻权域写《风调雨顺的崇宁县为什么会减产》的崇宁县委书记杨洪魁，1958 年初被停了职。年底郫、崇两县合并后，一直无所事事。这次被抓出来，列为郫县头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肆批斗，那篇登在新华社内参上引起掀然大波的报道，也翻印出来作为批斗材料，罪名是“上欺中央，下害人民”宣布撤职，降两级工资，下放劳动改造。

县级以下的干部被打成右倾的，从地专机关到各县都有长长的一列名单。 郫县区级及公社党委书记第一书记中三类(严重右倾)、四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分子的名单中即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余俊修，农工部副部长、灵圣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孙茂安，文教卫生局副局长孙成周，粮食局局长叶成章，邮电局局长韩玉增，陶瓷厂厂长兼书记党开国，郫县拖拉机站站长宋旭，公安局治安股长高发祥，农水局副局长陈棋秋、胡孝村，酱园厂厂长王生广，竹瓦公社第一书记江吉福，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杨乃栋。(见中共郫县县委办公室：《郫县县级、区级及公社党委书第一书记中三、四类分

子名单》，1959 年 11 月。）

叶成章的下场大概不出读者所料。虽然红光公社等假报入库经反复调查事实确凿，并不能使他幸免。对他的批判完全是一幕丑剧，谁也不好意思开口说他坚持揭露的不是事实，只好言不由衷、信口雌黄说什么“手续混乱”、“否定大跃进的成绩”等等。然后，还要把他下放到造假之冠红光公社劳动改造，接受教育。

一份温江专区“地专机关反右倾三、四类人员名单”，竟然开列了 140 名一般干部和工作工人员的名字。其中有地委、专署各部门的干部、地区报社记者、医生、护士、书店经理、事务长、通迅员、打字员、农技师、电影放映员、补电影胶片的修片员、收发员、书记员、以及幼儿园老师。宋文彬的妻子、宣传部干事石彬也在列，因为她回山西老家一趟，回来“散布家乡尽吃糠菜”。

1958 年底化名直言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的地委下放干部张慎，当然在劫难逃。实际上“直言”的真实身分早就调查清楚，因为他反映的完全是事实，当时公开讲这类话的又不止他一个，地委未作处理。信是省委转下来的，并加有措辞严重严厉批语，未处理就是一笔欠帐，这次当然得一并还清。温江县反右倾五级干部会上，张慎是重点批斗对象，一直斗到他语无伦次、神经兮兮。温江县委急急忙忙泡制了一份“关于 1958 年粮食增产问题对‘直言’给党中央 一信的答复的报告”，上报地委并转省委办公厅和中央办公厅。

化名“直言”给党中央一信，反映温江 58 年粮食增产有虚假现象，公粮完不成，口粮不够吃，……通过两次五级干部会议，肯定 58 年大跃进成绩，…… 证明了增产是实在的，直言的言论是没有根据的虚报。（见《中共温江县委关于 1958 年粮食增产问题对“直言”给党中央一信的 答复的报告》，1959 年 9 月 20 日。）

“右倾”分子形形色色，有的纯粹是照领导意图办事而倒霉的。地委宣传部教育科副科长梁进学长期在大邑安仁下放。1959 年 5 月毛泽东《党内通信》传达后，他回到地委机关，宋文彬把他叫到家里，语气沉重地对他说：“去年产量没搞清楚，地专机关下放在安仁有八、九十个干部，无论如何要把产量查清楚，直接报告地委。”

梁见宋语气诚恳，回去后就作了传达 。秋收开始前，下放干部分成三个组，选择好、中、差三个代表性的生产队分头负责，从开镰起，每一块田逐一过称划码，确实记载，收割完毕后统计，三个队平均亩产 690 斤，梁给地委作了书面报告。谁知国庆节后回地委便大祸临头，头条罪状就是这份“否定大跃进成果”的钢鞭材料。批判中的强词夺理，荒诞无稽令人啼笑皆非。有人揭发梁讲过“人民公社若干问题”，质问“人民公社有若干什么问题?”梁只好解释，中央有个文件，题目就是《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我组织大家学习过，如此而已。不久前，梁在安仁街上见到一个干部，因为无粮票买饼干十分痛苦，便送了两斤粮票给他，批判中这个干部“揭发”了此事，也成了罪状，因为“你若对粮食形势没有看法，怎么会给他粮票?”

专区《都江报》记者李绍亭则是刹车晚了掉进深渊的。1959 年 10 月，他采访新津县的反右倾五级干部会议，发现"在批判右倾思想的过程中，个别干部有左倾情绪"，如主张把社员"见缝插针"的土地收回，把下放的毛猪统统收回，把划小的食堂并大，对已经批准以原初级社为核算单位的，重新恢复以管理区为核算单位。回到报社便写了一篇题为"反右倾要防左"的稿件，自取灭亡，划为四类。

最终被定为三、四类的干部绝大部分被撤职并下放基层劳动改造，承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如李绍亭先是下放劳改，后又逐出地专机关，下放彭县山中的一个矿区，他的爱人张玉如和两个孩子在矿区医院艰难度日。温江到矿区二百多里路，他从矿区借了一辆架子车拉回温江，装上全部家当启程拉往放逐之地，他描述道：

农历 8 月已过，在冷漠的天空下，辽阔的田野寂静无声，阵阵凉风袭击着孤身拉车人，一种惆怅的感觉涌上心头，勾起我无尽的愁绪。

拉车至郫县，觉得车重如山，汗水湿透了衣彬，每迈一步倍觉艰难，忽闻到铁沫臭味，方知车出了毛病。好容易找到一家自行车修理店，苦苦哀求，店主推说无法修理。路傍一人慷慨相助，帮助修好了车，李感激涕零，赠粮票 5 斤。从郫往北，步步登高，面朝马路背朝天，一步一点头，一步数滴汗，精疲力竭之际，遇一牛车相助，李向赶车人诉说衷肠，赶车人深表同情。晚至崇宁唐昌镇，爱人玉如在此迎候。

夜宿唐昌，闻镇外大桥已被洪水冲毁，临时架行人便桥，李顿觉浑身发软，夫妻惶惶就寝。翌日五时闻鸡而起，见前日赶车师傅已在旅店门等候，言帮助拉车过河，如遇救星。过了大河，李赠香烟一包，粮票 10 斤，"以示重谢"， 目送恩人背影消失。

夫拉中扛，妻拉边套，拉着二百多斤的架子车在碎石路上爬坡，妻是医生，从未拉过车，不出几里，已是双颊惨白，汗如雨滴。临近矿区，天色尽墨，李赶路心切，怨妻不出力，妻默不作声，暗自流泪。到了矿区陋室，妻脱下鞋子，两脚打满血泡，李方知错怪了妻子。黯然之际，再见熟睡的两个儿子，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千难万难，总是一家人活着了。

温江专区 1959 年 11 月对县级干部(不包括地、专机关)反右倾排队，413 名县级干部中三、四类共计 78 人，占 18.9%。其中金堂县 31 名县级干部中，划为三、四类的达 10 人之多。全区各县反右倾五级干部扩大会，共到会 8089 人，划为三类的 843 人，划为四类的 281 人，共计 1124 人，占到会干部的 13.9%。 继县反右倾大会后，运动席卷全地区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受打击者数以万计，其中受批判、处分者 8458 人。（见《全区参加各县扩大会情况统计表》，1959 年 11 月 5 日。）

11 月 12 日，四川省委在《四川省关于省、地、县三级反右倾斗争情况给中央的报告》中，豪迈的宣称："这次运动斗争十分激烈，各级领导骨干受到不同程度批判

人数之多，批判的深透，是解放以来历次运动中所没有的。”

毛泽东在 4 月底的《党内通信》里刚刚讲过“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余音未尽，讲真话的人就来了个总吃亏。

被打下去的不仅仅是一大批忠诚正直的干部，还有理性和正义的呼声，剩下的是假话的一统天下和肆无忌惮的胡作非为。

这一年，全川农民生产的粮食将近一半，被“先下手为强”地搜进“国家仓库”。巨大的灾难降临了。

29、先下手为强

反右倾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正值秋收大忙季节，老百姓在忙收，各级领导也在忙收，建国以来最大、最残酷的一次“国家想多拿一点、农民想多吃一点”的争夺战打响了。政府方面的战略口号是“先下手为强”，除了强大的国家机器，他们还手上又多了一件致命的新式武器——反右倾。

庐山会议似乎是计算好了似的，传达精神、掀起运动刚好和秋收同步。各县都把征购和反右倾“捆起来搞”， 一边开会，一边组织征购，征购完不成便拿到会上去斗，什么时候完成什么时候脱手，谁交不够公粮就是右倾分子。正在运动的风口浪尖上，谁敢往枪口上撞呢？连堂堂国防部长、彭大元帅都打成了反党分子，谁敢不从？他们先前已经见过“分子”们的下场，贪污分子、阶级异已分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一旦被扣上这顶帽子，就是阶级敌人、敌我矛盾、一落千丈、万劫不复。现在，那顶骇人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正捏在别人手上，而且是有计划有指标地分配下来，一定要扣完为止。现在会上已经提了几个上去，摘去了乌纱，扣上了“分子”的帽子，你还想上去凑数么？政策已经交待明白，杀掉的鸡还在淌血蹬腿，何去何从随你选择。

所以征购任务比 58 年完成得“既快又好”。在这件事上，郫县干得尤为彻底。去年假报征购数一案，虽然靠了省上的袒护不了了之，但终归已是不言自明的事实，今年是绝对不能再那样干的。他们要实实在在把“丰收”的粮食收上来，给李政委交个好差，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有力的回击，让那些对郫县心怀不满、伺机发难

的人口服心服。

人当然要选择活路，大家表示：

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办好食堂……把下放的自留地、毛猪收回来，集体耕种和饲养。并表示保证在 20 号以前完成国家征购任务。过去压低产量的，已检查了错误，报实了产量，从而高产田、高产片又在全县各地出现。

出现了，就要兑现。

各公社都一边开会，一边指挥家里征购入库及生产战斗，不少干部白天开会，晚上回去亲自率领群众进行战斗

“战斗”的结果是农民被几乎搜刮一尽。郫县县委 9 月 16 日的简报说，全县 59 年征购任务 1 亿 9 千 5 百多万斤，9 月 8 日会议开始时仅入库 6 千多万斤，会议开始后，日进数由 4 百多万斤增加到 8 百多万斤。9 月 14 日会议结束时，已完成 1 亿零 5 百多万斤。

交够话就好说。这次会议开始划的三、四类人员 99 名，其中大部分为征购完成不好的。经批判斗争，积极上粮“转变很好的”48 人，便划到一、一类去 了。(《郫县县委扩大会议简报》，1959 年 9 月 16 日。)

反右倾运动层层往下搞，一直搞到老百姓头上。越到下面，斗争越野蛮残酷。

红光公社集中全公社党员和队以上干部开大会，搭台斗争对完不成征购的干部。县委书记赵金波在红光公社宣布：“凡是没有完成征购、没留粮的地方，都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斗者被脱去衣服，站板凳、跪竹片、跪转头，打得头破血流，惨叫不止。

四类，即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公社党委书记就可以划的。被划为“四类”的共产党员、红旗管区副主任毛炳高的命运凄惨。

斗争时，把裤腿挽起站板凳，跪砖头。赵(金波)定罪名：“对上粮抵触，右倾思想严重，回去监督改造。”回管区又斗，指头都打断了，60 年 2 月就疯了，不久死在东林管区。……社员说，连根狗都不如，讨不到吃。(见温江地委组织部《合兴联合管区干部第二次座谈会记录》 1961 年 1 月 22 日。)

这是建国以来最大、最残酷的一次“国家想多拿一点、农民想多吃一点”的争夺，一场名副其实的抢夺。有的地方不等稻子完全成熟就组织抢收，不等晒干风净就往国家仓库里运，各级干部积极分子遍布田间、道路和仓库，分兵把口，组织监督，为的是不让农民把粮食拿走。在反右倾运动的巨大政治压力下，征购任务完成得异常迅速。每个基层干部的命运都和完成征购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为了躲过眼前令人胆寒的灾难，谁也无暇顾及今后的生死存亡 。1959 年 9 月中旬，四川日报兴高采烈地宣布，到 9 月 10 日止，全省征购粮入库比 58 年同期增加 61% 。10 月底，温江专区完成了全年粮食征购任务，比以往提前三、四个月。

1959 年，四川地区粮食征购创建国以来的最高纪录。当时公布的粮食产量为 700 亿斤， 后来核实为 316 亿斤。当年征购量 154 亿斤，占实际收获量的将近一半，比 1953 年至 1958 年平均征购率高出 18 个百分点。

作为“四川粮仓”的温江专区，担负了远远高于全省平均征购率的征购任务。当年全区粮食实际产量，约合贸易粮 20 亿斤，征购任务竟达到 15 亿斤，约占产量的 75％!比 1958 年的 10 亿斤高出一半。扣除后来返还的 1.2 亿斤，仍然占当年实际产量的三分之二以上。

10 亿斤的贸易粮征购，本来已经是维持农民生存所能达到的极限，所有超出部分，必然以农民的生命为代价。当然那时候不是这个算法，当时虚报的产量远在实际产量之上。

在人均耕地仅有两亩左右的“肥富”地区，人均征购量达到 600-800 斤，个别社队甚至更高。华阳 1 万来人的白家公社，竟征购了大米 1000 万斤!。

以前所未有的迅度完成前所未有的征购任务，其结果是普遍的粮荒比以往任何一年来得迅猛。尽管表面上仍在强调国家、集体、个人三兼顾，在完成征购的同时安排好社员生活， 留足口粮种子饲养粮等等；层层上报的粮食分配方案也做得十分漂亮，看上去令人心旷神怡：交足征购之余，还有足够的粮食供社员细嚼慢咽。实际上纯属应付政治需要。绝大部分地方口粮所剩无几，有的收完粮食便断了粮。

征购如此之顺利，使地委领导大喜过望，事实似乎证明报表上的丰产数字准确可靠。然而刚刚高兴了几天就下面就传来痛苦的呻吟。10 月底到 11 月初，地委组织了一次口粮落实情况的复查。这一查，叫苦的又以为是反右倾，赶紧闭嘴。地委办公室报告说：“经过这次复查，四粮（作者注：口粮、种子粮、饲种粮、储备粮）已真正落实，原来闹缺粮的管理区也不缺粮了，按生活安排的标准可安排到明年 5 月底。”

真正落实的不是粮食而是政治高压。如果 1958 年的假话还有政治虚荣的话，现在已经为彻头彻尾的政治恐怖所取代。饿，不能说，饿死，更不能说，最好别看、别听、别想，否则就会惹出大祸。说起来让人难以置信，那时尽管成千上万的人在饿死，处在一定位置的领导干部是很难亲眼目睹的，他们当时知道的情况比我们现在知道的要少得多。一方面他们不想去 、不敢去看：你为什么要去看？居心何在？想搜集阴暗面向党进攻吗？一方面下边使出浑身解数不让他们看：为什么不把社员生活安排好？粮食到哪里去了？你贪污！你破坏！你 ……一级一级都在竭尽全力抹刹事实真相，言路闭塞至此，一个不清醒的领导眼里只会有面目全非的哈哈镜世界。

巨大的灾难降临了。

第 四 章 大饥荒

30、一条心 一股劲 一个样

1959 年国庆 10 周年前夕，成都市的主要街头竖起一块块巨大的木牌，上面用油漆画上砖块和窗户，周围挂上彩灯，入夜华灯齐放，俨然光彩夺目、鳞次栉比的宏伟大厦，烘托出辉煌的建设成就和欢歌笑语的节日气氛。锦江河畔，两座真正富丽堂皇的大厦正在昼夜不息的施工，一座是堪称西南首屈一指的高级宾馆锦江宾馆，一座是仿照人民大会堂式样的锦江大礼堂。在此之前，作为省会的成都还没有一座象样的大礼堂，可供走马灯似的巨型会议之需，许许多多的声势浩大的会议，不得不在重庆那座建国后新修的天坛式的人民大礼堂举行。在人民大会堂建成之前，它是全国第一大礼堂，号称亚洲之最。谢觉哉评价它："是没有见过的大，也想象不出的大，但它的利用率很低，每年要花一大笔维持费。"（见谢觉哉:《观花小记》，见人民日报 1958 年 5 月 16 日第 8 版）但对于动辄召开的"万人大会"，却是必不可少。成都有了大礼堂，就不必劳师动众到重庆开大会了。

十是一个吉祥的整数，尤其是面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大跃进的猖狂进攻，莫斯科修正主义、华盛顿帝国主义的污蔑攻击，更需要大张旗鼓宣传大跃进的伟大成就，报纸、广播、集会、文艺表演，街头、课堂、工厂、军营、田间地头无处不响彻着震天动地的跃进歌声和口号。置身于这种山呼海啸般的声浪里，哪怕腹中空空，也会激起莫名其妙的亢奋，把幻觉当真，仿佛住进了那些油漆画成的高楼大厦一般。

青羊宫的农业展览会车水马龙，人来攘往，是节日期间全市最热闹的地方。走进展览会，迎面一座巨型灯塔，竖起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的口号，几位巨人的形象无比亲 切地展现在人民面前：毛主席在红光社，刘主席在郫县拖拉机站，周总理在金牛人民公社……图表上的红色的箭头显示，全省小春粮食总产量比 58 年增长 30％，全年粮食总产量增加 10％以上，油料、棉花增长 20％以上，"要知道，这些成就都是在特大自然灾害的严重威胁下夺过来的。"高额丰产的典型

经验和各样的高产实物令人啧啧称奇，有一株结桃 485 个的棉花王，一株 72 穗的高粱王，一窝 27 斤的红苕王，一株分枝 1643 枝，结荚 70789 个的油菜王，一粒谷子发 196 穗的水稻王……

“大跃进的彩笔绘出最新最美的图画，我省农业年年满堂红”，四川日报用整版的篇幅描绘农业大丰收的景象，歌颂人民公社的幸福天堂。硕果累累、六畜兴旺、粮食山积、男欢女笑的画面允斥版面。“我们企图用这些画来反映我省十年农业生产的伟大成就。现在看来，尽管艺术家 们挖空心思，倒尽智慧，也不能表达其万一。”

人们激动地追忆着去年此时的农村：“那时，一声春雷平地起，伟大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了全川各地，千百万农民，坚决斩断资本主义的羊肠小道，勇敢地走向通往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中外反动派，曾把人民公社描绘为一个可怕的怪影，挖空心思地对他进行了种种恶毒的诽谤和攻击，但是，人民公社如一轮初生的太阳，一涌出地平线就朝气勃勃地升到中天……”

7 月间成群结队涌进省城的农民已经清理一尽，现在他们正拼命朝交通沿线的仓库里搬运秋收的粮食。节日期间，省城里每人供应了半斤猪肉，人人脸上泛起了生气，和张灯结彩、锣鼓喧天的大街小巷交相辉映。市中心明代王城城楼装点得如同天安门，国庆 10 点钟的钟声敲响，几十万人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由东往西通过广场，展示大跃进光辉成就的彩车一辆接着一辆，人民广场鼓号齐鸣，欢声雷动 ，彩旗飞舞，汽球升空，鸽群翱翔，省、市领导在城楼上频频挥手……

一切都是那么鼓舞人心，催人奋进。两年来精疲力竭的劳累，缩减到极限的口粮、肉、油 ，日益紧缺的日用品——从火柴、肥皂到月经纸，似乎都将成为过去。这些暂时的困难，都是因为可恶的天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破坏，后来还有赫鲁晓夫乘人之危的逼债——眼下他正和毛泽东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首都的游行队伍。越是难艰，人们越是期待奇迹：新一轮的跃进，在 1959 年大跃进的基础上更大的跃进已经拉开序幕，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再来一个大跃进什么都会有的。男女老少齐声高唱：

1960 年是更大的跃进年，是更大的跃进年，六亿人民跟着党呵，紧摧战马飞向前，跑呀跑呀飞快地跑呀，跑在时间的前面，……惊天动地干一番，干呀干呀加油干呀，一天顶他个 20 年，鼓足干劲创奇迹罗，生产指标冲破天，嘿！嘿！冲破天……共产主义早实现，嘿！嘿！早实现！

新年尹始，根据中央决定在当年继续大跃进的精神，省党代会提出“全党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为实现 1960 年的大跃进而奋斗”的口号。

“三个一”是李井泉别出心裁的发明。一条心，就是大反右倾，镇压不同意见，统一意志；一股劲，就是在极左的号令下统一行动，不许越雷池一步；一个样，就

是向所谓先进县、先进单位看齐，强行推广其“经验”。

与此同时，李井泉的雄文《人民公社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第三次印刷的精装本面世，总发行量达到 25 万 1 千册。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 1959 年 10 月第 20 期《红旗》杂志的首篇，针对庐山会议“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与国内外阶级敌人的叫嚣遥相呼应”对人民公社的“恶毒污蔑和攻击”， 阐述公社化的历史必然性。他回顾说，四川农业合作化每提高一个档次，就带来一次大增产，尤数公社化增产幅度最大，只有 1956 年由于反“冒进”吃了亏。从而“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结合的思想是百战百胜的”。他把张春桥的恢复供给制的思想加以发挥，认为它是解决农民吃饭问题，激发生产积极性的唯一途径。

大力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回击国内外的反对意见，是毛泽东在庐山会议结束时提出的。他想沿用 1955 年编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击退“反冒进”的成功经验，把公社化运动再次推向高潮。庐山会议结束下山前一刻的 8 月 19 日，毛泽东给吴冷西、陈伯达、胡乔木这几位他称为“休想挖走的秀才”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为了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或不明真象抱着怀疑态度的人们，对于人民公社的攻击、诬蔑和怀疑起见，必须向这一切人作战，长自已志气，灭他人威风，为此就需要大量的材料。每个省(市、区)选择 5 个典型，特别办得好的社，要派有政治、经济头脑而文笔又很行、思想很通的同志去。“写好，一律交给我，由我编一本书，例如 1955 年《农村合作化社会主义高潮》一书那样，我准备写一篇长序，痛驳全世界反对派。……即为此问题要向全世界宣战。”

四川省委以极快的速度安排部署这项战斗任务，除了选写 5 个典型社的材料，还要求各县搞一个先进公社的材料，在省内宣传并编写成书。温江专区的红光公社和新民公社入选给中央上报的典型。因为放卫星交征购弄虚作假被一再揭露，郫县在 1959 年蔫了好长一段时间，这时又象打足了气的皮球欢蹦乱跳起来。

郫县首先是高产卫星被揭了老底给打蔫的，这次他们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爬起来。当初亩产 8 万斤的最大的卫星出在友爱乡，他们就在这里打翻身杖。1959 年 11 月 10 日，他们给地委送去一份关于友爱公社 12 亩中稻亩产 4374 斤的材料。这又是一个未经地委验收的既成事实，而且事先已经报省委农工部，要在四川日报上发表。如果不是反右倾运动，他们是没有胆子这么干的，现在呢？你们看着办吧。这一军，可真把地委将惨了：同意么，明知是假；不同意么，正在反右倾的风口浪尖上，形势比 1958 年更险恶。秋收完两个月了，都不嫌晚，简直是仗势欺人。地委秘书长杨玉成琢磨了半天，批：“这个材料郫县已直接送省委农工部，今天省委农工部征求地委意见，他们准备登四川日报，我问了刘致台同志，他说这个材料没有问题，是可靠的，而且经验是好的。这里主要缺点是没有经过验收，请宋政委审查，并看可否登报。”宋文彬在材料上东算西划，打了无数个问号，无可奈何地批：主要

看省上的意见，由省上直接决定云云。

时至 1959 年末，高产卫星已是拆穿的西洋镜。尽管反右倾、鼓干劲的叫喊甚嚣尘上，全国已没有一个省好意思再折腾这玩意儿。然而这一颗全国独一无二的卫星划破沉寂的天空，顽强地在西南一隅升起。11 月 30 日，四川日报头版在“大反右倾保守，大立高产思想”的引题下，报道郫县友爱社 12 亩中稻亩产 4257 斤，的“特大喜讯”。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整篇报道的用意，就是要肯定省委——确切地讲是李井泉年初大肆推行的密植措施和继续搞万斤田。除了通篇的陈辞滥调和无所顾忌的凭空捏造，什么“麻雀都飞不过，鸡都钻不进去”啦，“把两里路远的草皮一个下午全部铲光” 下到田里啦，“黄澄澄的谷穗挤得密不透缝”啦，“高产是没有底啊！”的“老农的”赞叹啦，报道还特别指出，他们是到红光公社去年夺得水稻万斤的青年种植组去访问取经后，才树立高产信心的，而且是百分之百的实行 3×6 寸条栽密植。有意思的是，向地委保证“没有问题”的刘致台又不出面，仍然是“县委书记高义禄亲自去该队核查”。和这条消息同时发表的还有郫县崇兴公社钟月秋领导的“穆桂英战斗小组”，夺得亩产中稻 3257 斤的消息，“她们夺得大面积高产主要是听党的话，树立了高产思想。”

这颗大跃进期间全国最后一颗高产卫星除了给制造者打气，再也引不起什么轰动效应。而在头脑清醒者眼中，不啻是大难临头的凶兆。路已经走到尽头，恐怖的深渊就在眼前，难道还要眼睁睁往下跳么？

头脑昏热的郫县领导者们看不到这种危险，他们在“杨眉吐气”的感觉中梦游。1960 年 1 月 3 日，县委投书四川日报，发誓 1960 年小麦亩产破千斤、油菜破 5 百斤，水稻实现双千斤，养猪头数翻一番。四川日报头版头条以“郫县誓攀农业生产更高峰”刊登此信，并发表评论吹嘘郫县敲响了 1960 年农业生产更好更全面跃进的第一通战鼓。“这一通战鼓十分响亮”评论说：“这样的雄心大志……这股劲头从哪里来？追根溯源，就是前两年连续大跃进大大打开了人民的眼界。”评论呼叫：“让那些怀疑今年不能实现连续跃进的人们去怀疑吧！我们跃进的战鼓将越敲越响，越敲越猛。”

已经头重脚轻、两眼昏花的醉鬼，哪里还经得住这么猛灌烧酒。紧接着，郫县县委抛出“惊天动地”的一招：搞一条“规模巨大的高产路”!

高产路这个词，最初出现于聚集在郫县的那群记者笔下。1959 年底，郫县县委在“总结 1959 年水稻万斤指挥田的作用后”，决定在来年小春生产中，由县、公社、管理区、生产队四级层层建立高产指挥田的领导机构，在公路沿线规划“田园化”的高产片。记者在“立特大跃进壮志，树八字宪法标兵”的标题下吹嘘说：“这样，在成灌公路上红光公社到竹瓦公社全长 60 多华里的道路两傍，形成了一条规模巨大的高产路”。

指挥田，实际上就是瞎指挥田，是由上而下按照胡思乱想的增产措施搞出来的“样板”。它是由试验田演变来的，因为嫌“试验”二字缺乏行政权威，没有非照办不可的意思，改称指挥田。指挥是军事术语，如同战场上的命令，死活都得执行。然而仍然有基层干部不听指挥，千方百计变着花样对抗，在领导常来常往的公路要道两边按规定种，不易走到的偏僻地方按老办法种，上级发现了装装样子，人一走我行我素，或者干脆装聋作哑，死拖硬磨，令上面十分头痛。

从上到下层层搞指挥田，其目的是把强迫命令贯彻到底，不使消极对抗者漏网。在省委的督促、鼓励和宣传的煽动下，郫县的领导决心把这件事干得更漂亮。1960年1月10日，郫县县委发出在1960年大搞农业高产四级指挥田安排意见的通知。

我县在1959年农业生产获得空前未有的大丰收，特别在农业生产各项作物中，出现了无数高额丰产纪录。这些高产事迹的产生，根据总结的结果，都是由于在1959年抓高产田、指挥田分不开的。

为此，我们今年为了获得更大的跃进，让那些高产纪录遍布全县每个角落，使他们在各项作物中都向高产水平看齐，因此，目前决定大搞指挥田运动，即将成灌公路两傍各两华里划作为各项作物的指挥田，共10万亩左右，来确保1960年农业生产样样加番而奋斗。（见中共郫县县委:《关于县委60年大搞农业高产四级指挥田的安排意见通知》，1960年1月10日。）

这个庞大计划的核心，是沿成灌公路搞一个两公里宽、占地10万亩的高产片走廊。走廊范围内的田块，要改为“百亩大田”，每种农作物必须连片；公路沿线的零星农舍统统拆除，社员统统迁入远离公路的“百户大院”集中居住 。而且要在一个冬春大功告成！

为了使计划得以实施，县委动员全县干部全力以赴，并作出庞大周密的组织安排。规划范围内6个公社、２５个管理区、约12000户社员中，每百人选1代表，组成450人的“指挥田代表大会 ”。县委成立“农业高产指挥田委员会”，委员会下设由县级机关各单位牵头的生产技术研究指导组 、肥料生产合理使用组、劳动力调配组、政治鼓动评比检查组。各公社成立农业高产指挥所。县级机关各单位分别参加规划区内6个公社的指挥田管理……。

这个称之为丰产路的，利令智昏、好大喜功之大成，登峰造极的瞎指挥的怪物，想象起来真是美妙之极：阳春三月，当往来于金牛坝的领导同志、社会主义阵营的来宾驱车在成都到郫县的道路上，一边是一望无际，金黄灼目的菜花，一面是连绵不断，碧绿如毡的麦田；秋收时节，稻浪翻滚、密植的稻子的稻穗密密地铺了一层，如同行进在粮堆之中。偶尔可见远处房屋整齐的大村庄。苏联电影中的集体农庄——那时中国人心目中的共产主义新农村，不就是这样的么？

然而这只是梦想，它在这个饥饿和死亡的冬季给老百姓带来雪上加霜的可怕灾

难。数千间农舍几乎在一夜之间被强行摧毁，几十上百户的农户如同囚犯般挤住到一处。最终形成的这条供上面参观的高产片走廊，稻子还未成熟便大片倒伏，而一公里之外是大片丢荒的良田。

和“丰产路”一起出身的双胞怪胎是成都至郫县的“轻便铁路”。1959 年秋，郫县至成都的铁路正式开工，筑路民工在本县调集，最多时达到 3500 多人，4 万多根枕木“就地取材”。设计的路轨和小煤窑运煤的铁轨差不多宽。由于钢轨紧缺，只有用铸铁轨替代。在化了几十万个劳动日、吃去几十万斤粮食、砍光沿线成材树木之后，1960 年 3 月 15 日宣布正式通车。

这一天正是毛泽东视查红光社两周年前夕，盛大的通车典礼在郫县“城关总站”举行，县委书记高义禄、赵金波，县长潘太华，成都市委书记米建书剪彩。在 6 千多人欢呼雀跃声中，一台披挂如京剧武生用载重汽车改装的“火车头”，拉着几节公共汽车改装的客车车箱，摇摇幌幌驰出站台。四川日报宣称，列车每天可以从郫县至成都 1 7 公里的路段上往返 4 次，每次拉 20 个车皮，载重 320 吨，大大加快成、郫物资周转。郫县兴高彩列的宣布，今后全县大部分物资转运工作，将由铁路运输取代。为壮红光公社观瞻，除县设总站，另在犀浦设“红光分站”，在合兴设“高店子分站”，各站站长、书记委任到位。下一步计划要把铁路修到原崇宁县的唐昌乡、彭县和“红光居民点”，以及县属仓库、厂矿，“在全县建成四通八达的铁路网”。

这条劳命伤财的铁路没有正常营运过一天。马力有限的汽车头拉几节车箱，每小时爬行一两公里，到成都市区需 1 0 多个小时，比老太婆走路还慢。路基不稳，质量低劣的铸铁轨频频压断，车轮下陷，经常要招集人马推的推抬的抬，人们经常看到的是“列车”僵卧铁轨。半死不活“营运”一年之后，这条代价不菲的铁路便寿终正寝，铁轨枕木被偷拆得七零八落，到 1962 年“正式拆除”时，已没有什么东西可收拾的了。

乘反右倾的东风，红光公社进入了大跃进以来的第二个“黄金时期”，风头之盛，较 1958 年有过之无不及。和新繁的新民公社总是和罗世发联在一起那样，在外界的印象中，红光公社是和剃着光头、身材瘦小的周桂林联系在一起的。其实现在代表红光公社的是年轻泼辣的姑娘郑凤兰。周挂林当年那个毛泽东视查过的红光高级农业社，现在仅仅是红光公社合兴分社的一个管理区，他不过由社长改任管理区支部书记，而且已经无足轻重，靠边稍息。

1959 年 10 年 8 日，在北京参加了国庆十周年盛典的中苏友好协会主席吉洪诺夫，率团到郫县红光公社访问。这位热情洋溢的友好使者对年轻的女社长留下深刻印象，写下一首赞美的诗歌，译文在人民日报发表。

田野上走来一位美丽的姑娘，
她今年只有 2 5 岁

……

整个温江专区美丽和不那么美丽的女干部私下都撇着嘴说:“那个女子漂亮啊？”县上干部开会，郑凤兰迟到了，有人就问:“美丽的姑娘呢？……”“啊！来了，美丽的姑娘来了。”有人指出，她已经２７岁。对于那时的未婚女子这是一个可怕的数字。事实上大多人不服气的是她的所作所为，她凭什么红得发紫？然而现实就是如此，决定干部命运的不是民意而是领导的好恶，如果被某为大领导看中就挡也挡不住了。眼下红光公社是李井泉情有独钟的骄子，谁也阻止不了她的青云直上。随即她又随中国妇女访苏代表团到苏联访问，参加了莫斯科的十月革命节庆典，还跟赫鲁晓夫握了手等等。那时莫斯科在中国人心目中犹如穆斯林心中的麦加，让她享受这份殊荣更让许多干部不服气。

从 1957 年就开始聚集在郫县的记者队伍，1959 年底急剧膨胀，随时根据座镇金牛坝的李政委的意向，连篇累牍地泡制大块文章。四川省委的机关报四川日报，一段时间看上去就象是郫县和红光公社的专刊。11 月 25 日，李井泉在金牛坝招集刘致台、曹云生和红光公社、新民公社的干部座谈，计算两个公社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时间，李井泉说，红光公社 1962 年可以实现机械化，今后都要向红光公社这样，成立一万户左右的联社，以利机械化耕作。为此，他提出郫县、新繁两县合并，让曹云生转告宋文彬就这么办了。

李政委的意见两周前已见诸四川日报头版头条。“红光社向农业机械化迈进”，报道说，现在全社已有５３台拖拉机，还有１千多部属于半机械化的双轮双（单）铧犁和３００多部架架车，机耕面积达到５０％，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省上为郫县及红光社的农业机械化，确实下够了本钱，但５０年代从苏联东欧买来的那些大型拖拉机，在川西坝子的小块水田里极不适用，大跃进一来，拖拉机搞犁田竞赛，要求每台拖拉机每年犁田万亩，甚至提出创犁田１０万亩的“卫星机”，机械严重损坏，不到一年，一半以上都动弹不得了。双轮双铧犁牛拉不动，纯属废铁。人病了可以说偷懒，强迫你干，机器病了有什么办法呢？结果县拖拉机站的站长宋旭，红光公社农机站女站长郎树林反右倾时都倒了霉，就差没给拖拉机扣右倾帽子了。到 1962 年，全县 101 台拖拉机勉强能开动的只剩 32 台。

为毛泽东提供的红光公社调查报告——“红光满天，东风万里”，早在国庆１０周年前夕就大功告成。这篇报告按毛泽东“以七八千字为适宜”的标准，写足了八千字，通篇夸大不实之辞和编造的数据，把红光社描绘成丰衣足食，百业兴旺的幸福乐园，大跃进路线的成功典范。当初这篇报告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时，一定度使许许多多的人神往——“在‘四川粮仓’的川西平原上，有个最大的人民公社——郫县红光人民公社”，那是多么幸福美好的地方啊。报告的修改版被郑凤兰带到苏联，

让半信半疑的老大哥们开开眼界，还让莫斯科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欢喜了一阵子。

如同寡不敌众，死伤累累的攻击队伍，不知退却和休整，反倒被命令作自杀式的大冲锋，整个温江专区都在新一轮的跃进高潮中疯狂折腾。

1960 年元月初，地委组织各县第一书记、公社第一书记 4 百余人的庞大队伍，浩浩荡荡奔赴乐至，学习李井泉一手在这里试点的贯彻“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的经验，即以“反右倾为纲”，把反对瞎指挥的干部统统打倒，实行基层干部大调动、大换班，一个样的搞小春作物高度密植。取经归来，各县以反右倾为纲，层层开干部会，群众会，“万人誓师大会”；组织百人、千人、万人大检查团，轮流到各公社“逐田检查，逐苗检查”，凡不够密植标准的一律补栽重栽，长势不好的下令灌水施肥。

1959 年以来已经局部纠正的共产风、“大兵团作战”卷土重来，浮夸、乱指挥变本加厉。华阳永兴公社把全社劳动力组织为三支“战斗队”，一队突击小麦追肥、淹水，一队突击“五光五净”（即把田坎路边所有杂草铲光做肥），一队突击“三类苗”。全社冬水田翻挖二次、三次、四次，小麦、油菜突击“三肥三水、四肥四水，五肥五水”。

中央、国务院又有“今冬明春继续开展大规模兴修水利和积肥运动的指示”。1958 的大跃进，就是从大兴水利开始，现在又大上大干起来，全川投入的水利建设队伍居然达到前所未有的 620 万人。温江专区仅仅修灌县水库就上了 10 万人。这座由苏联专家设计的水库最终半途而废，只留下几段废弃的水泥墩子。

肥啊肥！到哪里去挖掘肥源？老墙，锅台打得差不多了，地皮子铲过几遍，田边地头“五光五净”，猪成倍减少，人拉的屎都不臭，威兼氏的有机物到哪里去找呢？哦，还有树叶。四川日报编造说，温江县集体公社为了给小春猛追一道腊肥，开展了“千锅万灶”运动，大熬树叶子水，四天内全社共造水肥 7 万多挑，给 2 千多亩小麦重施了一道“腊肥”。为应付检察，公路沿线每隔一二十米垒一个土堆，冒充“堆肥”。

如果说四川在 1958 年的浮夸大赛、共产大赛中未能抢拔头筹，那么在 1960 年卷土重来的跃进中，四川大有独领风骚之势。1958 年大跃进中风头出尽的一些省分，这时候要么偃旗息鼓，元气顿挫，要么吸取教训，暗自退却。王任重无心让 58 年那一幕在湖北重新上演，小心而坚决的控制着局势。广东的陶铸对柯庆施在华东 4 省座谈会上提出的加快过渡到公社所有制的方案公开反对，认为这样做“有可能重复 1958 年曾犯过的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错误，而 1958 年的经验证明，这个教训是深刻的，决不能重复这个教训。”安徽的曾希圣在试验和推广包产到户。能够和李井泉唱合的只有上海的柯庆施，他的杰作是循着毛泽东的思路，提出人均收入达到 150 元到 200 元，就可以向以公社为核算单位过渡了。但是在继续吹牛方面，似乎还不及李井泉来劲。

1959 年底，李井泉告诉温江地委，他在中央开会时，上海市委建议，上海市郊

要同我们竞赛，我们表示热烈响应，我们以温江专区的都江堰流域、成都市郊区和重庆市郊区与上海市郊区竞赛。 倒底是谁向谁提出挑战，李井泉的话大可打问号，因为后来的事实证明，上海方面似乎对此并不热心。

接到任务后，温江地委急急忙忙组织了一个赴上海的学习竞赛工作组，搞了一份竞赛意见，提出以温江专区的都江堰流域和上海市郊县农村展开竞赛。竞赛指标搞出来以后，宋文彬多了个心眼：既然是对方提出挑战，就应该先给我们下战书，提出竞赛指标，视对方开价的高低相机行事，以免日后丢脸。谁知对方更精明，任温江方面一再探询，直到 1960 年小春收割以后还没把竞赛指标交出来，竞赛成了一场应付差事的游戏，1960 年 6 月 11 日，以温江地委牵头、有成渝两市干部参加的竞赛工作组前往上海，上海方面依然闭口不谈竞赛指标问题。到了 7 月份早稻收割，工作组向温江地委报告，上海的早稻亩产只有 600 来斤，密植的样板田台风一来都倒伏了。而小春产量经核实，油菜亩产 160 斤，小麦亩产 230 斤。这样的产量说出来都叫人脸红，还有什么竞赛头？到此双方再也无心恋战，这场心血来潮的游戏便胎死腹中了。

31、恶兆

李井泉在庐山会议上，矢口否认田家英关于“真假两个罗世发”的调查结果，回到四川便拿罗世发是问：你为什么说有两本帐？为什么说减产？罗早有准备，回答说那只是田家英调查的三个生产队的情况，他既没有说全社，更不是说四川。李井泉轻描谈写地说，你小子脑袋还灵光，便把他放了。

罗世发和新民公社，是李井泉多年关心扶殖起来的典型，他当然不愿把这面红旗拔掉，况且罗还是人大代表，名声在外呢。而罗世发能够轻松过关，还得益于他多年的精明处世。这位前禾登乡街头剃头匠的徒弟，具有非凡的调合上下利益冲突的本领。他从家乡的土地上一步步往上走，从来没有忘记要把根留住，他始终参加劳动，动口也动手。作为李井泉一手抓的典型，他不得不摆出先进的姿态，以至弄虚作假，吹牛拍马。但他也会留一手，不把事情做绝，尽可能给家乡父老留条活路。既要为上面“争光”，又要顾及下面的利益；既处理好同领导的关系，而且是观点不

同的各方面领导的关系，又不被大多数群众唾弃，真是难乎其难，他居然勉勉强强做到了，这得有多大的本事！

给毛泽东提供的新民公社的调查报告题为“光辉的里程——罗世发和新民公社走过的道路”，记载罗世发从建立互助组到人民公社的历程，说明农村不断扩大所有制规模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新民公社是温江专区屈指可数的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公社之一，其宣传意义和庐山会议后“加速过渡”的喧嚷甚为合拍。再次成为热门人物的罗世发却没有因此而发昏，田家英使这位悟性极高的前剃头匠窥到上层斗争的隐密。秋收以后，一个神秘的人物在新民公社的出现，把他脑袋里的弦绷得更紧了。

这个人是周恩来的女秘书许明。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曾经当面说周恩来“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周恩来没有生气，而是提醒彭德怀注意自己曾经犯过反冒进的错误，所以“应当谨慎，吸取教训。今年你替了我。其实，你有鉴于我，还写了总路线基本正确，没写‘冒进’字眼。”[9]　田家英在会上反映的真假罗世发的事，引起周恩来的注意，庐山会议后，他派秘书许明到新民公社调查，许明以四川省妇联干部的身份在新民公社调查 3 半个月，找生产队长黄常和一些农民多次长谈，证明田家英的调查完全属实。据田家英的妻子董边回忆，周恩来把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对田家英态度“有所好转”。[10]

1959 年底，罗世发揣着一颗七上八下的心出国访问，参加“世界青年农民联欢会”，周游东南亚及印度诸国。饱览异国风光之余，他不断写信回家询问情况。在印度，他收到家乡一封回信，告诉他今年春节全社每人吃了 5 个汤元，一看见这几个字，他就认定大事不妙：往年生活再困难，社里春节会餐都要凑够“九碗”，饭菜管够的啊！

1960 年 3 月回国，罗世发一到成都李井泉就告诉他，马上到北京参加 3 月底召开的二届人大二次会议。罗说他必须回家看看。他坐车到新都，然后步行经马家到禾登乡。正是川西坝子上春光明媚，景色如画的季节，但他不是诗人，他发现庄稼孬得不成样子。人更不成样子，要么面黄饥瘦，要么皮泡脸肿，擦肩而过，一个个神情麻木，东摇西晃，如行尸走肉。在马家乡和一个亲戚相遇，问起生活，对方告诉他，没吃的了，啥子都没吃了，还不敢说饿，说饿就开会斗争，背石头……

一块巨大的石头越来越沉重的压在心头，他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头上冒出一层虚汗，突然他站住了：路傍躺着一具倒毙的尸体，一看他就明白，那是饿死的……。

北京人大会议期间，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单独接见罗世发，请他吃饭。周以不经意的口气一再问他农村情况如何，他一个劲地回答好！好！他毕竟第一次和总理面对面交谈。

“一点问题也没有吗？”周很有耐心。

他揣摸到总理的意思说:"就是农民病多一点"。什么病？周继续问:"肿病……"看他那付吞吞吐吐的样子，周没有再为难他，迈过话题说，这说明你们生产有问题，你们的产量不是那么高嘛？罗再次把"两本帐"的事和盘托出。

但是他没敢说，连堂堂的新民公社都在饿死人了。

宋文彬后来说，这时候他才真正开始清醒。他毕竟在这片土地上工作了 10 年，十之八九的精力都花在粮食上，折腾来折腾去，每年能收到国家粮库里的粮食也就是 10 亿斤左右，今年突然增加 5 亿，尽管为了完成上头的任务嘴上不承认缺粮，但心头实在发虚。11 月的一个傍晚，他独自一人来到温江县城附近的永兴乡，一群种小麦收工的农民正在朝公共食堂走，他默默地尾随上去。走进食堂，蒸笼打开全是红苕。他问，秋收刚过，为何尽吃红苕呢？人们没有认出他来，但山西口音暴露了他的身份，那时候，温江专区地面上操北方话的个个是官。农民回答，红苕容易坏，我们先吃红苕，再吃细粮。

用不着多问，他就发觉坏了，稻子打下来还不到两个月，已经粒米不见，要出大事了。温江专区大大小小的粮库里有的是粮，但那是国家的，只有省上有权调动，地委能掌握的至多两亿斤，那是供每年青黄不接时调剂的，眼下不得不动用。他吩咐通知各县，敢快统计汇报缺粮数。

想象得到么，没一个县敢报！

反右倾运动他们刚上了一回当，那些"考试"不及格的人正在挨斗呢，谁知道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想想自己面对省上的尴尬，宋文彬也就理解。这样吧，反正没有不缺粮的，拿出 1.2 亿斤，按人头、猪头平摊分下去。象一群打慑了的孩子咽着口水围住一块大饼，开初谁也不敢下手，现在大人把饼切开，说拿吧，大家便闪电般的把各自的一块抢到手，狼吞虎咽起来。拨的是指标，各自到就近的仓库如数照领，方便得很，到 12 月份粮食已经分配下去。新繁县委书记曹云生顾不得什么先进的面子，动作最快。

只有郫县没有去拿地委分的一片饼，他们骄傲地宣称，不需要！颇有不食周粟之古风。他们觉得地委那帮人没安好心，一年多来尽往郫县脸上抹黑。眼下正是洗尽污水，重塑形象的关键时刻，这片饼不好吃，吃了就给人家留下话柄，不打自招的先短了气。为了绷先进的面子，竟然可以置老百姓的性命于不顾。然而设身处地，你又不能不为这种幼稚的愚蠢叹息，他们还嫩了一点，其实就是吃了，先进照样可以当的。

人不可能不犯错误，但是不能犯致命的错误。为官者的一言一行，都是在书写一方的历史。历史很无情，它不原谅犯致命错误的人。

地委拨下的粮食，就算全部能落实到人头——实际上不可能，要维持到翌年 5

月小春收割，远远不够，很快便被饥饿的浪潮席卷一光，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饥荒降临了。

两年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还在介绍科学常识——人为什么要吃饭？“每人每天究竟要吃多少食物才能得到足够的养料呢？……一般的说，成年人每天能吃到 14 两到 1 斤的米饭、馒头或窝窝头，吃到半两到 1 两的脂肪，就差不多了。而在冬天，由于热能消耗大，需要吃更多的食物来补充多消耗的热能。”

眼下正是严冬季节，四川省委给农村安排的粮食标准是每人每天 4 两细粮（记住了，这本书里所讲的都是 16 进位衡制），外加 1 斤红苕。红苕按 4 ： 1 折细粮， 1 斤红苕折 4 两，加起来总共 8 两，即半斤。脂肪？不存在。这个标准粮食大约是“常识”标准的三分之一，而且他们还要干沉重的体力活。但是省委说这样“就可以吃得饱，就可以吃得好了。”是否吃得饱吃得好暂且不谈，问题在于，就连这个标准也落实不了。1960 年元旦前，李大章焦虑万分地在省委电话会议上讲群众生活安排问题，怒气冲冲地说按省委的标准，只有 60％的地方落实到了食堂，还有 40％没有安排。而且，所谓“落实”的 60％也大有问题（见《省委 12 月 30 日电话会议上李大章同志关于群众生活安排问题的讲话》1959 年）。

有的地方把红萝卜、白萝卜以 6 斤折 1 斤也当成粮食来计算，这样折算的结果，每天又只有三、四两粮，二、三两粮……把萝卜都折算进去都只有二、三两粮，这就成问题，没有细粮了。

他要求即使只吃粗粮，也应把折算的标准统一，细粮的折算，只能包括红苕、薯类，不要包括萝卜。

红萝卜还顶点事，白萝卜一煮就成了水，吃到肚子头几泡尿就算了……

他警告说，不抓群众生活要出大问题。

现在叙永的暴动，简阳的暴动，叙永的暴动是复原军人……，现在粮食太少了，就借这个缘故就闹起来了。……你要跃进嘛，你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这个东西不行。

在人人钳口结舌的反右倾运动高潮中，敢这样讲实属不易。

他提醒人们，不能再犯 1958 年底八届六中全会就开始纠正的那些错误。要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否则就会出大问题。至于李井泉大吹大擂的 1959 年四川粮食增产是怎么回事呢？

今年预计粮食产量是 715 亿斤，现在又退下来了，实际上是能够保产。能增多少，现在还有点疑问，所谓增就是增加点粗粮。

对大张旗鼓的新一轮跃进，大修水利、大兵团作战、夜战等等，他颇有微辞。

每天劳动 10 个小时已经很够了，所谓搞夜战是不好的，再不要搞夜战了。……在水利建设方面，全国有 7 千多万人，四川有 622 万人，……而这种大兵团作战几

百人，几千人，几万人的大兴农田水利，吃的饭都是汤汤水水，都是冷的，送点冷东西去吃，就问题更多。

口粮落实不了，食堂停伙，各地又在大搞反瞒产私分运动。李大章公开宣布：

我不主张搞运动反瞒产私分，这容易出问题，……不采取反的办法，而采取正面教育，说服的办法。

这年年底，中央破天荒给四川“拨”10亿斤粮食。不过还不是由外省调入，而是在四川外调粮食指标中扣除。李大章在讲话中说，这10亿斤粮食他“主张一次下放，一次落实到公共食堂”。涪陵地委反瞒产私分最积极，宣称反出5亿斤隐瞒的粮食，一面又要求分4千万斤粮食，结果自讨苦吃。

那些不缺粮、或缺得少过得去的，就少分配一点，……现在你们反出5亿多斤出来，因此是否考虑分配涪陵地委的4千多万斤可以少一点，或者涪陵地委把省委分配的粮食暂时冻结起来，不要分配下去了，把你们反出的5亿多斤粮食分配了，也比别的地区好的多，因为你们量太大了。

地处武陵山脉的涪陵专区，粮食总产不到10亿斤，居然反出5亿私分粮，纯属天方夜覃。（作者注：1962年6月28日，时任团中央委员、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的廖伯康在中南海向杨尚昆汇报，涪陵全地区各县加在一起饿死350万。（廖伯康：《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旋涡—回忆四川”萧李廖”事件》见当代史资料2004年第1期。）

32、沉默的羔羊

川西坝子的冬天，是一年四季最难熬的季节。仅仅从气象显示，你是体会不到那份难受的。气温很少到0度以下，听不到北风呼啸，偶尔下几粒雪，一沾地皮就化了。但是你见不到太阳，几乎整个冬季，盆地都笼罩在浓重低垂的乌云之下。空气中注满了水，说不清是霜是雾还是雨，当它们慢慢降落到地面，就把道路变成一片泥泞。屋里屋外，旮旮角角都浸泡在冰冷的湿气中，那是一种无所不在的、无法驱赶的、钻心透骨的阴冷。那时候，整个温江专区没有一间带暖气的房子，机关单位和家境好一些的城里人有时烤烤炭火，乡下人把烘笼夹在胯下取暖。它是一种竹编的小提篮，提篮里装瓦钵，瓦钵里装柴灶烧剩下的木炭或锯末 ，看上去有欠雅致，

却是最节省的取暖方式。此外，抵御寒冷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淀粉和脂肪了。

1959 年的冬天似乎来得特别早，也特别冷。不准社员开伙，家里没有木炭，烘笼烤不成，何况有的地方灶打了，烘笼也收了。食堂再一关门，里里外外捞不到一点热能，只有任凭寒冷肆虐。

在这个黑暗的冬季，自古就有“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美誉的温江专区，和全省一样遍地是饥饿和死亡。

川西地区饿死人的事从 1958 年冬季开始出现，1959 年已经很普遍。大规模的死亡发生在 1959 年到 1960 年冬春之间，像一股凶猛的寒流席卷整个川西平原。从 1958 年冬季以来被精疲力竭的劳累、日益加剧饥饿折磨衰弱不堪的人们，再也经不住这次惨重的袭击，成批成批的倒下了。

人吃少了会饿，会衰弱，但是要饿死可不那么容易。活过来的人说，一天有一两米也饿不死。然而眼下已经不是缺粮，而是粒米不见的断粮，少则十天半月，多则数月，食堂停伙关门，什么吃的也没有。土地、牲畜、农具、土地上生长的一切都是“公家”的，农民家徒四壁，自由市场取缔，甚至到城里挤馆子都不可能了，一切淀粉制品现在凭粮票供应，而农民没有粮票。食堂一关，上天无路，下地无门，唯有死路一条。

老人们在呻吟中衰竭而死，孩子在哭叫中嘎然而去。倒毙在路边田间的多数是男性青壮年，他们为生存绝望地奔走，被驱赶到田间干活，然后象断了电的马达走着干着突然倒下，猝然而死。女人由于有较多的脂肪储存和较慢的代谢，承受饥饿前煎熬的时间长一些，但她们也因此受到更多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一个家庭，往往是男方先去，剩下她们去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和面对嗷嗷待哺的孩子。

没有啼饥号寒的喧嚷，没有呼天抢地的悲泣，没有“饿死不如肇死”的骚乱，甚至没有大规模死亡引起的震惊和恐惧。死者默默地，无声无息地消失，活着的神经麻木，除了减轻生理上的痛苦，没有任何事情能引起关注和兴趣。有时候，他们会见惯不惊地互相告诉一下谁又死了，就象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无力走动的人躺在床上绝望的等死，谁也无力帮助他们，有时候全家人就躺在床上一个接一个的死去，后死的根本无力掩埋前者，而且埋不埋似乎也失去了意义，因为后者很快也会死去。一些全家死绝的人家数日后才被发觉。

饿死的过程缓慢而痛苦，当他们突然倒下或失去知觉时，严格的说并没有死，而是处于“低血糖休克”状态，此时如果抢救及时，如注射点葡萄糖或喝几口米汤等多半可以起死回生。但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只有从低血糖休克的状态慢慢走向死亡。所以人们往往看见倒下去的人一会又慢慢蠕动起来，埋到一半的人突然“乍尸”等等。

从理论上讲，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绝大部分充公后，社员的生、老、病、死就

全由公社包干，这是被竭尽赞颂的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之一。死了人，自然得由集体组织人员安葬，不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安葬工作是十分草率的。传统的安葬仪式已经作为封建迷信彻底铲除，旧有的坟园大部分开垦为农田，担任这个差事的人本身就有气无力，不得不潦草从事，一般是在房前屋后就近掩埋， 好一点的有口“火匣子”（即薄木棺），差点的裹床草廉子，或者什么也不用的“软埋”。到后来有的地方连 抬埋死人的人都难找了，干脆抬到少有人走动的地方一扔了事，任其曝尸荒野。

“饿”犯忌，“死”更犯忌。好象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亏心事，人们默默无言地忍受饥饿，悄无声息地死去。连掩埋工作也是偷偷摸摸进行的，干部唯恐被追究责任，不得不用恐赫、打骂的办法封社员之口，除非上面派人调查，绝少有人敢主动反映实情。在来不及组织人安埋死人的情况下，有的就下令将尸体扔到邻近的社队，嫁“娲”于人。

地委宣传部教育科副科长梁进学因实报所下放公社的粮食产量，在反右倾中受到批判，被下放到新繁的新民公社当社员。1960 年 3 月，县上又要求他们一批下放干部到邻近的新都县马家公社“突击落后”。他后来在个人回忆录中记载了这次“突击落后”时，目睹的可怕一幕 ：

我先去二大队，我从马家中学后面出去一看，小春作物长得相当不好，特别是油菜，好些是“一柱香”，顶上只有几个小花苞。田里看不见人出工，只有几个女社员在淘苕菜。我走近问他们：“你们男社员哪里去了，怎么不见人做活路？”他们回答说：“男社员住居民点去了，只有我们几个女的还在做活路。”我心里一诧，问：“你们还修了居民点？在哪里？” 他们用手一指，说：“在河边上，你们去看嘛！”我顺着他们指的方向，走了一里多路，到河边上一看，我的天啊！那是公社化以后规划的集体坟园，两片坟茔，几乎全是新的，大致有一百多座。我的心情十分沉重，返回到这个大队的 3 生产队公共食堂，在食堂门外红苕窖里看到丢了一个死娃娃。我找到生产队长说：“把那个死娃娃找个地方埋了”他找到几个社员下到红苕窖埋一拖，下边还有个死了的老太婆。生产队长为难地对我说：“实在饿得没办法了，人死了都顾不得埋了。”（见梁进学：《我的回忆》）

饥饿是一种毒素，它麻醉理智、良心、亲情以及一切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经历了长时间濒临死亡的饥饿后，人会变得如同病入膏肓的隐君子毒瘾发作一样，除了吃、吃、吃，真不知人间还有何物。“家中无粮，父子不亲”，岂但父子、夫妻、母子都顾不得了，人人都在死亡线上挣扎，顾了别人，就顾不了自己。自己的让给别人，自己就得饿死；母亲让给孩子，母亲就得饿死。人到了这个地步，一切非理性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在这种时候，你无法指责残忍。

大邑安仁 9 管区社员刘元芳，女，30 岁，于 4 月 23 日把亲生女(李水清，8 岁)，儿(李永安，9 岁)，用牛绳子拉到安仁观音堂清水河淹死。

原因：据刘元芳自己说，由于这两个孩子偷社上碗豆角 2 斤 5 两，被发现，当天中午事务长即扣了刘元芳母子 3 人的饭。刘元芳提出她下午要耕田使牛，只给了她一人 4 两米，两个孩子即没吃。下午这两个孩子又去偷了附近鸭棚子的米 2 斤，又被捉住，第二天中队长打了刘元芳两耳光，吐刘的口水，要刘把米退出来，刘没法，则将饭票退出。因此，想到做了活，吃不到饭，做活路完不成任务，又要挨斗争，所以就下了这个毒心，把孩子整死。（见温江地委办公室接大邑县委办公室电话记录，1960 年 4 月 25 日。）

那些不缺粮、或缺得少过得去的，就少分配一点，……现在你们反出 5 亿多斤出来，因此是否考虑分配涪陵地委的 4 千多万斤可以少一点，或者涪陵地委把省委分配的粮食暂时冻结起来，不要分配下去了，把你们反出的 5 亿多斤粮食分配了，也比别的地区好的多，因为你们量太大了。......................人吃人的事，古今中外有之，却永远是令人惊心动魄的话题。在川西农村，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几乎人人都听说甚至见过关于人吃人的事。因为这种事对政府的宣传构成极大的威胁，当时被视为罪大恶极的犯罪行为，一经查处将以政治罪名判处极刑，因此必须冒着生命危险极其隐秘的进行。孙二娘式的勾当极为少见，多半是在死人或垂死的人身上打主意。他们本无杀人之心，只是饿极了而已。同样的原因，在孩子身上打主意的人只有自食其子，连“易子而食”的安慰都得不到。这样的故事作者在采访中一再听到，如泸州专区一个在外地读书的学生放假回家，一天半夜闻到肉香，又听隔墙有咀嚼之声，从墙缝偷看，见父母正狼吞虎咽，次日发现弟弟没了踪影，回到学校便疯了；又如青神县天池乡一个妇女吃了自己死去的孩子，被发现后竟逼她用竹竿挑着孩子的头游街示众……。

吃人案由公安部门秘密侦破，判处情况绝对保密，因此尽管广为流传，却难以掌握准确的例证。为了不致让人感到它不过是流播和言传，作者引用温江专区当时记录在案的两件事，这是灌县在 1960 年的一天之内同时发生的。

蒲阳公社 8 管区 3 队潘素华，女性，现年 41 岁，地主成份。……51 年丈夫病死，为逃避群众改造，52 年便与贫农唐前武结婚，婚后夫妻感情不好。……3 月 16 日晚，［其夫］唐前武落水淹死，次日晨被发觉，管理区具棺埋葬。当晚其妻潘素华以假悲之情，叫社员埋浅点，回家后将菜刀磨得锋快，当晚乘夜静更深，带上锄头、菜刀、背篼等物，把坟墓挖开，将头、四肢砍下，并挖取肚腹及全部上躯背回家中煮熟自食外，还假以熊骨出售，以 1.5 元一斤，共卖了 11 斤 12 两……事为食堂事务长黄荣太觉查，并在家中查出手、残躯及肠、骨等。……鉴于潘素华抱有深入骨髓的阶级仇恨，有计划、有步骤地下此毒手，为了及时有力的打击敌人，已将潘素华依法逮捕。

丈夫死了，妻子将尸体挖出来吃，这本是饥荒造成的惨剧。但因为妻子曾是地

主的寡妇，丈夫是贫农，就成为有计划、有步骤的阶级报复，这是当时流行的推理方式：阶级成分决定行为动机。似乎除此以外他们连人的基本需要都不存在。因此，他们若有不轨行为，将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这反过来促使他们挺而走险。这使作者想起这年大肆宣扬的合江县著名少年英雄刘文学的故事。一个叫王文学的前地主在地里偷辣椒被他抓住，他一定要将王带到公社，王最后掐死了他。无论当时的具体情况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王一旦被送到公社的后果十分可怕。

如果你成分不算坏，就从思想上挂靠，总之，吃死人肉之类的事决不是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干得出来的。

崇义公社 3 管区 2 队富裕中农周玉光，女，现年 39 岁。解放前男人外出当兵病死，解放后在四大运动、土地改革中工作积极，曾被选为妇女代表。统购统销后及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深入和两条道路斗争尖锐下，该周对现实极为不满，资本主义思想严重，不愿走合作化道路，直至公社化后才入社。…… 3 月 1 6 日下午竟将该队杜之田已死两天的小孩(两岁多)从埋处挖出，砍去头部、四肢并将肚腹挖出丢在河里，将身拿回家煮吃……。（见灌县县委办公室关于“两起不正常死亡事件”给温江地委办公室的报告。1960 年 3 月 26 日。）

奇怪的是，这两起事件是以“两起不正常死亡”为名报告的，这和报告中所说把埋葬的死人挖出来吃相矛盾。报告没有说明两个被食者是如何“不正常死亡”的。留下的悬念是食人者造成了他们的不正常死亡，也就是被有意弄死后吃的。同时可以看出，因为能找到政治原因，县委才可能向地委报告。可以肯定，大量“政治影响不好”的事已经永远石沉大海。

33、昏天黑地

在饥饿和死亡边缘挣扎的农民，还随时要遭到非人的毒打和凌辱。

大跃进以来愈演愈烈的打人风，现在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反右倾的结果，是使一大批正直的干部被打倒，取而代之的是所谓立场坚定的“积极分子”。他们鉴于前者的“教训” ，面临来自上面的高压、下面极端恶化的现实的多重压力，乞灵于粗暴恶劣的方式支撑局面，否则他们也免不了被打斗，死亡的几率也更高——干部毕竟有多吃一口的机会。需要说明的是，在死人最多的 1959 底到 1960 年春年，

极少有反映死人问题的官方资料，大部分情况是在 1960 年年底到 61 年年初整风整社运动中揭发出来的，而当时的资料，又对死人的原因作了很大的歪曲，将其统统归结为“阶级敌人”的破坏和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没有（或者说不敢）从路线政策上找原因，甚至不敢提“饿死”二字，有关崇庆县五江公社 16 管区的一分材料说：

去年腊月社员朱克伦因病不能坚持积肥工作，向［队长］粟某某请假未准而哭了起来，当即被粟发现，晚上召开会议要朱讲哭的道理，朱被赫得屁滚尿流，粟即以随便屙屎屙尿，有辱公共食堂为名，将朱打倒在地，乱踢一阵，并在严寒季节罚站三个钟头。朱克伦因此得病趴床不起。病中 60 年正月 14 日朱到食堂称米时，又被粟以样子“褛垮垮”打了一顿马鞭子，这样朱便一病不起于 60 年 2 月 24 日身故。

如果说朱克伦之死看起来还象是挨打所致，以下的两个例子这样说就很勉强了。

59 年冬月初 4，社员粟子明，因在田里拿了斤半红萝卜被粟当众打了几个手心，并将粟子明推到柑子树下跌伤腰杆，……冬月底因扫食堂走迟了一步，又被粟打了一顿，以后病势日渐严重，于腊月 29 日死亡。社员粟蒋氏（70 多岁）因迟到食堂一步，未赶上开饭时间，被粟鬃打了几腚子，隔三四天即死去。（见崇庆县委工作组：《粟明章材料》1960 年 8 月 2 日。）

邛崃道佐公社第二书记杨树楼及该社三管理区主任汪齐松的违法乱纪案件，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当年 29 岁的杨树楼解放前曾是邛崃平落乡绸缎铺和纸扎铺里的学徒，1952 年入党，他“侮辱贫苦农民”的妙语是：“穿件破衣裳，62 个疙瘩，不搞生产去赶场，买一砣肉夹在胯底下，血都跟到胯胯流，回去洗都不洗，丢在茶壶罐罐头煮来就吃。”据说他亲手打过的社员有 6 6 人，打人手段有捆绑、吊打、逗瓜、打手心、扯耳朵等等。最具特色的“逗瓜”，是数人围住一人推来推去。管区分支书记朱正林在党员大会上被“逗”后几天不能出工，女社员郑本兰被“逗”得“屎尿流了满裤子”。社员吴天清等 3 人到法院告杨打人，杨便把他们打成“反动小集团”弄到大会上斗争，并当场宣布“管制劳动”。杨却因为“工作有能力”，1960 年 10 月调太和公社升任第一书记。

有杨书记带头，全社干部打人成风，最厉害的是三管区“当过伪军”的主任汪齐松。据材料称，该管理区二中队 4 3 户社员，被他打过的就有 4 0 户，其中 6 户全家老少人人被打。12 岁的女孩汪木林捡豆子吃，被汪一脚从屋里踢到屋外，又提起扔到田坎上摔死。社员汪齐青偷了两把胡豆，小队长吓唬他“等汪齐松回来再说”，汪齐青吓得上了吊。群众见了汪齐松“就如老鼠见了猫”，小孩哭时只要说声“汪齐松来了”，马上就要住声。据工作组的调查，被汪齐松打死的有 5 人，打后 1 至 2 月内死的 6 人，3 个月后死的 11 人，打残废的 2 人。

杨树楼、汪齐松违法乱纪东窗事发，是因为有人写匿名信告到省里。经省公安厅和县委工作组在道佐公社三管区调查，证明控告“基本属实”。但是，把道佐公社

三管区惊人的死亡情况，归罪于杨、汪显然是违背事实的。

据工作组统计，全管区 1958 年 11 月建立公社时有 840 人，到 1960 年底出生 19 人，迁入 11 人。大规模的死亡从 1960 年二、三月间开始。其时全管区 5 个食堂全部断粮，死人之惨烈，已到活人无力掩埋死人的地步。喂牛的老年人汪齐茂，汪杨氏夫妇死后摆在床上四五天，汪齐松命三个社员将尸体埋掉 ，三个饿得偏偏倒倒的社员将尸体拖出来扔到一个露天空粪坑里，直到烂成一堆白骨也未掩土。社员汪齐洪 、廖文兰（女）等 6 人死后，尸体扔在离马路几丈远的土坡上，路上行人举目可见，被成群的老鸦啄食一尽。三四月份，连到仓库运口粮的劳力都难找了。干部派工，社员说："我都不晓得哪天死，干一阵又怎样，死了还不是给野狗吃"。年底工作组统计，全管区死亡 262 人，外逃及不明生死的数十人，尚存 516 人，较公社化初期减少人近 40%。（见 6 四川省公安厅、中共邛崃县委联合工作组：《关于对被控人原道佐公社党委第二书记杨树楼严重违法乱纪、贪污腐化事实初步查证情况的报告》，1960 年 12 月 6 日。）

杨树楼 10 月份升调，匿名控告信 11 月份发出，可见杨在任时没人敢告，县上对杨的印象不错。事实上，这只是冰山的一角，杨、汪不过是倒霉鬼罢了。死人是普遍现象，地、县一级大部分领导干部对死人的真正原因心中有数，除非形势所迫，不会追究基层干部的责任。暴露了真相他们自己也没有好果子吃，这是各级干部的共同心理。

基层干部处境最难。完不成征购、说粮食不够吃要挨整，饿死了人还要挨整。事情败露，上面推下面，他们毫无推托余地。面临大规模死人，除了竭尽全力掩饰，别无选择。温江清平公社社员李方平饿得奄奄一息，县委检查团下来检查生活，管区干部怕他走漏风声，便把他关进保管室关了三天，生产队长报告说李已死，管区干部下令"死了把他软埋算球"。社员张绍春薅油菜菜饿倒在田头，队长以为他死了，赶快挖了个坑想把他埋了，埋到一半，张醒过来，大叫"活埋人了……"吓得队长扔掉锄头就跑。（见温江地委工作组：《潘廷光违法乱纪案件》，1960 年 12 月 1 日。）

基层干部如果据实反映了情况，不仅会被扣上右倾的政治帽子，还会成为饿死人的罪魁祸首。曾经给毛泽东治过病的成都中医学院院长李斯炽的儿子李克淦，当年是广汉县委办公室副主任，1959 年 8 月到新丰公社"突击落后"，任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所谓突击落后，就是把没完成征购任务地方的粮食逼出来，把缺粮的舆论打下去。他后来承认，当初他确实以为当地的干部右倾，开会斗了人。但他很快发觉实际情况和上面讲的完全相反。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有人带头叫苦，台下顿时哭作一片，李把心一横，拍着胸脯说："我就是掉乌纱帽，也要给你们要粮!"他在县委会议上提出要求，毫无结果。

新丰公社位于川陕公路沿线，到年底，饥寒交迫的农民使出了"拦驾"的古老办法——到公路上拦小汽车，那年月坐小车的都是"大官"。据李克淦回忆，农民们

果然拦到了大官，先是拦到了李大章。李大章听了农民所讲的情况后，驱车到公社了解情况，然后又到县委找到第一书记吕孝先， 要吕向地委反映情况。吕给宋文彬打电话，被宋斥为“右倾”。农民们“挡下”的第二个大官是李井泉，这一下就闯出大祸了。李并未下车，让保卫干事将睡在公路上的农民拖开，扬长而去。然后就派下省、地产联合工作组来新丰公社抓“坏人”，把包括公社第一书记李克淦在内的200多名基层干部撤职斗争关押乃至判刑。奇怪的是罪名不是右倾而是“违法乱纪”，并把缺粮死人的原因统统归罪到他们头上。李克淦被定为“阶级异已分子——因他出身中医世家，于1960年2月撤职，关进广汉县看守所。和他一起关进去的有一百多人，把看守所都塞满了。有人死在看守所里，中兴公社干部刘志民就是其中一个。李后来被判了6年刑，送到小煤窑里挖煤。县委书记吕孝先也因“包庇坏人”被撤职。（作者注：李克淦 于1966年出狱，随父亲学医。直到1979年才得以正式平反，再也不愿当干部，用他自己的话说，当小干部如同做小媳妇，“起早了得罪丈夫，起晚了得罪公婆”。晚年在成都中医学院任教。）

当时反映的饥荒和死亡情况在官方的文件中往往被称为“某事件”，如闻名全国的河南“信阳事件”等等，而这些事件的祸首无一不是干部的胡作非为和阶级敌人的蓄意破坏。华阳县的“同心事件”便是一例。同心原是华阳县委所在地的一个镇，公社化后成为一个管区。李大章1959年冬到华阳检查工作，发现县委门口倒着几具饿殍，当即下令撤销县委第一书记马维政的职。省委工作组随即前往调查，搞出一个“同心事件”。马维政还算幸运，只是被下放到温江清平公社做党委书记。李大章在文革中对找他要求平反的李克淦承认，这些干部实际上是做了“替罪羊”。

经过50年代初的大力整肃，川西坝子社会秩序安定，可谓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现在则“偷”风大炽，社员偷、干部偷、男女老少人人都成了“窃贼”。他们当然知道这是不为人齿的勾当，但他们既不可能做绿林好汉杀富济贫——过去的富人已整个地不存在；也用不着打家劫舍——家家一贫如洗。所有能下肚的东西都属于“集体财产”，一动即偷。也有人认为偷集体的东西不算偷，既然共了产，一切东西都是大家的，“公社就是我们家”，我的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拿别人的东西为偷，拿自己的东西怎么是偷呢？

在饥饿的煎熬下，偷在道义上的意义已经不存在，真正的恐惧是被抓住后所受的折磨。因为他们偷吃的往往是未成熟的庄稼，冠名“偷青”，基层干部收拾“偷青”者最常见的手段是“开会”和“扣饭”。前者追溯起来，还是土改以后为人们所熟悉的斗争艺术，不过从那以后，多半就用于整自己了。它的功效，除了皮肉之苦，更是一种当众的凌辱，面子—— 说文明些叫人的尊严扫荡殆尽，使你觉得不配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扣饭是公社化以后干部的刹手锏，甚于一切的惩罚，几乎是判你的死刑。由于惧怕这类惩罚，一些人宁肯自杀。1959年9月，郫县灵圣公社(原属崇宁

县)报告当月 2 号发生的两起自杀。一桩是金星管区四中队 37 岁的王某，“因此人平常说了些坏话，说食堂糟糕，干部做事不公道，闹粮食吃少了等等”，当晚干部通知他到食堂开会，他没有去，队长李某亲自跑去喊他，看到他在厨房站起的，喊他数声，不见答应，一拉他一下，人就一转，把队长吓来就跑了。一喊群众来看时，才知道他吊死了……。

一桩是火花管区三中队 32 岁的妇女易某。报告说，当夜某社员从食堂吃饭回家时，发现茄子地里有人影，就问“是不是偷茄子的？”，不见答应，就跑去一看，发现是易某，又在地边的慈竹笼头发现了她偷的茄子，于是将她弄到食堂去：

众人七嘴八舌说绑起来，她要去解手，他们就等她去了，去多一阵都未见转来，大家去找四处不见人……第二天早晨去问她男子，说未来过，到吃早饭李仙桥来人报信说她淹死了，这时才知道她畏罪自投江水而死了。(见灵圣人民公社关于死亡人的报告(59 字 00 号) 。)

天大的事莫过于吃，天大的罪莫过于偷，偷是要冒生命危险的。为了自己的生存，人们不惜采取种种残忍的手段对付偷窃者，包括使用武器。在那个“全民皆兵”的时代，民兵手中都有真抢实弹。 1960 年 10 月，省委监察委员会下放金堂竹蒿区的干部，报告三起将偷窃者打死的“令人发指 ”的罪行。

10 月 18 日晚，石佛公社胜利管区社员陈某，男，31 岁，偷了转龙公社三管区两窝花生吃，被“社员”用乱捧活活打死，然后，将死者捆绑抬到石佛公社地界。

10 月 10 日晚，隆盛公社三管区社员陈某，贫农，40 岁，……偷了本管区 6 队花生 65 颗，被正在巡夜的几个社员发现，当即被王某从治安员手中夺过步枪，将陈打死。

8 月 14 日晚转龙公社二管区社员陈某，62 岁，去石佛公社胜利管区偷了包谷 40 多个，被看守包谷社员拖回食堂，用乱捧打死后，抬到转龙公社地界上。……(见中共四川省委监察委员会:《金堂县竹蒿区发生违法乱纪打死社员三人》，1960 年 10 月 12 日。)

1960 年 5 月 23 日深夜 12 点，崇庆县廖家公社两社员在本队洋芋田边捉到“小偷”一名，捆绑至公社审问，发现该小偷“言语异样 ”，且手上无老趼，“即认为是特务、流窜犯”，又押解至公社农场“吊打审问”，此人任凭打骂，再不开口说话。24 日下午，公社干部下令将其反绑双手，用枪押解至县公安局，半路上，此人几次倒在秧田中“打滚不走”， 最后走到一条河边，纵身投入水中。押送者追到河边，即对准开枪射击，子弹从左背穿出前胸而死。

押送者向县公安局报告“押一人犯跳水淹死”，县公安局也就不调查追究。几天之后，设在崇庆县元通镇的四川省革命残废军人休养所到县公安局联系，称该院有一名叫廖思忠的“神经病患者”去向不明。经查证，正是那个被击毙的“小偷”。(见崇庆县委:《关于元通荣军校精神病员廖思忠抢杀一案的检查报告》，1960 年 8 月 9 日。)

这个修养所便是当年闻名全国的"荣军学校",收养朝鲜战争中的残废军人。1958年，他们组织的演出队曾轰动京华，一部描写他们生活的纪录片感动了千百万人。廖思忠幸好是“神经病患者”，否则他会为没被美国鬼子打死，却为在祖国的地里偷吃洋芋死在同胞的枪口下而不得安息呢。

34、光环下的罪恶

冬天降临的时候，红光公社合作分社的一家农舍里，传出一阵凄凉的哀嚎。那是 60 多岁的老农何德山吃荞麦壳拉不出尿发出的，一声接一声的哀嚎划破阴冷的天空，在荒凉的平原上回荡。没有谁能帮他一把，那声音在人们耳膜里撞击了三天三夜之后，渐渐稀疏低沉，终于消失。

就在宣传机器把红光公社吹嘘成人间乐园的同时，饥荒和严寒正在这片土地上疯狂地吞噬人的生命。

和全省、全专区一样，郫县这年的粮食征购创下历史最高纪录，为了不让别人再拿到虚报征购的话柄，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征购工作完成得空前的迅速彻底，而食堂无米下炊、关门大吉的现象也更加迅速普遍的出现。当地委发现事态严重，于年底拨下救济粮，他们竟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姿态拒绝接受。虽然地委拨下的那点粮食无力扭转大局，毕竟可聊解燃眉之急。这个无可挽回错误，加剧了饥荒造成的灾难。（作者注：郫县到 1960 年 2 月最终接受并下拨了地委分的救济粮，比其它县晚了两月。）

如果说高征购造成的饥荒是不可抗拒和普遍存在的话，他们为领导新潮流搞的一套荒唐把戏，更是给老百姓雪上加霜。让我们从毛泽东当年视查过的红光社看看老百姓所受的双重灾难。

当年的红光社，现在是红光公社合兴分社的红光管区。还是当年的那些人口和土地，不过支部书记周桂林那颗光头上的光环已经暗淡了。反右倾运动中他成为批判对象，有关领导早就对他不耐烦了，如果不是沾了“龙恩”和全国政协委员、劳动模范的头衔，早就脱不了手。而他在反右倾、鼓干劲的风口浪头上，又不识时务的干蠢事，诸如交征购“调皮”；叫他按作物连片的标准，把已经长起来的晚秋作物

耕掉，他又“装聋”。于是上面就派自告奋勇、干劲冲天的侯孝民等人夺权，让他和老保守、管区主任穆青云靠边站。郑凤兰给他打招呼：“你不要管红光管区的事了，侯孝民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有点摸不着头脑，问县委书记高义禄“郑县长喊我不管红光的事”是何原因。高不作正面回答：“县委没有研究过，只是侯孝民主动提出要来红光管区工作。”周嘟嘟囔囔说：“我又没有犯错误……”这话让傍边一些人听起好笑。他一直没弄明白自己是共产党员为啥当全国政协委员，疑心别人是否对他另眼相看，又傻乎乎地申辩：“我又不是民主人士……”。于是后来就给他安排了一项工作——种南瓜。种南瓜就种南瓜，在他看来也是重要的任务，南瓜可以救命啊。可是又听社员议论“周社长在劳改”，他才终于明白自己倒霉了。

其实周桂林受的这点委曲根本算不得什么。红光管区的反右倾运动，由县委农工部干部组成的工作组一手操办，全面彻底，人人过关。

把一些所谓不爱开会的，开会迟到的，不爱劳动的，说秧子栽密了的，做不够规格质量的，报产量低了的，吊二话的人都作为右倾分子来反，专门开管区大会把这些干部和社员处以刑罚。……其刑罚有罚站、跪竹片、跪瓦渣、跪拌桶边边、跪高板凳、捆、打、淹水、皮鞋踢、送特别队等１０多种。（作者注：本节和下节资料来源：1，《中共温江地委工作组关于在郫县红光社红光管理区贯彻中央紧急指示的 报告》，1960 年 12 月。2，郫县县委整风整社工作组：《郫县红光公社红光管区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和生产队的排队情况》，1960 年 12 月 19 日；《红光公社合兴分社整风整社工作第二阶段情况简报》，1961 年 1 月 29 日。3，温江地委组织部：《郫县红光公社干部问题调查记录》1961 年 1-12 月等。）

特别队就是劳改队，有的地方称劳训队。为公社、管理区建立的准监狱机构，管理区以上的干部一句话就可以将社员送去“劳动改造”。

转业军人杨心田反右倾时给工作组的干部提了意见，就被毒打了两次。

杨当时爬着回去，后害怕斗争逃跑，被成都市公安局作为流窜犯捉到送回来，杨在外无吃的肿病甚重，……（工作组）便派两人将杨从床上拉到大会，叫杨站到 5 根重叠起来的板凳上弄来斗争，杨求情不允，斗争后吓慌又外逃，无几日就死在厕所边上。

这一年，红光管区生产的粮食四分之三交了征购，入冬以来，食堂要么停伙，要么半死不活。食堂不开伙，人总得想办法活。有的食堂眼看难以为继，不得已把剩的一点粮食分了，让各家多对付几天日子。政府早就动员，在房前屋后，沟沟坎坎“见缝插针”，口号如“蓬沟搭架点瓜豆，院坝空地栽红苕”之类，信誓旦旦保证谁种谁收。小家禽家畜鸡鸭鹅兔允许自养，家家户户就靠这么一点点缝隙创造着苟延性命的奇迹。

食堂停伙，家家户户冒烟，被认为是典型的右倾倒退活动。管区领导以宰资本主义尾巴和反隐瞒私分、贪污盗窃为名，普遍对社员搜家、搜粮、收锅和收“见逢

插针”甚至捉鸡捉鸭，有些社员家里的泡菜、盐菜、鸡蛋、鸭蛋、海椒、盐巴等也不能幸免……一度造成农村秩序大乱。

这是一场真正的活动。靠食堂就得饿死，靠政策允许的那一点点生存机会，又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宰掉，那情景令人怵目惊心。

1960 年 1 月，管区食堂全面停伙断粮，管区领导召集各队干部召开“收锅誓师会”，布置连夜突击收锅。干部冲进社员家中，翻箱倒柜，将所有可食之物一卷而空，见锅就提，一时间告饶声哭骂声响成一片。

一队女社员袁木清，儿子得了肿病，需要早晚烧火烫脚和煮些吃的，向前来收锅的管区副主任刘贤松等跪着哀求：“不要收我的锅，收了锅就断了我娃娃的命根”。刘等不由分说，将锅端起就走，果然不久她儿子就病死了……。

与其说是收锅，不如说是收命。走投无路的人们象苍蝇一样的死去。

一个阴冷的早晨，“五保户”刘大汉家中传来一阵女人的哭声。听见哭声的人一听就晓得准是刘大汉死了。没人去安抚那个爪手的残疾女人。没多久，那女人的哭声也渐渐消失。生产队干部命社员钟大朋去将两口子埋了。过去身高力壮，如今也饿得偏偏倒倒的钟大朋将刘大汉两口子从家中拖出来，放在鸡公车上一边绑一个，推到一个低洼处，掩上一层薄土。然后从公共食堂得到一碗稀饭吃，这是他干这件活享受的特殊优待。吃了饭干部又命他去埋汪家两个饿死的人。干完活当天晚上，钟大朋也一命归天。

无力掩埋的尸体有的在家中腐烂，有的横尸田野路旁，活着的人已完全麻木。连小孩对死人也见惯不惊了。饥饿的孩子不惜冒种种可怕的惩罚，偷食一切可以下肚的东西。（作者注：1997 年作者曾数次到前障县红光社采访经历过那个时期的农民。他们不太愿意提当年毛主席视察的事，说几十年来问的人太多了，都说烦了，他们并为因此得到曾经抱有极大希望的实际的利益：“一点光也没有沾到!”。而说起大饥荒则滔滔不绝。毛泽东去亲临过的温幺娘的家房屋依旧，温幺娘早已去世，她的儿媳妇吴玉芳给我讲了刘大汉和钟大朋的故事。毛泽东叫他的私人医生李志绥给她上过药的王祖云说，那时候好多人走着走着倒下去就死了，他们见惯了死人，根本不怕，一步就跨过去，“就象跨过一截木头”。她家最小的“九妹”就是在田头拣谷子吃后死的。毛泽东曾摸着他的头说“还差点营养”的余万才说，他有次到养猪场偷了一把玉米，用帕子包了藏在厕所边上，叫哥哥去取，没想到干部早就“吊上”了，哥哥一去就被抓住，干部拿起棍子乱打，他冲上去拼命，被倒提起来打，然后关了几天。他实在饿慌了，打洞穿墙逃跑，在外头流浪好多天，靠偷吃生菜活命。）

维系保生命的那根线捉在干部手里，任何荒唐、蛮横的命令都得俯首听命，否则不准你进食堂就行了。不参加开会不准吃饭，不参加大兵团作战不准吃饭，吊二话不准吃饭，叫饿不准吃饭，给上面的人讲真话不准吃饭……要死都躲到旯旮里去死。

甚而至于还有脸不洗干净不准吃饭。锅收了，十冬腊月烧点火洗脸都办不到，

不少社员蓬头垢面，满脸黑污，干部认为有碍观瞻，下令不洗脸不准进食堂，逼得妇女娃娃天寒地冻在河沟里洗脸。其实洗干净也未见争光，洗去黑污，露出青黄面皮，依然红光杳无。

1960 年 2 月底，郫县县委雄心勃勃的"丰产路"规划在红光公社全面拉开战幕。成都至郫县沿公路两傍两里宽地界内的农舍顿遭无妄之灾。那是共产的时代，今天拆迁工作中的动员、赔偿、安置等等根本不存在。拆房队伍所到之处，一声令下，攀屋揭瓦，推墙倒柱，好端端的房子倾刻变成一堆废料，废料还属于管区，或送到食堂当柴火，房主无权支配。房主不在，撬门拨锁，将衣服家具甩出门外便开拆。房主归来，屋去财空，呼天抢地，徒换奈何。一些抽调在外修铁路、修电站的民工回家，妻儿老小房屋家具杳无踪迹，"流着眼泪到处找"。

红光公社在这次大拆迁中，共拆房屋 6 千多间，而红光管区已经不是第一次拆房了，两年多来，这个原有 4 千来人的管区，共拆毁房屋 1290 间，被拆去房子的社员迁到指定的地点集中居住，拥挤不堪。第 6 生产队 22 户社员住 23 间房子，"有的三姓人同住一间，有的公婆、儿、媳同住一间，又脏又窄又臭。" 规划层出不穷，花样时时翻新，社员数次搬迁。 1 生产队的鄢某，一年之内搬了 7 次家，其中有一个月搬家 3 次。和平管区的甘大娘土改时分的 4 间房子拆掉后，两年之内搬家 5 次，最后一次住进牛圈，还要她搬，她就 "只好在屋檐下的石阶上过夜"。

这次拆房规模之大，来势之猛把一些人吓坏了，他们想，与其让别人把产共个精光，不如捞点算点。于是自己动手拆房子卖家具，然后挤到别人屋里去住。声称："现在只有身上穿的和吃到肚子里的才是自己的，其它都是公社的"，"把东西整光了好当工人，成无产阶级，住洋居民点。"

说得好。公社化的目的，就是要让农民尽快由小私有者向无产者转化，变小农经济为社会主义大农业，缩小乃至消灭城乡差别，让农民都住上洋居民点。1958 年四川省城市规划设计院就按苏联集体农庄的样板，为红光公社设计了居民点蓝图，那上面有整齐的楼房，宽阔的道路和林荫带，文化、体育、福利、生活设施一应俱全，甚至还有污水处理厂，连 90 年代的城市小区都远远不及。不幸的是，把农民变成无产者倒是很快实现，洋居民点还无影无踪，工农差别、城乡差别拉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拆房子仅仅是第一步，接下来搞作物连片，整齐划一，以利 "机械化耕作" 和领导观瞻。传统上各处田里该种什么，是根据土壤等诸方面情况长期形成的，现在全部打乱。红光管区干部根据县委指示搞了个 "三集中"，第一集中烟、麻，第二集中洋芋，第三集中蔬菜，已经种上的作物，不在规定区划内的统统犁掉。结果种出的烟叶没巴掌大，产量只有过去的十分之一；集中种的洋芋又少又孬；全管区的瓜、菜种子集中到管区 "蔬菜队"，未待下种一把大火烧得干干净净。

一切瞎折腾都是为了应付检查。上边通知搞“堆肥运动”，管区领导下令从田里取土，在田边路边堆 8 尺长，8 尺宽，5 尺高的“土肥堆”，不分白天黑夜连续突击，完不成任务“站起说，跪倒说”。管区用田土造假堆肥哄上面，社员为完成任务作假哄管区领导。在拌桶上糊上泥巴叫“肥料方”，坟包上糊泥巴叫“肥料岗”，草堆上糊泥巴叫“堆肥大王”。检查一过，取土还原，陡劳一场。

一边在造假堆肥应付检查，一边又有中央卫生检查团驾到，他们又是见不得什么“一亩一堆、十亩一凼”，到处见肥见粪的。管区领导连夜布置，各队干部带领社员沿参观沿线填灭粪坑，当晚必须完成。时间紧迫，社员来不及将粪坑中的粪水担出来，就地挖泥将４０多个粪坑填了。检查团沿参观线路巡视，满意而归。

劳师动众造假肥，劳师动众填真肥；还有几百人在毛泽东走过的“幸福田”里搞夜战，火把映红半边天，哄闹一夜什么都没干；规定小麦不用镰刀割，要用麻刀砍，据说苏联人就是这么干的，结果砍得遍田麦穗；为了密植，多栽几百亩秧母田，秧子用不完，秧母田放荒；下放给社员的毛猪又收回，集中到管理区搞大型养猪场，几乎全部死光……。

这一切，无异于强迫处于绝境中的农民自掘坟墓，彻底摧毁了他们对未来的希望。这一年，红光管区三分之一土地荒芜，庄稼地里“野草丛生，与禾苗争茂”。一个冬春，全管区死亡 800 多人，约占公社成立时人口的 20%，其中二生产队全队 370 多人，死去 140 多人。

整个红光公社都在发生同样的事。而所有令人不可思议、痛心疾首的事，莫过于人的生命毁灭。红光管区所在的合兴分社，公社成立初人口为 11394 人，到 1960 年底只有 8767 人，其中死亡 2408 人，另有 219 人“不知去向”。

如高叔云食堂，共 50 多户，就死亡 80 多人，正月初一那天就死了 4 人，有的人死在床上三四天都无人埋，有的拉出门就埋在屋檐下，至今(60 年底)在院坝中还可见到坟包。

记录在案的官方材料里，不乏令人心酸之事。1959 年冬，犀浦分社幸福管区(即刘少奇曾经视查过的幸福社)陈素珍生孩子刚满月，没有奶，千方百计搞了点米面，偷偷在家里给孩子煮吃的和烧热水洗。被干部撞见，不由分说提起锅把火泼灭，把锅和家里的米全部搜走。她男人正生病，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几天就死在外面。她家喂了１０只兔子，她的几个大孩子在田里摘苕菜喂兔子，干部就叫人到她家把兔子全部没收。

陈素珍一家陷入绝境，她打主意先把孩子弄死，自己再一死了之，被邻居张金山劝阻。万般无奈，她把最小的孩子带到成都八宝街丢弃。几天后，她实在忍心不下，又回成都去找孩子，被认为是“流窜犯”，一关２８天。

这就是红透半边天的红光公社人所不知的另一面，和铺天盖地的颂扬吹捧、上

至中央首长、外国贵宾车水马龙的参观检查同时发生的一切。1960 年 3 月 18 日那个阴雨霏霏的日子，朱德到老红光社即眼下的红光管区视察，公社为此作了精心准备：将沿路有碍观瞻的东西清除殆尽——包括政治上“不干净”、嘴巴不牢靠乃至饿得形象不佳的社员。当天，他们被集中到离参观路线 10 多里远的几个大院子里，由持枪民兵把守，直到朱德离去才放回。敬老院里留下几个“好看”的老人，教他们如何回答首长的问话。“乱说脱不到爪爪！”朱德来到后问老人们“一天规不规定劳动，规定多少，生活安排好不好？”老人们按事前反复演练的台词齐声回答：“闲不惯，自觉劳动，生活安排得好。”朱德见一路人烟稀少，问陪同的社队干部是何故，回答是“搞大兵团作战去了”。管区的食堂做了够上百人吃的大米饭，吃饭的只有 10 多个人，朱德问：你们这几个人吃这么多饭啊?曾经见过毛泽东的女孩王祖云有幸吃到这顿饭，她后来说，那是她一生吃得最香的一顿饭。



现在，人们去到那里，还可以看到 毛主席视察红光公社纪念广场。(2000 年，东夫摄)

为掩盖实际发生的一切，干部们无所不用其极。公社党委书记郑凤兰为遮丑——布置在边界发现的死人，和崇兴毗邻的就抬到崇兴境内，和成都郊区毗邻的就抬到成都郊区境内，以丢尸灭迹。

专区百货公司下放干部张玉良向她反映死人的情况，她一句话就打回去：

人是咋个死的？没有人，那么多生产是谁搞的？

35、黑白颠倒，好人遭殃

象张玉良这样敢于冒巨大的政治风险反映真实情况的干部不止一个。1960 年 3 月 2 1 日，郫县城关派出所所长谢绍清带工作组到犀浦幸福管区“突击落后”。这个初级社时曾受到毛泽东赞扬，1958 年成都会议期间刘少奇视察过，土地肥得流油的地方，眼下已满目凋敝，死人累累。谢下来前，县监委副书记白官和要他调查一下死人的情况，谢做得很认真，逐个生产队找队长、事务长、炊事员、治安员开座谈会，调查核实后由提供情况者签名盖章，填写了统计表格。调查结果，全管区从 1959 年 10 月至 1960 年 3 月止，死亡 764 人，约占管区总人口的 20%，并且不包括外出人员。

与此同时，省卫生厅干部谢波正率４０多人的医疗队正在犀浦搞“卫生防病试验田”，他们 1959 年底来，病人越医越多，人越死越多，人人焦头烂额。见县上有人敢来捅马蜂窝，自然积极协助。谢绍清把统计表格填好，谢波便要去底稿，又拿去给省委宣传部在红光公社调查的张国维、胡俊德看，张、胡二人看后倒抽一口冷气。“考虑到非正常死亡是个大事”，他们便去找郑凤兰汇报，以期引起公社重视。第一次，郑说“忙得很”，叫他们给公社干部李伯元谈，而李伯元是一脸的见惯不惊无可奈何。他们感到还是要给郑反映才行，第二次到公社去找她，说是到幸福管区去了，张国维、胡俊德打电话找到她，一再申明事关重大，须向她当面汇报。考虑到“郑县长”日理万机，又提出到管区来找她，郑表示同意。 二人气喘吁吁赶到幸福管区，郑又说“不空，要开电话会了”。

张、胡二人按下心头的愤怒，请郑指定一个同志接受汇报，她就指了公社办公室的一个女孩子。他们将情况给那女孩子谈了，请她一定转告郑。这是 4 月 20 日。二人当天赶回省委宣传部，写了一份书面材料，如实反映在红光公社犀浦分社万福、幸福、跃进三个管区的肿病情况，揭露：公社上报的肿病人员数字大大低于实际发病人数；没有按省委的规定解决病人的医药费；“非正常死亡”情况严重。报告列举了卫生厅工作组提供的幸福管区的死亡数字。

材料反映的情况迅即返馈到郫县县委和红光公社，引起一阵慌乱。县委书记赵金波和郑凤兰找到卫生厅工作组的谢波，要他打电话到宣传部“把事实更正一下”，质问谢“你们是不是有右倾？”谢申辩说，幸福管区的死亡数字是你们县上工作组统计

的，更正什么？谢波不打电话，郑只好屈尊，给她数次推脱不见的胡德俊打电话：

你们反映的情况，公社党委已查了一下，有出入。死人问题是县上一个同志搞的，那个人政治上有问题，鸣放时犯过错误，这回他专门来查死人，实际上没有那么多。

可以布置把死人抬到别处地界上的郑凤兰，不会不知道问题的严重。她的自信心建立在这是一个谁也不敢声张的政治问题上。说“死人”犯忌，“专门调查死人”更犯大忌，所以她根本不去正面接触这个问题。

城关派出所长谢绍清不幸犯了大忌。其实他并非不知道风险。县上工作组到幸福管区“突击落后”一共是 4 人，到调查死人情况时，有两个便找借口溜了，只剩县农机局搞人事工作的女干部刘芸兰跟他一起调查。4 月 11 日填好表，15 日到公社汇报，郑凤兰又不在，公社办公室主任杨玉章说：“反正就那些情况，你们交上去就算了”。虽有杨玉章这句话，谢绍清倒底觉得事情可怕，回到县上，打发刘芸兰到县委组织部交统计表，刘推辞说：“二天整错了，怪我”。谢只好自己去交。

谢到县委交材料时，遇到给他布置调查任务的县监委副书记白官和，白特别问到幸福管区 4 中队死了多少人，谢说 8 1 人，白说：“我调查的是 8 4 人，差不多”。谢差不多放心了，他始料未及的是问题出在将调查情况透露给了省卫生厅工作组。郑凤兰打电话到省委宣传部“澄清事实”后，县委书记赵金波把谢绍清叫到县委劈头盖脑一顿训斥：“死人情况是你搞的吗？你是公安人员，党员，连这点立场都不要了！乱搞嘛，乱搞汇报，给公社党委也不汇报，就给省委报了，我和县委都不晓得！”谢说，他没有向省委汇报过，只是给卫生厅工作组留了个“底子”，赵说：“你知不知道卫生厅工作人员的政治情况？那些人都比较右的嘛。”

郑凤兰向省委说谢绍清有政治问题，赵金波说卫生厅工作组有政治问题，反正谁说饿死了人谁就有政治问题。他们是有根据这样说的，赵让谢明白这一点，说：

省委对郫县提出了批评，还问过我，人只有生得多，哪有说死得多呢？是否死这样多人，要一个个调查过！是谁布置的？

听口气显然来头不小。谢又害怕又觉得冤枉，申明是“县监委白书记布置的”。赵把白叫去问，白承认布置过，赵就对这位比他早入党 5 年的县委监查委员会副书记交待：“你的问题今后处理。”

根据省委人只会生得多，死得少，不会生得少，死得多的指示精神，县委对幸福管区重新组织调查，结论是只死了 1 6 4 人，死者绝大多数是老人。原调查者“丧失立场，找伪乡长、反属、落后分子、富裕农民”调查，多报 6 0 0 人。县委书记高义禄在会上作结论：“两种观点，两种调查结果，……原来的那个人是攻击性的调查。”

由于立场，观点的不同，死的可以变活，谢绍清就必须交待他为什么没有把死人变活的立场问题，数次批斗。县公安局肖局长开初还给谢通风报信，叫他“以后

要注意”，这时候不得不转变立场，要谢交待调查死亡情况的“虚报浮夸”问题，严肃指出：谢的调查是要说明饭吃不饱，死亡的根本原因是营养不良，实质上是推翻“三个万岁”（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万岁），给反革命、富裕中农留下借口，谢“检讨得好有前途，检讨不好就是自己的事了”。谢当然还是想有条生路，承认立场有问题，不该听“坏人”的话 ，把死人统计多了。公安局最后决定，“开除谢党籍，建议行政严肃处分”。

眼见火烧到自己身上，卫生厅工作组长谢波敢紧找到卫生厅长潘阳泰解释，说事情是县上工作组搞的，我们“只是配合”。潘说，把工作组撤回来算了。但谢的帐并没有清，不久，一纸调令，这位二野的老卫生战士，又刚刚从川医进修毕业到卫生厅工作的干部，就举家迁到大凉山去了。

幸福管区挨着金牛坝招待所，就在谢绍清在幸福管区调查死人情况的 4 月的最后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住进了招待所，招待员们被告知，刘主席这次主要是来“休息”。正是川西坝子春光融融的时节，他却没到因他视察过而取名幸福管区的老地方去走动一下。也许他已经没这个心思，他知道的情况实在不妙，省委副书记廖志高在这里向他报告，全川 140 个县发生肿病和妇女病，死亡的人“要达到 10 万”，并承认外调粮食过多，“犯了些错误”。而他即使去了，看到的也不会比 3 月间朱德在红光管区看到的多，谢绍清在幸福管区了解的情况半点风声也传不到他耳朵里去。

虽然不准别人说饿，自己饿了还是难受。往往不准别人说饿的人，自己是很注意补充营养的。1960 年春节，郫县县委伙食团事务长陈嘉民到县城附近的晨光公社幸福大队通知杨洪魁，叫他到县委会餐，这位前崇宁县委书记自从被打成“郫县头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就被下放到这个邓小平两次视查过的大队劳动。陈嘉民劝他说：“他们天天吃油大，你回去吃嘛”。杨洪魁狠狠咽了一口唾液，说：“你回去给他们讲，我不去！”

不能不说别人也是一番好意，但这位全家被日本人杀了三口，1 4 岁就参加八路军的硬汉子没法去吃油大。为过这个年，他下放的二队食堂弄了 10 几斤米，准备煮一顿苕菜稀饭给大家吃，半夜米却被偷了；一户从城里下放当农民的人家，两口子加两个男孩子活活饿死，仅剩下一个女儿被亲戚救走；一个小队长见到热锅里的油，不顾死活勺起一瓢往嘴里倒，当场烫死……。这时候，他和社员一样，天天吃苕菜吊命。“正直的共产党人天天掉泪，国民党时期也没有这样死过人啊！”他后来说。

上面有上面的吃法，下面有下面的吃法。只要“站稳立场”，按上头要求的那一套办，怎么搞都行的客观现实，给社队干部混水摸鱼、多吃多占大开方便之门。和社员食堂的凄凉比较，干部食堂简直就是天堂，从社员家中搜走的东西，往往进了

干部的肚子，集体的财产，首先满足干部的需要。社员形容“干部食堂酒肉臭，社员食堂喝清汤。”话虽然说得过份，但一些干部和社员生活的反差确实太大了。在红光管区：

当食堂趋于断粮，即群众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侯孝民等竟不顾群众死活，开办干部食堂，大米白面，吃酒吃肉，有些干部退出小灶，候却批评他们“不是一条心”。同时侯孝民还规定各队死了的牛都要送到干部食堂，几个干部吃了牛肉 200 多斤，过旧历年一队社员食堂杀了一支 150 斤重的猪，干部食堂就拿去 90 多斤……。

红光公社有两对著名恋人。一对是县委农工部部长潘克之和公社党委书记郑凤兰，这一年他们终于结为夫妻。另一对是合兴分社总支书记刘绍元和曾经和毛泽东握过手的游福群，后来她当了独拍管区的支部书记。刘也是有妇之夫，但一直未能离婚。二人的关系尽人皆知，他们甚至有了一个孩子，这种事在当时是严重错误，但上面似乎表现了极大的理解和宽容。刘长期驻独拍，和游并肩战斗，他们的干部食堂伙食也开得不错。

……甚至连供应照顾病人和幼儿园的白糖、鸡蛋都卡住吃掉。60 年过元旦，杀了一根猪重 130 斤，刘和游就拿走吃掉 60 斤，当时全管区 6 个食堂已全部停伙，只吃一点白水煮的苕菜，死人累累，但他们却大摆延席三桌，为其一周岁的私生子做生日。……他们为了吃鲢鱼，在数九寒天，逼迫１０余个社员下水戽鱼，共戽了 60 斤鱼，刘、游和潘克之、郑凤兰就吃了 30 多斤。……更恶劣的是刘绍元在公社上碰到一个社员拿了一支鸡，刘硬说是偷来的，把鸡拿走，社员跟到要鸡，到了乡公所，刘便拿起电话，假装给派出所打电话，社员看到叫派出所，便吓跑了，鸡被他们吃起。

上面买笑脸，下面整群众”，只要把上面的笑脸买到，群众怎么整都行。社员偷偷摸摸在家头煮点吃的，一听说干部来了，如闻鬼子进村，灭火的灭火，藏东西的藏东西。没有吃的，到田里摘苕菜，干部一来四散狂逃。幸福管区 17 岁的邱立根被干部追到水沟里，连吓带饿带伤，几天就死了。

红专学校（作者注：大跃进时期农村基层普遍建立的半农半读学校，实际上是青少年劳动营）十多岁的孩子郭全生，因解便误了点名，干部去查找，郭害怕干部打人，回头便跑，××就顺手捞起钉耙，追上去一耙把郭勾了过来，棉衣都剁穿几个大洞，致便腰部受伤，回去两三天就死了。

队长张某常带着武装人员，深夜敲门，挨户搜查，捉鸡捉鸭。“他贪污了生产队卖谷草的 1 百多元，却栽污一个富农的小女孩偷了，将她弄来吊打”。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红光管区 7 队女社员兰秀芳在田头偷谷子，队长发现后，“便将兰的下身脱光，令其站在板凳上叫男社员去看”。

取缔市场交易，宰资本主义尾巴，阻止农民进城，维持治安抓小偷、抓流窜犯等等，给干部以拦路抢劫的借口。

有的干部到公路上设立关卡，以“维持治安”为名，拦劫行人财物，脱行人的衣服。8 队队长叶某在马路上设卡时，拦劫过往农民和小商贩不少鸡鸭鹅兔，拿到八里桥代销店大吃大喝。2 队队长秦某在路上搜查农民叶大洪女人 24 元和几斤粮票，反说别人是偷来。社员进行反对，干部说什么“要宰你的资本主义尾巴，……现在是共产主义，啥子你的我的，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没有个人的，都是集体的。”

干部为非作歹，群众切齿痛恨，干群关系恶劣到极点。红光管区大权独揽的侯孝民，被群众暗中叫做“侯爷”、“侯刮鼻”、“侯代召”。管区 5 队社员胡某痛恨干部搜家，捉了一条活蛇放到米坛子里，干部到他家翻坛倒柜搜粮食，差点被咬了一口。

1960 年一个冬春，红光管区少数社员有幸见到一次油荤，那是在 3 月 16 日庆祝毛主席视查红光两周年的宴会上。县委第一书记刘致台、书记高义禄等各级干部齐聚红光管区干部食堂，“特别席”鸡鸭猪牛一应俱全。当年见过毛泽东的社员沾光坐了普通席，但是有人已经永远享不到这份福气了。

这一年，潘克之，郑凤兰夫妇数喜临门。5 月，以先进地区支援落后地区干部的名义，潘克之升任华阳县委书记——与此同时，“潘吹吹”的绰号也开始流传。6 月，郑凤兰升任郫县县委常委。

这一年，郫县干部官运亨通，8 月，刘致台升任温江地委副书记，高义禄任县委第一书记 。

这一年，李井泉登上他政治生涯的顶峰，年底重建中共中央西南局，李井泉任第一书记。

这一年，从合作化初期就在红光社蹲点的县委办公室主任王春莲不堪回首。2 8 岁尚未成婚的她停了月经，她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从红光管区第 5 生产队步行 1 0 里回县城，叫醒县委食堂的炊事员，好心的炊事员总是能给她找出一点可吃的东西，一碗粥，几个连麸的馍馍什么的，有一次她竟一口气吞下 1 0 个米糠馍馍。吃完东西，又连夜赶回生产队，生怕别人知道。在那些黑夜里，她不怕鬼，不担心歹徒袭击，最令她毛骨耸然的是横卧路傍死去和垂死的人，冷不防就出现在面前，有的还在蠕动呻吟，除了尽快逃走，她什么也不能做。

36、饿 痨 病

从 1959 年年初开始，一种奇怪的病症开始在川西坝子流行。患者先是下肢踝部肿大，渐次上升到小腿乃至全身，用手指在浮肿的部位轻轻一按，就会出现一个经久不散的圆坑。严重者浑身象一只注足了水的尿泡，黄亮透明，然后又象给放了水似的干瘪如柴。如此一胖一瘦，几经反复，人就抽筋断骨般瘓软下来，极度衰竭而亡。

这种病很怪，不烧、不吐、不咳、不痛。会泻肚子，排泻物中却分离不出肠道病菌，什么神医怪手，仙丹妙药一概无效。患者只要一息尚存，胃口均好得出奇，而且只要有东西下肚，哪怕稀粥一瓢，即收回春之效，如果每天有吃有喝，再重的病人用不了几天就活蹦乱跳了。

谁都知道这是什么“病”，谁都不准说这是什么病。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首先不准说。甚至可能引起饥荒联想的词汇如“营养不良”、“水肿”、“热量摄入不够”、等等都必须避讳。但是病情大量漫延，“劳动力”巨减，人心惶惶，又不得不加以重视和处理。从 1959 年初开始，省上医疗卫生部门连续组织医疗队、调查组到各地调查防治，又是统计化验，又是查找原因，又是寻找治疗方法，很忙碌了一阵子，其目的与其说是为了“扑灭”肿病，不如说是为了扑灭真正病因的舆论，需要他们做的实际上只有一件事：证明肿病不是饥荒造成的。

作为专业人员，他们的日子太难过了，他们的职业道德、科学常识、做人的良心都被强奸和扭曲。要你去调查，又不准你说真正的原因，还要违心的提供伪证：要你去治病，又得不到路人皆知、非其不可的良药。一个个牢骚满腹，心灰意冷。

他们尴尬处境已非今日。1954 年在崇庆县调查肿病说了真话的省卫生防疫站总支书记郭嘉陵，事过不久被降为副站长，连总支委员也不是，反右时又差点没脱到手。眼下他正带卫生工作团在仁寿检查工作。1959 年 7 月，到仁寿调查的省委书记阎红彦问他肿病是怎么回事，他支支吾吾地说，因为热天在地里干活，生水冷水吃多了。阎追问。为什么往年也吃生水冷水没得肿病呢？郭嘉陵不敢开腔了，他摸不清这位首长用意何在，是想听真话还是诱他入围。

阎红彦火了，猛地站起来指着郭那张躲躲闪闪的面孔：“你怕什么嘛！向我汇报都不敢讲真话……有什么说什么嘛！”

郭求之不得，骂到心坎里去了。他省去一切解释，回答：“一天一斤米、二两肉，二两白糖，半个月就好了……”。

阎红彦下令赶紧拨粮。受到鼓舞的郭嘉陵迅速整理出一份报告，报告仁寿县肿

病发病 1 万多人，原因“可能与营养不良有关”，治疗措施是办好食堂，保证吃粮，“尽可能多给病人吃些肉、糖、鱼、蛋……和豆类食物”。一个多月后，反右倾开始，郭被打成右倾，下放郫县红光公社红光管区劳动。

因为有 1954 年的前车之鉴，温江专区医疗卫生人员更不敢说皇帝没有穿衣服。1959 年 5 月初，有关大规模肿病暴发的情况传到地委。报告说，金堂县竹篙区发现严重的“脚肿病”和拉肚子的现象，人数达数千之多，有的生产队男女老幼无一不肿无一不拉。经卫生部门调查了解有以下原因：“1.天气热，环境卫生又没搞好；2.有些食堂饭菜没有煮熟；3.食盐不足”。金堂县委称，他们了解到邛崃县有民医的方子可以治好这种病，已派人前去学习。行署专员宫韫书郑重其事的在报告上批示：“希各地注意，卫生运动是非常必要强调一下。”（见温江地委办公室给宫韫书的报告，1959 年 7 月 5 日。）

邛崃民医的单方偏方也好，多吃盐巴也好（后来证明更坏事），大搞卫生运动也好，统统无济于事，有关金堂肿病爆发的消息从各种渠道不断传到地委。到年底，随着大规模死亡的生发，肿病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从山区到平原，乡下到城镇，平民百姓到机关干部乃至领导干部，几乎人人都肿胀起来，大家都明白了这其实不叫病，而是长期营养不良造成的生理反映。医学界内部人人都很清楚，用医学术语讲，叫做“无条件营养不良”，说直接一点是“饥饿综合症”。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饿痨病”。专区卫生局长高吉辰带工作组到金堂竹篙区防治肿病，煞有介事进行各项体检，老百姓被搞得不耐烦，说，医生，我这个病只要吃“大白丸”(大米)就好了。

越是尽人皆知，越是急于掩饰。1959 年底，一直在闹肿病的金堂县肿成一片，由于“肿”和死总是相伴而至，引起农民对这种可怕病症的恐惧，基层医疗卫生人员无能为力，唯有向上反映求助。于是县委派出一个“防治血吸虫病、钩虫病”小组到反映最强烈的土桥区进行“扑灭”。首先是扑灭“肿病”这个使人联想到饥饿的字眼。因为饥饿不仅导制水肿，还会引起许多并发症，凡是有并发症的，统统归结为并发症；没有并发症的，就追问病史，硬住老病上栽。如果又无并发症，又没有病史，也有办法“扑灭”。抱孩子的妇女，是“生娃娃足肿”；生冻疮的，自然会肿；脚上有伤口，叫“外伤性脚肿”；皮泡眼肿的，是因为“熬夜”；脚肿的是脚气病引起脚肿……还有一个一网打尽的办法：长期饥饿的人肠道功能衰竭，总是会拉肚子，那就是"消化不良"的原因。

医疗组在某管区搞了个典型调查，声称原报告的 81 个肿病病人，被重新确诊为钩虫病、肾脏病、心脏病、消化不良、足气病等，一个肿病都没有。在把大部份浮肿者从“肿病”中剔除后，医疗组乘胜追击，通过“拜访贫农”，证实“肿症”是历年就有不是今年骤然发生的，从 1950 年以来，这里年年都有脚肿病发生，今年的患者，还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少。

医疗组调查后作出结论：肿症病因为钩虫病、结核病、肾脏病、消化不良、足气病、皮肤病、蛔虫病等等。下面缺乏知识，夸大病情，“见肿就归于脚肿病报，所以造成人为紧张”。采取的措施是“彻底搞好环境卫生；不准吃腐败食物，死猪必须埋掉；人粪全封闭储存，不准新鲜人粪下地；彻底治疗钩虫病；组织医务人员划片包干负责，限期半个月扑灭。”（见温江地委防治血吸虫、钩虫病5人小组关于金堂县土桥区“脚肿病”调查报告。1960 年1月9日。）

不难想象这些张寇李戴、隔靴骚痒的措施有什么效果。最令群众痛心的莫过于把死猪埋了。他们最喜欢猪死，死了好吃肉，活猪连国家任务都交不够，根本没他们吃的份。实际上埋了的死猪多半被偷挖起来吃了，比吃刚死的更不卫生，即使如此，也强于上述任何“措施”。

在官方，最早公开把这层纸捅破的是省长李大章。他在一次会议上讲，他当年在苏联留学时粮食很紧张，每人配给很少一点黑面包，到后来不少中国同学的脚都肿了。1959 年年终的那次电话会议上，他特别提到“水肿病”的问题。他说，各专区都反映了水肿病的问题，“比例是不少的”，对这个病，目前认识上还不一致，医务卫生部门强调多少粮食发生多少热量，但是又不敢公开这样讲，而有的人又不同意这种讲法，认为粮食是吃够了的，不该发生水肿，当然这个争论我没有研究，要说粮食供应、生活的安排，完全没有点关系，恐怕这个结论不好下，如说所有的病都是粮食吃不够，这恐怕有问题。粮食又少，如果生活又安排不好，会影响身体健康，这样说法恐怕毛病不大……。

话虽然说得宛转，意思是一清二楚的。最高领导层终于有人站出来公开说明事实真相，使许许多多早就憋了一肚子话的人为之一振。而且反映肿病情况，较之于直接反映死人又隔了一层，说“肿病”、“得肿病死亡”，总比说“营养不良”、“饿死”好听得多。1960 年春天一到，各地的肿病报告雪片般飞舞，省委派到各地的工作团，也纷纷反映这个问题。红光公社幸福管区死人问题，正是这个时候由省委工作团以“调查肿病”的名义捅出来的，不幸的是他们捅到了李政委的后院。

纸越来越包不住火了。1960 年 4 月，省卫生厅长潘阳泰率专家学者赴雅安地区调查肿病，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流行病学、生物化学、病理生理学、病理学、细菌学、寄生虫学、病毒学、营养学 、临床学” 诸方面综合考查。把一个简单明嘹的事实弄得如此复杂，也许是想从中挖出点别的原因，把肿和饿加以区别，结果却令人失望。潘阳泰不得不向李井泉报告“死者病理解剖呈现内脏组织萎缩和耗竭状况”等事实，证明肿病的主要原因是营养不良。

6 月 6 日，也就是潘阳泰的报告送交李井泉 24 天后，省委终于批转了这份报告，批示说，省委“基本同意”报告的意见，肿病的直接原因是劳动量增加，营养量有所减少，或减少过多引起的。……这是因为大跃进以来，本应保持一定的营养量（即

热量），才能使劳动得以继续维持下去；但是，因为渡过灾年和其它主观原因，使营养量有所减少，使一部分体力较差的人身体受到影响。加之在人体内的钩虫和蛔虫，又要吸取人体的本来不足的那部分营养，使得原来有钩虫，蛔虫病的人最易得肿病，这就是肿病发生的近因和远因。（见《四川省医药卫生志》，四川科技出版社 1991 年第 1 版第 253-255 页。）

比大姑娘说“我爱你”还扭捏。

但总算说出来了，下面终于有了面对现实的可能。省、地、县三级“除害灭菌领导小组”相继建立，集中力量抓肿病、妇女病的治疗。公社、管理区普遍成立了“肿病医院”，各级医疗卫生部门组织卫生队伍下乡支援，声势浩大，行动迅速，大有短期内将肿病扑灭之势。

这是不可能的。既然承认肿病是营养不良，根本的治疗办法当然是加强营养，多吃粮、肉、油， 问题恰恰在于拿不出来，一切赖以维持人体生存的物质极度紧缺，规模庞大的工业跃进尚在拼命支撑，农副业生产极度调敝，肿病已经从农村发展到城镇、工厂、机关和学校，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只有采取治标的办法，绞尽脑汁延缓和减少死亡。

办法想得不少，首先是减少能量支出。这个好办，将饿得快死的人集中到肿病医院，躺倒休息就是了。有钩虫、蛔虫的加以治疗，免得这些可恶的寄生虫争夺“人体本来不足的那部分营养”。血色素减少，皮肤发黄，服用含铁的“红色大补丸”；各种“消肿化湿”的民间单方偏方祖传秘方用以对付水肿。在最令人头痛的增加营养方面，除了保证最低限度的粮食供应，额外补助麦麸、米糠、豆类、杂粮等“营养品”，幸运的可以沾点糖、肉、油。用连麸面、细糠、糖合在一起炒制的“康复散”效果奇佳，可惜能吃到这种“药”的人太少。一切办法都想光用尽仍然不能阻止浮肿和死亡，就期待奇迹的出现。

1960 年初简阳县棉丰公社的土专家张泗洲想，水肿病人“寒湿”重，可不可以把他放到蒸笼里去蒸，以去寒去湿呢？他们做了竹笼子抹上稀泥，熬一大锅中草药，把蒸汽用竹筒子送到这个土制的蒸汽室里，把病人关进去蒸，声称疗效神奇。有关领导如获至宝，大肆宣传。省委在全省五级干部会议上，组织棉丰公社作现场示范，要求在全省推广，各地肿病医院、正规医院竞相效仿，纷纷设置蒸疗室。又有专家学者奉命考查总结，定名为“ 物理保温蒸气疗法”。四川医学院奉命组织５０多名师生，赴棉丰公社学习蒸气疗法，进行科学论证。学院建起了蒸疗室，进行临床治疗研究。四川日报说，“医学院根据已经掌握的事实与科学资料，认为蒸气疗法不仅是一项有广泛治疗价值的方法，同时是一门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医学科学。”

就像万斤田要让专家出面圆谎一样，如此煞费苦心自然是因为有人反对。他们说，体虚的人澡堂里头泡久了都要虚脱，水肿病人虚得要死，不蒸死才怪。有医生

认为这是“虚性水肿”的大忌。事情真是如此，病人活的进去，半死不活的出来，轻的蒸重，重的蒸死。提倡者解释，那是因为蒸前没喝“定心汤”的缘故，所谓定心汤是“红糖水、蛋花汤，当然肉汤、鸡汤更好”。人家就想，有这些吃何必用得着蒸呢？大邑县安仁公社搞了 8 个蒸疗室，蒸死几个后，再也没有人敢去领教，各处的蒸疗室都象这样废置了。

总而言之，是要找吃得少，又饿不死的办法。突然之间，一种单细胞的藻类植物成了救星，它的名字叫小球藻。胡乔木 1960 年 10 月 27 日写信给毛泽东，称推广小球藻有重大意义，“至少可以保证不饿死人，减少甚至消灭浮肿病”，毛泽东批示中央发文推广。四川日报说，它无处不在，“我们常常看金鱼缸、池塘或是水坑里的水是绿色，就是因为水中生了小球藻的缘故，它在自然界里到处都有。”没有想到吧，这种需要在 600 倍以上的显微镜中才看得清楚的小东西含 45％的蛋白质，15％的粗脂肪和 20％的淀粉及糖类，以及 21 种动物生长所不可缺少的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它的营养价值“不低于牛乳、鸡蛋或豆类，远比稻米、小麦的营养价值还高，因此，有人称它为水中猪肉、人造鸡蛋……”。

至于大量生产小球藻，更是简单得令人可笑。凡是能盛水的东西，水缸、瓦罐、池塘、粪坑都行，装上水，撒几泡尿，勺一瓢“绿水水”进去，太阳一晒，几天后水自然变绿，就象游泳池长期不换水会变绿那样，小球藻就培养成功了。

它是最好的饲料。四川日报说，“饲养员们情不自禁地赞叹小球藻喂猪比粮食还好，不推磨，不煮猪食，勺舀来就喂”；广汉县隆丰公社农科所用小球藻喂猪，每天长一斤，农民称赞：“小球藻 ，真正好，用它喂猪顶精料，长得快，易上膘，人人称它宝中宝”；成都畜牧园艺场用小球藻喂鸡，尽下双黄蛋……。省委发出开展大量繁殖小球藻的群众运动的号召，于是农村工厂机关学校，缸缸钵钵坑坑凼凼都盛满了臭烘烘的绿水。

这个所谓的最高级的人体营养液，被用来煮汤、煮稀饭、和面、糠蒸馍馍煎粑粑。专家指点在绿水里洒上明矾，使小球藻沉淀、过滤、晒干做成的干粉，是不可多得的营养精品。所有的肿病医院，都要求大量培殖小球藻作代食品，增加病员营养。

奇迹终于没有出现，人们的心就渐渐冷了。在基层建肿病医院，本来就勉为其难。房屋、床铺、生活设施、药品、人员无一不缺。病员不参加劳动，还要比别人多吃一点，又让其他人不满。在人人自危的情况下，那些躺下“休养”的垂死者难免被人厌弃，觉得不如让他们一死了之，省下几口给活着的人。所谓医生，要么是乡村郎中，要么只进过几天卫生常识学习班，真正称得上医生的凤毛鳞角，人数又少得可怜，往往一个人要管几十、上百人的吃喝拉撒睡，哪里照顾得过来。事实证明，除了填饱肚子，什么办法都无济于事，然而又得不到让病员填饱肚子的东西；稍有好转的，出去几天没吃的又肿了；病人越医越多，死人一天天往外抬，这一切

让做医生的何以不徒唤奈何，敷衍塞责？何况他们自己也饥肠碌碌，气虚体弱呢。责任心差的就撒手不管，甚至克扣病员，以求自保。

所谓肿病医院，有的状不忍睹。金堂县栖贤公社二管区肿病医院常住病员八九十人，只有医生 1 人，“保育员” 2 人，病房是包谷杆搭的草棚棚，睡的是谷草铺的地铺。“且还是男女病人混住一房”。 广汉兴隆公社肿病“疗养院”病人住的是“檐口边、拌桶内”；西外公社重病院的病人“水肿破皮不能料理自己，被盖、鞋、袜、裤子都是湿的，有的人睡着吃饭、屙屎，无人护理”；中兴医院有的病人死了无人抬走，同室的病人挪得动步子的只好搬走，走不动的“伴同死人住了三天三夜”。

病人到肿病医院，无非是为了不劳动和多吃几口饭，眼看着医院的条件日益恶化，人们觉得与其到医院等死，不如在外头挣条活路，甚至觉得死在家里也比死在这里强，非万不得以不住院。如此一来，住在里面的奄奄待毙，抬进来的尚存一息，病人死亡率高得惊人。广汉松林公社医院半年内收治肿病人 250 人，地委干部王树本去了解情况时，已死亡 97 人，去的当天又死 2 人，第二天死 3 人，离开时他看了剩下的 67 人，他估计将近一半活不到半个月。（见王树本给温江地委的报告。1960 年 12 月 13 日。）

1960 年冬季到来时，全专区肿病人数已达 3 百万之众，4 个人中就有 3 个肿的，大部分肿病医院名存实亡。亲朋好友见面，常常是互相按一按额头或脚杆，看凼凼有多深，以示关怀。

37、灾难中的妇女儿童

和肿病同时爆发的是妇女病。

川西坝子的妇女历来不参加田间重体力劳动，农家妇女多半是在家带孩子、做家务，间做栽桑养蚕、挑花刺绣、绩麻纳鞋、纺织土布、编织民间工艺品等家庭副业。合作化以后，家庭副业被视为资本主义自发因素逐步限制取消，集市贸易日渐萎缩，政府一门心思抓粮食生产，男女老少都赶到田里去了。

“1952 年，情况大改变，婆娘打男人，手都不敢还，”这是解放初开展反封建的民主改革运动川西坝子流传的民谣。那以后男人确实不敢随便打婆娘了，因为她

可能到干部那里去告状，拿你开斗争会，她还可以提出离婚，批准很容易。男女平等的口号让年轻女人们很开心，这意味着她们可以自由恋爱，在家中和男人平起平坐，可以和男人一样当工人，当兵、当干部，参加所有的社会活动。然而这是有代价的，男女平等还意味着她们要承担同等的家庭经济责任，除了带孩子做家务以外，还要和男人一样干重活。

大跃进一来，就什么规矩都打破了。先是郫县妇联 1957 年秋天在合兴、永定等乡首创妇女丰产组，种植小春作物。1958 年春天，社社队队都搞起了妇女丰产组。但当初还有一个禁忌没打破——妇女不能下水田。这倒不是男人们的责任，而是传统，女人们自己不愿意，怕长时间泡在冷水里对身体不好，所以没有人敢搞妇女水稻丰产组。于是各级妇联召开妇女跃进誓师大会，大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妇女什么也能干”的雄心斗志，破除妇女不能做水田活的“迷信”。郫县红光社伍绍群说“自古以来只有男人下田栽秧，没有听说妇女还要下田栽秧”，就被弄来“辩论”，反对妇女栽秧的男人则被扣上“老保守”的帽子。合兴乡党委书记郑凤兰要求青壮年妇女“打破常规，脱鞋下秧田”，率先组织上千名妇女脱鞋下田，全区的许多青壮年妇女，也都“英勇地参加到栽秧行列中去了”。

但是她们还没有彻底解放，她们还要做饭、带孩子、照顾老人，埋没了才华和宝贵的劳动力。公社化以后，有了食堂、幼儿园、敬老院，她们再也没有借口呆在家里。后来又有妇女兵团，妇女农场，集中住宿，使人怀疑共产主义还要不要家庭。有的地方当真还搞过“生活集体化还要家庭吗？”的辩论。有人说，每天光回家睡睡觉，那不叫家，叫宿舍、“幺店子”[33]。有人说“一双筷子一个碗、在哪吃饭哪是家”，“睡在哪里哪里就是家”。有人抱怨，男女分开住，睡都没法，还叫什么夫妇？有人则美滋滋地琢磨，今后大概要兴“乱睡”——正如有人吊的二话“人民公社乱睡”。

妇女们可对乱睡不感兴趣，她们怀念着过去的小家，牵挂着自己的男人、娃娃和老人。她们担心失去的家庭虽然没有瓦解，但她们再也没有时间和气力去照料了。从 1958 年下半年以来，她们就成了田间劳动的主力军，拉车挑担栽秧打谷犁田挖土无所不为，15-50 岁的妇女均被指定为劳动力。一部分妇女抽调到山上炼钢铁、修水利。最让已婚妇女伤心的是集中到“妇女农场”劳动，公社化后建立的那些解放妇女的福利设施，除了少数供参观检查的样板外，大部分陡有其名，她们一走，家里就全乱套了。

长期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上饥饿的折磨，把妇女们的身体完全摧垮，妇女病和肿病一样广为流行，最常见的是闭经和子宫脱垂。妇女们突然之间都不来月经了，正常的生理活动周期中止了，伴随而来的是头晕脑胀，脚火巴手软，腰腹胀痛，面黄饥瘦，乡下人称之为“干病”。同样因极度虚弱和劳累的原因，导致子宫悬吊组织松散，子宫脱垂出体外，乡下人称之为“吊儿肠”，（作者注：川西土话称子宫为“儿肠子”）

长期磨擦，感染溃烂，痛苦不堪。

温江县除害灭菌办公室 1960 年 6 月分作了一个调查，全县 18-45 岁的“经期妇女” 5 万多人中，停经的达 2 万多人，另有子宫脱垂的 2 千多人，他们并认为这个数字“可能偏小”。据他们在金马、永兴两个公社重点了解，前者停经妇女占经期妇女一半，后者达 60%。金马公社 896 名停经妇女中，18 岁到 25 岁的青年妇女有 334 人。一份来自温江涌泉公社华丰管区的调查说，全管区 15-50 岁的 124 名“成年妇女”中，停经的达 90 人，占成年妇女的 70%以上。

闭经和子宫脱垂原因多种多样，然而如此惊人的普遍，罪魁祸首无疑是营养不良，劳累还是次要的。但是和肿病一样，这个疤是揭不得的。温江县除害灭菌办公室的这份报告称：

停经原因：……内伤生冷，大部分人吃过生的红苕、萝卜，以致影响肠胃功能缩减，血脉干涸，月经闭止。根据古典中医学称“水容不化，脾气衰，则塞塘，胃气衰则水肿，男子则小便不利，妇女则经水不通”，所以患水肿病女，几乎全部停经。

患水肿病妇女全部停经说对了，因为吃了生红苕、萝卜却是打胡乱说。当然，只要不说饿，有些案是可以翻的。当初赶妇女下田，把妇女不能下田当迷信批，温江专区妇联代表钟福秀还在全国妇女积极分子代表会上讲“我区水田一般泥脚不深”，事实证明是“妇女体力所能胜任的”。现在为了把“饿”遮过去，便把这件事拉来垫背。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约有 90%以上的停经妇女往往在经期中下水田，接触冷水，或者坐卧于阴冷潮湿的地方，这样，必然使“风寒容于胞门”血精凝滞，这是造成闭经的又一原因。

子宫脱垂的原因，则归结为“产后休息不够”，用旧法接生，会阴没缝合，生育过多或“长期咳嗽”把子宫挤出来了等等。（见温江县委办公室：《关于积极防治妇女停经和子宫脱垂的报告》1960 年 5 月 3 0 日。）

治疗妇女病仍然只有中草药和神通广大的蒸气疗法。既然妇女病是肿病引起的，肿病可以蒸好，妇女病自然应当蒸得好。简阳县草池区茶旅栈的女服务员袁素芬给四川日报写信，说她很早就得了白带病、小便失禁病、脑膜炎后遗症——面部阵发性痉挛、全身风湿性关节炎，手脚麻木、疼痛剧烈，这一系列的病症导致了停经。她在别人的再三劝说下，扶着棍子去医院蒸疗，蒸得热汗淋淋，浑身通泰，不是医生劝她都不想出来。连蒸几次，关节不痛了，脸不抽了，白带干净了，手脚麻木，心累心跳全好了，不几天月经也来了。真是“仙丹妙药”啊！ 5 4 岁的郑天华写信说，她患子宫脱垂 2 7 年了，打针吃药不见效，蒸了几次就完全治好了。信当然不会是她们自己写的，就象江湖郎中“华陀再世”的招牌不是别人送的一样。

月经不下，“儿肠子”下一长截，当然谈不上生孩子。坚信公社化后人只会生得多、死得少，不会生得少、死得多的李井泉似乎很焦虑。省委宣传部组织医疗队到

大专院校巡回治疗肿病妇女病，向他汇报说效果不佳，他就大发脾气说，你们跑了几个月，连个妇女病都治不好，今后还搞什么社会主义！是啊，孩子都会不生了，今后劳动力从何而来呢？李政委下令郫县抓治疗妇女病的样板。

善于创造奇迹的郫县立即在红光公社的奇迹加工线上推出了样板。1960 年 7 月 10 日，县委向省委报告，红光管区总结出用益母草合剂治疗闭经病的办法，"全管区 221 个闭经病患者，191 人服用 1 个疗程就来了月经，其余 30 个服用两个疗程后都月经来潮"，全部好了。还有更稀奇的：

红光公社推广这个方法后，在 3703 个妇女中，服药 3 天到一周内已来月经的有 2207 人，占 60%，已有月经来潮现象的 1309 人。……

真是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说来就来。生理常识等于零，编套话倒有一手。

过去群众都认为这种病是"血气痨"，视为难治之病，患病者都思想恐惧，情绪紧张。这次治好后，同声歌颂共产党，歌颂毛主席，歌颂人民公社，感激党和毛主席的关怀，有的甚至感动得的流泪。

"用针炙加火罐治疗子宫脱垂"，更是"治一个好一个"。

一个叫胡五娘的社员，子宫脱垂已近五年，子宫体已糜烂成一个个的洞洞，……送医院不到一周，已完全治愈，来时抬了来，回时走了回去。……治好后逢人就说："没有毛主席，我坟上长了草，有了党，有了毛主席，我得了活命，党是我的重生父母，救命恩人。（见郫县县委：《关于红光公社红光管理区临时医院对妇女子宫脱垂、闭经病和蛔虫病治疗情况的调查报告》，1960 年 7 月 10 日。）

治疗子宫脱垂实际上大量采用的办法是注射无水酒清，在酒精的作用下，子宫很容易收缩进去，但没有营养补充，用不了几天又吊出来了。

妇女病也要求集中突击治疗，但大部分"医院"和肿病医院一样条件恶劣。明明饿出来的病，却得不到营养的供应；治不好，又要治医生的罪。情急之下，医生就下猛药，结果酿出大祸。邛崃双江公社鱼唱管理区"疗养院"医生李明征，将草乌、南星等有毒草药加进处方，护理员又未按操作方法泡制，就让病员服了。医院条件太差，医护人员晚上都在外面去住。两小时以后，服药的 29 人全部发作，呼天抢地，力竭声嘶，无人照应。凌晨 5 小时，医生李明征闻讯赶到，发现已经有 4 人死得硬梆梆，还有一堆奄奄一息者，就跑出去投河自杀了。（见中共邛崃县委：《关于双江公社鱼唱管理区疗养院药物中毒事件的情况报告》 1960 年 12 月 23 日。）

男人是肿病，女人是肿病加妇女病，儿童是"干病"，即极度干瘦。

糖、肉、蛋断绝，母亲断奶，食堂吃饭，社员不准生火等等，对婴幼儿是致命的打击，他们整日哭叫着，只见缩不见长，直到皱缩成一小把，哭声细若小猫叫，死后大人随便挖个浅坑就埋了。大一点的是这副模样：麻杆似的腿，青蛙似的大肚皮，眼睛可怜兮兮的四处搜索，抓住任何可吃的东西，不论生冷脏臭一概往嘴里塞，

滚圆的肚子里塞满了蛔虫，拉屎的时候大肠吊出一截，那叫“脱肛”，原因和子宫脱垂一样。

妇女被驱赶到劳动第一线，家中的孩子无人照看，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是造成小孩死亡的又一个原因，也是妇女们的一大伤心事。今天你翻开那时的公开出版物，这一切是看不到的。你会看到许多关心妇女儿童健康的经验事迹介绍。照片图画中，从家庭中“解放”出来的妇女们个个兴高彩烈，体态丰腴；公社的幼儿园里，孩子们穿着白色的围裙，在老师的呵护下，手拉着手儿在鲜花丛中唱歌跳舞，如此等等。实际情况天差地别，下面是广汉县妇联干部 1960 年 6 月间在该县金鱼公社看到的景况。

公社干部声称的所谓的托儿组、幼儿班纯属于虚乌有，婴儿的“保育员”就是孩子的母亲，“幼儿班”一无教室，二不见老师。“解放”了的母亲在充当生产主力军，孩子无人看管，四处乱跑。

去年冬天到现在，由于孩子无人看管，就发生 1 2 个非死亡［死于非命］的孩子。……妇女队长杨昌秀的孩子，妈妈出工后自己到河边玩，掉到河里淹死了，……肖文聪（地主孩子 6 岁），在今年点玉米时，他偷些玉米去烧，把衣服烧着了，没人发觉，被活活烧死。……一个孩子摔在水缸内淹死了，还有一些婴儿无人照顾，冻死，墙倒打死，摔在井内淹死，被铺盖闭死等。

谁个父母不心痛自己的孩子？但他们照顾孩子的要求往往遭到粗暴的拒绝，被迫撇下孩子遭罪。

社员胡正群两夫妇都是全劳动［力］，家中有 3 个 7 岁以下的孩子，小的只半岁，在出夜工时要求照顾，怕去后孩子在家出问题，但组长一再不准，说这样多妇女，你不出工，就会都不出工，结果……小孩子被被盖闷死了。杨明秀有 3 个孩子，4 月份小孩子死了，大孩子 5 岁脱肛，要求队长照顾也不准，结果孩子在家脱肛出来，被鸡啄烂了，鲜血大流，孩子现在瘦得不象人。

男女老幼一律在食堂吃饭，不准社员生火，食堂又不给婴幼儿做吃的，母亲又没奶，“普通是大人吃啥孩子就吃啥”，大人吃菜孩子吃菜，大人吃糠麸孩子吃糠麸，幼小的生命怎经得起这样的折磨？况且还吃不够，“一般幼儿吃不饱，就吃大人的”。

上面一再强调照顾妇女生理特点，治疗妇女病，保护妇女劳力等等，早已是全面破产的基层只有虚以应付，谁还顾得了那么多呢？有的子宫脱垂的妇女子宫糜烂，“经常裤档内都是血水黄水”仍然被迫出工。有的子宫脱垂患者，医了几天又被派去干重活，复垂如故。妇女们寒心了，许多人拒绝治妇女病，她们说，这样还好，免得生娃娃，生下来更遭罪。

男人没有性欲，女人不来月经；生下来的活不了，活着的在死去。广汉县妇联在金鱼公社调查的一组数字，活画出当时的惨景。

据 50 个生产队 3388 户，关于 59 年冬至现在［六O年六月］七岁以下幼儿生死情况。查，共生了 198 个，死了 358 个。8 区 4 队生 1 个，死 19 个，7 区 5 队新生 7 个幼儿全部死去，9 区 4 队 53 户现在 3 岁以下的幼儿只有 3 人，现在也无孕妇。（见广汉县妇联:《关于检查金鱼公社妇幼保健工作的情况报告》，1960 年 7 月 3 日。）

38、猪贵于人

饿死归饿死，跃进归跃进。

“关键在于一个很大的干劲。拖拖踏踏，困难重重，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这些都是懦夫和懒汉的世界观，半点马列主义的雄心壮志都没有，这些人离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风格大约还有十万八千里。”

这是毛泽东的一段名言，不过难以有人注意到这是就养猪而言的，写于 1959 年 10 月 31 日关于发展养猪业的一封信中。“苏联伟大的土壤学家和农学家威廉氏”——他这样称呼，对他的影响太大了。1958 年挖地三尺看来收效不大，现在他把改良土壤的希望寄托在有机肥料的“第一来源”猪身上，要全党大办特办、大养特养其猪。四川省委迅即发出高速度发展猪的战斗号召，要求 1960 年养猪头数比 1959 年增加 50％，并力争翻一番。

“翻一番”落实到四川就是外调猪肉。四川是全国养猪第一大省，温江专区是全省养猪第一大户，每年除供应省会成都，还向北京等地外调大批猪肉。公社化以前，全区生猪存栏 250 万头，年出栏七八十万头。公社化以后养猪业一落千丈，可供宰杀的上调殆尽，不够标准的无饲料催肥，猪只大量死亡，数量骤减。上调任务完不成，农民基本上被剥夺了吃肉的权利。随着局势的恶化，北京方面催猪的声音越来越急迫，李政委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了。

发展养猪当然好，猪多肥多，肥多粮多，粮多肉多。问题是怎么个养法。一年多的实践已经证明，“公有公养”的路子走不通，前一段已允许部分公有私养，泸州的邓自力干脆全部下放给社员养。一个反右倾，又把这条路堵死。

1959 年 12 月省委在金牛坝召开的毛猪座谈会上，李井泉大批“邓自力路线养猪”，恨恨地说，对那些主张把猪下放给社员饲养的人，“以后不要叫小泸州，小邓

自力，叫资本主义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历数集体养猪的优越性，可以有计划地配种，预防疾病，减少死亡，大大节约劳动力等等，是实现“成倍增长”的必由之路，为此，还要把集体养猪场搞得更大。

养一百头以下叫小猪场，一百头以上千头以下的叫中猪场，一千头以上的叫大猪场。生产队、公共食堂一般是小猪场，管理区一般是中猪场，公社、县以上一般是大猪场。修猪场要大搞群众运动。这就是喧嚣一时的“百、千、万”养猪场运动。

公社化以后集体养猪，造成大规模的瘟虐流行，猪只死亡惨重，下面心有余悸，如今还要搞更大规模的集中饲养，人人头皮发麻。为了打消大家顾虑，李政委提出修“猪公馆”，猪圈要修得宽畅通风，设施齐全，搞好清洁卫生，“每头猪每年打它两次预防针”，而且：

各类猪只要分圈养，男女老少分开。杜勒斯造谣攻击人民公社一家人分开不见面，我看养猪就要这样子。

思想上相信能翻番就能翻番，建大猪场发挥集体养猪的优越性，修猪公馆解决防治猪瘟，好了。那么猪源问题如何解决呢？温江专区过去农户养猪，一般是购进半大的“架子猪”，短时间内催肥出栏，出栏率高，效益好，很少有喂小猪、母猪的。按照这个思路，真正要完成生猪派购任务，短期内增加猪肉供应，只有从外地购入大批的仔猪。

不行，李政委说，只能“自繁自养”，因为全省到处都要发展养猪，把别人的拿给你了，别人就少了，全省的总头数并没有增加。下面感兴趣的是肉，李政委感兴趣的是头数翻番，南辕北辙，但是你必须服从。

可是，就算自繁自养，一年内也达不到头数翻番啊。下仔母猪和配种公猪的比例，是根据整个养猪业的效益形成的，数量有限，哪能一年之内生出那么多小猪呢？

有办法，李政委说：

12 月底配一窝，旧历年前配一窝，明年六七月再配一窝，才能保证翻一番。（见温江地委办公室：《李政委在金牛坝发展毛猪座谈会上的插话和讲话》，1959 年 12 月。）

李政委话音未落，郫县就拿出“公有公养无限好”的十条经验。到处都开始拆民房腾民房集中猪只搞大型养猪场、修“猪公馆”。1958 年“母牛全配”的荒唐游戏再次上演，省委下令保证母猪在年底前（只有 10 来天时间）“全配满怀”。有人说冬天母猪不发情，四川日报的社论就批判说：

有的人至今还有冬季不能配种的迷信，说什么“冬季天冷，母猪不发情，配不上”，“冬季配种产仔少，猪仔成活率不高”，这些都是缺乏科学根据的无稽之谈。

为此，四川日报介绍了许多科学催情方法，如“异性诱导法”——把母猪与公猪放到一起，促进母猪发情；“乳房按摩催情法”——站在母猪背后，用手掌在母猪乳房上由前到后，由后到前，来回不断地按摩；“用碘酒催情”——用 20％的碘酒

涂擦母猪阴道；“孕畜尿催情”——将妊娠后期的母畜尿注射到母猪体内“均在一至三天内发情”。正在喂奶的母猪，也可以不让它的子宫闲着，只要夜间把小猪隔离开，不使母猪听到小猪叫声，隔上三五夜，母猪就发情。（见《怎样使母猪全配满怀》，四川日报 1959 年 12 月 15 日第 2 版。）

一时间，母猪都成了宝贝，一年翻番的重任都寄托在它们身上，它们要在一个冬春不断地怀，不断的生，必须精心护理，住猪公馆，馆内塔“猪床”，还要生火取暖。新生的小猪，凡是母的都要特别关照，“一见发情，立即配种”。

母猪身价日益看涨，一头“有着革命历史意义的母猪”应运而生。四川日报报道，广元马鹿公社有位 55 岁的女社员刘玉兰，30 多年前（作者注：原文如此，明显有误）红军北上抗日时，给她留下一头母猪。红军走后，复辟的地主妄图夺走这只母猪，刘玉兰为了保护这只母猪，遭受了敌人无数次毒打，一次又一次被关进牢房，经过长期不曲不挠的斗争，终于保存了这份革命财产， 并把它喂成了今天人人称赞的“母猪王”。

这只有着革命历史意义的母猪被养活了３０多年，已产仔 1100 多头，这不仅创造了我国养猪史上的奇迹，也将成为革命历史中的美谈。（见《发扬刘玉兰的革命精神》，四川日报 1960 年 3 月 1 日第 6 版。）

辞海上讲，猪的寿命“约 20 年”。一只活了 30 多年、生了 1 千多头猪的老母猪都还在大生特生，还有什么猪们办不到的事呢？温江地委在新津县金华公社召开现场会，提出“不让一头母猪空怀过冬”，全区建立健全人工授精站 660 多个，组织起 1 万人的配种大军。新繁龙桥公社一头母猪三年不发情，饲养员刘大嫂就四处寻找“催情秘方”，先后采用“喂药、打针、洗澡、运动等 10 多种办法，”终于配上了种。短短十多天内，四川日报就报道，温江专区适龄母猪已“迅速达到全配满怀”。

一宣布全配满怀，有人就开始吞着清口水算帐：全区据报有 19 万头母猪，以每头每窝平均产 8 只计，这一下来岂不有 150 万头？等不及小猪出世，四川日报就提前报喜：“群众运动的胜利，集体养猪的胜利——温江专区喜迎百万只仔猪降生”。“目前，广大群众特别是两万多名饲养员，正以无比欢欣鼓舞的精神做好怀孕母猪的产前准备，以迎接春中产仔，大批产仔的盛况”。

盛况只存在于满怀雄心大志的人的脑袋中。猪只重新集中，饲料紧缺，瘟疫流行，这一个冬春猪和人一样大批死亡。1960 年 4 月 26 日，地委办公室根据各县第一书记的报告统计，1959 年底以来毛猪已下降 27 万余头，这就是养猪新高潮制造的奇迹，实际减少的肯定不止这个数。

在这次汇报统计中，全区唯有郫县报告猪只增加。为了扶住李政委树立的这面摇摇欲坠的大旗，县委几乎要急疯了。下面反映饲料不够，“饲料不够是右倾思想！”刘致台怒斥。他说，凡是养不好猪的干部“都要开除，早就该开除，党员书记亲自

去喂猪，啥事也不干。”他表扬先锋公社曙光管区主任刘兴太的女人曹素光，“用自己的奶喂活了两支猪儿”；崇兴公社一管区饲养员怕猪受冻“抱在床上睡觉”。为了保证这次大批猪仔降生，郫县真的正在大量赶制“仔猪保健箱”呢。在这个饿殍遍地的时候，在有的领导者心目中猪比人贵，因为猪只上调是上面规定的任务，否则北京要“打扁担”，而人是要消耗粮食和猪肉的。实际上这年底专区补助的粮食，就是按“人头”和“猪头”分配，更有因偷了“猪粮”而遭毒打的农民。

连艺术家也被动员起来为猪们唱赞歌，著名的大舌头艺人邹忠新打着金钱板唱：

人民公社闪金光，人人夸奖养猪场，条条肥猪赛大象，个个母猪长得胖，千千猪儿长得长，架子猪儿正强壮……母猪住的特别号，猪儿住的崽崽房，有病到兽医院去疗养，吃药打针保健康。

人连猪食都吃不上，猪们又会好到哪里去呢？到 1960 年年底，温江专区猪只头数下降到百万头以下，比头年刚刚倒减一番。而且多半是小猪，根本出不了栏。

39、衰竭的“心脏”

饥荒遍地，农业生产遭到毁灭性破坏，人民公社优越性最集中的代表公共食堂风雨飘摇，许多地方已经是名存实亡。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提出：“现在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怕取消供给制就不够进步，退出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采取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种办法。”毛泽东认为，这是腐蚀党、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想，是“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至此，是否坚持搞公共食堂，就成了是否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大跃进的重大原则问题。四川省委为此不遗余力，口号是“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

正是饿殍遍野的贵州的办法是，把社员自留地统统收回，由食堂集体种菜；粮食统统集中到食堂，不许社员开伙；干部统统下食堂，掌握吃饭大权。把食堂办成基层“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同时扩大食堂规模，集中社员建“大居民点”。他们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颠倒黑白的编造说，个别地方出现的外逃、肿病和死人，就是分户吃饭出的事。毛泽东 3 月 2 日批示给予高度评价，称之为是“一个科学的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跃进一大步”，先是强

调“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接着又说“应当在全国仿行，不应有例外”，并且“是为至要”。（见 中共中央关于批转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报告》1960年3月6日）

民以食为天，老百姓心目中，公社就是食堂，食堂就是公社。公社的最大特点，就是剥夺了老百姓对劳动果实的支配权，抓住食堂，就抓住了老百姓的命根子，任何政治鼓动，行政命令都没有饭瓢儿的威力大，它是公社至高无上的权力的最集中、最有力的体现，是驱使群众“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 搞大跃进的特效手段。食堂一旦解体，基层权力机构对农民的支配力将锐减。有如中国传统的“同居”“同堂”大家庭必须以“同食”来维系，一旦分锅吃饭就意味着解体分家一样。在这个意义上，食堂的确是公社的心脏。

1961年6月食堂一哄而散后，李井泉有一段精彩的自白。

我看59年的食堂是供给制食堂，不可以不参加；60年的是官办食堂，不能不参加。因为粮食在食堂，不参加就会饿死。（见 1961年6月29日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上李井泉插话记录。）

以“不参加就会饿死”相威胁，把食堂由生活机构变为基层的权力机构，就是这个“官办食堂”的实质。四川省委以极大的热情贯彻贵州经验，同时又推出彭县楠木公社办公共食堂的经验，规定了官办食堂的模式：“政治进食堂、书记下厨房”，下厨房做什么呢？掌握瓢儿把把，抓住社员的“命根子”，控制实权；“贯彻阶级路线，建立以党团员为骨干，以贫下中农为主的食堂工作队伍”，这支队伍就是基层领导班子；由一个生产队几个食堂，并成一个生产队一个食堂，“使基本生产单位和基本生活单位合二为一”。这样一来，便完成了基层权力机构向食堂的转移，公社、党的领导和食堂成了同义语。

省委指示，办这样的官办食堂，是“当前全党全民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要使食堂成为组织社员集体生产和生活的坚强堡垒，对社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开展文艺活动的中心场所，发展和提高人民公社的强有力的阵地。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生产持续跃进”。

“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的口号甚嚣尘上。而一到关键时刻，就有红光公社。一篇“公社食堂万年红”的雄文登遍了大报小报，历数公共食堂的优越性。就在红光公社食堂停伙，死人累累的时候，文章描写道：

社员在食堂吃饭，吃得又饱，又好，又卫生，……这样幸福愉快的生活，是办起了公共食堂才得到的。广大社员生活得好，心情舒畅，体重普遍有了增加……

在收锅、搜家、不准社员升火的时候，人们从报上看到的是：

公社还贯彻执行了“大集体小自由”的原则，保留了……社员的小锅小灶。除去食堂吃的蔬菜外，还分给社员一些蔬菜让其拿回家去吃，……还分发了一些大米

猪肉和蔬菜给社员，以照顾社员探亲访友的需要。公共食堂还对老、幼、病、弱和产妇、孕妇做到了适当的照顾，允许他们打饭回去吃，并为老年人和小孩子煮软饭。……也可以在家自己煮饭。

至于有人攻击食堂远，吃饭不方便，纯粹是污蔑，因为社员对集体生活已经逐步习惯。长河管理区的赖侯氏，今年６０多岁了，食堂为了照顾她少走路，给她送饭，劝她在家里吃，可是她愿意和大家在一起，不管刮风下雨，顿顿来食堂吃饭。

食堂再好，社员吃不饱等于零，这个道理人人都懂。粮食如此之少，又如何让人吃饱呢 ？邛崃县有人受爆米花的启示，发明“火米蒸饭”绝技，先将谷子蒸熟，晒干再碾成米，使米的膨胀系数增加，“蒸出饭比一般多两三倍”邛崃县委立即总结经验。温江专区在邛崃召开“粮食增量”现场会，到会数百人“边听、边看、边吃、边学”，全区推广。四川日报吹嘘，温江专区推广邛崃“粮食增量”经验后，每百斤黄谷可以多蒸出饭 1 百斤，全区 10 天内节约粮食 410 万斤，机关单位 59 年 10 月以前人均每月吃粮 30 斤，推广火米蒸饭法后，只吃 19 斤就饱了。机关单位的干部看了哭笑不得，粮食定量下降到 19 斤是省上的规定，现在一个个饿得白鹤伸颈。有人提出这是水份增量不是粮食增量，打成“右倾”。有的地方检查肿病和死人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没有推广火米蒸饭法”。

食堂不仅要办，而且还要办得更大，使之成为“组织集体生产和集体生活的坚强堡垒”，要求是一个生产队一个食堂，把“生产单位和生活单位合二为一”。郫县做得更彻底，不仅小食堂要并大食堂，还要求社员大搬大迁，以食堂为中心居住。食堂就是队部、会场，开会也好，安排劳动也好，不用通知自动报到，男女老幼一个不缺，任随你调皮捣蛋，使懒耍滑都躲不过去。如果让社员自己开伙，喊破嗓子跑断腿也弄不到这么规矩整齐。不服从？好办极了，拿一顿不给你吃就叫你服服贴贴。

食堂越大，做饭吃饭越成问题。烧柴困难，粮食奇紧，人人掐两算钱，分饭用称，你多我少，争吵不休，乌烟障气。地委干部在广汉西外公社一个食堂目睹，头天已到下午 5 点过钟，锅里的水都开了，事务员还没把米领回来。第二天米都下了锅，还没找到柴烧。每次分饭都在一个多钟头，甚至两个钟头，大人小孩哄闹不已，干部“麻木不仁”。说的是食堂节约劳力时间，结果费时费力。但这个社会主义的阵地必须坚守，于是在煮饭上做文章，办法是大搞“炊具革新 ”。

又是一场和 1958 年农具改革一样劳民伤财的瞎折腾，誓师大会，破除迷信，书记挂帅，群众运动， 宣称是减轻劳动强度，“解决劳力不足的治本办法”，标准是“送饭送菜传送带化、轨道化，用水自流化，炊煮科学化，洗菜、切菜、淘米半自动化。”

温江专区的１万１千多个公共食堂正以日新月异、一日数变的速度，猛烈异常地掀起了大搞炊事工具半机械化的高潮。这些公共食堂炊事工作用手工作业的现象急剧减少。不闻切菜声，但闻机器响，不见人挑水，只见水自来，淘米不用手，送

饭不用手，已经成为目前公共食堂中的普遍现象。……全区采用炊具改革后，可以抽出一大半的炊事人员参加农业劳动，每天节省一个小时吃饭时间，……社员们个个吃得欢天喜地。(见四川日报1959年11月4日3版:《普遍推广邛崃“粮食增量”经验》。)

参加过炊具改革的人过后回忆起来都只有苦笑，它把简单的厨房劳动变得更加复杂化，纯粹的脱了裤子放屁，所谓的机械过不了多久就拆来当柴烧了。

集体食物中毒在那个年代经常发生，除了饥不择食、乱吃肮脏、有毒、腐败的东西外，食堂大锅煮食是一个重要原因。以菜代粮，大锅煮菜，闷的时间一长，极易产生大量亚硝酸，集体食物中毒屡屡发生。1960 年 3 月 31 日上午，华阳上游公社会龙管理区 4 生产队早饭刚刚开过，吃饭的 225 人全都呻唤起来，有的抱着肚子遍地打滚，有的昏倒在地，中毒最严重的是小孩。省委书记杜沁源、专区副专员马维政、省公安厅、卫生厅大队人马赴现场抢救，仍有 3 名小孩中毒死亡。经调查，这天早餐供 225 名社员吃的是 80 斤厚皮菜，3 斤灰灰菜(野菜)；5 斤苕菜，厚皮菜在厨房里已堆放两天，一锅闷煮，打到社员碗里发黑发酸，“属亚硝酸盐中毒”。

此前一个月，一篇《为了 61 个阶级兄弟》的报道轰动全国，说的是从中央到地方全力抢救山西省平陆县筑路民工食物中毒的事迹，情节细腻感人，就是没有讲是吃了什么食物中毒的。各地领导因此对食物中毒事件极为重视，一有消息，即兴师动众组织抢救。但兴趣似乎主要在“抢救”而不在解决中毒的原因。比较起千万人的死亡惨剧，实在是小题大作。

食堂家底厚也，社员干劲大嘛，千亩秧苗一类化哟，窝窝长得象芭茅也，咿哟，呀嗬咳……也…… 呀咳……。

夕阳西下，吃得“红光满面”的社员还在边干活边唱食堂颂歌。

当时的报纸就是这样胡编的。

40、丢卒保车

粮食最紧张的 1959 和 1960 年两年，李井泉每到中央开会，总要表白他给中央调了多少粮食，全国各地都在吃四川的粮食，因此也得到“顾大局、风格高”的美誉。在外界看来，四川似乎是个遍地稻谷的大粮库，实际上这是个人为的错觉。全川除川西坝子以外，不是丘陵就是大山，加上人口众多，粮食的商品率很低，推行

集体化生产的结果进一步降低了商品粮的产出。所谓全国首屈一指的商品粮基地，完全是迫使农民勒紧裤带，打肿脸充胖子硬绷出来的。大跃进的几年中，四川的粮食征购率比全国平均水平将近高 1 0 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留粮比全国低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见《当代中国的四川（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104 页 并参看书末附表：《四川农村人口及粮食情况》）。他们无疑是饥饿的人们中最饥饿的一群，从最饥饿的人口中夺食，支援别人，这就是四川人民作出的“贡献”。

到 1960 年，四川的粮食产量已低于国民党政权崩溃的 1949 年的 10 个百分点以上，粮食库存几乎挖尽，水陆交通沿线的仓库更是扫荡一空。四川省委已经了解问题的严重性，破天荒地开始向中央叫苦。然而此时整个国家都陷入空前的饥荒之中，已经不是谁多吃一点、谁少吃一点的问题，而是保存谁、牺牲谁的问题了。

1960 年 5 月 28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告急：“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救济，就有脱销的危险。”6 月 6 日，中央再次发出调粮紧急指示。其时，北京的粮食仅能维持 7 天，天津 10 天，上海几乎已无大米库存，当时全国最大的工业省辽宁急待粮食随到随销。

国家到了如此境地，丢卒保车就不得已而为之了。

濒临断粮的大城市要粮；规模庞大，苦苦支撑的工矿企业要粮；灾区要粮。十万火急的命令一道接着一道。鸡公车、架架车在川西坝子的公路上奔流不息，人们忍受着刻骨的饥饿，支撑着浮肿的身躯，把粮运往主要交通沿线的国家粮库，时间紧迫，劳力紧缺，甚至不得不实行全民总动员。1960 年 3 月 9 日，为了突击赶运一批外调粮食，郫县县人委通知全县机关、学校、部队、商业部门、城镇居民，在一周之内每人突击运输 1 千斤粮食，一时间机关人空，商店关门、学校停课，马路上人流滚滚，场面颇为悲壮。（见郫县县人委：《关于在城镇职工、居民、学生、商业人员中展开千斤突击运粮运动的通知》，1960 年 3 月 9 日）

悲壮是一种真实的情感。从 1959 年秋收以后，人们就被反复告知，全国遭受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令头脑单纯的人们大动恻隐之心。川西坝子这几年风调雨顺尚且如此，灾区的情况可想而知。就象后来一提起“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什么困难都不在话下一样，神圣光荣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以至现在人们还津津乐道“四川作为粮食调出省，面临的选择是让问题发生在四川，还是发生在京、津、沪。两弊相权取其轻，四川人民为支援国家渡过困难，作出了巨大牺牲……”

如果他们的牺牲换来的是掌权者的彻底醒悟，也许还有意义，但是，正如上面已经看到的那样，他们换来的是什么呢？

1959 年前所未有的高征购，已经酿成去冬今春人口的大量死亡。继续倒行逆施的结果，使生产进一步遭到毁灭性的打击。1960 年的农副业生产，滑到大跃进以来

的最低谷，川西坝子的良田沃土大量荒芜，杂草盖过庄稼。对温江地委来说，多年来争论不休并导致大批干部遭难的诸多问题，已经是无可争辩的血淋淋的事实。1960年的征购指标一下来，宋文彬的头皮都麻了。这一年的任务仅比 1959 年减了 10%，考虑到减产的因素，征购比例将和去年不相上下。然而事到如今，他已经没有和省上讨价还价的余地，省委的指标就是中央的命令！

这一年粮食调运十万火急。往年粮食收购，一般先交就近粮库，待有外调任务时再组织运输，今年根本等不及，要求粮食一收下即送往主要交通沿线国家粮库组织外调。为此秋收之前，各县即组织大批的专业运输队，工具是架架车。省上给与的照顾是送来近两万付架架车胶带，以助多拉快跑。8 月中旬宋文彬检查专业运输队组织情况，发现还有四分之三的胶带在仓库里睡大觉，气急败坏的在全区电话会议上骂：

今年秋天立即就来了，调粮任务很大。中央说非调不可，秋收就调，边收边调，要调到交通沿线。这么大的运输任务，你们急不急！专业运输队的问题不解决，秋收后就要叫几十万人推鸡公车，秋耕秋种还搞不搞？怎么办？……这笔帐不算清不散会，……非算不可！

最后他又安慰说，今年运了，明年就没这个事了。这个他猜对了，明年四川将破天荒从外省调入粮食。

温江专区竭尽全力完成了粮食上调任务。但是到年底，各县纷纷告急，在形势突然发生逆转的情况下（这个下面会讲到），大家都敢放开喉咙喊缺粮了。在年底的省委工作会议上，省委再次提出农村按每人每天半斤留粮，这是 1959 年底定下的标准。宋文彬争辩说 1959 年按这个标准，一个冬春饿死那么多人，再出乱子怎么办？

这时的李井泉，就如同债台高筑、早已破产的商家，还在拼命支撑着阔人的门面。他反问宋文彬：乱子已经出了，是先保京、津、沪，先保成都，还是先保你温江？

宋文彬相信，中央并不十分了解四川的情况。如果真是了解，决不会如此催逼的。“能不能把我们的情况向中央反映一下？”他问。

省委书记廖志高解释说，省委已经向中央反映了，如果多调 1 亿斤粮食，会饿死多少人，但是中央还是要调。

宋文彬无可奈何。回去地委作出一项决议：地、专机关干部每人每天半斤米，和群众同甘共苦。”宋文彬想试一试，半斤米熬不熬得过去？如果真熬不过去，再向省里反映，结果他没几天就“胖”了起来，一头栽倒在厕所里。其实他的试验毫无意义，农民这时每天有半斤米，哪还有死人的事。

大大小小的城市，尤如饥饿海洋中的座座小岛，风雨飘摇中随时面临着沉没的危险。城市的危险来源于赖以生存的农产品供应日益减少，也来源于因饥饿而四处逃亡的农民。在中国历史上，饥荒产生的流民曾摧毁过一个又一个的王朝，控制饥

民的"盲流"，对维护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应该说当时这项工作是做得十分成功的。比如说，那时一个无亲无靠的农民要想进成都的话，他会面临重重的困难。首先，他得持有公社或"基本核算单位"管理区的介绍信，否则就叫做"流窜犯"，遭到公安机关的拘捕或驱逐；他得通过若干道关口，接受检查和盘问，没准带的钱和粮食就被共产了；他得有粮票，所有的餐馆吃饭都要付粮票，付食品就更复杂，需要钱、粮票和供应证三种。农民没有粮票，即使用粮食兑换粮票也并非易事。郫县就明文规定："农村人的外出，以粮食兑换粮票者，必须持公社证明由粮站站长批准，始得兑换粮票"。只此一条，就让你动弹不得。所以那时的流亡者，少有在城市落脚的可能，绝大多数远走穷乡辟壤，如西北贵州等人烟稀少或户籍管制不严之地。

由于上述原因，1959 年春天开始的大批农民进城的景观不复再现，但是城里人的日子也江河日下，粮食定量一降再降。以郫县为例，1959 年以前机关、团体、学校、厂矿和城镇居民粮食月平均定量 25 斤多，1959 年 9 月，根据省委"节约粮食、支援灾区"的指示，一次性下调 20%，调整后的定量是：特重体力劳动 41 斤，一般重体力劳动 33 斤，轻体力劳动 24 斤，干部、教师等脑力劳动者 19 斤，大中学生 24 斤，居民 19 斤，6-10 岁儿童 18 斤，3 岁儿童 14 斤，3 岁以下幼儿 7 斤。

今天的年轻人也许对这个数字不以为然，因为许多人甚至还吃不到这个数呢。不过可以试试，每个月吃二两肉，或者根本不吃，菜里只放盐，一切零碎付食皆无，吃这点粮是个什么感觉。你会觉得吃了上顿马上就想到下顿，始终觉得腹中空空，一天的粮食恨不得一顿饭就吃下去，那是轻而易举的事。

再看付食品供应。郫县 1960 年 2 月的规是：城市人口糕点每人每月 2 两，持糕点购买证购卖，还要照付粮票；幼儿园、敬老院供应 4 两；食糖 1 岁以下婴儿每月 1 斤，产妇一次性供应 2 斤；盐，每人每月 1 斤；酒，每月 1 两；鸡蛋，产妇凭证供应 3 斤。饮食行业一律收粮票，只供应来往客人，"本地农民、工人和干部一律不予供应"。

那时候，城里人手中的粮票比什么都宝贵，它是最硬的通货，可以换一切物品，若是表达关心爱意，送几斤粮票最好。有心计的人从牙齿缝里省下的一点粮票以备不测，可是 1960 年 7 月 1 日省委一道命令，宣布旧的粮票作废，就把老百姓苦苦积攒下的 4800 万斤粮食拿走了（见《当代中国的四川》一〇五页）。对此人们更多的只是惊恐。地委宣传部副科长梁进学当时正在新都三河公社帮助工作，他回忆这件事说：

那时的粮食比什么东西都珍贵，我们一个月的定量才 19 斤啊！6 月 30 日，突然来了一个通知，从 7 月 1 日起，使用新粮票，旧粮票除在当日兑换外，第二天全部作废。我从大队回来，已是晚上 9 点过，听到此事，摸了摸身上还有不到 10 斤粮票，明天起我要作废了，好心痛哪！魏福田（公社党委书记）急了，对我说："马上拿给我，我到仓库粮站叫他们给你换。"我把粮票交给他，他到粮站打门叫人，硬是给

我兑换了，回来时已是半夜 11 点过了。

一般老百姓就没这个运气，有的甚至是在事后才得知。两个月后，省委又要求城镇居民每人每月节约 2 斤粮食，实际上又一次降低粮食标准。

来自农村的供应日趋枯竭，一场南泥湾式的生产自救运动在吃皇粮的人们中展开了。所有的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都建起猪圈养猪，这些猪真比农村的喂得好，因为是谁个喂谁个吃，不象农民只有喂、没有吃的分儿。一听到杀猪的声音，单位里顿时充满节日的气氛，人人奔走相告，激动万分。种菜运动也搞得热火朝天，口号是“低标准，瓜菜代”，所有的空地都种上了菜，连成都市公园里的一些花园也翻作了菜地。

成都市从郊区划出一部分菜地，供较大的工厂、学校、企业、机关作菜地，各单位组织起蔬菜生产队突击队，秋收后的一段时间每天投入种菜的人达六、七万人之多，选用品种以高产为标准，最为常见的是厚皮菜、莲花白、洋姜、萝卜等等。厚皮菜堪称大跃进时期川西坝子最有代表性的菜种，它不耗肥不择地，生长迅速，剥了一层又长一层，因此叫厚皮菜，填肚子效益高，味道欠佳，后来几乎人人吃得倒了味口。

为了吃，什么法子都想尽了。继“低标准、瓜菜代”之后，中央到地方又有“大搞代食品”的指令。什么叫代食品呢？1960 年 10 月 6 日郫县县人委关于在全县开展大搞粮食代食品运动的指示说：

玉麦杆、壳、心，高粱杆、壳，谷糠等不少粮食作物杆、壳，只需要加工制造，是一种很好的代食品。而且原料丰富，加工方法简单，因此，在全县范围内开展群众性的大搞粮食代食品运动，乃当务之急。

通知要求，上述可以做代食品的原料，今后一律不准当柴烧，若烧掉或造成霉烂，要“追究责任”。粮食局、商业局等有关部门组成了“代食品办公室”，召开现场会，推广代食品加工制作方法，要求全县每人每天吃 4 两，每头猪吃半斤。（见郫县县人委：《关于在全县范围内立即开展群众性大搞粮食代食品运动的指示》，1960 年 10 月 16 日。）

简单地说，就是让人吃牲口吃甚至牲口也不吃的东西。从农村到城市，人人尝过代食品的滋味，至于是否“很好”，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恐怕终生难忘。它的最大特点是吃进去难，拉出来更难，得用手指头一点点往外抠，也有拉不出来活活憋死的。

乡下人吃着的那份苦，城里人也尝到了，乡下流行的那些病，也开始在城市漫延。肿病、妇女闭经、子宫脱垂比比皆是，小孩闹脱肛的很多。干部闹得最多的是肝肿大、肝炎、肝硬化，死起来很快，弄得人人紧张，一躺到床上就做深呼吸摸右肋下，有人居然成了专家。倒不是这种病专找他们，而是他们有诊断条件。肝病流行也是营养不良引起的，农村人也得，但往往死了也没弄清怎么回事。下放在乡下的干部多尝一份缺油吃的苦头，天一黑几乎就成了瞎子，晚上开会(那时下放干部都

是白天干活，晚上开会到深夜)在田埂沟边摔得一踏糊涂。后来中央认为干部应属保护之列。1960 年 7 月，国务院决定给在京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少量副食品补助，四川不久也依照办理，成都地区 1 3 级以上的高干，每月红色供应票，17 级以上县团级干部绿色供应票。每月供应不等的烟、酒、糖、点心等。这项特供制度在高级干部中一直持续到 70 年代末。省级机关县级以上干部轮流到成都草堂寺附近的干部疗养院疗养，实际就是多吃几斤米，几两肉。

农业以粮为纲，粮食副食品紧缺；工业以钢为钢，造成一切日用品紧缺。布票大人每年一丈五尺，小人一丈二尺，说起来够做一套衣服，实际上不可能。因为凡是沾棉的东西诸如铺盖、蚊帐、被单、枕头、内衣内裤乃至袜子、棉鞋等等无一不要布票。呢绒制品一般人不敢问津，化纤还没听说，尼龙袜子为稀罕之物。肥皂、牙膏牙刷、针头线脑，照明用的煤油、蜡烛、灯泡，铁锅、铝锅、碗、盆、热水瓶、笔黑纸张等等日杂用品无一不缺。纸张的缺乏尤为突出，擦屁股的草纸、妇女用的月经纸几乎断档。

纸厂因为缺乏烧碱，所有的印刷纸张都是又黑又厚，粗造无比。省委的喉舌四川日报象那个年代的擦屁股纸，学生的课本黑得看不清课文，小学生用铅笔做作业，费尽了老师的眼神。温江专区地、县两级印发的文件材料，如今复印下来都是黑糊糊一片。1960 年暑假都快完了，新学年给学生印课本的纸张还没有着落。温江专区 8 月底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单位突击回收废纸，以解“赶印秋季教科书课本等急需”。各级领导亲自带头，搜集废纸，书店里滞销的书刊清扫一空，学校和学生保存的旧教材、书籍课本清理上交。此外还大力回收废铜烂铁、胶鞋底、牙膏皮、烂布碎片等等。

41、农民万岁

城里人清苦如此，比起乡下人还算幸福多了，他们至少保证了最低限度的粮食供应，不致于饿死。而此时的农民，已经从绝望走向公开发泄愤怒，各种各样的牢骚话开始在乡间流传。广汉县新丰公社有人说：“社会主义好，饭都吃不饱”，“人民公社不如劳改队”，“不管哪朝哪代都不象这样饿着肚子教育人，解放前粮食紧张一

点，都有人割口袋，打仓库，现在饿死这么多人，都没人叫割口袋、打仓库”，“国民党税多，饭吃得饱，共产党会多，没得饭吃。”温江县黄水公社三道桥 49 岁的妇女赵义华在食堂吃饭时突然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两眼发直，遍地打滚，口称“共产党毛老二腊月初十垮台，蒋介石要回来，萝卜本来是菜，共产党把它当粮食，吃了光屙尿 ，我现在踩到饿坛神了，赶快修庙安坛……”管区主任陈茂根赶快调来木匠，先在自己家建土地庙一座，安神禳灾，又从双流请来端公二人，到赵义华家中安坛显神，管区干部齐集，请端公“过灾免难”。一时间，神灵附体的“疯子”赵义华声名不径而走，远近前来求神化水者终日不绝……。(见温江专署政治党组:《关于广汉新丰公社敌人活动情况报告》1960 年 5 月 8 日、5 中共温江县委监察委员会:《关于黄水公社一管区党员干部参加闹神修庙的情况报告》1 960 年 10 月 30 日。)

1960 年冬季到来时候，大规模死亡的阴影再次降临在川西坝子上空。这时候，温江专区又出了一位敢于拿性命作抵押为农民请命、犯颜直谏的勇士——王万澄。

这位勇士看上去毫无武夫之勇，身材清瘦，架一副近视眼镜，温文尔雅，象乡村里怀才不遇又胆小怕事的小学教师。其实他胆子大得出奇。他父亲在大邑县安仁乡有一间草药铺，他曾在刘文彩办的安仁中学读高中。安仁中学的中共地下组织十分活跃，校长吴德让是 30 年代初期的老地下党。王万澄在学校参加共产党组织的宣传活动，当局要抓他，他就上山打游击去了。

1949 年刘邓大军逼近川西时，蒋介石忙着在成都布署川西复兴基地，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委任大大小小的救国军司令。王万澄揣着袍哥舵把子的名片，只身一人，到大邑 4 个乡下通知书 。通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快入川了，各乡务须看管好抢技弹药、粮食和一切建筑，维持好地方秩序，作好准备，迎接解放。龙凤乡乡长展信一阅，抬头一看转身欲走的王万澄，厉声呵道:“莫走！念来我们听听。”王接过信大声读完，扔下一句“识时务者为俊杰!”昂首而去，把一帮乡长乡丁镇在那里。这时他才 19 岁。

解放后他在温江地委党校工作，1957 年被定为“内定”右派，罪行为：一、卖废纸时卖掉了几本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二、认为不一定非要无产阶级才能写出伟大的著作，比如巴尔扎克。当右派后下放老家安仁乡劳动改造。画跃进壁画时，乡亲们请这位秀才画，他在大队油碾房的墙壁上画了这样一幅：当空一面迎风招展的大红旗，红旗上书“一切为了亩产万斤”，红旗下一队社员荷锄扛犁挑粪拉牛吹号奔向田间。政治头脑敏锐的干部发现，画中吹号人的号口恰恰对着牛屁股，那牛又象充了气似的滚瓜溜园，岂不是挖苦万斤田是吹牛皮么！抓出来就是一阵猛斗，新帐老帐一起算。

为了不让他在农村放毒，又将他送回党校劳动，使他目睹家乡人民的生活真情，

他的妻子和女儿都在家乡农村。1960 年 11 日，他再次回到家里，他要做一件事，这是经过反复思考作出的人生的一项重大大决定，他已经“账多不愁”，干脆做一笔大账，让历史去清算。

他告诉疾病缠身的妻子高玉屏，他要给毛主席写一封信，“我要求毛主席直接答复我，这是党的规矩许可的，作为一个人民的儿子，我的心是善良的，我的心地是坦白的，我的行为是光明正大的。”

冬夜的凄风苦雨之中，大邑安仁一间普通农舍灯光整整亮了一夜，当最后一滴煤油燃尽时，天亮了，王万澄放下笔，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有一种死而无憾的快意。

主席：你好！当我坐在桌旁向你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心中非常沉闷、抑郁、苦痛。……

主席：这是一篇用血和泪写成的字句，不知你能否收到？主席，如收到请仔细阅读。……

我回到故乡，首先见到的就是粮食问题，我家所在食堂粮食标准（旧秤十六进位）：

一级——成年人，每人每天 13 两(包括犁田、担谷、担粪等农村主劳力)

二、三级——成年人，每人每天 11 两(乙级劳力)

四、五级——成年人，每人每天 9 两(半劳力)

附带劳力——老年人，每人每天 7 两

五、六岁小孩——每人每天 5 两

一岁小孩——每人每天 2 两

每人每天平均半斤粮。我走过很多地方，粮食定量大同小异。

由于农民肚皮未吃饱，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人一天天消瘦。他们的面容变黄了，走起路来东倒西歪，好多人手中拿了一根棍子才能走路。特别是老年人、小人，就更恼火了，普遍足也肿了，一直发展到全身肿，全身肿后，人就死了。党也曾设想了很多办法来挽救，组织医生下乡治疗，但是，党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即未从粮食上解决问题。

我知道有一个管区一下就死了 1 百多人。有的全家 9 口一齐死完，其中有好几个还是精强力壮的。我曾经亲自住在一个公社社员家中，他家中只有 3 个人，3 个人都皮泡脸肿，食堂配的粮食不够一顿吃。我走后，听说他们 3 姊妹都住到管理区医院中了。

农民未吃饱，生产不好，有很多管区连公粮、统购还未上清。秧子栽来越密越好，连薅都未薅过；有的麦子点下去，也未薅过就收麦子。肥料很少，生产一年不如一年，猪只减少。我住的那个管区。建社时猪是 160 只，现在只有 8 只了。鸡、鸭、鹅少了十之七八。……

这样下去，农民是吃不消的。由于营养缺乏，不知有多少善良而勤劳的农民付

出了无辜的生命！主席，你救救他们吧！……

严重缺乏粮食所引起的病，有好多医生当着某些人就说成是一种什么病菌，什么传染病所致。但离开那些人后就谈了知心话。我曾在一个公社医院听见几个主治此病的医生说过："什么足肿病？为什么病这样多？主要是肚皮未装饱。这些话不好说，一说就给你戴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帽子。"……

现在，这种欺上压下的干部在我们祖国大地上真是太可怕了，我亲眼看见了许多。他们明明看见农民停火，没有粮食吃，他们还高高在上的向农民讲"艰苦奋斗，跃进再跃进"，"增加生产、苦战三年"，他们明明看见农民有病，快饿死了，还睁着眼睛叫农民"打夜战，积极干"。……

主席，人民的救星，希你组织起检查团来看看饿死了多少农民，把官僚主义者、阳奉阴违、好大喜功的犯罪分子从人民领导岗位上撤职下来。

主席：你在工业上，在人民事业上是有很大功绩的。但农民一年到头干，到头来连一顿饱饭也吃不上，你到底知不知道这些情况呢？难道你被一群官僚主义者所包围，所蒙蔽了吗？

主席：你应该立即从会议中、从汽车中、从办公室中、从书斋中、从美味的食品[？]

主席：我很激动，我看见农民因粮食吃不饱而慢慢死去，我很痛心。你是否又在走中解放出来。你独自一人悄悄到我们温江专区来调查一下，直接到食堂中，农民的家中来了解一下。你应学习一下包公的精神来到民间。主席：当人民正需要你下来的时候，你赶快放弃你的什么从事理论研究，到民间来吧！趁现在你在人民中还未失掉威信的时候，到民间来吧！

我们的祖国，建设来为了什么？到底是为人民还是为了什么？建设是为了让广大农民生活得愉快，不是要夺去农民口中粮，把农民引向慢慢饿死的道路上去。

主席：我们现在的国家，建设起来是疯狂，是失掉了理智的在搞建设，可是，农民正在被疯狂建设拖到饥饿，死亡的道路上去。53 年匈牙利不顾人民生活需要而片面主观去无限发展重工业，因而大大影响了农民生活水平，最后（他们）又立即纠正了国家建设上路线之错误，这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的党所抱的态度。波兰也曾在 54 年在农业化上犯了冒进之错误，人家也立即纠正了。主席，你为啥在农村中犯下了如此残酷的行为——饿死了（人），你还在越来越把农民引上死亡的道路呢？

敬爱的主席：我是看见、听见这些现象，如实给你反映上来的。作为一个人民生活的热烈关心者，我不得不站出来把农民这些事实反映给你。在这些事实面前，我对党非常失望，如果这种饿死人的情形再得不到纠正，我只有要求退党，退出这使农民饿死的党。

主席：希望你赶快发出其他的指示。

最后，我高呼伟大的，世界上最伟大的劳动者农民万岁！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 11 月 18 日收到这封信，不久即转四川省委。四川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秦传厚亲自办理。他仔细读过信后，给省委几位主要领导及温江地委宋文彬写了一封便函，附原信一同送上，便函说：

这封信是写给毛主席的，看来是一封不满的信件。信中所说的究竟是真是假或半真半假，是什么人写的，都应认真调查，实事求是地把问题弄清楚。从始到终应由地委掌握。不能把这件事放到县上，更不能放到区上、社上去办。检查的情况如何，请报省委。对写信人的处理应谨慎，不能草率从事，最后查清属于什么性质，处理时建议由地委写出专题报告，报省委批准。

1961 年 1 月，温江地委按此精神由公安处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认为信中反映的问题属实，不是反革命问题，谈不上对写信人进行处理，于是将有关材料存档，不再追究。直到文化大革命东窗事发，王万澄平安无事。

相信读者在读王万澄的信时，已经为他捏了一把汗，未料到如此结局吧？对于一封矛头直指毛泽东，对党的大跃进提出如此尖锐批评意见的信，从省领导到地委竟作如此处理，这是怎么了？

原因是就在这时，国家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逆转。

第五章 迟到的春天

42、经是好的，叫和尚念歪了

毛泽东是否看到王万澄的信不得而知，但他并非象王万澄以为的不了解情况。时至 1960 年底，他不但了解，而且远比王万澄了解得多。

从 1960 年的夏天起，庐山会议的灾难性后果和大规模饥荒的情况开始反映到中央，毛泽东情绪低落，身边的工作人员发现他经常长时间地呆坐在那里，凝视不动。他的“美味食品”无非是红烧肉和辣椒，这一年连红烧肉都不吃了，他自己给自己规定不吃肉。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女儿回家吃不够，他就把自己的一份也给她吃。他确实在搞理论研究，他在《十年总结》中写道，对于国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不少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还不足，在我们面前，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他承认这几年党犯了错误，他本人也有许多错误。他以中央的名义公开作自我批评，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见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转发的重要批示 》(1960 年 11 年 28 日)。）

路已经走到尽头，国家经济陷于崩溃，家底掏空，人民在饥饿中垂死挣扎，四处逃亡。几乎所有的领导者都心知肚明，再不悬崖勒马意味着什么。

1960 年 11 月初，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紧急指示)，于 11 月 3 日下发全党全国。指示共 12 条，核心精神是重申 1958 年底以来中央关于纠左的一系列指示，纠正 1959 年底反右倾运动开始后卷土重来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生产风、特殊化作风、强迫命令风(简称“五风”)。具体政策上有以下几点重要改变。一、强化基本核算单位生产大队的自主权，和生产小队的部分自主权。二、把收回的自留地重新分给社员，允许社员经营小规模家庭副业。三、恢复农村集市，除粮食、棉花、油料外，其它农副产品在完成规定的交售任务外，可以拿到集市交易。四、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减少供给部分。

中央通知要求，要把这封信原原本本的读给全体党员和干部听，读给农民群众

和全体职工听，反复解释，做到家喻户晓，把政策交给群众，发动群众监督党员干部认真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

物极必反，为贯彻紧急指示开展的整风整社运动，声势浩大，干部和群众积极蓄已久的愤怒与仇恨象火山一样爆发。突然之间似乎一切都翻过来了。

一开初，农民并没有反映过来，几年来，他们什么时候少了学文件、开会，搞运动？他们上的当也太多了，1957 年的鸣放，1958 的辩论，1959 年的万人大会和反右倾时动员提意见，哪次不是“编起筐筐让人往里头钻”？1959 年就在喊反共产风、反瞎指挥，结果越“共”越凶，乱干得越厉害。

地委工作组到温江柑梓公社传达紧急指示，好不容易把人叫齐，上面干部在激动万分，“原原本本”的念，下面男人打瞌睡，妇女纳鞋底、做针线活，娃儿喳喳闹闹。干部急了：“社员同志们，你们好生听，上面政策变了，拿你们的东西都要赔了，要分自留地了，可以赶场做买卖了，欺负你们的干部脱不倒手了！……”人们的头一齐抬了起来，眼睛鼓得溜圆。干部边念边解释。完了，老太婆胡苏氏跑到读文件的干部身边，指着文件说：“你把这本书收好，这回毛主席说了，我的垫子钱拿得到了。”有的干部听了传达，回去把办公室门一锁，不干了。

按照中央整风整社的要求，温江地委崇庆三江公社、温江清平公社、郫县红光公社作整风整社试点。三江为一类社，清平为二类社，红光为三类社，即落后社。

啊，毛泽东等众多中央领导、国际友人视查过的红光公社，李井泉精心耕种的自留地，名扬全国的人民公社幸福乐园啊，怎么一夜之间就从超先进变为落后社！

在省、地、县了解底细的干部眼中，它早就是三类社，一块没有破皮的大脓胞，一具戴着美女假面的僵尸。然而它又是一块布满地雷的禁区，禁区的中央是座落在公社附近的金牛坝招待所，招待所里坐着人见人怕的李政委。几年来，上上下下有多少干部在这片禁区给炸翻在地啊。他们不是瞎子，不是蠢货，不是没有良心和正义感，他们是给炸怕了。在一个只有权威没有监督，领导意志主宰一切的生存环境下，除非大的政治气候改变，他们能做什么呢？

然而和以往没有区别的是，所有的罪过仍然由“阶级敌人”和下面的干部承担。导演这一切的人安然无事，只是换了一副面孔。

红光公计的整风整社，以县委多年直接插手、公社书记郑凤兰直接负责的合兴分社为重点，合兴分社又以毛泽东视查过的老红光社，即红光管区为重点，紧急指示下达后一星期，省、地、县工作组直奔这里，接连召开干部会和社会员大会，逐字传达，反复宣讲。仿佛一瓢冷水泼进滚烫的油锅，社员们沸腾起来了。

先是清理几年来被共产党风刮走的社员个人财物，逐一登记，如房屋、农具、家什、钱、信用卷、竹子、家禽家畜、蜂、“见缝插针”的菜等等。汇总而成的“红光人民公社合兴分社刮共产风统计表”看上去令人眼花缭乱，这个当时 2400 多户，

8 千多人的分社，拆毁房屋 2768 间；其中 2 千多人的红光管区，竟拆毁房屋 1547 间。收社员的农具包括伴桶、箩筐、粪桶、犁头、连盖、晒席、鸡公车、猪圈、烟折子、锯子……，家什包括箱柜、桌椅、捅、饭甑子、锅、称、鸡笼、门板、碗盘……，仅锅就收了 1200 多个，真是无一不刮，无一不收，社员彻底倾家荡产。

按规定，共产的东西统统退赔，社员喜笑颜开，说如果不按中央的办，“再过几年恐怕连箍捅的篾条都没得了。”有的说，过去房子烂了都不想补，就怕上面规划拆房子，这下子放心了，烂一个洞就要补一个疤。干部则焦头烂额，公积金没有了，哪来钱退？东西都不在了，哪里去找？“以往那些糊涂帐，拴住太阳都说不清楚，干脆一刀两断，旧帐不算，以后不犯。”这倒是真话。

按照上面的精神，工作组把整社称之为“第二次土改”。运动声势浩大，在工作组的反复宣传动员下，农民终于发觉，世道真的是翻过来了，一个个声泪俱下倾倒一腔苦水，放假卫星、谎报征购、乱指挥生产、干部打人、多吃多占，收锅收自留地收“见缝插针”，反右倾整人、食堂停伙、饿死人……几年来昏天黑地的怪事丑事骇人听闻之事统统揭开。（见郫县县委工作组：《红光公社合兴分社整风整社工作第二阶段情况汇报》1961 年 1 月 29 日）

紧急指示下达后，全国各地一片爆发，大跃进以来基层的黑暗现实第一次大爆光，中央连续批转了山东、河南、甘肃、贵州等省某些地区的揭发出的材料，这些材料无一例外的把灾难的原因归结为下面的干部为非作歹和“阶级敌人”的蓄意破坏，连省一级都不敢触及，更别说追究中央的责任。1960 年 12 月 8 日，中央就山东、河南、甘肃、贵州 4 省某些地区发生的严重情况指示说：“这些地区的干部违法乱纪，不顾人民死活的情况，有些简直不能想象。其中某些反革命的破坏行为，显然是封建势力在地方上篡夺领导，实行绝望性的破坏性的报复。这是农村中阶级斗争的最激烈的表现。”（见《中共中央关于山东、河南、甘肃和贵州某些地区所发生的严重情况的指示》1960 年 12 月 8 日）河南信阳地区死亡惨重，正阳县一个冬春死亡 8 万多人，新蔡县一个冬春死亡近 10 万人。被称之为“信阳事件”。在追究原因时，有的干部公开提出，“信阳事件是我们党犯了错误”，遭到严历批判。毛泽东定下的调子是“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见《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1960 年 12 月 22 日。）

于是整风整社变成了“第二次土改”，“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程序几乎就是土改的翻板：扎根串连、访贫问苦、内查外调、揭发控诉、残酷斗争、重组队伍、夺权换班、撤职戴帽……。不过斗争的主要对象不是前地主恶霸，而是基层干部。在温江专区，这是大跃进以来基层干部第三次遭大难。第一次是 1959 年春天万人算帐大会查“瞒产私分”；第二次是 1959 年秋冬的反右倾；这是第三次。但这次和前两次

有很大不同，是在清算左的错误的背景下进行的，大批的干部已经在前两次被清洗。在职的干部中，确有少数品质作风恶劣，为群众愤恨，只要有人引导，群众是很乐意把火往他们身上烧的。他们很容易接受这种观念：共产党、毛主席永远英明伟大，坏就坏在这帮期负他们的干部身上，用他们的话说："经是好的，叫和尚念歪了"。挨斗的干部只有苦水往肚子里吞：他们敢不照着"经"念么？可他们又怎敢说经是歪的呢？

经念歪了的和尚们揪斗的揪斗，关押的关押，逮捕的逮捕，判刑劳改者多多。单是合兴分社，工作组上报"不捕不足以平民愤"的干部就有 15 名，其中有 4 名县上派去的驻社干部。斗争场面异常激烈，社员们真的象土改时诉苦一样，痛诉大跃进以来的种种惨祸，说到伤心之处台上台下一片呜咽，"歪嘴和尚"们就免不了挨打了。

几年来叱咤风云，主持斗争过无数人的郑凤兰被揪上了台。

工作组要斗郑凤兰，这个事实令农民难以置信，头一天干部动员了半天，只有一两个人嗫嗫嚅嚅说了几句，红光管区反右倾中靠边的穆青云悄悄对工作组说："今天揭发了郑县长，该不得遭哟？"工作组坚决给群众撑腰，第二天大会，首先揭开郑凤兰"土改时包庇富农、反革命、重用坏人，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地主阶级对待人民的丑恶面貌"，一下子点燃大火。穆青云说："把我这腔热血洒了也要提你郑凤兰的意见，我们这里死这么多人，就是你郑凤兰整的！"

郑凤兰一斗，社员们再没什么怕的了，咬牙切齿的说，这次要"粗筛子筛了，细筛子筛"，"一层一层的理，连个带把把的都不要留，留下还要生儿子，不晓得还要死好多人"，"过去我们以为党的政策变了，现在才知道是这一帮人干的坏事！"

党的政策就是变了，这一变，结束了前绣花女短暂的辉煌，命运之神把她绑上大跃进和李政委的战车，如今这辆战车已经弹尽油绝，百孔千疮，成了一堆废铁，注定会有一些人为之殉葬，她是无法逃避的一个。温江地委组织部 1961 年 3 月审查结论，郑凤兰为"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已分子"。

（她）在工作中重用坏人，打击好干部，虚报浮夸，弄虚作假。恶劣的是 58 年征购还差 1800 万斤，即造假帐骗取国家征购款 80 余万元。由于工作落后，食堂停火，郑既不反映，亦不解决，并向县报还有 1800 万斤口粮，致其直接负责的合兴分社 30%的食堂停伙 3 月之久，死亡 2400 余人。又封锁消息，私下布置不准干部反映，为嫁祸于人，丢尸灭迹，竟叫把死人丢在邻近的成都郊区和崇兴公社（见温江地委组织部：《关于审查了解郫县红光公社领导干部的情况报告(初稿)》，1961 年 3 月 9 日）。

显然她不可能为这一切承担主要责任，但这就是当时清算的调子。事实上，整风整社工作组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地委工作组委婉地指出，在这样严重的事件中，县委是应当负一定责任的，共产风、浮夸风和形式主义等并非完全来自下面，有些是直接来自县委的，对红光管区的工作则"负有直接的责任"。那么县委的又来自何

处呢？那不是报纸文件上明写着的吗。

最冤枉的恐怕莫过于“阶级敌人”了，他们是“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的贱类，既无实权又无发言权，居然也要为这一切承担责任。按地、县工作组描述，整个红光管区已经成了阶级敌人复辟的天下，他们和干部沆瀣一气，篡夺领导权、蓄意破坏生产、破坏公共食堂，是管区落后的根子。红光管区 5 队第一任事务长是中统特务，“第一天就贪污了 200 斤大米”；伪军连长兰炳高放鸭子放死一半；“台湾家属”马仲年偷谷种千多斤……。

7 队一个院子 27 户人，就有镇压家属 5 户，反革命 3 户，地主 2 户，贯偷 6 户，前土匪 1 户，四类分子 1 人，由于坏人集中，该院子完全为反属、反革命分子所控制，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盗窃、破坏生产。7 队落后的根子也就出现在这里。

所谓“惯偷”无非是饿慌了偷吃了庄稼，“前土匪”过去肯定是穷人，如今也成了阶级敌人。凡是成分不好的，一一拉上台斗，然后组成特别劳动队，早出晚归，监督劳动。

贯彻紧急指示和整风整社，标志着农村大跃进的结束。尽管它本身存在缺陷，一些重大问题如食堂、体制等尚未触及，但是 1958 年以来的种种胡作非为已不可重演。没有这次的揭露，大跃进的许多黑幕恐怕会永远沉没于历史的深海。在大批干部受到无辜打击的同时，一些人也受到了理所应当的惩罚，一批正派的干部重新上台。在红光管区，靠边站的周桂林、穆青云官复原职。姑娘焦桂芬在外盲流的哥哥从外面回来，她告诉他政府的新政策，哥哥听后说：“这下农村有板眼了！我再不东想西想想走了。”

43、“失控”下的复苏

从稀开的门缝中投射出一缕阳光，使人们万念俱灰的心活泛起来。他们有些什么“板眼”呢？自留地又分下来，活路做得多的可以多吃。猪以公有公养为主变成了“以私养为主”，卖了肥猪，政府允许返还少部分猪肉，不再是白养一场。养鸡鸭鹅兔不用担心被干部捉去，完成收购任务后还可以拿到市场上卖。生产小队实行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有奖的“三包一奖”制度，包工范围以外的生产的东西归小队。

说得闹热吃得造孽的赔退毕竟在搞，大邑王泗公社 4 管区 1 队 15 户农民拿到赔

退款 31 元，每户进款 2 元，农民李恒山院中的两棵大柏树共了产，退赔折价 12 元，实收 8 角，被推走的鸡公车不予赔退。“贪污盗窃”的干部赔个精光，还欠下一笔二辈子还不清的烂帐，满腹冤屈地说：当干部有什么好下场？哪个不是“巴巴掌上台，棍棍棒棒下台，”还不如回去把自留地种好，鸡鸭鹅兔喂巴式。大路小路田坎地头那些手提尺子绳子指手划脚凶神恶煞的官们没了踪影，三天两头的动员会誓师会斗争会不开了，农民几年来第一次呼吸到一丝自由的空气，有了一点可以支配自己身体的机会和自主经营的空间。

1961 年到来的时候，各级领导对农村劳动力问题深感忧虑。这几年，劳动力紧缺的问题无时不困绕着他们。1960 年下半年省委要求抽调劳力“全力保钢”，郫县拼凑了一支 137 人的队伍上山挖煤，其中女人 80 个，大的四五十岁，40 多个带着娃娃上山，温江上山炼铁的劳动力妇女占 70%，气得宋文彬大骂：“你们把这些人弄到煤矿去做什么？你们忍心叫这些人下井吗？”他说这是本位主义，下面呻唤说实在无法。整风整社后，惊人的死亡数字和劳动力锐减的情况彻底暴露。郫县报告说，全县劳动力比 1958 年减少近 20%，其中有 7 个公社减少近 30%。友爱公社一管理区 1958 年上半年有 855 个劳动力，现有 500 人。永定公社一管理区劳动力减少 60%。1958 年每个标准劳动力负担 3.9 亩土地，现负担 13 亩土地。（见中共郫县县委：《郫县五级干部会议关于劳动力问题的讨论》1961 年 3 月。）上上下下一算劳力账，深为 1961 年的生产忧虑。中央强调让群众休养生息，男社员每月放假 4 天，女社员放假 6 天。1960 年已有大片土地荒芜，现在劳动力更少，休息时间增加，大批基层干部又躺倒不干，如何是好？

在麻起胆子开始搞小包工——包产到组或包产到户的地方，实际发生的情况大出官们的预料，1961 年春耕生产居然是“又多、又快、又好”，不仅没有谁叫劳动力不够，反而出现“活路不够做”的事！在生产最落后，闹肿病最厉害的金堂县，出现队与队争土地，社员因争工分而不愿让脱产干部一起干活等新情况。农村有搞头了，基本建设下马后的劳动力返乡了，流亡在外的人回家了。过去吃大锅饭，生产队唯恐种多了吃亏，任凭土地荒芜，现在落实“三包一奖”，唯恐种少了吃亏，队与队争土争得打架。金堂三星公社五爱大队 12 生产队过去丢荒几十亩土地，大队把这些地划给别队种，现在他们坚决要求收回，两个生产几乎动武，经公社调解后划归原队方得平息。社员评工记分，多劳多得，出工人数大大超过评级(正式评定的劳动力)人数，每日早出晚归，回家搞自留地搞到天黑，工效大大提高。一些五保户也不甘心靠劳保过活，自愿投入生产。社员主动要求队上安排活路，增加副业生产，生产队就组织社员开荒，社员自己也到处开荒。这一下可苦了下放干部，他们突然间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多一个得多分一粮呀。赵渡区委的一个干部扛着锄头一连跑了三个地方都被干活的社员赶走，垂头丧气的打报告请求回区上工作。

在毛泽东视察过的红光大队（60 条下达后，管理区一律统称生产大队）支书周桂林一声号召，全大队两千多男女老少，一起到成都推粪，白天晚上公路上川流不

息，“真的把田铺了一层”，放荒的土地也长出了绿油的秧苗。社员说，好多年没见过这么好的庄稼了！

去年金堂县种早包谷强制推行“定向密植”，社员怨声载道，消极怠工，早包谷拖成中包谷，中包谷拖成晚包谷”；红苕推广“火笼育苗”，把苕种烤烂完，该 4 月份下种的 7 月份还没栽完；棉花搞育苗移栽，移栽失败，又改直播……干部几乎天天开电话会，天天东奔西跑强制推行技术规格，干部越忙，社员越懒，干部越管，生产越惨。今年只抓政策贯彻，杜绝瞎指挥，春耕生产又快又好，早包谷面积增加 2 倍，苕菜增加 25 倍，全部赶上播种季节。为劳动力问题忧心忡忡的县领导听到各方传来的生产喜讯，惊喜之余未免惆怅：这几年都瞎忙了些啥啊！

让机关干部的跷着二郎腿看报谈吃感慨万端的事还多着呢。集市贸易关闭后，农副产品供应紧张日甚一日，国营商店空空如也，有时凭票也买不到东西。鸡鸣狗吠的农家院舍变得一片死寂，商业部门的人提着称带着款逐家搜购，十室九空，跑断了腿都完不成收购任务。自由市场一恢复，鸡鸭鱼蛋，烟麻菜果就象变魔术似的冒了出来。住日路断人稀，清冷破败的乡场数月之后已是热闹非凡，上市品种从无到有，由少到多，过日子必需的多种服务行业迅速恢复。

崇庆三江乡是川西坝子历史悠久的水路码头，大跃进以前有各种店铺 2 百多家，逢场时聚集周围三县八乡数万人。大跃进市场关闭，乡场居民商户全部参加农业生产。年初市场一恢复，短短三四个月时间已成闹市：“买不到的东西，三江买得到，卖不脱的东西，三江卖得脱。”5 月的一个逢场天记者描述说，太阳刚刚露头，成群结队的农民肩挑背背从四面八方涌向三江。解放前湖南商人的会馆辟为禽畜市场。“鸡、鸭、鹅、兔在街沿两旁摆成了长蛇阵，看不胜看，数不胜数，仅上市的兔子就有两千多只”。社员宋良清二月份买了一对母兔，现在已下了 17 只小兔，卖掉小兔，换回了公社化后损毁的粪桶、粪档、提蓝，“高兴得不得 了”。

分了自留地，刹住共产风，劳动和个人利益联系紧密了，过去对劳动工具损毁麻木不仁的农民急急忙忙添置农具，购买小农具的人排成长龙，供销社上千把锄头一个上午卖光，售货员又到库房搬出 800 多把，“才勉强应付过去”。修理农具的铁匠铺炉通红，铁锤钉铛，最兴旺的生意是把“新式农具”改成旧式农具。还有一个多月才会宣布食堂下放，但农民已经算定了它的命运，开始为新生活作准备，补锅、补碗、修伞、补鞋、磨剪刀、菜刀、配钥匙的匠人忙得不亦乐乎。配弹子锁钥匙的老技工田志文应接不暇，一天就配了 60 多把锁，还接下一大堆做不赢的活。

这一年最挠动人心的自由市场，到年底发展到相当可视的地步。郫县 1961 年 10 月份与年初开放市场时比较，家禽家畜上市量增加 32 倍，蔬菜增加 74 倍，土产增加 1 倍。郫县城关逢场时进城卖东西的农民成千上万，大街小巷水泄不通，让那些几年来为建设共产主义天堂累得半死，却搞得民不聊生的干部大惑不解。

然而这条资本主义的尾巴一旦肥大起来，就大有扫荡一切阻碍它挥动的清规戒律之势。中央恢复集市贸易的政府明文规定：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副产品只

能卖给国家，不许上市；只许卖自己生产的商品，不许转手倒卖，从中赚钱；集市买卖的价格，应和国营商店的牌价大体相同。市场价值规律不理会这一切，首先是物价无法控制。

三年大跃进，国家赤字累累，1957 年货币投放量 57 亿元，1961 年高达 125 亿元，一方面多发票子数十亿，一方面国家掌握的商品急剧减少。1960 年国家零售商品的货源只有社会购买力的十分之一。国家牌价是不高，可惜没货，人们手中有钱用不出去，自由市场一开放，票子就象洪水似的泄出来，物价节节暴涨。郫县 1961 年 9 月的自由市场物价与 1957 年同期比较，菜蔬上涨 8 倍，烧柴上涨 7 倍，禽蛋上涨 8 倍。市场物价和国家牌价一般相差 8 倍。而国家明令禁止上市的粮食和凭票证供应的物资，高出公价 10 倍、20 倍甚至 60 倍。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日用品因为缺货，自由市场上出售的旧品，较新货牌价高出若干倍。请看 1961 年 10 月郫县物价局的部分统计：（见郫县物价委员会：《关于进一步稳定市场价格，活跃农村集市贸易的意见》1961 年 11 月）

品种	国家牌价	市场价
鸡(斤)	0.90-1.00 元	7.50-9.00 元
鹅(斤)	0.80 元	8.00-9.00 元
小鹅(对)	2.00 元	40.00 元
鸡蛋(10 个)	0.96 元	7.00 元
鸭蛋(10 个)	1.20 元	10.00 元
鹅蛋(10)	2.50 元	15.00 元
南瓜(斤)	0.04 元	0.40 元
茄子(斤)	0.08 元	0.50 元
青海椒(斤)	0.20 元	1.60 元
大米(斤)	0.086 元	3.00 元
小麦(斤)	0.076 元	2.00 元
豌豆(斤)	0.095 元	6.00 元
胡豆(斤)	0.10 元	4.50 元
红苕(斤)	0.023 元	0.60 元
菜油(斤)	0.62 元	5.50 元
土烟(斤)	0.38-0.44 元	7.00 元
黄金叶纸烟(包)	0.19 元	0.90 元
芙蓉牌纸烟(包)	0.20 元	1.80 元
铁钣锅(个)	2.60-3.50 元	24.00 元
单裤(条)	3.20 元-7.00 元	17.00 元
单衣(件)	3.50-8.00 元	18.00 元
棉絮(床)	7.00-9.00 元	32.00 元
毛巾(张)	0.80-1.00 元	2.50 元(旧货)

事实上的价格差比这项官方统计还大。这年新都县一个鸡蛋买 4 元；青海椒论

个，每个 5 分钱(小青椒，每斤超过 100 个)；红苕 1 斤 2 元，……惊人的价格差使市场管理失控，统购统销以来就严禁上市的粮食上市了，土烟、大麻、麻籽、苕种等国家收购物资上市了，各种计划供应的票证也成了流通倒卖的商品。马克思所说为了超额利润不惜上绞架的资本开始挺而走险，销声匿迹的商贩，无以为生的城镇居民纷纷做起了生意，尽管他们的买卖被称为“黑市”、“投机倒把”而屡遭打击也在所不惜。

这门营生太诱人了，弃农经商者有之，弃工经商者有之，吃皇粮的单位干部职工人心浮动，有人不辞而别，“下海”经商。郫县唐昌镇木器厂 30 多名职工走了 20 多个，市场管理委员会的干部也参与“投机倒把”活动。饮食服务行业如雨后春笋，国营餐馆不顾规定卖起了高价，素菜包子市管会规定 5 分一个，他们卖则 1 角到两角，二两粮一个的最多有 1 两 5，节余的粮食便私分了。

小说《芙蓉镇》中胡玉英式的个体饮食摊贩纷纷开张，推出多年未见的名优小吃，他们在市场上买高价原料，做出的食品价格惊人，但服务周到，味道鲜美，生意兴隆。有办法的和国家粮油部门内外勾结，低价买进粮油。于是至今人们还很熟悉的“双轨制”的种种弊端便出现了。郫县安德粮站绰号田巫教、刘蛮子的粮站干部“成天在饮食行业打进打出，提劲打把”，他们在永兴场饮食店吃了 3 斤牛肉没过瘾，扬言要盘该店的存货，经理赶紧割了 3 斤肉让他们提走，第二天又送白糖包子 35 个谢罪，方才免了这场风波。有什么法呢，饮食店的米、面、油都要通过他们买啊。

大大小小的国营单位也以“协作”为名干起“投机倒把”的营生，供销社以超出规定的价格大肆收购，高价卖给“协作”单位。有的供销社在马路上设卡，“不择手段大肆收购”，运到成都卖高价。人民币贬值，以物易物盛行，烟厂用纸烟换烟叶及掺和在烟中的梧桐树叶；铁器社用菜刀、锄头换大米、鸡蛋。还有凭票供应的东西国家商店里买不到，市场上却到处摆着等等。

真正吃大亏是靠工资吃饭的人。那时的工资水平，地师级“高干”每月 1 百多元，县团级八九十元，一般干部三四十元，工人、职员、中小学教师少者二三十元，最高不过七八十元，一个县级干部的月薪大约能买一只鹅，或两只鸡或百把个蛋。为回收滥发的货币，政府推出“高级点心”，不收粮票收高价，桃酥每只 1 元，酥皮点心每只 3 元，月饼每只 3-5 元，二两一只的蛋糕 3 元。在成都烤红苕每斤 1 元，鸡蛋每只 1 元，一只大鹅可换一辆新自行车，一家人到西餐厅吃一顿蛋糕，一两月的工资就没了。再贵人们还要是买，他们实在饿极了，有好几年没吃到这些东西了，能够一饱口福，为人间第一快事，他们多年的积蓄，就这样被“回笼”了。

44、且战且退

1961 年的川西坝子，犹如经历了一场血腥战乱的战场，枪炮声已经沉寂，硝烟尚未散尽。饥饿的人们慢慢从地上撑起，迎着一线希望的曙开始为活着而奔忙了。

以无以伦比的雄心大志在四川组织实施这场战役的李井泉，已经无法再组织一次自杀式的集团冲锋了，他甚至不得不放弃他的核心阵地之一的郫县。他毕竟只是一员战将，不是主帅。如今的任务是退却和防守，防守住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最后阵地。在这场且战且退的防御战中，他是打得最顽强的一个。

首先是防守人民公社的心脏——公共食堂。

整风整社以后，全国的公共食堂要么公开散伙，要么名存实亡。虽然中央紧急指示明确规定："公共食堂必须办好"，但各地领导似乎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连年的饥荒，整风整社后的局势，无论客观条件和干部群众的情绪，都不允许这个怪物继续存在下去，解散食堂的呼声上上下下响成一片。

整风整社中暴露出的黑暗现实，使毛泽东深感震惊，他觉得受了蒙骗，怒斥"死官僚主义分子"对实际情况不甚了了，满足于看文件、听报告，不做亲身的实际调查。他拿出他 1930 年写的一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内容是反左倾教条主义的，散发各省领导，要求各级第一书记亲自到基层调查。2 月下旬，他在广州主持起草人民公社条例，下发全国农村党支部和全体社员讨论，并给全党发出一封信，要求通过讨论明确公社各级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有一个统一的、全面的、正确的理解。（见《中共中央关于讨论人民公社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1961 年 3 月 22 日）。）

他承认：庐山会议的估计不灵，当时认为一年之内形势可以好转，……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共产风比 1958 年还刮得厉害。又说，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左的，由 3 月到 6 月只反了 3 个月。如果继续反下去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中间插了一手。反右是正确的，但带来了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个教训值得我们吸取。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反左打断了。在 1961 年 2—3 月举行的广州会议期间，他甚至明确地说：农村问题，1959 年即已发生，庐山会议反右，使问题加重，1960 年更严重。饿死人，到 1960 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

但食堂这个核心阵地，他的本意是不愿退守的，在他主持起草的人民公社条例草案中，仍旧规定"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应该积极办好公共食堂"，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一结束，中央主要领导和各省头头都领命下基层调查，刘少奇、周恩来、

朱德、邓小平、彭真调查后一致报告，食堂无优越性，早早宣布解散为妙。朱德到四川调查后报告毛泽东，四川的食堂“对人力物力浪费不少”，而四川省委“对食堂问题远没有深入地了解”。

这就等于奏了李井泉一本，但一点没冤枉他，他还死死抱住他的“心脏说”不放：心脏都挖了，公社不就成了一具僵尸了吗？不过毛泽东倒还很想听听李井泉的意见。1961 年 5 月 6 日他给李井泉去信说“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李井泉是去调查了。这年春天，当了 3 年国家统计局局长，报了无数假帐的前温江地委书记贾启允，被李井泉要回四川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广州会议后李井泉下基层调查就带上他。他后来回忆说：

省委书记李井泉同志带上我和书记处书记杜心源同志到内江一个公社去调查。调查中不是研究食堂解散后要解决什么问题，……而是研究如何把食堂继续办下去。调查结果是四川省的农村食堂基本上是好的，少数不好的只要加以整顿就可以办好，并且向毛主席写了报告。从此开始引起了毛主席对李井泉同志的不满。（见贾启允《我的回忆》）

李井泉的意见是否真的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作者无据可考。但是李井泉的确为坚守公共食堂阵地战斗到了最后。从 1961 年初开始，面临公共食堂儿近全面崩溃的局面，省委接连派出工作组进行名为“调整”的抢救。我们从省委工作组在温江专区彭县大宝山公社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到他们为此作出了何等努力。（见四川省委、彭县县委工作组：《关于大宝山公社调整公共食堂试点情况的报告》1961 年 2 月 27 日。）

大宝山公社地处川西平原西部山区，其中 4、10 两个管区，是温江专区少有的高山丘陵地区之一，两个相邻的管区分布在南北长 60 多里，东西宽 20 多里的山区，61 年初共有 446 户，2000 余人。在这个每平方公里农业人口不到 10 个人的地区，食堂这个怪物几年来把老百姓折腾够了。

公社化初期，两个管区成立２２个食堂，一个生产队一个，社员吃饭翻山越岭，扶老携幼，风霜雨雪天更是苦不堪言。

1959 年春，大搞“少种高产多收”，放荒山上土地，强迫山上住的社员搬迁下山集中居住，有山的村整村搬迁，集中搞大兵团作战，种万斤田。２２个食堂合并为１１个，最大的 300 多人吃饭。以后上面发觉势头不对，又要求耕种山上土地。不少社员吃饭走七八里，上山干活１０多里，一天大半时间在赶路。人口集中，牲畜也集中，肥料要从山下背到山上。土地荒芜，当年产量减少三分之一。

1960 年春，大反右倾，巩固食堂，干部担心食堂办小了犯右倾错误，食堂合并为８个，种种弊端愈演愈烈。当年粮食又较上年减产 40％。两年累计，比 1958 年产量下降 60％。

1961 年初整风整社，社员坚决要求划小食堂。干部心有余悸，商量来商量去，

8 个食堂分成 1 4 个，怕哪天一股风吹来又挨整，6 个新增加的食堂称“野战食堂”，以表明为临时性的。

春节前社员造反，围攻干部，要称米回家开伙。干部无奈，同意社员数日称米一次。开会统一口径：食堂门面撑起，上头若来人，就说日日照开如常，瞒上不瞒下。

3 月，省委工作组进村，干部急招社员回食堂吃饭。工作组的任务，是按照省委继续办好食堂的精神，对食堂进行“调整”，调整的原则是“积极办好，自愿参加，有利生产，便利群众，按照条件，多种多样。”

农民什么也没听进，只听进自愿参加一句。成份好、胆子大的带头一叫，人人跟着喊退出。工作组作出退让，承认野战食堂可常设，同意食堂划小，老、弱、病、残、孕可以领米回家做饭，也可以打饭端菜回家做饭等等。伤透了心的农民起哄：“脱了裤子放屁！”“背时瘟伤食堂把我们整惨了！”“散了算了！”。

工作组技穷，疾言历色的宣布：调整食堂，贯彻自愿原则是为了积极办好，绝不是拆散食堂！有多少人就办多少人的食堂，一户人要办，公社也要负责到底！

毕竟是大势已去，他们不可能再抓几个人来斗，散伙的呼声还是压不住。

哄也不成，压也不成，工作组使出杀手锏，规定：一、粮食仍然分到食堂，退伙者只能按时向食堂领取，不能分到户。二、食堂的集体菜地，退伙者没份。三、食堂的集体养猪，“由参加食堂的人享受”。四、炊事员由生产队评工记分，食堂设施由公益金开支。五、食堂原有的结余，由在食堂的人瓜分，退出者不分；食堂原有的亏欠，退出者照样分担。六、计划供应物资，一律供给食堂。

挤干算尽，让留在食堂的占尽便宜，退出者吃够亏损之后，就生出一件两难的事情：地富反坏如何办？他们当然没有自由进退的权利，他们连社员都不是，叫管制分子，摘了帽的叫“侯补社员”，何去何从任人宰割。要他们留，岂不跟着沾光？把他们清洗出去，岂不让他们享受了自由的权力，正中其破坏食堂之下怀？工作组反复磋商，左右为难，决定“留下一步讨论”。

这个自由的代价显然太高了，一部分社员思前想后，反复盘算，又把腿收了回来。于是工作组向省委报告：

经过部分调查证明，相当一部分社员，特别是贫农和下中农中的绝大多数，对公共食堂是坚决拥护的，他们坚决反对拆散公共食堂，……只要有条件，食堂坚决办下去。

李井泉搜罗诸如此类秉承其意志的调查材料，1961 年 5 月 11 日写信向毛泽东报告，称大部分群众是拥护食堂的，应该帮助他们办好。它在毛泽东收到的众多报告中，恐怕是难得让他顺心的一个了。然而大势已去， 6 月，修正后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 6 0 条）下发，其中第 3 6 条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凡是要办食堂的，都办社员的合伙食堂，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

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对于不参加食堂的，不能有任何歧视。社员的口粮，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分配到户，由社员自由支配。

这就将它从理论和实践上彻底摧毁。曾经给亿万中国农民带来幸福、欢乐、激情与梦想，又让他们饱经痛苦、失望、饥饿与死亡的公共食堂终于寿终正寝。

６０条一下达，四川省委顿时陷入一片慌乱，急忙撤回为挽救食堂作最后努力的工作组。大概中央早就料到李井泉之类的地方官员会有断章取义，为我所用的一手，同时发出指令："各级党组织必须保证把这个工作条例的每条、每款、一字不漏地、原原本本的告诉群众。要防止一部分干部把那些不合乎自己口味的规定不告诉群众，或者任意加以篡改。"（见《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人民公社工作条件修正草案的指示》（1961 年 6 月 15 日）。）

省委书记处书记贾启允回忆这时的情况说：

"党中央一个解散食堂的文件一直发到人民公社，农村公共食堂一风吹了，以致省委工作十分被动。"

川西坝子的农民清楚地记得，食堂是端阳节解散的，从 1958 年 10 月到现在，食堂整整办了两年零九个月，是全国办得最久的地区之一。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端阳节啊，该吃的粽子、烧鸭子、盐蛋、皮蛋已经是早年回忆。食堂解散，分粮到户令他们兴奋不已，新的艰难困苦又摆到面前。小春刚刚收完，从食堂分到手的东西不够一只手提。温江涌泉公社双华大队每个人分到 3 斤麦子，5 斤荞子；郫县清何公社三大队每人分到 3 斤半麦子。有人一拿到粮食就哭了，他们哪里还有一个象样的家啊，没锅、没灶、没柴，盆、瓢、碗、油、盐、酱、醋，一切皆无。没法子，捡几块石头支个灶，一口锅几家人轮着煮。国营商店里买不到锅，这就是几年大炼钢铁的结果。自由市场上铁锅价格暴涨，是国家牌价的１０倍。农民 3 年大跃进领到的"工资"一分不花，也买不到一口。

就这点粮食，他们要维持到 3 个多月以后的大春收割。但毕竟又多了一分生存的希望。打下谷子，他们就可以分回家了。靠着这一分希望，他们会创造生存的奇迹。

公共食堂一朝瓦解。人民公社的体制——所有制规模问题便暴露到前沿，这是毛泽东最不愿意退却的阵地。他在这个阵地上进行了长时间的顽强坚守，直到 1962 年 2 月大势已去，才正式宣布退守。

毛泽东坚定不移地相信，公有化程度愈高，愈有利于生产发展。迅速完成农业由个体经济向全民所有制经济的过渡，是他朝思暮想的宏伟目标。从 1953 年到 1958 年，他在短短五六年的时间里，把土改后分到土地的个体农民集中到庞大的人民公社，闯下一场弥天大祸。这时他作何感想呢？他是否想过这条"康庄大道"原来是个死胡同，是否想过从合作化初期就和他意见相左的党内同志是正确的呢？

没有，他至死都在做这场过渡梦。

他把这场农业社会主义革命，想象为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把挫折与失败，归结为被剥夺阶级的反抗与破坏和农民小生产者的自发资本主义思想。当教育农民不见效，打击阶级敌人也不见效的时候，他就把仇恨集中到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他作过一些退却，那只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和他打仗时屡试不爽的战略战术一样。一旦时机成熟，他就要发起进攻，沿着这条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走下去。

建立公社的初衷，是把所有制扩大到公社。1959 年初发现事情不妙，确定了“队为基础”，以生产大队或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相当于高级农业社的规模，算是“退了”一步。1959 年庐山会议后，他又按捺不住，在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写写划划，说公社的社有经济占全社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就可以过渡到社有，这样，再变为国有就好办多了，那时，“全国将出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会大大促进生产的发展”。（见毛泽东：《读苏联谈话记录的论点汇编》1959 年底至 1960 年春。）

穷过渡点燃又一轮共产风。“壮大集体经济”，把农民搞成无产阶级，并没见他们死心踏地的去热爱集体，反而连集体经济一齐搞挎。1960 年底紧急指示下达，重申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宣布至少 7 年不过渡，接着又推行生产小队的三包一奖制。本以为如此一来，能够稳住阵脚，结果事与愿违。要求下放核算单位的呼声日益高涨，单干风达到失控的地步。

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 1959 年搞包产到户挨批后，这次改头换面推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包工包产责任制，和 20 年后赵紫阳在四川、万里在安徽搞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同小异。中央提出批评，他们一再辩护，声称这样做并不违背社会主义原则，公然我行我素。

退不退呢？60 条下达后，人民公社的三级统一称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仍然规定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没有退。从规模来讲，生产队大致相当于过去的初级合作社，生产大队大致相当于高级农业社。坚持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际上承认向公社过渡失败，回到高级社规模。如果把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岂不等于退回初级社么？

然而这只是一个理论问题，实际情况是非退不可，否则无法收拾大跃进摆下的烂摊子。

45、各吃各、各吃各……

大跃进后期，整个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大厦，是靠公共食堂来支撑的。食堂解散，粮食分配到户，农民有了掌握自己命运的机会，集体经济顿呈崩溃之势。

首先是基层领导陷于瘫痪。大跃进以来，农村基层干部轮番打倒，伤亡惨重。1961 年初大邑县给地委的一份调查报告说，安仁公社 13 大队高级社时期有社一级干部 8 个，公社化以后大办钢铁调走 3 个，撤职 3 个，久病 1 个，现在职的还剩 1 个；生产队一级干部 21 个，饿死 5 个，大办钢铁调走 4 个，撤职 5 个，久病 1 个，现在职 6 个。一方面他们心灰意冷，满腹委曲，一方面又失去了致命的武器——饭瓢，社员不听使唤。“经是好的，叫和尚念歪了”的宣传，使他们的威信下降到最低点，说话理不直、气不壮、也不管用。

彭县大宝公社一个生产队长发现社员偷麦子去抓，社员抄起一把菜刀反向他扑来，队长吓得边跑边喊“杀人啦……”，其它社员见了说“背时！你也有今天”。郫县合作公社有的社员不出工，晚上估倒干部记工分，队干部不给工票，社员一齐喊：“吐他的口水！干部无法只好给工分票才脱手”。他们对几年来让他们吃尽苦头的“工作干部”充满敌意，在邓小平视查过的晨光公社幸福大队，有人说：“人民政府不来，我们吃饭都要匀尽些”，连毛泽东视查过的红光大队社员也“不服从领导”，不参加干部组织的学习。

骂县上工作干部说：“你们倒吃饱了，再多学两次 6 0 条，我们肚皮都要饿扁了”住该队工作干部几乎个个都有外号，如张局长取名张猪脚……等等。[19]

郫县基层干部流行的牢骚话是：“党不党、团不团，当不到一根青斯兰（作者注：由国外引进的兔种名，意思是还不如养一只兔子得的好处多）”。他们发现当干部确实没啥搞头了，大批躺倒不干。邛崃白鹤公社 4 大队支书买了一只小船，一只鸟枪，白天打鸟，晚上捉鱼。有的党员干部不干工作，上级批评，回答是：“党员又咋个，还不是要吃饭”，再说，他就要退党。

体制不落实，形形色色的“共产”依然存在，使社员难以重建集体生产的信心。只要这个集体在他们眼中不是自己的，他们唯一想到的就是捞一把，加上干部不愿管，社员不服管的无政府状态，和秋收之前严重的粮荒，食堂解散前后几个月，一场全民“挖社会主义墙脚”的盗窃活动遍及每一个角落。社偷社、队偷队、社员偷集体、社员偷社员、几成盗贼天下。据省委工作团在彭县致和公社 3 个大队的调查：

3 个大队 7 4 9 户社员，有程度不同的偷摸行为占 80％—90％，群众说：“哪

家锅底都是黑的，哪个也说不了干净话”，……北京大队 3 生产队 100％的儿童有偷盗行为，集体增种的粮食、蔬菜、红苕种等被偷个精光。７１户社员，４１户自留地的粮食被偷，许多社员昼夜都要留人在家看守，人人自卫。

在谈到原因时，工作组认为“社员的意识形态起了很大变化”。

原因主要是，一平二调把所有制搞乱了，集体拿社员的，社员拿集体的，你我不分，互相乱拿，成为社会风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拿到有本事，拿不到没出息”，“干部有权力，笔一勾，嘴一动就可以随便吃随便拿，我们为什么不拿？”

几年的“共产”熏陶，鼠窃狗偷这种不为人齿的事，居然成了光明正大之举。私有财产得不到尊重和保护，何言礼义廉耻呢。

偷光荣，抢就有理。队与队，社与社，县与县，毗邻地带有组织的集团性抢劫达到明火执杖的程度。华阳公兴公社长山大队一个２０多人的团伙，先后在附近生产大队登墙凿壁，明偷暗抢数十次，盗窃粮食、蔬菜、毛猪、羊子、鸡、鸭。广汉三星公社有人见毗邻的彭县蒙阳公社早包谷熟了，就说“蒙阳那边玉米都蔫须了，快去整啊！”他们三五十人一伙，有的甚至是干部带队，以吹哨子，打石头为号，一哄而抢，一哄而散。新繁太兴公社的玉米被毗邻的金堂龙王公社掰去大半，太兴公社的社员干部去守卫，龙王公社手持凶器的大队人马视若无睹，当着主人的面掰，边掰边说：“那头几块地的也吃得了，等几天喊几十个人挑萝筐来整”。大邑全县的早玉米被偷盗近一半，毗邻别县的地区几乎无收。

合作化以来温江专区从未发生过的抢劫国家粮库的事相继发生。邛崃县 6 月份连续发生抢劫仓库、水碾房、粮食加工厂案件。中兴公社一伙人冲进水碾房，抢走大米 1 千多斤，打伤看守人员。大邑在食堂下放后的一个多月内，王泗、金华、仁和、文井公社相继发生抢劫国库，县委立即调动公安、民兵、持抢把守各处粮库。７月 6 日，上安公社 1 百多人涌到粮库抢粮，守卫人员鸣抢示警，才将人吓散。

解放前夕，川西坝子流行“打粮库、吃大户”，现在又有人在喊吃大户。现在哪里还有大户呢？结果是引起普遍的恐慌。彭县九尺公社“社员中的较为普遍地流露出吃大户的情绪”，扬言“哪里烧火哪里吃，要饿死大家饿死算球”。邛崃中兴公社有的队干部向社员宣布，分的粮食不够吃不怕，吃完了吃大户。社员争先恐后，寅吃卯粮，加剧了粮荒。有的人家白天不敢生火，晚上偷偷煮吃，刚端起碗，咣的一声门被踢开，就被“共产”了。被选中的“大户”还有国家单位乃至部队。６月２２日，位于大邑花桥公社的部队某航校正在开饭，１７０多个农民冲破警卫的阻拦，围住食堂要吃饭，部队不得已让他们吃了一顿。

偷杀、私杀毛猪、耕牛层出不穷。猪不论公养私养，必须交售国家，在连年完不成交售任务的情况下，偷杀、私杀、有意把猪弄死几乎是农民吃肉的唯一手段，现在他们干这类事的胆量更大。乘食堂解散之机，食堂的集体养猪被大量被偷杀，

让一些地方的农民过了个有油晕的端阳节。生产队的猪没有了，他们就把目光投向大队、公社的猪场，其手段十分高明，百多斤的大猪连叫声都没听到便不翼而飞，有的抓住小猪摔死，毛都不刮，一人割一块就拿回去吃了。郫县同兴公社 3 大队安排社员推猪到供销社猪场交征购，推猪的社员半路上把猪弄死，5 只大猪全被分吃。

私杀生猪叫犯法行为，轻者挨斗，重者扣捕，干这类事是要付出代价的，甚至是十分惨重的代价。金堂赵渡公社桐梓大队 5 生产队的蒋茂生，将自己养的一条猪推去交售，因为只有 8 0 多斤，不合格。回来后与“兽医”廖纲宣共谋一计，当晚用 1605 剧毒农药将猪毒死。第二天宣布猪病死，邻近社员闻讯，争先恐后来买死猪肉吃，蒋茂生惧“私杀”之罪，有言在先：不许外传吃了猪肉。众人心领神会，提着肉欢天喜地偷偷摸摸窜回各自家中一饱口福。

蒋茂生知恩报恩，当日中午请兽医廖纲宣一家打牙祭，众人狠吞虎咽，风卷残云，把一大锅萝卜烧肉一扫而光。不出半小时，毒性发作，全队 4 0 多人口吐白沫，人事不省。兽医廖纲宣、蒋茂生的女儿蒋芝春等 7 人先后在 1 小时之内死亡。全队男女老少惊恐万状，六神无主，先是怕吃肉的事传出去上面追究，不敢报告，后来见人接连死亡，才派人到县上报告，发病后 3 个小时，县上医务人员赶到进行抢救。廖纲宣 7 岁的女儿这时还未死，其母因心虚，不敢给医务人员报告实情，拖到深夜眼看孩子不行了才报，医务人员前去已死亡。全队共计死亡 8 人， 3 0 多人住院治疗，蒋茂生判刑。

盗杀耕牛是更为严重的罪行。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耕牛属于生产力的三大要素之一生产工具，盗杀耕牛，就是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力，轻者坐牢、重者杀头。要想吃牛肉，得有更高明的手段和挺而走险的勇气。华阳县上游公社经兽医评定，宰杀和出售了 18 条丧失耕作能力的牛，县委严加追究其“破坏生产的犯罪行为”，向地委提出给予批准杀牛的县法院院长兼公社书记张聪受“法律处分”。金堂王凤、龙王公社接连发生耕牛晚上被人砍去后腿的案件；官仓、栖贤“盗杀牲畜的反革命集团”，啸聚广汉、中江、金堂三县交界的荒山之上，住宿岩洞，昼伏夜出，盗杀耕牛 1 0 余头。

和这一切同时发生的是思想的极度动荡和不满情绪的滋长。流行的口号和歌曲被篡改成吊二郎当的村语民谣广为流传：“三大万岁是‘乱睡’，人民公社员只有一岁”。有的小学生在唱“反动歌谣”：“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饿得社员吃草草，又要做，又要饿，猪草吃不饱，看你住哪里跑”；“太阳出来红卷卷，人民公社断火烟……”。

建国以来严加铲除的“封建迷信”死灰复燃，华阳黄佛公社联合大队一个妇女声称，她有天背娃儿赶场回来，路过“野鬼坝”时，碰见一老太婆，老太婆见她背上的娃儿在哭，问她娃儿为何哭，她说娃儿饿了。老太婆用手一指地上长的野菌子

山地母道，这是仙米，你扫回去吃，说完就不见了。她把山地母挖回去给娃儿煮吃后，娃儿再也不哭。于是周围社队的婆娘娃儿一齐涌来找仙米，把个野鬼坝搞得比赶场还热闹。新繁万安公社“一个社员生了两条蛇”；大丰公社三大队出了“养尸地”，据说把公社代书记都赫跑了。新民公社传说书记罗世发家楼上来了 3 个仙女，要罗世发退他们的房子……。

有些谣传带有明显的“扇惑变天”的色彩，和这一时期蒋介石不断派游击分队“窜犯大陆”的活动大有遥相呼应的味道。金堂有人传，化工厂有人生了一个怪物，人脑壳，蛇身身，鸭脚板，一生下来就说，我要到北京去；官仓公社“沈仙娘”家的田坎被烧香化水的人踏得溜光，有人出来就说：“这下对了，快过好生活了，共产党垮杆最迟不过明年 4 月”。６０年代初 4 个发动机的苏制伊尔 18 客机出现在川西坝子上空，有人误认为是抗战时成群结队飞来飞去的美制 B29 重型轰炸机，说：“五个脑壳的飞机１０多年没见过了，是老蒋的飞机，毛主席快垮杆了”。金堂城厢有人组织“共和党”。

有关改朝换代，大难临头的谣传搅得人心惶惶，“子丑之年，人吃糠，庚子年间少行人，万里人民难活命”，“要起歪风、打铁雷、黑七天七夜”，有人听了就把粮食吃完，鸡鸭 杀光，坐等世界末日降临。听说有辫子的活不过七月七，妇女们就扎红头绳，戴红珠子以免灾避难。听说“恶党要除尽，恶人要死完”，“所有党员活不过七月十五”，一些干部就不敢去开会了。邛崃平乐公社老君道道主李廷春设坛，聚集数百人讲五公经、玉匣记，声称有大劫大难，社员纷纷上香钱，交大米，求神讨符许愿烧纸人消灾，大队书记罗有昌也在家念五公经，抄大圣五公符。

许多谣传是和“体制”直接相关的。“现在粮食分到户，二天田地也要分到户”，“青白江河边有个娃娃，天天在喊‘各吃各，各吃各’（作者注：意为分田到户、产品归己），20 武装人员去看不到人，武装人员走了又在喊”。这才是农民最关心的事。当上面还在为是否“从高级社退到初级社”大伤脑筋的时候，农民想得很简单——分田到户，万事大吉。他们诚心诚意跟着党走了这么些年集体化道路，路越走越黑，越走越窄，土改时分到土地后短短一两年的好光景令他们留恋不已。对于大多数贫苦农民来说，他们并不希望老蒋回来，老蒋给了他们什么呢？是共产党给了他们土地，他们希望毛主席共产党重新把土地分给他们。他们根本没有把分田和什么“主义”联系在一起。他们脑袋里的社会主义就是耕者有其田，人人有饭吃有衣穿，不受地主土匪恶霸的气。他们相信把田分了自家种、各吃各，他们的日子会过得好。

新繁要求分田的呼声之强烈，县委报告说，有的地方 30%的社员公开要求分田到户。事实上在一些基层领导完全瘫痪的地区，群众为了生活，各种一块，已形成事实上单干。郫县花园公社食堂一下放，干部就喊不动社员出工了，有的田里秧子只栽了一行就丢下不管，剩下的秧头长出老高，大麻在田里成了干柴，烟还没长成，

就被社员偷光。干部叫社员出工，社员说，你包给我种我就种。干部说现在的政策是多劳多得，现在多出工，今后多分粮，社员说，共产党的政策东一下西一下，天晓得！干部心一横，包就包！ 3 大队 5 队队长把全队菜地一户一亩分给社员，规定一年交粮 100 斤。菜地原是队上养猪场的饲料地，没分到地的社员就去抢猪、抢占猪圈，抢得动刀子差点出人命。[21]

毛泽东欲罢难休，李井泉死死咬定大队为核算单位不松口，口号是“依靠集体，生产自救”。下面各显神通，自行其是。郫县太平公社 3 大队各生产队各有高招，有自由选田，自种自收；有生产队划田，自种自收；有生产队定田定产，自种自收。县上去人整顿，队干部诉苦说：“生产搞不去，开会挨批评，回来喊不动，逼火了就干脆分到户，”县上干部指责他们搞倒退，队干部很横：“好，你们另请高明，我早就不想干了！”

在坚持不下放生产体制的地方，干部就不想组织生产，社员就不愿参加集体生产，人人都在拼命地从可怜的一点可以自己支配的天地里谋生存。川西坝子的良田沃土大片荒芜，种下的庄稼缺乏管理，加之暗偷明抢，产量低得可怜。地委工作干部在新都曾加场的一个生产大队发现，小麦才开始灌浆，就有人在地里偷割麦穗，回家搓下炒了吃。干部又是开会，又是组织民兵守护无济于事。一到晚上和下雨天，社员便一群一伙背上背兜，拿上镰刀到地里割麦穗。小麦收割后一算帐，亩产平均才 9 斤。工作干部向地委领导汇报，地委领导问：“一亩地用多少斤种子？”答：“七、八斤。”问：“未必一颗还不结两颗啊？”答：“不是不结两颗，是还没熟就没穗子了。”

温江专区 1961 年的征购任务，下降到 1953 年统购统销以来的最低点，只有 9.5 亿多斤。几年来被高征购搞得七死八活的农民开始公开抵制征购，基层干部也一反常态，公然站到农民一边开始“瞒上”。秋收时，连年号称平均亩产过千斤、数千斤的郫县，各公社普遍报产二三百斤。超级大社红光已经解散，分为了安晴、犀浦、合作、团结、红光 5 个公社，以郑凤兰为首的原公社领导多半撤职，各公社的干部都换了班，“意识形态”也都大不一样，声称无粮可交。到 10 月郫县征购情况为全区倒数第一。几年来对郫县耿耿于怀的宋文彬有了报复的机会，命令地委副书记刘致台亲自下去催收，刘致台坐在县上不动，把这道难题甩给县委书记高义禄，高义禄硬着头皮来到“顶牛”最厉害的犀浦、合作、团结等公社，开始动员时，公社干部、群众“情绪并不慌，就是不交征购”，往年气壮如牛的高书记只得低三下四，动之以情，晓之非理，才使“情况有所好转”。此一时，县委态度极为保守，除承认征购完成得最不好，还报上一个全区第一的留粮差额，要求地委减免征购，给予补贴。

公开说老实话，发牢骚的人开始多了。这年秋收后，华阳县委开会安排征购任务，会上各公社一报产量，任务就分不下去。到会的地委副书记张培民发现气氛不妙，就开始讲“认清大好形势”。新上任不久的西南局农办秘书长史立言也参加了这

次会议，听了张培民等的讲话，不阴不阳地插话说："农民一天只吃 4 两，亩产能达到 400 斤，这个成绩还不伟大？这个形势还不是大好？"一时局面相当难堪。张培民绷起面孔反诘史立言："那你把华阳的征购任务减 2000 万斤嘛！"史立言道："你找你们的书记去。"县委书记紫英华只好宣布：产量不说了，直接下征购任务。

其实史立言所说的"书记"宋文彬如今也不那么听话了，一年之中，他数次向省里要粮，说农民一出工，就躺在田坎上睡觉，饿得动不了，再不给粮，我这个产粮区就自身难保。

面对全国普遍出现的事实上的单干，和党内日益高涨的下放核算单位的呼声，毛泽东在 1961 年 9 月 29 日给中央常委等的信中，终于明确提出："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还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了 6 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从 1956 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 7 年应该清醒过来了吧"。(见《9 月 27 日，邯郸谈话会》 毛泽东记录。)

领袖一开口，中央于 1 0 月 7 日发出《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的指示》，指出："就大多数情况来说，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比较好的"。 指示还要求各级党组织进行调查和试点，把结果报告中央。

还需要什么调查试点呢，就全国大多数地区来说，要的就是中央一句话，纷纷把核算单位下到生产队。生产队的规模按初级社进行了调整，一般二三十户，真正是回到了初级社。

表面上看，中央的这个指示并没有把话说死，还要征求各地的意见。实际上是装装样子，在作出明确规定前打个招呼而已，和解散食堂时的程序一模一样。曾经在食堂解散问题上"陷于被动"的李井泉竟然不吸取教训，继续重复上一次的做法。他定下调子：解决核算单位的问题分两步走，先落实生产队向生产大队的"大包干"，再解决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问题，实际上就阻止下放核算单位。贾启允回忆这时的李井泉：

他总说四川高级社规模是五六十户，生产队的规模才二三十户，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退得还不如高级社了，也是一直顶着不办，一再写信给毛主席、党中央……。

根据中央指示进行的所谓调查试点，完全依照李政委定下的调子。1 1 月，温江地委召集新繁新民公社、温江清平公社、大邑安仁公社部分社队干部讨论核算单位问题，讨论不是根据中央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为好的精神，而是要大家对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好，还是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好表态。你让这些在油锅里滚了几年的社队干部如何回答是好？地委的"调查结果"是：

属一类队（好）的大队表示：仍然以大队为核算单位，生产队向大队实行大包干。属二类队（较落后）的大队表示：把大队和生产队都划小，仍以大队为核算单

位。属三类（落后）的大队表示：生产队划小，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

越先进的越想核算单位大，越落后的越想核算单位小，这就是调查的结论。李井泉“一再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讲的就是诸如此类的东西。

既要表现坚守社会主义阵地的革命气概，又要应付局势的压力，李井泉作了点小小的让步：在不放弃大队核算的前提下，实行生产队大包干，即生产队承包生产任务，除了上缴国家和生产大队外，剩下的归生产队分配，这也是毛泽东在退却到生产队核算前曾经考虑过的一种方案。1961 年 11 月，四川省委将这一方案付绪实施。李井泉对此作了解释，他说核算单位放在大队等于放在“腰上”，放在生产队等于放在“脚上”，而这种做法等于放在两者之间的“膝盖上”。

究竟把基本核算单位放在哪里好呢？有的放在腰上，有的放在脚上，有的放在膝盖上，……放在膝盖上就是把生产队的分配权扩大，大队保留小部分调济权。我们就暂时这么定，第一步放到膝上……。（见《李政委总结讲话记录整理》，中共温江地委办公室 1961 年 11 月 23 日印发。）

真可谓“饿死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只不过是饿老百姓的肚子。这一年，全国大部分地区急流涌退，农村情况已大有好转，四川则仅仅因为李井泉个人一再顶住不放，仍处于深重的灾难之中。他个人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他的最大本钱粮食已经输得精光，他所借助对农民进行残酷榨取的政治气候已经转变，不仅无力再向省外调粮，反而破天荒向中央要粮，他实在丢不下这个脸，就让李大章出面。李大章后来写道：

据我所知，1961 年秋冬全国大多数省、区农业生产已好转，而四川还处于严重的困难时期。当时，四川农业生产继续下降，我到北京开人代会，李井泉一再叫我向周总理汇报，请国家从别省调粮支援四川。……从 1959－1960 年，他每年到北京开会，就亲自吹嘘他向中央调了多少粮食，全国各地都吃四川的粮食……。到 1961 年，他的牛皮吹破了，伸手向中央要粮食的时候，他自己就躲在后头，要我出面汇报，请国家支援四川粮食。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和省长之间的关系多年如此，讨甜头的事书记出面，讨苦头的事省长出面。就在李井泉发表著名的“腰、脚、膝”说的省委三级干部会上。又是李大章出面，向已经不那么听话的各专区头头催粮。这一年全省征购 70 亿斤，不及 1959 年征购量的一半，为 1952 年以来最少一年，到年底还完不成，成渝两市面临断粮。李大章归纳为四句话：“该拿的没有拿够；已经拿到的有虚数；城市供应少不了；调粮又调不出来”。他悲观地承认，“明年春荒究竟怎么样，从我来讲是没有把握的”。

去年曾经慷慨地保卫过京、津、沪的四川，现在连成渝两市都快保不住了，去年受了表扬的李井泉现在很克制，丑活让李大章说。

目前城市的困难和危险比农村更大，必须以最大的努力保住城市，具体来说，就是要保住成都、重庆两市。否则，如果成都、重庆出了问题，那就是天府之国的首府闹粮，政治影响很大。……所以必须千方百计把粮食调运出来。（见《大章同志11月8日在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温江地委办公室1961年11月印发。）

城市固然危险，但农村还在继续饿死人呢。省里认定下面粮食有“打埋伏”现象（不说满产了），要各专区坦白交待到底拿到好多粮食。温江专区交待的数字很少，省上不信，追问“是否统计错了？是否下边都报实了？”地委答复没有，省上一再追问，宋文彬“一生第一次在领导面前发脾气”，脸红脖子粗地在会上和省委领导吵架。绵阳地委书记李林芝出面圆场：“要把温江保住，温江保不住，四川就垮了”。省委书记廖志高顺势说：“是啊，温江保不住成都就完了”。

宋文彬的确没有打埋伏。1962 年 1 月，地委秘书长杨玉成从温江出发，经郫县到灌县，沿途走访农户，了解生活生产情况。在郫县德元公社一个生产队，他们看到的是：去年秋收后，每人只分了七八十斤粮食，３个多月下来，所剩无几，抠得紧的人家，眼下每人每天二三两粮，其余全靠吃红萝卜，断了粮的尽吃红罗卜。杨玉成问，过得下去不？农民说，有红萝卜吃还过得去，过了春节，红萝卜吃完了，只有吊起。全队３２０亩田，只剩谷种８００斤。在灌县聚源公社，他们“一走下去，就叫社员围起来走不了路”，一个个长吁短叹，流眼抹泪，哀求政府贷粮。地委干部苦口婆心解释，现在各处遭灾，全国人民都很困难，大家共同克服。队干部说：“说实在话，现在粮食分到户，哪家不是精打细算，吃糠吃菜，把粮食当金子，吊起命活，要是吃食堂，不晓得又要饿死好多人了。但就这样子吊，也最多吊过年”。老太婆刘巴氏拉着杨玉成的衣襟再三说：“我们晓得国家困难，我们过不出来咋个搞生产呢？求政府借给我们些，帮我们把这个难关过出来，我们把生产搞好，明年给国家多上粮……”，说得杨玉成眼泪差点滚出来。

时至 1961 年底，温江专区才开始对“非正常死亡”建立逐月统计。统计显示，从 1961 年 11 月至 1962 年 2 月中旬的 3 个半月中，非正常死亡人数为 4760 人。（见温江专区各县1961年11月至62年2月份逐月非正常死亡数字统计表。统计日期：1962年2月18日。）

46、“团结起来犯错误”

一场试图创造经济发展奇迹的大跃进，给国民经济以摧毁性的破坏，使人民蒙受了一场深重的灾难，同时给中共党内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为收拾残局统一思想，由毛泽东提议，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央召开了有7千多人参加的工作会议，规模空前而且绝后。四川有400多人出席会议。

被认为是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这次大会已经讲得很多了。作者想强调的是，实际上这次会议是逐步升温的，最终的结果并非是预先安排好的。会议原计划只有18天而不是最后开成的28天，毛泽东那篇著名的关于党内民主集中制的讲话也不是事前预备好的。以“发扬党内民主”而著称的这次会议，一开始的主题只是“反对分散主义”。刘少奇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要求议题集中于“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上。他特别强调：一年来中央逐步纠正错误，各地、各部门也要改正错误，不能自行其是，现在这种现象太多了、太普遍了。

参加起草报告的田家英更是对李井泉式的分散主义深恶痛绝，私下和吴冷西议论说，现在中央的指示贯不下去，一些人阳奉阴违，或用不学习、不传达、不执行的“三不主义”公然抵制，为建国以来所未有的。他说毛主席要他读贾谊的《治安册》，他读后感触很深：汉高祖分封诸侯，结果诸王割据自大，酿成“七国之乱”。他又举唐代边将拥兵自重，安史之乱后藩镇跋扈，唐室因以衰亡，史足为鉴。现在这种分散主义恶劣倾向发展下去，非旦“左的错误难以纠正，而且党和国家有被肢解的危险。”（见吴冷西：《同家英共事的日子》 1996年清明节）

左派们对此并不服气。在有中央领导和柯庆施、李井泉等各大区头头参加的报告讨论会上，自以为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的人拿毛泽东的“另一些话”和中央的一些决定为自己辩解。刘少奇、邓小平不得不再三说明，马克思主义讲时间、地点、条件，彼一时此一时，现在中央已提出一系列调整方针，不允许自行其是，这种分散主义已是全面调整的最大障碍，必须坚决纠正。但左派们则认为这个问题“强调过分”，所举例子“与事实有出入”。又想把问题讲够又要维护毛泽东威信的刘少奇无可奈何地说，如果认为举例不当，可各自拿出恰当的来替换，最后干脆提出把举例全部删去。

而对四川组的大多数干部来说，要说分散主义，头一个就是李井泉。他们印象最深的就是李井泉把毛主席的党内通信收回，继续搞他的密植高产，解散公共食堂四川搞到最后，体制下放一拖再拖，搞到四川致今还在饿死人。更叫他们气愤的是，

四川组还要求主要体会《报告》的精神，“不联系实际”。不少人牢骚满腹：既然是总结经验教训，不联系实际从何说起？

终于，被李井泉这个“飞扬跋扈的独裁者”（作者注：李大章语）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四川干部开始反抗了。在讨论刘少奇的《报告》时，有人向省委和李井泉提意见。多年来，他们从来没敢这么干过，“李政委”也从来没落到过这般处境。中央要求各地领导作自我批评，省委不做检讨交待不了，“于是他心生一计”，叫李大章代表省委作检讨，李大章气坏了：

究竟谁应当代表省委作检查？在毛主席六条指示（指《党内通信》——作者注）上妄加批语，封锁毛主席声音的；在四川大搞高指标、高征购、瞎指挥等浮夸风，如在川四川日报大登特登亩产万斤水稻“经验”，并大力推而广之的；在3年暂时困难时期，从四川过多的调出粮食，把省内口粮标准压得很底，致使各地发生人口逃亡和死人情况的；抵制中央解散公共食堂的精神，坚持继续大办公共食堂的；……主要就是李井泉。他不检讨，又该谁来检讨？（见李大章：《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的反党罪行之六》1967年1-2月。）

这是李大章的后话。当时他只好忍气吞声，接下苦差，代表省委检查。一见是李大章作检查，大家更起火，“大章同志”虽然也是按省委的决定办事，但他的正派、厚道，这几年的所做所为大家看得明白，这明明是李井泉在耍滑头。不把李政委请出来，他们出不了气！李井泉强作镇静说，大章同志代表省委只着重检查了农业问题，没有检查工业方面的，我们还要请陈刚同志代表省委再做一次检查。陈刚是管工业的书记。李井泉既要他出来担过，又怕他说漏了嘴，就指定了几个心腹“秀才”由他面授机宜，拟写检讨稿。

本书主要反映农业方面的问题，末涉及工业方面，这里略提几句。

1959年底反右倾以后，李井泉无视四川农业的极度凋敝，再次掀起大办钢铁运动，大搞基本建设，1960年投资比上一年又增46%，施工项目多达6千余个，城市工业人口上升至大跃进时期顶峰，他声称不仅“我们给国家调了那么多粮食和猪”，还要大批的调出钢铁。其头脑之狂热，行为之蛮横荒唐不亚于农业上那一套。1958年到1960年，四川工业、基建累计损失43亿元，占这3年累计财政收入的57%。

陈刚的检讨照样过不了关。眼看火要烧到头上，四川组又规定总结经验教训只联系自身的实际，既不上挂，也不下联，给省委提了意见的被斥为“态度不端正”。整个四川组会上气氛沉闷，会下议论纷纷。

忍无可忍，一颗重磅炸弹爆炸了。

这颗炸弹是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明朗。

明朗，陕西南郑县人，教师家庭出身，1936年参加红军，阎红彦的老部下。从

阎任二野三纵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开始，到任川东区党委书记，他一直是他手下的宣传部长。四川合省后，阎任省委副书记兼副省长，他又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长期的战斗生涯，赋与这位外表文质彬彬的书生以内在的军人阳刚之气。多年与阎红彦共事，使他深受顶头上司刚直不阿气质的熏染。二野三兵团政治部一次会议上，二人因工作问题发生分歧，争到面红耳赤，阎一拍桌子：“放屁！”明朗重述一遍自己的理由，然后质问：“究竟是我在放屁，还是你这个政治部主任在放屁？”，开会的人全楞住了，阎气得两眼圆睁，一言不发。第二天阎把他叫去，一见面就说：“昨天是我失言，伤害了你，向你认错。”



七千人大会上，明朗写匿名信状告李井泉，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重视，会议延期，主题转移至讨论大跃进原来的相关问题。文革中此事暴露。文革结束后，李井泉重新主政四川，明朗为此遭受到迫

李井泉耿耿于怀、迄今尚未破获的在首届省党代会上带头不投他票的人，就是此公。

宣传部另一位副部长李亚群，是他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庐山会议以后，二人扼腕叹息:“彭总都不能说话了，党内还什么人敢说话！”。1960 年初，明朗率四川川剧团出访欧州半年，回来李亚群便给他讲了许多饿死人的事：“我们干革命为了什么？把老百姓弄成这个样子，问心有愧啊！”说着便潸然泪下:“真是忧国忧民不敢忧啊！”。这一年，明朗写下这样两首词。

［风入松］反右倾

随团出访已闻风，彭总话苍生。归来举国凝霜雪，反右倾，刮到基层。但见罪名滚滚，分明几句实情。何人侥幸得安宁？似地冻云封。忧国忧民难相问，对城乡，谁不头痛！生气消亡殆尽，从此党内无声。

［正宫：叨叨令］ “克里空”

鸡婆一天生三蛋；稻粮亩产十余万；公社心脏焉能散；都从报刊新闻见。喇叭任人吹，魔术任人玩，青云直上金銮殿。

后者是直冲李井泉去的。

1960 年底，明朗下放梁平县兼任县委第一书记，临行前与李亚群促膝话别。谈到治疗肿病，李说："你去给老百姓弄点糠吃，就能救命，不要相信什么蒸气疗法，人都饿得快要死了，再一蒸，是催命。有些人就是没心肝，不敢说真话就算了，还出些烂点子，给自己挣红顶子戴。"

梁平县没有川西坝子自流灌溉之利，种水稻靠冬水田蓄水，只能种一季。大跃进一来，上面命令改一季为两季，放掉田水，小春种麦，大春种稻。多年蓄水的冬水田泥如沼泽，旱作的小麦无法生长，到种水稻的季节又无水灌田。连续几年大减产，连续几年高征购，饿死人超过 8 万。

二野三纵是淮海战役中围歼黄维兵团的主力，时任纵队宣传部长的明朗对淮海战役的惨烈场面记忆犹新。在梁平，明朗去了遭祸最惨的一个村，全村人死绝，目睹的景象令他终生难忘："那场面象打过淮海战役一样，房顶、门窗全扒光了，屋里只剩一堆堆烂草，人迹杳无，村外的山坡上密密麻麻全是新坟，真是惨不忍睹！"

明朗是以县委书记的身份参加 7 千人大会的。他满怀希望，想把真实情况说出来，他无法忍受由李井泉所控制的四川组的局面，于是他做了李井泉终身不忘的第二件事。

他要告状，他也怕倒霉，死在敌人的刀枪之下他无所畏惧，在自己人中当反革命的滋味，比死难受多了。鉴于"投票事件"至今被李井泉苦苦侦破的教训，他把匿名信写好后，让在中央劳动部工作的弟弟重抄一遍，偷偷扔进邮筒。

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并党中央：

我是在四川工作的一个干部，第一次到北京来参加会议（中央工作会议），来的时候抱着很大希望，希望把肚子里的话都说出来，回去愉愉快快地工作，现在，会已开了十几天，看起来，这个希望是不能实现了。

中央提倡说老实话，所以我想写这封信，把我知道的情况反映到中央。

这次开会，头几次叫我们体会文件精神，不联系实际。后来允许联系实际了，但，又叫各人联系各人的，不要把责任往上推，往下推。这几天有人给省委提了点意见，又说发言要端正，于是又像在四川开会一样，大家坐在那里磨时间。

不许讲话，不许讲批评省委的话，这大概就是四川省委领导这次会议的方针，

这不过是李井泉闹分散主义的一个表现罢了。

在四川工作的干部，上上下下不敢讲话，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只举几个闹分散主义的例子。

一、毛主席的六条党内通讯，四川省委不准传达，不准贯彻，叫下边从积极方面理解。

二、毛主席反“左”的八句话，四川省委改成三把刀子变成反右。

三、中央关于自留地，私人养猪的五条紧急指示，四川省委顶住没有执行。

四、四川自作聪明提出“一个样”，“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等政治口号，助长强迫命令和瞎指挥。

五、不执行中央甄别干部的指示，泸州地委第一书记邓自力的错误，是划自留地，解散公共食堂，毛猪下放，甄别的结果，“批判基本上正确”，直到现在省委并没有承认错误，邓自力也没有复职，对其它人的处分当然也“基本正确”。

六、四川省委前几年规定，农民的的口粮标准是八两，不久以前规定四两、五两、六两，（十六两的称）有的地方执行下来，农民一天一人只能吃二两、三两、四两，现在还在饿死人。

七、中央关于改变基本核算单位的文件，没有发到县，不许县里试点，现在中央作了决定，又规定一个公社保留一个大队不变。

八、最近中央指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四川省委改成“打击投机倒贩，贪污盗窃活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规定万分之几逮捕法办，千分之几斗争打击，百分之几批判，硬说干部中有百分之几十的人搞投机倒贩，还规定县委书记要到成都交账，那个交不出不准到北京开会。

李井泉这样搞分散主义，结果是怎样呢？结果大量死人、死猪、减产。有的县饿死的人将近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以上。四川全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还要饿死多少人，（作者注：明朗的这封信文革中被造反派抄写成大字报贴在成都街头，作者曾亲眼目睹，清楚地记得这句话是“四川已经饿死一千万人，还要饿死多少人”。本书引用的是 1997 年作者采访明朗时，明朗亲笔写给作者的版本。）谁也不知道。像这样严重的问题，李井泉怎么敢叫下面讲话呢？

中央如果要反分散主义，就应该反反这种人的分散主义。

一个四川干部

１９６２年１月

中央办公厅 1 月 25 日收到此信，印发政治局常委参阅。

有理由相信，这封信对改写历史起了重要作用。

按原先的计划，会议从 1 月 11 日开始，主要讨论通过刘少奇的书面报告，中央主要领导讲话后于 1 月 29 日会议结束，大家回家过春节。后来许多材料都指出，会议之所以延期，是因为许多代表反映话没有讲完，还憋着一肚子气，有人压制民主不让人讲话，但并没有提出具体的事实。象明朗这样尖锐的意见无疑是最有代表性的，其影响力可想而知。其中的一个证明是，经讨论修改后的《报告》，例举的第一个分散主义例子，就是有的地方拒不传达执行毛泽东 1959 年 4 月的党内通信。

1 月 29 日，即农历的腊月二十四日下午，毛泽东突然在大会上宣布，会议延长时间。他说，这次会议还要解决党内民主集中制问题，上下通气问题，他号召发扬民主，开“出气会”，打消一切顾虑，向上级、重点向省委的缺点错误展开批评，“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并说，7 千人一起在北京过春节。

全场欢声雷动。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了关于党内民主集中制的长篇讲话，谈古论今，扣人心弦。讲话一再被暴风雨般的掌声、笑声和欢呼声打断。讲话结束，全场起立，掌声久久不能平息，许多人热泪盈盈。几年来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由伟大领袖用最精萃的语言甘畅淋漓地表达出来，令他们何等地欢欣鼓舞！

“这一下，李井泉吓慌了手脚”。李大章说：

我记得，主席在 7 千人大会上讲话后，李井泉马上找我说：主席这次讲话，主要是对我们四川讲的。我们四川省委是团结的。工作有成绩是大家的功劳，犯错误是大家一起犯的。后来李井泉总结了一句结，叫做“团结起来犯错误”。

作为政治局委员的李井泉，亲口说出毛泽东的讲话主要针对四川，显然是有根据的。明朗的信是发到政治局常委的，李井泉却已经知道匿名信一事，并且立即布署他的亲信追查写匿名信的人。

参加会议的四川干部虽然并不知道匿名信之密，但多半都认为毛主席讲话是针对李井泉的。他们听到主席讲：“我们现在有一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象项羽。这些同志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都发出会意开心的大笑。然而他们不认为是什么“团结起来犯错误”，他们就是要把气出在李井泉头上。

被周恩来称之为“会议的第二高潮”的“出气会”，矛头指向各省头头。曾经发生在四川成千上万干部头上的事，轮到了李政委头上。眼看就要滑过去的李井泉被迫在四川组作检讨。眼下他方寸已乱，他还没有摸清中央的“行情”，“霸王别姬”之说令他大为惶恐。他的处境十分不妙，根本的问题出在中央，但他不可能把责任推给中央，而要把罪过承包下来，又实在担当不起。他收敛起往日的威风，本来有些驼的背显得更驼，支支吾吾，东拉西扯，试图搏得同情凉解。检讨的内容，正是明朗匿名信中所揭发的。由于李井泉的检讨潦潦草草，到会大多数干部更加不满，

纷纷提出批评。

众目睽睽之下，李政委哭了……

如果不是邓小平出面，不知李井泉如何收场。邓小平说，会议不能继续这样开下去了，李井泉也不要再作检讨了。他解释说，省委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帐不能都算到某一级头上。

邓小平讲完就带着李井泉离开了会场。很长一段时间再没人开腔，直到散会。再开会，便有人率先发言："李政委作检讨，李政委犯了错误，是我们没把工作做好……"说着就涕泪交加，泣不成声。接着就是一个接一个的作自我批评，按照"团结起来犯错误"的精神，分担李政委的错误。

直到那时，应该说邓小平和李井泉的个人关系是不错的。建国初期，邓小平、贺龙、李井泉曾一起在西南局工作，关系密切。李井泉每次到北京几乎必到邓小平家拜访，送点四川土特产品。毛泽东讲话后，李井泉也曾到邓小平处打听过"行情"。李井泉在文革中承认，是邓小平给他看了明朗的匿名信。（作者注：李井泉在 1967 年 10—12 月写的"交待"中说："有同志揭发，六二年有人对我的错误，写过匿名信给中央，邓小平把信转给我看，保护我过关。我回忆邓小平确曾转过两封信给我看，我看过后退回。"）排除个人关系的因素，邓小平在会上讲的无疑是事实。而更重要的"行情"是，毛泽东并没有让李井泉这样忠心耿耿执行大跃进路线的人"别姬"的意思，中央当然也不希望四川组这样的事态发展下去。李井泉不过虚惊一场罢了。

事实上，毛泽东耿耿于怀的并非李井泉式的分散主义，而是搞包产到户的曾希圣式的分散主义。一度受毛泽东信任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大跃进初期也搞得很左，安徽浮夸死人都很严重。然而从 1961 年初开始，曾希圣便在安徽全面推行后来称之为包产到户的"责任田"，使生产迅速恢复。在第二阶段的"出气会上"，刘少奇参加安徽组讨论，把刮"五风"和搞包产到户搅成一团来批，当场宣布撤销曾希圣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职务，由李葆华继任。

李井泉的"团结起来犯错误"，其实也是中央定下的基调。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帐，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帐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帐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帐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帐，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有各的帐"。（见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 年 1 月 30 日）

47、跃进盘点

这个错误有多大呢？让我们回到天府之国的温江专区看一看。

离开数据来谈论这个问题显然是不行的。然而当作者试图作这方面的努力时，立刻如同闯入了迷魂阵，头晕目眩无所适从。有关的统计资料要么相互矛盾、要么前后矛盾、要么一片空白。首任温江地委书记，大跃进期间的国家统计局局长的贾启允对这种统计上的混乱现象有如下说明："全国各级统计部门都在各级党政机关领导下工作，统计数字直接受到各级党政领导人主观随意性影响，计划部门可以修改统计数字，统计数字很难搞得准确"。我确信，掌握大跃进时期哪怕是一个局部地区完整准确的数据，都是一项无比艰难的工作。

但是在查阅了许多资料并访问了有关领导人之后，作者发现抓住政治这个纲，这堆乱麻还是可以理出一些头绪。首先，要看显示数据的年代。1949 年以前的数据夸大的可能性不大，建国后到 1955 年的数据比较准确，1956－1957 年的数据已有水份，大跃进三年的数据都该打问号。其次，要看数据产生的年代。比如，1961 年到 1962 年期间的统计较为可信，80 年代后重新作的统计更接近于实际。再次，要看统计对象。诸如粮食产量、人口等"敏感部位"的真实面目很难看清，次要一些的方面透明度较高。循着这些线索，作者希望尽可能向读者展开一幅真实的画面。

三年以粮为纲的农业大跃进，温江专区的粮食产量以商品粮计，由 1957 年的 40 亿斤，下降到 1961 年的 23 亿斤，减少 40％以上。

粮食征购实绩，1961 年降至 9.5 亿斤，低于合作化以前 1952 年的 10 亿斤。

生猪 1949 年 83 万头，1957 年 181 万头，1961 年 69 万头。1961 年的数量比 1949 年少 17％，比 1957 年减少 62％。

耕牛由 1957 年 20 万头，减少至 1961 年的 14 万头，减少 30％。

再看看本书较少涉及的经济作物状况。

温江专区最有代表性的经济作物是油菜、土烟和大麻，其价值在整个农业生产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以粮为纲"的大跃进，不仅搞垮了粮食生产，经济作物生产受到的破坏更为惨重。

影响经济作物生产的因素比粮食生产更为复杂。生产经济作物是为了卖钱，1953 年下半年开始统购统销以后，经济作物的生产成为单纯的完成国家任务，产品只能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廉价交售，农民无利可图甚至亏本，生产积极性已受到严重挫伤。大跃进粮食生产连年下跌，征购任务连年增加，而征购任务是按土地面积摊派的，

农民既要完成征购，又必须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不得不扩大粮食作物面积，缩小经济作物的面积。

经济作物生产的衰败，可以通过一个小小的“烟折子”反映出来。烟折子是种烟必不可少的竹制工具，长 7 尺，宽 2 尺，108 孔，用于将收获的烟叶夹于其中晒干，一亩烟田大约需用 300 个左右的烟折子。1953 年以前，农民种一亩烟的收入，可以换回 1 千多斤大米，比种一亩水稻的收入高出一倍多，农民种烟的积极性很高，每年都要新制烟折子，以保证工具稳定在必须的数目内。1953 年底统购统销后，种烟的收入大幅度降低，烟折子数量年年下降，到大跃进后烂的烂，烧的烧，有的用来搭棚盖物，几乎毁坏殆尽。据地委调研室在温江镇子公社晶光大队一生产队调查，该队 1951 年前有烟折子 5100 个，1955 年有 2500 个，1959 年只剩 300 个，1960 年以后一个不剩。社员说“晶光”大队硬是搞得“精光”了。

油菜、土烟和大麻，是川西平原历史悠久的主要经济作物。下面是温江专区几个有代表性的年代，这几项作物的收成情况。（见温江地委调研室 1962 年 7 月统计）

油菜：

年度	单产（斤）	总产（万斤）
1949	89.7	9627
1953	119	13688
1957	117	13837
1961	58.5	3876

土烟：

年代	亩产（斤）	总产（万斤）
1949	143	2726
1953	185	4382
1957	149	3447
1961	49	514

大麻：

年代	亩产（斤）	总产（万斤）
1949	107	559
1953	107	1345
1957	118	1861
1961	79	339

1961 年油菜产量仅及 1949 的 40%、1953 年的 28%；土烟产量仅及 1949 年的 19%、1953 年的 12%；大麻产量仅及 1949 年的 60%、1953 年的 25%。

如果说生产的破坏可以在短期内得以恢复，自然和文化生态的破坏也许是永远无可挽回的了。５０年代的川西平原林木繁茂，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处处是避暑消闲

的好去处，村村乡乡林盘遍布，星罗棋布的寺庙、坟园苍松古柏遮天蔽日，纵横交错的河流渠道在绿阴中穿行，修竹华木拥抱着农家舍院，一年四季满目苍翠。3 年的大跃进，尤如一场燎原野火，残酷地扫荡了这一切，人们突然发觉，田野显得空旷了，林木稀疏了，农舍一目了然了。只有偶而见到的孤零兀立的参天古木，还能唤起人们的回忆。

没有谁为这场浩劫留下全面准确的记录，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个小村庄的历史材料中，窥及一斑。（见温江地委工作组:《关于燃料问题的调查报告》，1961 年 5 月 31 日）

这个座落在川西平原腹心地带的小村，是温江县永兴公社柳江大队 6 生产队。全队 1962 年时有 25 户，160 人，耕地 280 亩。公社化以前，在这个队范围内有 4 个林木稠密的林盘，“林外不见屋，林内不见天”。4 个大坟园内有上千株杉树柏树，苍荫蔽日。6 条全长 3 千多米的沟渠，沿岸遍植林木 2500 多株，绿荫成带，环绕田野。春去冬来，飞鸟成群，乌啼莺啭，鹰翔鹭舞。

农民对林木的爱护，很大程度上源于与自然环境的共生意识。川西坝子的农村那时仍然烧柴，林木与人们有着休戚与共的关系，直到公社化以前，这种生态圈仍然运行良好。农民的燃料来源，一是农作物的稿杆、根壳，二是林地的产出物，如树叶、树疙篼、树椏枝，以及成材的薪炭树等。“出门一把草，娃儿捡柴割猪草”是当地的传统习惯。农民们烧的主要是谷椿、麦杆、油菜杆、树叶、茅草等“毛毛柴”。麻杆、豆杆、竹杆这些“引火柴”，和树技、木柴等“硬柴”除了自己烧少数外，大部分拿到城镇去卖，是他们一项重要的经济收入。在季节安排上也十分合理：大春收获到过年，主要烧谷桩；腊月前后最冷的时候，为了满足老年人烤烘笼，烧一些硬柴；三四月间竹子落叶，烧竹叶等毛毛柴，五六月份烧小春作物稿杆。七八月分，青黄不接，最缺燃料，农民形容“笋子半中腰，有米无柴烧”，所以他们都提前作好储备，并无断炊之虞。1957 年，这个队的农户不仅燃料不缺，还卖好柴 3 万多斤。

公社化后，这个良性循环的生态圈彻底破坏。公共食堂大锅大灶，必须烧硬柴，当然只有砍树子，“毛毛柴”变成无用之物，收获季节，麦草稻草铺成“弹簧路”。深翻熏土，砍!大炼钢铁，砍！搞农具革新、修大养猪场、建工厂砍！一大二公，你我不分管区公社大家砍！树子越砍越少，柴火越来越缺。树子砍得差不多了，就挖树疙篼；树疙篼不多了，就拆房子，打猪圈，毁家具……，到 1960 年下半年，这个历年卖柴的队，还要买柴来烧。

1961 年食堂散伙时，呈现在人们面的是如此光景：4 个大林盘，一个已经消失，3 个只见杂草灌木。沿沟渠的２５００多株林木，还剩稀稀拉拉几棵一把粗以下的小树，4 个坟园上的千株古杉柏，仅留下了 5 株……。

鸟群失去栖息之地，农民失去不缺柴烧的日子和风景如画的家园。

最惨痛的是人。

大跃进给四川人民带来多大的生命损失，确切数字也许永远是个迷。

当时出自不同部门的统计数字各一，医疗卫生部门掌握的数字是 700 万，公安部门统计是 800 万，民政部门统计是 400 万。而一些干部私下流行的说法是 1000 万。

精确地统计显然是很困难的，迄今为此，各级各类人口统计表格中，1958 年到 1961 年往往是空白，原因之一是资料不全或不准确，更重要的是出于政治忌讳。

从 1959 年起，人口统计成为风险极大的雷区，温江地区公安处处长赵健是触雷倒下的一个。公安部门负责管理户籍，按规定每半年上报一次人口变动情况，包括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四项统计数字。从 1959 年上半年开始，专区各县普遍出现人口负增长，但各县公安部门出于种种顾虑，直到 9 月份还未将数字报齐，在省公安厅的一再催促下，地区公安处上报了 10 个县上半年的统计数字，均为生得少、死得多，这是全省第一个上报人口负增长的专区。反右倾开始后，赵健即被宣布停职检查，罪名是"谎报人口减少"。省公安厅厅长赵苍壁知道后，私下给下面打招呼，别再报人口变动情况。内江专区公安处认为情况严重，要给省厅报情况，赵说："温江都报出事了，你们还报！"。

1960 年初，四川省委下达了一个"关于加强户口管理人口统计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反右倾、鼓干劲的思想基础上开展人口普查工作。从有关金堂县的一份材料中可以了解到这次统计是如何进行的。

开始金堂县委根据各公社上报的数字统计，出现了出生少死亡多的"反常现象"，受到地委批评，要求按照省委"只有生得多、死得少、没有生得少、死得多"的精神重新统计。金堂县委召集各区、社干部开会，传达省委精神，反复强调"人口统计工作的重大政治意义"，批评死亡数字大的区社是"对人口统计工作的意义认识不足"。大家听明白弄不好要戴右倾帽子，赶紧重新"调查"。土桥区 6 个公社原报出生人口 1800 多，死亡 3800 多，重新"调查"后，死亡数大大减少，反正无法到阎王的生死薄上核对。有的公社的统计一而再、再二三被打回，先后"复查"１１次，直至"生得多，死得少"才算完事。

情况如此之复杂，只有依靠最权威的资料作出判断。根据 1988 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口》四川分册的统计，1957 年全川人口为 7081 万，1961 年为 6459 万，1958 年到 1961 年 4 年间净减人口 622 万。这意味着什么呢？从 1950 年到 1957 年的 8 年中，四川人口平均增长率为 19.1‰， 按此计算，在正常情况下，1961 年全省人口将达到 7637 万。而实际上这年的人口为 6459 万，也就是说，饥荒造成的死亡和减少的出生人口共计 1178 万。

上述情况和全国相比说明什么呢？

四川饥荒延续时间最长。全国人口只有 1960、1961 两年呈下降，四川是 1958

－1961 年连续 4 年下降。

四川死人最多。全国 1959-1960 两年净减少人口 1348 万，四川同期净减人口 458 万；全国 1958-1961 四年间净增人口 2642 万，四川同期净减人口 622 万。这段时期，四川人口死亡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一倍以上，死亡率最高的 1960 年达到 59.97%，死亡人数达到 364.74 万人。

就全省范围来说，死人最惨烈的发生在那些农业生产条件差、当地主要领导又特别想出政绩的地方。以专区计，涪陵专区无疑是全川也全中国死亡比例最高的地区。据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回忆，1961 年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苗前明告诉他，“(涪陵）全地区加在一起死了 350 万”。(见廖伯康:《回忆四川萧李廖事件》当代史资料 2004 年 1 期）这是个令人恐怖的数字，占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该地区人口的一半以上。另一个公开发表可资佐证的数字是，1953 年涪陵地区人口为 422 万，12 年以后的 1964 年人口为 372 万。上世纪 80 年代陆续出版的县志中，该专区大部分县都未公布大跃进期间人口变动数字，只有涪陵县是个例外。据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 年出版的《涪陵县志》公布的数字，该县 1957 年人口为 795，998 人，1961 年为 532，801 人，四年间净减 266，797 人，减少率为 33.5%。专区所属的丰都县，3 年死于“肿病”的就有 10 万余人（见《丰都县卫生志》1986 年）。但作者未能掌握全专区的准确数字。

雅安专区是又一个重灾区，所属的荥经县死人最严重，县委书记姚青因此被判刑（作者注：雅安地委宣传副部长刘恩 1959 年因为到荥经县调查死人情况并写成报告而被打成“三反分子”，县委书记姚青到职不到半年，便因死人太多，于 1960 年被捕判刑）。据 1998 年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的《荥经县志》公布的数字，该县 1957 年人口为 123，717 人，1962 年为 69，656 人，五年净减 54，061 人，减少率为 43.7%，是迄今公布的全国死亡比例最高的县。

而全川绝对死亡数字最高的县，是以发明“蒸汽疗法”治疗肿病而闻名的简阳县。据巴蜀书社 1995 年出版的《简阳县志》公布的数字，该县 1957 年人口为 1，233，232 人，1961 年人口为 864，034 人，净减 369，198 人，减少率 29.9% 。一个县四年减少近 37 万人，在全国已经公布的记录中绝无仅有。

占尽天时地利的温江专区算不上死人最严重的地区。据当时的统计，温江专区非正常死亡人口约 50 万。但这至少是最低限度的数字，根据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温江地区历史大事记》(成都出版社 1995 年出版)的统计，全区人口 1957 年为 494 万人，1961 年为 433 万人，4 年净减 61 万人。据此推算，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的约为 90 万人。

以下是 20 世纪 80—90 年代中国公开出版发行的县志中，有关温江专区各县大跃进期间人口统计。

县别	1957 年（人）	1961 年（人）	净减（人）	减少率	资料来源
郫县	281512	231318	50195	17.8%	《郫县志》
崇庆县	446630	402323	44307	9.9%	《崇庆县志》
邛崃县	452756	378001	74755	16.5%	《邛崃县志》
灌县	350873	321645	29228	8.3%	《灌县志》
温江县	167751	143065	24686	14.7%	《温江县志》
金堂县	521201	492986	28215	5.4%	《金堂县志》
新津	187419	151733	35686	19%	《新津县志》
双流	535582	443085	92497	17.2%	《双流县志》
彭县	533404	466385	67019	12.5%	《彭县志》
新都（含新繁）	341465	293919	47546	13.9%	《新都县志》
蒲江	149586	127630	21956	14.7%	《蒲江县志》
什邡	299369	247498	51898	17.3%	《什邡县志》
广汉县	355143	306216	48927	13.8%	《广汉县志》
大邑县	346661	281491	65107	18.8%	《大邑县志》

各县总计，1957 年人口为 4，969，252 人，1961 年人口为 4，287，295 人，四年减少 681，957 人，减少率为 13.7%。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些年最出风头、先进经验出得最多、受表扬最多的县，恰恰是人口死亡率最高的，如郫县、邛崃、新津、双流、什邡、大邑；而问题反映得最多、挨批评最多的县，往往是人口死亡率最低的，如崇庆、灌县、金堂等。“天府之天府”的郫县四年间人口由 28 万降至 23 万，净减 5 万，属温江专区的重灾区之一。毛泽东亲临视查过的红光社死人惨重。根据温江地委工作组 1961 年的一份调查材料，该社 1958 年有 4020 人，在庆祝毛主席视查红光社 3 周年的日子里，还剩 2775 人，净减 1245 人，少了三分之一。

作为大饥荒的典型结局之一，是男女比例的变化。由于生理和劳动强度的差异，饥荒中男性死亡率高于女性。一个大跃进，温江专区由男多女少变成女多男少。以郫县为例，1957 年男性比女性多 4 千人，1962 年，女性比男性多近万人。

另一个结局是大批孤儿出现。据 1961 年的一份统计，大邑安仁公社有１５岁以下孤儿２５１名，其中７岁以下的２６名，绝大多数孤身一个。公社成立了“爱幼院”，收容了其中７０名，其余有些被人收养，有的四处流浪。

48、秋后算帐

1962 年温江专区最早感觉到春意来临的，无疑有曾笳、申培林、景廷瑞三位著名的老“右倾”，时至今日，他们是对还是错历史已经做了结论，中央正在纠正错误，省里正在总结经验教训，拖拖拉拉的干部甄别平反工作加快了步子，看来翻身的日子总算到了。

关于甄别干部的工作早在 1961 年《60 条》下达时就开始了，毛泽东那时说，1959 年不该把反右倾斗争搞到群众中去，提出要对几年来批判和处分错了的干部、党员甄别平反。

1961 年 6 月底到 7 月初，在贯彻中央精神的省三级干部会上，宋文彬谈到曾笳的问题，李井泉插话说：“关于速度问题对曾笳的批评，是我们批错了，请转告曾笳同志”。什么是速度问题，它包括哪些具体内容，除此之外，哪些又是批对了的呢？宋文彬猜不透。猜不透的事他就放一放，等局势明朗。7 千人大会后，中央一再重申，局势很明朗。3 月，地委正式通过对曾笳的甄别意见，《意见》列举当时安在曾笳头上的种种罪状，认为他当时的意见“基本上是对的”，其错误在于“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不过这些缺点错误曾笳同志已做过检讨并已经有所改进”。所以“原结论为很严重的、一系列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错误的，应予修改。……我们的意见，不给处分，恢复原职”。

李井泉的批复是同意撤销处分，但不恢复原职。

其实撤销处分都是形势所迫。因为曾笳有一条不便见诸文字的、不可饶恕的罪过——因为反对万斤田在大庭广众之下和他公开顶撞。所以只能维持原判，永远做靠边站的副专员。同样的道理，申培林居然敢组织人调查，揭他一手制造的万斤样板田的老底！温江地委要求恢复申培林农工部长的职务，也被李井泉拒绝，永远坐冷板凳。没有直接冒犯过他的景廷瑞待遇稍好，加上是雇农出身，恢复了宣传部长职务。

甄别是甄别了，“错误”永远存在，就象右派摘了帽子，还是“摘帽右派”。你总是犯过错误，犯过和党的路线——不论是对的还是错的——不一致的错误。所有甄别平反的干部，或多或少都留有一条“事出有因”的尾巴，以证明整你是有道理的。这条尾巴很重要，它事关整人者地位的稳固，是挨整者不可重用的理由，一旦需要，还可以拖出来再整。他们翻身的日子还早着呢。

从 1960 年底开始，报纸上突然大肆宣传 1960 年全国遭受“百年未遇的严重自

然灾害”，使老百姓知道所有的困难都是天灾造成的。有关自然灾害的宣传逐步升级，到这时后 1958 和 1959 年天灾也冒了出来，“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很快流行起来，成了三年大跃进的代名词。报纸还告诉人们“如果没有人民公社，遇到这样的灾年不知要死多少人！”这时有关苏联逼债、落井下石的罪行尚未公开，老天爷承担饿肚子的全部责任。

1962 年 3 月开省人代会时，参加会议的四川省气象局局长姚国士接省委农工部长杨万选交待的任务，要他写发言稿从“气象科学”的角度，阐明四川自然灾害的严重性，反映温江专区遭受的严重旱灾，到大会发言。

就这“气象科学”四个字把姚国士难住了，他是干革命出身，但是对科学很崇敬。从科学的角度讲，就要引用气象数据。数据显示，四川年年有旱灾，主要发生在川东、川北的山区地带，大跃进期间并无特别严重之处。温江专区更不能讲，省气象局在温江、郫县都设了观测站，气象资料完整，可谓风调雨顺，再说，温江坝子是自流灌溉区，老天爷不下雨的问题李冰父子两千多年前就解决了嘛。

他去找省人委秘书长诉苦，说这个问题“从政治上可以讲，从科学上不好讲”，科学就是科学，总不能让我改数据啊！对方无计可施。小组会上他又发牢骚，说三国演义上诸葛亮称益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天下莫可及，谈什么天灾?曾经在四川日报上发表文章，称四川 1959 年要搞 1 千万亩万斤田的省农业厅长赵孟明，也满腹牢骚的唱合“讲得好！讲得好！”

他不明白，科学数据也是可以根据政治需要修改的。他坚持按资料反映的情况实活实说，第一稿通不过，第二稿还是通不过，幸好中央气象局通知开会，他才如获大赦得以逃脱。稿子由省委农工部直接修改，署名仍然是四川省气象局局长姚国士，由气象局副局长李寅登台宣读。姚国士回来看了讲稿差点没晕过去：这叫什么科学？

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两年后的四清运动姚国士被揪出，罪名之一是反对李井泉、反对讲三年自然灾害，撤职、降级、留党察看。

1962 年 6 月，到北京参加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重庆团市委书记廖伯康、副书记于克书——在此之前他已经给毛泽东写了匿名信，决心向上反映四川这几年的真实情况。通过团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德林从中搭桥，廖得以有机会和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单独会面。廖谈了三个小时，胡耀邦边听边记，然后将他笔记交给团中央的另一书记胡克实，由胡克实整理了一份简报报送中央书记处。又亲自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扬尚昆做了口头汇报，并建议杨尚昆直接找廖伯康谈。1962 年 6 月 26 日下午，杨尚昆召集廖伯康、于克书二人谈话，开门见山就叫他们实话实说，不要跟他“打太极拳”。

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很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

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 400 万，实际上这是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那时的粮票、布票、煤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擦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死了 800 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

廖汇报说，根据他们的统计，四川死了 1000 万人以上，并讲了统计的依据。杨尚昆听了后，叫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拿出一个旧式摺叠帐本式的本子，翻开看了以后说："就是你这个数字！"

这次谈话几天后，杨尚昆在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汇报了四川的问题，并转达了廖伯康提出的中央派司局级干部到四川做深入调查的意见。因为派部级干部去要报告省委，司局级干部则不必。邓表示同意。杨尚昆遂与中组部部长安字文选调了以四川籍为主的 17 名干部，"以返乡探亲访友的名义进行暗访式调查"。这批干部下去才一个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形势急转直下，调查结果也就胎死腹中了。

接下来倒霉的是廖伯康等人。于克书给毛泽东的匿名信由杨尚昆批送在京政治局委员阅后，又落到李井泉手上。李下令追查，牵连到有"右倾"言论的一大批人，最终重庆市委组织部部长萧泽宽、市委办公厅主任李止舟、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廖伯康被定性为进行右倾"反党活动"，成为当时与"邓崔陈反党集团"（泸州地委书记邓自力、书记崔章、专员陈怀堂）齐名的"萧李廖事件"。被李井泉认为"最坏"的廖伯康撤职留党查看、下放建筑工地劳动；李止舟撤职到砖瓦长当副厂长；萧泽宽调任农村工作团副团长，在工作中接受"监督改造"。于克书等人虽然"榜"上无名，也是按反党集团成员处理的。（见廖伯康：《回忆萧李廖事件》当代史资料 2004 年第 1 期）

49、1962 年

1962 年在新中国历史上是个特别的年头，自 1956 年以来，国家政治气候从没有象这样宽松过，几年累死累活出力不讨好的干部们日子请闲，嘴巴松散。县以上干部分期分批进省党校"轮训"，发扬民主、总结教训，"冷静地思考一下"，这些年都干了些什么傻事。主持轮训并代表省委做检查的李大章保证"不戴帽子、不抓辫

子、不打棍子”，还给大家拍胸脯：有话仅管说，哪个敢打击报复，你直接来找，“除非他不要党籍！”大家就把憋了几年的牢骚都发泄出来，什么修锦江宾馆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李井泉的红顶子是四川人民的鲜血染红的”等等都冒出来了。最让大家痛心疾首的是死人，有人不依不饶，穷追不舍，一定要李大章讲清楚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四川的情况到底给中央讲清楚没有。同样的事情在这年的人代会上也发生过。李大章只好讲老实话：

你们都是从县、地委来的，县里死了多少？地区死了多少？你们不是比我更清楚吗？你们县上有多少人，问你们县上的民政部门、公安部门、管粮食的、发布票的、管户口的都知道，瞒不了的。通过条条一年两报，中央也是知道的，欺骗不了中央的。四川几个死人多的，一是雅安，一是涪陵，一是江津，这次人代会上，几个死人多的地区，一个钉子一个眼，被逼得很紧，不讲也不行。你们问我（指全川的数字），我只知道非正常死亡很大，为什么不向大家讲，是因为中央主张不讲好。这不是中央护短，是因为讲了以后，有好处还是有坏处？这就要考虑讲好还是不讲好，讲有利还是不讲有利。（见《李大章同志在轮训干部班第二期全体干部会上的总结报告》1962 年 6 月 18 日）

文革初期，省委书记廖志高宣布“整 62 年的问题”，在党校放过炮的个个脱不到手，连李大章也被搅了进去。

省里检讨了轮到专区。1962 年 7 月，温江地委召开县级以上干部大会，第一书记宋文彬，地委书记、专员宫韫书代表地委作检讨，一字一句传达毛主席在 7 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发扬民主，畅所欲言，营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假面具一旦撕破，原来没几个是真正的左派。

“说是老实人不吃亏，结果老实人总是吃亏”。

“想起老百姓受的苦伤心，想起好人挨整寒心，想起今后咋个变担心”。

“这几年的日子是‘开门看天色，出门看脸色，开会坐边边，说话选中间’”。

“交了党费就没有发言权了”。

“错误 4 个字：高、大、急、共”。

“‘得不偿失’如何解释”？

“郫县是李政委的问题，他检讨不深刻”。

“大章同志检查不好，应该是李政委检查。四川是左，但一直反右”。

“什么脚上、膝上、腰上，省委对中央的指示打折扣”。

“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头大了”？

“李政委说团结起来犯错误，是要大家统一口经，把责任推给下面”。

“主要问题在省委”！

“温江专区工作是主要的，天灾是次要的；错误是主要的，成绩是次要的”。

“肿病 1954 年就在崇庆县发生，总不承认是粮食问题”。

“把一批弄虚作假的干部提拔起来，比如刘致台、潘克之、郑凤兰”!

“曾书记为什么不平反恢复工作”？

“甄别留尾巴，什么意思”？

“话是说了，信心不足”。

…………

（见宫韫书工作笔记，1962 年）

虽然对层层担过不服气，各县照作检讨。郫县问题最大，早在 1961 年底县委就开始作检讨。刘致台给省、地作了书面检查， 7 千人大会后被撤销地委书记职务，仍回郫县任第一书记，高义禄降为书记。代表县委向全县干部作检讨的是县委书记王知琛，有些话讲得意味深长。

浮夸、瞎指挥、共产风在公社化之前，就栽下根子了……。这几年我百分不打了，电影不看了，觉也少睡了。我们县委的同志都可以想一想，我们工作干得很多，而干得很坏，我们不能原谅自己！……我们国家是一穷二白，我们要求多一点，快一点是对的，但决不能干拔苗助长的事。我们想在一个早晨把所有的好事都办完，那就要出问题了。如果我们面对现实，一步一步地来，那我们郫县现在是一个啥情况？那我们会一天带半斤粮来开会，把腰带勒得这样紧吗？这是付出沉重代价的教训。

老百姓没有心思关心上面的事情，他们操心的是自家的生计。沾大跃进的光吃上皇粮的大批干部工人“招之而来，挥之则去”，精简压缩回乡充实“劳动力”。 温江专区下放大队以上干部 23000 多人， 工人 3 万多人，80％以上工厂关门，保留下的大部分还是公私合营时的小厂。精简压缩很顺利，许多人甚至是不辞而别跑回去的。风水轮回，农村现在确实有搞头了，农民有了自留地，可以到自由市场做生意，日子眼看着就滋润起来，工人、基层干部一个月二三十元工资，当不到农民卖一只鸡、一挑菜，有什么好留恋的？

对城市一般人来说，最令他们垂涎的是多年不见的传统食品的起死回生。成都市的名小吃珍珠元子、赖汤元、麻婆豆腐、龙眼包子等待重新开张，家喻户晓，勾起人们对往日吃过的美食的联想 ，孩子们传唱着种种关于美食的儿歌：

乒乓乓，一炮三响，

龙抄手、钟水饺、熟油辣面，

夫妻肺片、川北凉粉儿，

熟油辣子多搁点儿，

哎依儿……多搁点儿……

被长期饥饿折磨得功能衰退的肠胃，在新的刺激下日益活跃，吃成为压倒一切的话题，无事聊天，朋友见面，亲人聚会，不分场合三句话不离一个“吃”，各自数落当年吃过的好东西，“……啧啧，好巴式哦”，美其名曰“打精神牙祭”，打得清口水吞都吞不赢。街谈巷议的流行赌博活动是赌吃：我一顿吃 3 斤米，吃不完赔 6 斤！“七把叉”式的英雄大批涌现，某某一口气吃了 3 0 个包 子，饱嗝都不打；某某整吞了 6 0 个鸭蛋；某某喝了 5 斤生清油；某某吃了 7 斤猪肉还嫌不够……，因此活活胀死的时有所闻。

流行歌曲改编为成吃的主题。陕北民歌《崖畔上开花》原词是：“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盼着那好光景……”，变成了“案板上，切腊肉，有肥又有瘦，你吃肥我吃瘦，妹娃子啃骨头”。一首颂歌原词是：“蓝天上飘着一面大红旗，看见了红旗想起了毛主席，我们苦难的中国人民自从有了你……”唱成了“蓝天上飘着一块大肥肉，看见了肥肉口水往下流，我们苦难的中国人民 3 年没吃肉 ……”。

借苏联电影《难忘的 1919》语风，到处流传“难忘的 1957 年”。城里人回想起来，1957 年的生活犹如天堂一般，吃饭不要粮票，油、肉副食随便买，香甜辣麻咸想吃啥有啥，价钱又相因，用当时的工资可以买到数倍于现在的食品，而几年来工资一点没涨。

幸福的回忆还不仅仅这些，肠胃稍加整顿，休息时光渐渐多起来以后，人们突然发觉除了吃之外，还缺少点什么。几年来，电影院里尽是大跃进的纪录片，老戏禁演了，名角们不见了，回肠荡气、韵味无穷段子曲儿听不到了，深入生活的“文艺工作者”们没见到生出什么灵感，所谓作品无非是些大跃进宣传广告。而这几年久违了的文化生活几乎一夜之间都复苏过来，一时间戏院电影院场场爆满，单位里周末又响起了“蹦嚓嚓”……

在人们敢于发泄不满，有了更多选择自由的同时，实际上一切都在发生变化。四川省委还在装摸做样征求所谓“群众愿意以大队核算还是以生产队核算”的民意时，包产到户已经象野火一样烧起来了，边远山区包产到户的多达十之三四，温江专区给省上报告说有 10%，实际远不止。

和这种“倒退”现象同时发生的是生活条件的迅速好转。1962 年 4 月，曾箔的妻子、专区妇联主任宋立华向地委报告，农村妇女健康情况比去年好多了，大部分经期妇女来月经了，生孩子的、怀孕的妇女大大增加，婴儿能吃上妈妈的奶了。这一来又出了新问题，这几年草纸供应几乎断绝，幸好没几个妇女来月经，农民拉屎习惯用篾片刮，克服了困难。大批妇女来月经，困难就大了，“有了月经又没有纸又没有布，实在无法收拾。”宋立华呼吁“请地委指定有关部门立即动手收回一切废纸，指定各县加工搞一点纸，哪怕质量差一点也可以”。生孩子的妇女意见更大，说政策规定生一头小猪补助 5 斤米、几斤肉；交 1 0 个鸡蛋能换半斤米，女人生个人什么

都没得，还不如母猪母鸡。地委就规定农村产妇补助３０斤粮。宋文彬得意洋洋地在大会上宣布，郫县县委办公室主任王春莲７月份生了孩子！考虑到几年来农村死人太多，又决定“计划生育过两年再提”，后来称之为“补偿性生育”。

从 1958 年以来，这是专区各级党政机关对农事管得最少的一年，也最最令他们开心的一年。大春收割前，各县的头头们信心十足给地委拍胸脯，“增产不成问题，而且增幅不小”，这次他们既无浮夸之心，也无瞒产之意，没有谁逼他们这么做，在落实口粮的基础上完成征购没什么大问题。年终一结算，粮食较 1961 年增长 3 成，生猪翻了一番，一个个眉开眼笑，大喜过望，一致评价今年的形势是：“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农业生产大幅度回升，市场繁荣，社员生活显著改善。”

生活的迅速改善加剧了农民对“一大二公”的抗拒心理。这种从 1961 年纠左以后发展起来的，以包产到户为代表的政治倾向，早就被中央觉查。1961 年底，中央就发出了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通知，通知说：“要给农民讲清，这几年农村工作中出现过的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不但造成了群众的损失，也损害了集体经济。不能把这些错误作风，同集体经济，同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混同起来”。并要求纠正包产到户。但农民偏偏要把大跃进的失败归罪于“根本制度 ”，他们是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一切以切身利益取舍。一般性的、不带强制的教育对他们不起作用，空子一旦出现，他们就蜂涌而入，几成溃堤之势。

兴旺发达的自由市场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传统的集市全部恢复，回到传统的场期，脚杆勤快的天天有场可赶。对农产品进入市场的限制完全失控，粮、油、肉、烟、麻、糖纷纷上市，国营商店里紧缺的工业日用品应有尽有，市场商品日益丰富，价格逐步下降，把大批曾经不敢问津的消费者卷入其中，成交量日新月异。各县纷纷向地委反映“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控制原则难以贯彻，市场“吸引力太大 ，有泛滥的趋势，管不住的危险”。

经商成为大热门。蛰伏多年的商人纷纷崭露头角，把交易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展，一批“暴发户”开始出现。“做生意”成为越来越诱人的字眼，“资本主义”的农村向城市步步进逼，温江专区所包围的省城成都现在面临的不是进城抢购求生的饥民，而是拉车挑担源源提供农副产品的农民，市郊迅速形成几个大型自由市场。弃工弃农弃学经商者皆有，跨县跨地区甚至跨省的生意的生意都做起来了，“跑西安”成为做生意的代名词，类似８０年代“跑广州”。广汉北外公社一个生产队７７个评级劳力，７３个在外做生意。金堂云绣公社一个２８户的生产队，２４户经商，近者成都，远则西安，剩下的４户“老弱户”只是跑不动而已。彭县通济公社一个生产队会计“跑西安”成了腰缠数千元的暴发户。新繁新民公社一个社员就养了 250 只鸭子。许多生产队办起了集体企业，崇庆三江乡乡场上新开张的８０多个门市部，有５０多个是生产队开的，饭馆、羊肉汤锅、日杂土产百货粉坊酒厂五花八门，生

产队长俨然老板，嘴上刁着纸烟，上街吃肉喝酒一晕二饱拍拍屁股就走。

生意人成了社会名流，干部身份贬值。新津邓双、顺江两个公社的党书记要求归田，抱怨公社书记是“一只鸡干部”（工资只够买只鸡），是“刮家”干部（作者注：川西口音“国家”和“刮家”同音，意为国家干部靠家庭补贴生活），吃的是“家拿”大（加拿大）米，“削家”（雪茄）烟。新繁新民公社一个大队长天天赶场做鱼网生意，说：当个县委书记一个月才百把元，我一天就挣几十元；队长罗兴安在禾登乡乡场上开挂面厂，做传统的金丝挂面，还雇了孤儿当帮工。温江升平公社文书退职回家办家禽饲养场，穿上了毛料衣服，吃饭“不定量”，其他公社干部好生羡慕，说“人家弄端了”。集体商业企业大受冲击，全专区有一半人员退出搞私营，剩下的“眼红心热”，“身在曹营心在汉”。有的挂羊头卖狗肉，“资本主义成分占百分之七八十”。新津县供销社主任养 7 头大肥猪卖高价，声称“两条腿走路 ”。

解放以来一鼓荡平的“社会沉渣”大量泛起。新繁新民公社土改时家家户户神龛上挂的毛主席象，“相当一部分”被“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取代。金堂云顶山荣华祖师“显圣”，朝山拜佛达数万人，盛传前几年生活不好，是荣华祖师上天“汇报”去了，今年生活好是祖师回来了。温江三圣公社大队女支书胡秋云死了男人，请 8 个道士念了三天经。新繁禾登乡乡场上算命摊子生意兴隆，道士“万里红”算出“共产党天下不长了，要分田了，啥子都要跟从前一样了”。一个又老又瞎的算命先生，还讨了个 1 9 岁的女娃子。

大邑安仁公社有 4 8 个生产队“摆赌场”，一个生产队会计一次就输了一件毛衣、两只手表；广汉北外公社“一半社员赌博”。大邑王泗公社一个大队支书抽大烟、开“地下烟馆”，邛崃井溪公社 1 7 户讨小老婆，其中还有大队支书；新津供销社一个党员干部讨了两个老婆，“大老婆还给小老婆洗衣服”。县城里出现了“梭叶子”（暗娼），专门“搞垮”司机、干部。新津仁和供销社 1 1 个干部 9 个乱搞，花桥粮站 10 个职工 7 个乱搞，包括站长和支书。大邑新场公社一个大队支书跑西安常携一姘头，绰号“三七开”（三分长相，七分打扮）。

“阶级观点”日渐淡薄。新繁新民公社敲了“沙罐”的地主兼袍哥头子韩焕和（四川土话称枪毙为“敲沙罐”）4 个女儿全部“打入革命阵营”，大女儿嫁给解放军军官，军官回丈母娘家把生产队长“训一顿”，批评说：“地主改造了这么多年却没改造好？还要当敌人看待？”二女嫁给成都一家工厂的车间支书，支书一结婚就要求退职回家。三女嫁给铁路上的一个党员工人，被她弄回家上门。四女又嫁给了民警队战士。一个女共青团员立场不稳，死活嫁给管制分子。生产队长，党员曾孝全土改时斗反革命分子付苏云立场坚定，付受不了说：“曾孝全，我死了都在鬼门关等你”，曾答：“老子杀你都不用抽刀！”今年二人打了干亲家。

一些干部“怕蒋介石回来脱不到手，政治上动摇，忧心忡忡”。随着报上不断报

道“蒋匪窜犯东南沿海”的消息，这种忧虑似乎加深了。新繁新民公社一个大队支书对大队长说：我是支部书记，相当于解放前的保长，你大队长等于副保长，蒋介石回来先杀我，后杀你。他自己花钱买了 3 百多条晒席给社员，说是“现在做点好事，免得将来杀头”，弄得全大队党员都“背了这个包袱”。高宁公社一个支部书记请地主吃饭，说：过去斗你是执行上头的命令，“以后蒋介石回来，帐不要算在我头上啊。”，一些党员“胆战心惊”，公开要求退党，有的声称“我早就不是共产党员了，蒋介石回来也没来头，看总有些人脱不到爪爪。”（见温江地委办公室：《关于当前阶级斗争中部分基层组织的材料》，1962 年 10 月 30 日。）

这些在当时的“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材料中披露的情况，并非当时农村的主流现象，事实上农民真正梦寐以求的是分田。和中央一个通知，食堂便一哄而散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社教”中纠正包产到户遭到强烈抵制，农民甚至对包产到户都不满足，他们巴望象土改那样重新分田。他们心目中的黄金岁月不是 1957 年，而是合作化前的 1952 年。

“远看五二年，近看自留田；要得生产好，除非再分田”；“要想宝，除非分田自己搞；要想富，田坎加宽当马路”（作者注：当时规定农民可利用田坎自种自收）之类的顺口溜广为流行。在四川合作化的典范新繁新民公社，社教工作组的民意测验表明，“坚决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社员只占三分之一，党员有一半“动摇”。有人说怪话：“共产党把田卡得梆机巴紧，产量又低，不如分给我，要不然租给我种算了。有人赌咒：“食堂垮了，人民公社肯定也要垮，我睁起眼睛看，人民公社一年不垮一年不得昌盛！”社长罗世发从北京开人代会回来，有谣传说：“北京开人民代表会，毛主席定了 100 条，罗世发显屁儿白，只传达了 99 条，只有分田单干一条没有传达。”于是就有人打赌， 8 月不分， 9 月肯定要分，如若不分，“输 4 桌酒席把你几爷子吃得昏昏然”。（见温江地委工作组：《关于新繁县新民公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报告》，1962 年 10 月 28 日。）

不见政府有什么动静，有人就主动请愿。大邑鹤鸣公社一个生产队的干部社员联名写信给公社，要求退田退牛搞单干，理由是政府“早就说过入社自由、退社自由”。他们不知道政府早就不这么说了。有人干脆干了再说，温江三圣公社王石大队支书王南丰组织分田，社员在田头立起界石。有人为包产到户大唱颂歌，大邑安仁公社一个大队总结出包产到户的 4 条经验：社员好商量；干部少操心；干部不得贪占；省了评工记分麻烦。

眼见单干风刮得如此历害，就有忧国忧民的干部苦苦思考，想探索进献既为农民接受又无损国家利益的良方。温江县有干部发现殷周时代的“井田制”和现在的农村生产关系有类似之处，建议古为今用：土地归国家公有，分配给农户耕种，收获归已，是为“私田”；另置“公田”，由生产队集体耕作，收获归国家，“公事毕，

然后敢治私事”，公田有定额，不足各户分担云云。

现实点的基层干部，觉得退到初级社已经够意思了，他们最放心不下的是哪天一股风下来，又要喊向高级阶段过渡。多少年的宏伟规划，多少年不变的话他们听多了，也变多了。人民公社《６０条》至今还是“草案”，随时有“修正”的危险。“社教”干部宣传以小队核算３０年不变，他们就吊二话：“３０年不变，那还看不到，象现在这样子，３年不变就对罗。”，“国家的事，你说不变他要变，他要变你敢不变？”。

50、年年讲、月月讲

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很理解农民的心情。1962 年 5 月２４日，他给中央和毛主席打报告，说下面一些干部把小队核算３０年不变当做“权宜之计”，总想伺机过渡，所以应当立法，３０年内侵犯个人、集体所有权的要依法治罪，又说把 20％的土地划给农民没有危险，应当允许。7 月 1 日 他在中央党校的讲话，提出通过立法保护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限制政策的随意性的多变性。他说：老百姓不相信 30 年不变，因为你们说 1 天等于２０年，３０年才 1 天半，总而言之，我们现在没有法。“今年这样，谁知道明年怎样，孙猴子７２变” ，“既然３０年不变，为什么不立法呢？”“前两年天天革命，这还象话……怎么能年年革命呢？”“农民并不傻，事实上自己是大傻瓜”。(见邓子恢:《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1962 年 7 月 11 日。)

6 月下旬，中央书记处开会，邓子恢发言支持安徽的责任田，邓小平在发言中说出了后来广为人知的那句名言：“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可以采取各种办法，安徽省的同志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耗子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试试看”。

1962 年 3 月，田家英受毛泽东之托，组织了 17 人的工作组，分兵三路到毛泽东的家乡韶山大队、毛泽东外祖家湘乡唐家圪大坪大队、刘少奇的老家宁乡炭子冲大队搞调查。田家英当时并不赞成包产到户的，但出科他预料的是，社员要求包产到户的呼声极高，事实使田家英的思想起了变化，并把调查情况如实写进了调查报告中，田家英将报告分别送毛泽东、刘少奇和陈云。刘少奇认为很好，陈云读得很

称赞。毛泽东却表现冷漠，大概连报告都没看，听了田家英的口头汇报后说：“我们是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田家英结束调查于 6 月回到北京时，包产到户的舆论在中央已成声势，只等毛泽东表态。毛泽东的一贯立场大家都清楚，只是寄希望于他在闯下如此弥天大祸后能够有所转变。然而毛泽东的态度让人揣摩不透。鉴于 1959 年庐山会议的教训，没人愿意当出头鸟，都在小心翼翼地做着试探。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见田家英，田家英系统地讲了自己的意见，说现在全国已经有 30%的农民包产到户，并有继续扩大之势。与其让农民自己去搞，不如有领导的去搞，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毛泽东静静听着，一言不发，等田说得差不多了，突然问道：“你是主张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田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毛又问：“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田答：“是我个人的意见”。毛再也不说什么。田悻悻地从游泳池出来，对逄先知说：“主席真厉害。”

被召见到中南海游泳池的还有刘少奇。刘少奇赶到后向游泳兴正浓的毛亲切问候，池子里的毛却声色促厉地质问刘：“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吃了一惊，觉得这样一个岸上一个水中不便谈话，便坐到池畔的椅子上，等毛起来坐到旁边，才解释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毛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作者注：1962 年 2 月和 5 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两次开会——毛泽东未参加，充分估计了当时经济上的困难，作出了大幅度 调整的决议。两次会议均在中南海西楼召开，统称西楼会议）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双方的情绪都很激动，刘少奇显然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冲口而出：“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毛提醒刘，作为他指定的接班人，他们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我死了以后你怎么办？”最后刘提出以下方案：“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毛同意继续进行经济调整，刘“总算长舒了一口气。”（见高晓岩：《刘少奇、毛泽东和四清运动》，见《南方周末》1998 年 11 月 20 日 10 版。）

下面的干部当然不可能了解这一切，要求包产到户、包产到组等进一步下放权力的呼声有增无减，尤其是基层干部。7 千人大会后随着曾希圣的垮台，安徽省委不得不动手纠正责任田，激怒了太湖县委宣传部的钱让能，他提笔给毛泽东写报告，力保责任田。他说，大跃进三年太湖县“荒、逃、饿、病、死一字不漏”，推行责任田后，“奄奄一息”的人民莫不欢腾鼓舞，在大旱的情况下，一年时间内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现在“急急忙忙收责任田，吵吵闹闹指责是单干”，违背了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的心愿，“哪有马克思主义者怕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大众的道理呢？”

1962 年 8 月 2 日，毛泽东不动声色的批转此信：“安徽太湖县、县委、宣传部

钱让能同志，给我一封信，请大家研究”。接着就动身到北戴河主持中央工作会议。

这是暴风雨前的寂静。

1961 年以来，因为大跃进的惨重失败，他已经做了无数的忍让和退却，现在他已经到了悬崖边上：彭德怀写了 8 万言的“翻案书”，歌颂不惜丢官舍命为民请命的大清官海瑞的《海瑞罢官》在上演，1957 年收拾规矩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开始蠢动，学术界、文化界出现 1956 年以来未有过的活跃，农村包产到户、单干风屡禁不止。从党内到党外，“翻案”暗流涌动，翻 1959 年庐山会议的案、翻 1957 年反右的案、翻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案……牛鬼蛇神纷纷出笼。

他已经没有退却的余地。他要力挽狂澜，扭转乾坤。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阶级和阶级斗争。毛泽东一开始就给会议定下了调子。

“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不要？”

“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

“全世界合作化，我们搞得最好。”

“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场。”

“这是无产阶级和富裕农民的矛盾，……这次无论如何要解决这个问题。” [55]

“从现在起以后要年年讲阶级斗争，月月讲，开大会讲，党代会要讲，开一次会要讲一次，以使我们有请醒的马列主义头脑。”

气氛急转直下，尤如 1959 年庐山会议的再版。再此之前，连田家英都摸不准毛泽东的想法，更徨论地方的干部了，他们大部分还沉浸在纠左的激奋之中呢。8 月 9 日中心小组会上，毛泽东的口气更加严厉，一开腔就是：

“今天来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国民党干了 23 年，垮了台，我们还有几年。”

曾经在 7 千人大会上狼狈不堪的李井泉彻底站稳了脚跟。 8 月 9 日的中心小组会上，毛泽东说：“高指标、高征购、这是认识上的错误，不是什么两条道路问题。”谁是立场问题呢？搞单干的曾希圣是，他“代表富裕农民”；反大跃进的彭德怀是，“因为他们的罪恶实在太大了。”

这一来李井泉就放心了。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

这种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

——摘自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公报

文革前两年，大跃进时期两位著名人物彭德怀、曾希圣先后被安排到四川，置于李井泉的监控之下。彭德怀任挂名的国防三线建设副总指挥，每逢西南局和省委举行文娱晚会什么的，他就站在显眼的地方，笑容可鞠向人们点头致意，人家却象见了麻疯病人似的唯恐避之不及。曾希圣任挂名的西南局书记处书记，无所事事，成天提着小口径步枪在成都童子街 29 号西南局干部宿舍里打鸟，继续“除四害”。

１９７９年，温江专区广汉金鱼公社率先推行包产到组。１９８２年，四川全省推广名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包产到户。

１９８０年 6 月 18 日，“广汉县向阳公社”的牌子在一阵鞭炮声中被拆下，换上了“广汉县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成为全国第一个改社为乡的地方。

积极推行农村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声名鹊起：“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

１９８０年底，解除变相监禁的前温江地委农工部部长申培林首次走上温江街头。

“申部长！”一个农民模样的人跑过来抓住他的手：“你认不认得我？”

申培林一时记不起来了。

“我是公平乡的……办合作社那阵还听过你的报告。”

申培林终于记起，此人当年是公平乡的一个初级社社长。两人打开了话匣子。

末了，老社长长叹一声：“哎，３０年啊，冤冤枉枉转了一大圈，又回到原处。如果象你当初说的那样，入社自由，退社自由，不晓得今天是啥样！”

１９８４年，全省人民公社寿终正寝。

尾声：戏剧人生

让我们看看本书所涉及的一些人物在大跃进以后的命运，也许它是这段历史的最好注脚。

李井泉：

李井泉文革前稳坐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交椅。但是他已经不谈马克思主义者的雄心大志了。他对中央打埋伏，年年向中央少报二三十亿斤粮食，说是过去吃了亏。他不顾中央三令五申，不管到哪里都带私人护士；他打麻将，玩桥牌不可以搞到深夜；他跳舞，看旧戏，看内部影片，特别爱看香港片子。

文革中造反派一起来，“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的口号响彻全川。没有哪一派保他，连最“铁杆”的保守组织都不公开提保卫李井泉。一提起李井泉搞浮夸风、共产风，“对抗毛主席指示”，是四川饿死人的“罪魁祸首”，家家有本血泪帐，人人喊打。

1966 年 11 月 13 日，李井泉在成都人民南路广场召开的群众大会作上做检讨，会开到一半，造反派冲击会场要抓李井泉揪斗，李在公安人员的保卫下脱逃。

他东躲西藏，先是到重庆，呆不下去又跑到贵阳找贾启允，然后到云南找阎红彦。偌大一个西南，竟无立椎之地，只有到他有点人缘的上海。接着被造反派抓回成都揪斗。年底，被中央送至北京西郊一个王公的小行宫什坊院“监护”，彭德怀、贺龙、彭真等一批被打倒的高层领导也关在这所“特监”里。

1967 年 5 月 7 日，中央作出四川问题决定，称李是“西南地区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西南搞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林彪说：“经过几十年的观察，李井泉最阴险，一句真心话也没有向党讲过。”

来自中央的指责绝口不提最令川民愤恨的大跃进问题。李井泉失去信任的原因，是与邓小平、贺龙、彭真、罗瑞卿等人过从甚密。贺龙与李井泉的关系更是源远流长。1966 年 2 月，罗瑞卿已倒，彭真还在金牛坝当着李井泉等人议论：“主席的错误，用车皮拉也拉不完”。

他在北京读大学的一个儿子，文革中被造反派打死，妻子肖里在关押中自杀，可谓家破人亡。

1973 年，李井泉在“十大”当选中央委员，以后他曾回四川联络旧部，到处承

认错误。打倒四人帮后，67 岁已经被折磨得老态龙钟的李井泉还试图回四川工作，声称“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来”。但是历史已不可能给他东山再起的机会，大跃进期间他在四川的错误在许多人眼里不可饶恕，他伤害的人太多，名声太臭。经历了文革浩劫之后，也未见他有多大开化 。过去他视四川地下党为异己，回四川还公开说“四川地下党不可靠，国民党来了他们会打旗子去欢迎”，引起一片哗然。当时在四川主政的赵紫阳对他的底细是有数的。传说邓小平对李此举很不高兴，批评他“不要干扰赵紫阳同志的工作。”

李井泉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顾委常委，1989 年去世，终年 79 岁。

李大章：

1965 年，身兼数职的李井泉终于放弃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职务时，没有把这个位置顺理成章的交给李大章，而是交给了廖志高。

文革初期，李大章不跑，诚心诚意挨批斗、写检讨，是省委主要领导干部中挨斗次数最多的。造反派呼“打倒李大章！”他也呼打倒李大章；呼“打倒李井泉”，他虽然反剪双手，弯腰 90 度，声音倒不小：“打倒李井泉！”

后者是发自内心的。他在四川本省籍干部中口碑甚好，他和李井泉的矛盾广为人知，就有造反派出面保他。

1967 年 1 月 29 日，四川拉开“二月镇反”序幕，李大章以“反革命组织黑后台”的罪名被军队抓捕，游街示众，关进监狱５０多天。出狱后在周恩来的要求下，不断写揭发李井泉的材料。

同年 7 月，谢富治传达：“毛主席讲过多次，李大章是可以用的”。此后毛泽东又针对有人反对李大章出来的情况说：“不行，当个黎元洪也很好，总要有个在四川有名的人嘛！”（见 1967 年 7 月 17 日毛泽东在武汉东湖召集周恩来、谢富治、王力、余立金、郑维山、杨成武开会的讲话。）1968 年李大章解放，任省革委副主任。

江青在文革中多次说，李大章是她的入党介绍人，李大章从不在公开场合认证，背地里跟人说不是那回事。实际情况是 1932 年他在当地下青岛市委书记时，同意江青的情人兼入党介绍人黄静（俞启威）发展江青入党，地下党是单线联系，他不可能直接介绍江青入党。坊间还传说他是毛和江的婚姻介绍人，有身边工作人员就此问他，他发气说：“江青是个演员，她就不会吊膀子嗦！”闻者大惊。

1976 年 5 月 3 日，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不到一年的李大章在北京逝世，终年７６岁。1988 年 2 月 3 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他为“一个忠诚的革命老战士”。

贾启允：

1965 年贾启允在邓小平、李井泉的安排下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1967 年 1 月，

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率造反派夺权，成立省革命委员会，成为继上海之后全国第一个“夺权”的省。人民日报为此发表“西南春雷”的社论。

据贾启允自己统计，1967 年到 1969 年两年间，被批斗 700 多次，90 度弯腰 1500 余小时，平均一天斗一次，弯腰两小时。这个纪录在省委第一书记中绝无仅有。

1975 年，邓小平提议贾启允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这是件苦差。云南文革以来已经死了三个省委第一书记，第一个阎红彦自杀，第二个谭甫仁被枪杀，第三个周兴按贾启允的说法是“指挥打派仗累死”。

贾启允也没落得好下场。

贾启允上任前，邓小平召集李井泉、廖志高、贾启允谈过一次话。问题就出在这次谈话上。

1976 年批邓时，邓小平的一条主要“罪状”，就是他在这次谈话中对贾启允说：“你到云南工作，人家骂你搞复辟了，你的工作就搞好了。”此话是怎么传出来呢？

打倒“四人帮”后，有人状告中央，称此话是贾启允当时向“四人帮”揭发的，事情就麻烦了。贾启允一再申辩说，邓小平根本没有讲过此话，他也从未说邓小平讲过此话。对方也一口咬定就是他揭发的。这就有点跳进黄河洗不清的味道了。

1977 年 1 月，贾启允免职。1979 年贬到河北石家庄地区任副专员，1983 年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1986 年离休。中央一直未对他的这件悬案作结论。他在回忆录中则表示“问心无愧”。

明朗：

文革初期，李大章把 1962 年中央 7 千人大会上、四川有人写匿名信控告李井泉一事桶了出来。急于搜集打李材料的造反派到中央办公厅查到原信。造反派的侦破能力超过了李井泉的侦察班子，他们找到关押在四川大学的明朗。明朗承认是自己所为。这封信被四处传抄，成为李井泉反毛主席的铁证。作者清楚地记得信中的一句话：“四川已经饿死了一千万人，还要饿死多少人？”

同时他将守口如瓶长达１０年的“投票事件”解密，给李井泉再添一条罪状。

造反派视他为反李井泉的英雄，他成为最早一批被解放的干部，到赵紫阳任省委书记期间，升任省委宣传部长。

打倒四人帮以后，李井泉回四川活动。现在他已经知道念念不忘的两件事是谁干的，因受他牵连的老部下也纷纷官复原职，明朗便成了“四川小四人帮”成员，受到批判并被停职检查。

停职以后，赵紫阳安排他到中央党校学习，学习期间本已安排调入中央党史写作班子，结业后却突然被通知到武汉钢铁学校任职。原因是李井泉副委员长打了招呼：这个人不好，不能重用。

一气之下，他就拒不任职回了成都。不久，中央组织部又来电报，通知他到华东工程学院工作。他答复，我有话要向组织讲。

在北京，他的老上级、中央组织部长宋任穷，副部长陈野萍和他面谈。他讲了与李井泉结怨的前前后后。宋任穷说，李井泉打击报复干部的事我们了解，但这次是组织安排，与他无关。那所学校文革中搞得一踏湖涂，我们是让你去收拾烂摊子。

他在那里做了５年的党委书记兼院长，在选拔干部、评职称、调工资时多次采用“民意投票”的办法，大得人心。１９８３年离休回到成都。

晚年的明朗出版了一本诗集和一本文集。当年的省委农工部副部长，被李井泉斥为“坏透顶了”的夏戎就住在他的楼上。

“你不投票，李井泉栽到我头上！”夏戎耿耿于怀。

明朗笑弯了腰。

明朗现已去世。

宋文彬：

1963年，宋文彬升任西南局农业办公室主任，文革打倒。1975年后先后任绵阳地委书记、省农业厅厅长、省委副秘书长、省顾委常委兼秘书长，1995年离休。已去世。

曾箭：

在四川有一条规律，凡是文革前（包括文革初期）挨过整的干部，大部分在文革中都倾向造反派。

因为反对过李井泉并受到迫害，曾箭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推选进夺权领导班子。造反派打杖，他就成了派性斗争的牺牲品。另一派抓住他一个早已作过结论的“历史问题”，罗织罪名，把他软禁了几年。

打倒四人帮，清算造反派，又有他的份。

除了打倒李井泉的时候高兴过一阵子，一直不得昌盛。离休时，仍是副专员待遇。

经过和癌症几年抗争之后，曾箭于1999年2月1日逝世。前温江地区在世的老干部和各界友人1千多人参加了追悼会。一首名为《哀悼老领导曾箭同志》的诗分外引人注目。诗曰：

曾老伊如苍劲松，高风不与世俗同。

为反浮夸呈忠谏，被诬是向党进攻。

耿耿忠心为国是，面临风险仍从容。

下放农村第一线，为民依然勇顶风。

农村产量如实报，公共食堂不推崇。

所行深得民称颂，当时潮流不能容。
累遭批斗“肃流毒”，傲雪托霜自凌空。
身居劣境心自若，平生豪气贯长虹。
景仰高风吊长者，悼词有限意无穷。

申培林：



温江地委农工部长申培林，是个老右倾(1949 年南下四川时摄)。

冷板凳坐到文革前。文革中得到造反派支持，任专区革委会生产指挥组组长，另一派夺权，又把他撤了。打倒四人帮，又因“支持造反”关押审查。1982 年始作结论。

从 1959 年反右倾撤职，直至离休未恢复过职务。已去世。

景廷瑞

1962 年党内民主最活跃的时期发表过激言论的干部，四清运动中遭到李井泉的反攻倒算。景廷瑞对妻子田征说：“李井泉这条老狗，人民迟早要跟他算帐！”

文革中斗当权派，身为地委宣传部长的景廷瑞自觉接受批斗。见有的领导干部想不通或东躲西藏，他就骂：“有什么想不通？想想这些年来做了多少对不住人民的事？饿死那么多人，群众斗你一下有什么！”

由于“态度端正、历史清白”，他很快被解放并参加地革委工作。文革后重任地委宣传部长。1983 年温江专区并入成都市后退居二线，任市委宣传部顾问，1985

年离休。

“不能为党和人民工作”让他痛苦万分。他开始写小说:“要让那些为革命牺牲的同志流芳千古”。一部以他亲身经历为素材的《血沃汾滨》长达 110 万字，前后大改了 4 次。出版社嫌太长，缺乏“市场价值”。他又写第二部《粮食》，讲温江专区文革前围绕粮食问题展开的历史变迁，40 万字，未能出版。

他活得很沉重，活得很累。1991 年，人们听说那位离休后很少见到的“景老头”去世了。有人叹息，这样的共产党员恐怕永远不会再有。

喻权域:

喻权域被打成右派后，在西昌的金沙江边当了 6 年农民，然后回新华社四川分社当了 15 年勤杂工。

旧帽遮颜，埋头读书，读了大约两千本，系统钻研马列主义。“当右派前，我是个随大流的马克思主义拥护者，度完２１年右派生涯，我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

1978 年平反恢复记者工作，一工作就钻到风口浪尖上。当时中央内部正在争论农业的出路，一些人主张继续走集体化的大寨道路，一些人认为实践证明此路不通。喻权域抓住这个题目，和分社另一记者到宜宾县喜捷公社下食堂大队搞出四篇调查报告，说明农业的出路在于反左。报告获赵紫阳和新华总社首肯，于中央两种意见激烈交锋的 1978 年１１月１３日播发，人民日报和各大报刊均以头版头条刊载，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纠左助威，一炮走红。

1979 年奉命创办《半月谈》杂志，在新华社工字楼顶层一间旧办公室里摆下桌子，和同事约定，发行量不超过１５０万份决不罢休。３年后，发行量超过３２０万份。喻先后任副主编、主编。

1982 年后先后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经济参考》报总编，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

抚今追昔，他对自己的老本行有一段肺腑之言。

建国以来，党和人民受“刮风”之害可谓大矣，决策失误，新闻界自觉或被迫地推波助澜，破坏极大。因为中国地广人多，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干部和群众文化水平较低，上面说十句话，到村里只剩一句话；上面刮６级风，传到下面会成１２级台风。中国读者是把党报当教科书的，报纸上几句过头话，下面会一哄而起，搞乱了只好一刀切下来，这就叫折腾。

张慎：

1957 年打成内定右派，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反右倾运动中又因给中央写匿名信

罪加一等，多数时间在乡下劳改，次次运动在劫难逃，凭信念活着。

1983 年地市合并，由原专区农业局调西南财经大学任教，１９９５年始恢复党籍，有多篇调查报告及学术论文问世。

几十年在黑暗中生活，惊、忧、恐、吓，使他的精神始终在被迫害的恐怖阴影中绯徊。他可以写出条理清晰的漂亮文章，同时每年要给校方打一个《狂人日记》式的报告，控诉遭受的种种“迫害”。试录几段于下。

总的情况与往年基本相同，继续拿我的全部心做试验。方法还是物理化学生物高科技，不让我像常人一样的生活。全年除强化各种声响及其它有形“暗示”外，有时主动找上门来，猛击屋门，隔门对话后又以超常速度离去，开门后人又不在……

除全身各部位轮番刺激有时甚至痛得叫出声外，还有“冷伤害”、“热伤害”、“风伤害”以及多种食物变质变腐等诸多试验。以冷伤害为例，今年１０月气温１５度以上就开始冻足化脓，并新增半夜冻醒试验。卫士（作者注：他养的鸟，认为可以保护他）们遭受的同样的刺激站立不起而短命殉职。总计二年购回卫士３０位，死亡２７位……

头部刺激包括昏睡型、晕眩型、刺痛型，……阻滞我的函件往来，不让我正常“产蛋”（作者注：发表文章之意）

……来自头顶的“传统”跟踪刺激从书房到寝室到厨房，乃至到厕所都不放过；“常规”化脓已搞到左右姆指，遥控刺激距离逐渐延伸，……中断用电，经查看上下左右均未停电，待点燃蜡烛旋又恢复供电，类似干扰在供水供气乃至使用收音机、电剃须刀等都时有出现……

盼校党委制上这些违反党纪国法的事重演，盼各位同志在可能范围内助我一臂之力！……

他怀疑妻子“在枕头里放针”以图谋杀他，长期与妻子分居。１９９８年初，出于对千方百计置他于死地的无形力量的巨大恐惧，他只身回到温江，躲进一间出租房。3 月，邻居发现他几天不见出部，找人撬开房门，发现他倒在地上，已死去几天了。

王万澄：

王万澄 1962 年“精简压缩”回乡当农民。对作了杀头准备的他来说，已属万幸。

他不知道匿名信发出后发生的一切，更不知道那封批转下来的信还躺在专区公安处的档案柜里。随着时光的消逝，他相信它早已石沉大海。他有了 4 个女儿。

但是公安机关内部有人知道这件事。1969 年，有人要夺权，就把这封字迹已经褪色的信从档案堆里翻出来了。

那正是造神运动登峰造极的岁月。地革委人保组和公检法军管会如临大敌，以

这封信发出的时间 1960 年 11 月命名为“6011 反革命案件”，印发案情简介，散发全专区四处张贴：

1960 年 11 月中旬，反动透顶的反革命分子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投寄了一封内容极端反动的反革命匿名信。由于旧公检法长期以来执行的是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使这个凶恶的阶级敌人长期以来逍遥法外。……

抓暗藏反革命的“人民战争”打响，包围圈逐步缩小到地专机关，人人提线索、亮思想、对笔迹，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事隔 9 年之后，王万澄捉拿归案。

1970 年 5 月 12 日，判处王万澄死刑、“立即执行”的报告送到省上，又是省上救了王万澄一命，改判“缓期两年执行”。

1979 年春，王万澄无罪释放，摘右派帽子，恢复党籍，恢复公职。

出狱三个月后，４８岁的王万澄患癌症去逝。

叶成章：

因揭露红光公社虚报征购在反右倾中受批判后，下放红光公社劳动。深知实情的地委半年后将他调专区粮食局工作。

1964 年四清运动中，写材料揭发刘致台等人弄虚作假、嫁祸于粮食部门的祥细经过。1965 年任郫县县委常委。1982 年任专区卫生局副局长，1983 年地市合并后任成都市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1995 年退休。

退休后在老家郫县三水乡建一小院，看书、种地，有时和乡亲们在“么店子”里喝茶、打麻将。

刘致台：

因为大跃进犯了错误，虽然地委副书记的头衔没动，仍回郫县任县委第一书记。鉴于大跃进的教训，政策执行比较宽松。1964 年四清运动，郫县被划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敌占区”。被撤销地委书记、县委第一书记职务，下放劳动。此后没有恢复过职务。离休时落实政策，恢复副地专级待遇。

离休后同曾筎同住一个单元楼，有时一起参加老同志聚会，谈天气，谈身体，绝对不提大跃进。

他心情抑郁，身体病弱，但是乐于助人，哪个干部要落实政策，哪家的孩子要安排工作，他骑着自行车到处跑。

有人说，他是个好人，就是少了根脊梁骨。1998 年 4 月，刘致台去世。

郑凤兰：

1961 年整风整社后撤职"阴消"。后调到丈夫潘克之所在的华阳县工作。四清、文革曾被揪回原红光公社批斗。先后随丈夫到广汉、温江地委工作，1983 年任成都市档案馆副馆长，现离休。

本文大量材料来自于市档案馆。

潘克之：

1960 年调任华阳县委副书记。四清受郫县问题牵连，调广汉任副县长。

他的仕途在文革中出现转机，1975 年任地委农工部部长。1979 年任地委副书记。曾作为援藏干部，调昌都地区任副书记两年，大部分时间因身体不适应在温江养病。1983 年地市合并后任成都市副市长，后任市人大常委副主任。

说明：
附表：
四川农村人口及粮食情况
1950—1963 年四川人口及自然变动

附表一：四川农村人口及粮食情况

附表一：

四川农村人口及粮食情况

（1949 ----1966 ）

时间（年）	农业人口（万）			粮食产量（亿公斤）		国家征购（亿公斤）		人均留粮（公斤）	
	数量	比上年增减	比上年增减%	数量	比上年增减%	数量	占产量%	四川	全国
1949	5.239			149.4					
1950	5.336	97	1.9	144.9	-3				
19551	5.438	102	1.9	153.6	6				
1952	5.694	256	4.7	164.2	6.9				
1953	5.839	145	2.5	170.9	9	52.9	29.6	216	233
1954	5.894	55	0.9	190.3	6.3	64.8	34.1	213	227
1955	6.009	115	2.	196.0	3	57.4	29.3	230	250
1956	6.096	87	1.4	215.6	10	59.5	27.6	256	274
1957	6.189	93	1.5	213.0	-1.2	65.6	30.8	238	268
1958	6.039	-105	-2.4	224.5	5.4	70.1	31.2	256	261
1959	6.814	-225	-3.7	158.2	-29.5	77.4	48.9	139	189
1960	5.552	-262	-4.5	133.9	15.3	61.8	46.2	130	176.5
1961	5.487	-65	-1.2	115.5	-13.8	44.7	38.8	128	199.5
1962	5.672	185	3.4	143.5	24	41.9	29.2	179	216.5
1963	5.850	178	3.1	170.0	18.5	45.9	27.0	212	220.5
1964	6.043	193	3.3	180	5.8	45.1	25.2	223	240
1965	6.228	185	3.1	205.5	14	48.8	23.8	252	244.5
1966	6.413	1985	3	21.0	7.5	50.2	22.8	267	264.5

注 1. 资料来源：周国瑞：《四川农村粮食购销》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2. 四川 1953 年以后的粮食产量统计包括杂粮（洋芋、红苕、豆类等，大跃进期间甚至包括萝卜）。征购的均为主粮（大米、小麦、玉米），农民留粮中相当一部分是杂粮。

3. 表中一些资料与文中有出入，仅作参照。

附表二：1950—1963 年四川人口及自然变动

附表二：　1950 年—1963 年四川人口及自然变动

年代	总人口（万）	出生		死亡		自然增长	
		人数（万）	出生率‰	人数（万）	死亡率‰	人数（万）	增长率‰
1950	5830.0	164.99	28.55	52.47	9.08	112.52	19.74
1951	6120.0	173.20	28.99	55.08	9.22	118.12	19.77
1952	6411.0	181.43	28.96	57.70	9.21	123.73	19.75
1953	6551.0	185.39	28.61	58.96	9.10	126.43	19.51
1954	6648.6	186.44	28.25	55.80	8.45	130.64	19.79
1955	6790.6	190.79	28.39	61.68	9.18	129.11	19.21
1956	6945.2	195.73	28.50	71.50	10.41	124.23	18.09
1957	7081.0	204.89	29.22	84.63	12.07	120.265	17.15
1958	7077.9	170.15	24.03	178.18	25.17	-8.03	-1.13
1959	6897.3	116.74	16.71	328.20	46.97	-211.46	-30.26
1960	6619.8	79.30	11.73	364.74	53.97	-286.44	-42.232
1961	6459.2	77.26	11.81	192.36	29.42	-115.11	-17.60
1962	6485.6	181.31	28.01	94.65	14.62	86.66	13.39
1963	6695.8	330.23	50.11	84.52	12.82	245.71	37.28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 · 四川分册》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8 年 7 月第一版。

注：　1957 至 1961 年的人口统计数有多种版本，当时的统计资料非常混乱，和该统计数相差很大。